

忆民国时期发生在宁城的几件事

沙万川

一、剪辫子

清朝末年,宁城汉治属平泉州,蒙旗属喀喇沁中旗。当时宁城人民在地主、官僚的压迫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11年(宣统三年)秋,武昌起义成功后,宁城仍像一潭死水,人们生活和风俗习惯依然如故。当时汉族妇女一般都缠足,老太太带着船形纂儿,中年妇女梳盘头,姑娘是满发一根辫,男子梳“雉发”。所谓“雉发”,就是头发梳得象雉鸡尾一样,头部生发处四周剃光,将顶部头发梳成一根辫子,垂在脑后,有时盘在头顶上。

农历四月初八日是宁城大明庙庙会。这个庙会远近闻名,前来赶会的不仅有本地人而且有辽、锦及关内商旅。有的拜佛求福,有的来做生意,有的来看热闹,集会常达数十万众。

就是在1912年的大明庙会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伙人,硬是给剪辫子。他们到处讲演:“清朝已被推倒,现在是中华民国,辫子是野俗,应该剪掉”,等等。说着采住几个人硬是剪。被剪掉辫子的人,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逃跑;有的看到剪辫子的人都没有辫子,并且还很洋气,也就自愿剪掉。对这样的人不仅剪掉辫子而且用推子推上一推。这样的发式,当时叫“洋秃”。

从此宁城男子的“洋秃”发式逐渐推广开来。剪辫子不仅在庙

会上剪,而且在集市上也剪过。

二、鞠躬礼

随着民国的建立而有了“鞠躬礼”。这种礼法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的汉人男子行“作揖”、“叩首”礼;女子行“下拜”,“叩首”礼。所谓“作揖”就是双手抱拳由下而上举至额前,再放下双手。根据受礼人的身份而定“作揖”的深度。对长者作揖要伴随鞠躬;对最尊敬的人要大鞠躬,称为“扫地揖”;对平辈敬礼或对晚辈还礼时,抱拳即可。在向长辈拜年、祭神、祭祖先(包括吊祭)要行叩首礼。所谓叩首礼,俗名磕头。叩首的方式:(一)、作揖;(二)、左腿前伸半步、左腿前弓,右腿膝盖着地呈半跪式,将左腿撤向右腿并拢成全跪式;(三)、双手前伸半步远,手指按地,头朝地面点下,是谓“叩首”。拜年、祭祖先、吊祭时,叩首四次,拜神、佛叩首三次;(四)叩首完后,在双跪的基础上,左腿前伸半步呈半跪式,然后站起,右腿跟上半步,直立;(五)、作揖,叩首礼完成。遇有丧事叫“磕孝头”。“孝头”不作揖,双膝直接跪倒,一般叩一个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连叩数次。汉族女人通常行“拜礼”。“拜礼”的作用和男子的作揖相当。其做法是身体直立,双手捧腹上体稍向前倾,再恢复原位。女子“叩首礼”和男子叩首礼基本相同,只在叩首时,双手捧腹上体前倾点头即可。

蒙民普通的敬礼,俗称“打千”。男子打千时左腿前伸半步,双膝弯屈,上身直立,双手下垂、松握拳,然后起立。给近亲、长辈拜年或婚丧嫁娶时行“叩首礼”。行叩首礼的程式:(一)、打千;(二)、在身直立的基础上,先跪右腿,呈半跪式,撤左腿与右腿对齐,呈全跪式,双手扶地面,头点地面。拜佛时:(一)、双手合十,先举手至额

前,再移至胸前;(二)行叩首礼;(三)双手合十。在拜佛时,有时行跪爬礼。所谓跪爬礼,就是双手合十,右腿上前一步,俯身,将身体贴在地面上,左脚跟上,头点地面。起立时,左腿前屈半步远,起立恢复站立姿势。如此周而复始。为了表示虔诚,有的爬几里、几十里或几百里不等。

辛亥革命后,在中国人民的礼仪中增加了鞠躬礼,并且逐步推广开来。跪拜礼逐渐成为特殊情况下的礼节了。

三、汉罗札布晋爵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喀喇沁中旗王汉罗札布同喀喇沁右旗王贡桑诺尔布一道响应孙中山的主张,拥护共和。

1912年8月民国政府发布《内蒙待遇条例》。9月下旬,发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封爵》的决定。由此喀喇沁中旗王汉罗札布由辅国公晋升为镇国公。1913年(民国二年)晋升为贝勒,1914年(民国三年)晋升多罗郡王。

四、商铺的开设与“洋货”上市

在民国建国后十余年间,宁城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宁城境内许多商铺,大多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开设起来的。仅小城子一地就有:永安堂药店,庆红斋、通泰兴、福兴堂、万增永、会成兴等杂货铺。此外如:八里罕、和硕金营子、榆树林子均有大商铺的开设。在商店或集市上也出现了:“洋火”、“洋油”、“洋烟”、“洋布”、“洋驴子”(自行车)……洋货。这些洋货逐步取代了:“取灯”(用麻秸蘸硫

磺做成的火柴)、麻油、叶烟或水烟、土布(亦称家机布)等。

五、直奉战争对宁城的影响

1913年(民国二年),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受到外蒙古军队的威胁,袁世凯派毅军进驻热河,姜桂题任热河督统。1921年(民国十年)奉军进驻热河,汲金纯为热河督统。1922年直奉战争打响,米振标驱逐奉系军阀汲金纯进驻热河而为热河督统。1924年(民国十三年),直奉战争又起。当地人称民国十三年为“大变乱”。直系军阀失败。奉系军阀派阚朝玺为热河督统。同年西北军师长宋哲元驱逐阚朝玺任热河督统。1925年汤玉麟开赴热河辅助阚朝玺。1926年汤玉麟逐走宋哲元,由此汤玉麟为热河督统。

汤玉麟,字阁忱。原热河(今辽宁省)朝阳人。他为人傲慢不逊,剽悍残忍,以绿林蛮勇汉之首而闻名。早年横行于辽西一带。

民国五年十一月,因汤在省城放赌,张作霖、汤玉麟发生矛盾,以致发生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汤玉麟失败下野。

民国七年张作霖复用汤玉麟为最高军事顾问。1926年率十二师驱逐了以宋哲元为首的西北军势力而盘踞热河。

在直奉军阀互相角逐中,宁城虽不是主要战场,但常过胜、败的军队,胜军到处,要吃要喝。在军队流传着:“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老干饭”的说法。不仅如此,他们还强征骡马以为军用。败退的军队散者为匪,到处抢劫,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兵匪一家”。著名的“老耗子”(匪号,真实姓名不详)匪帮就是从军队里炸出来的。他们有匪徒千余人,拥有机关枪和迫击炮。他们的据点是驿马吐川,因为他们人多私欲大,抢夺一般的老百

姓，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抢大户。当时大户都雇炮手看家护院，一般的股匪是难以攻入的。但“老耗子”这样的匪帮确实使大户害怕。当时的大户一般都采用“积极防御、和土匪头子拉关系”的两手策略来维护自己。朝拉海沟苏东川是运用这种策略达到目的的典型人物，他把土匪头子待如上宾并拿出部分家财供给匪帮开支，因而保住了他的家业。榆树林子万成当和榆树底老孟家则是失败者。

1930年农历三月三十日，“老耗子”率匪徒攻打万成当，他用上机关枪和迫击炮。万成当有炮手20人，双方对峙了一天。夜间，匪方抢占了院南炮台，匪首二当家的国老疙瘩被炮手打死。匪方用迫击炮轰击北炮台，炮手退向老哈河北。匪徒打开万成当，抓住马掌柜的，抢走100多匹骡马和无数钱财，纵火烧了前柜房和客屋。

从此贼势大振，扬言下一步攻打榆树底孟家。孟家见万成当抵抗失败，便托“舌家子”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协议：匪首和孟家交朋友，给匪帮一些粮饷，匪徒全到孟家犒劳一顿。但匪徒到了孟家，便大抢起来。结果孟家损失惨重。

从此宁城的大户拼力拒贼。“老耗子”匪帮曾扬言要抢八里罕孔家，但孔家加紧防备，土匪没敢去打。

民国十三年(1924年)后，宁城地区盗匪横行。大帮土匪有千人之众。如：“战北”、“大抄手子”、“大喜字”等。小股土匪遍地皆是。红庙梁、水泉梁、叶柏寿黑山口都是插翅难飞之地。上集赶店也有土匪拦路劫财。此外，如杠子手，砸明火时有发生，盗窃、挖窟窿更是防不胜防。当时人民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由于盗匪横行，商路断绝，当地人民需要的外地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盐每市斤市价一元二角银洋。

六、汤玉麟的“包税制”和宁城县的建立

北洋军阀统治热河时期,以汤玉麟统治时期最为残酷。他为了搜刮民财,实行包税制。所谓包税制,就是把一个地方税收数额,包给地方大户,大户再分配给乡、保。包税人为了自己不缴税还从中得到大量油水,就层层加码分摊在老百姓头上。当时有句俗语:“汤玉麟坐热河天高三尺”。意思是汤玉麟把地皮刮下三尺因而天高。宁城建县就是包税制的产物。

汤玉麟为了收税方便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把平泉县老哈河以北四、五、六区(包括喀喇沁)设大宁设治局,将这一带的税务包给当地大户。为了争夺包税权,小城子、大城子和公爷府的大户互争县城治所。小城子孟广安在督府有本家,争到包税权,从而把县治所设在小城子。因为“大宁”与山西省大宁县重名,4月改为宁城设治局。1932年10月1日改为宁城县。

七、结束语

宁城在民国年间,是受北洋军阀统治的。直奉战争以前,宁城地方的经济、文化略有发展。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后,宁城人民遭受兵、匪扰害。加上沉重的苛捐杂税因而民不聊生。特别是1928年的大旱灾致使次年的米价上涨到十四块银洋一斗(一斗小米八十斤)。宁城境内饿殍载途,逃荒者不计其数。地主乘机兼并土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1984年7月

宁城县的白莲教及其集体自杀

沙万川 整理

民国十四年(1925年),黑里河人吴洪文,原以卖木杓为生,后入巴里营子宣讲堂。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到必斯营子娘娘庙(自然村名,不是庙名)传白莲教。

白莲教的基本宗旨是“脱凡胎,成神仙;戡乱世,建佛国”。经过一个时期的宣传,由黑里河、水泉梁前、必斯营子、榆树底等地来了一伙教徒。最后巩固下来的有三十五、六个人,其中有十多名妇女。

教徒的生活来源,一是靠信徒捐献;二是靠化缘。有的信徒把全部家产献给教堂。这样,他们在娘娘庙盖起了一所九间的禅堂,并占有一个院落。

他们的修炼方法是:1、烧香拜佛;2、诵经;3、戒烟、戒酒、吃素食;4、练功。练功有坐功和武功。练武功时敲锣打鼓,手持大刀、长矛进行操练。平时身穿白衣。把一间禅堂用蜡纸裱糊,名之曰“雪花洞”,“娘娘”住在其中。起初当地居民可以自由去看,后来越搞越神秘,就不让别人看了。越是这样,外面的传说也就越多。什么准备了纸人纸马啊,教堂里有白兔子精啊……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如此经过四年之久,众信徒信得入迷。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历三月初,平泉县于荣光(据说是县长,未考证),率一小部分军队到必斯营子一带活动,听到娘娘庙有白莲教就去看个究竟。于带队到教堂大门前,白莲教徒拒绝他们入

内。军队破门而入。吴洪文率领教徒手持大刀、长矛向军队进攻。军队开枪射击，教徒奋不顾身直攻军队。吴洪文身中数弹也没退却。军人有的负伤，于是退走，并且扬言：回平泉搬兵荡平娘娘庙的白莲教。

吴洪文身负重伤，仍强作挣扎，聚众教徒商议应急措施。吴洪文向大家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升天的机会到了。用土遁还是用火遁？请大家议决。”众教徒酝酿了较长时间，决定用火遁。

农历三月初七夜，众教徒将干柴放在禅堂周围。三十五、六名教徒连同孩子四十多人，分散在几个禅堂里，互相用绳子缠住胳膊，打坐诵经。外面点火，烈焰冲天。当地群众见此情形谁也没去救火救人，好奇地要看看这伙人怎样“遁去”。

火灭后，只见这伙人全部烧死在禅堂内。群众慨叹地将众徒分男女各埋一坟。当地人名之曰：“肉丘坟”。1973年“农业学大寨”时才将这两坟铲平。

调查附记：这个材料主要是必斯营子一队社员孙占一提供的，他今年66岁，父亲母亲都信白莲教并且常住教堂，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弟7岁，二弟弟6岁，小妹妹4岁）也被父母带到那里一同烧死。孙占一那一年12岁，跟祖父母在家生活。三月初七那天，他曾到娘娘庙去一趟，跟父、母、弟、妹见了最后一面。

一九八四年七月

宁城县的黄枪会

李仲三

黄枪会是一个成份复杂用封建迷信聚集起来的民间武装组织。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和白莲教、义和团可能有历史的联系,随着历史和环境条件的不同,有时带有农民起义的色彩,有时为地主阶级所利用。他们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宁城地方曾有过较普遍的发展。

一、黄枪会的兴起及其发展经过

宁城县黄枪会的总法师是陈国均,一肯中西三爷地村人。他是农民出身,幼年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嗜好赌博。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因逃荒和避赌债,带领妻儿去热河省北部天山县谋生。在文化落后的天山,他教了三年私塾,于1933年二月又回到故乡。当时日寇正大举侵入热河全境,腐败透顶的军阀汤玉麟的军队,不战自溃。省以下各级政权都走散,伪政权还没建立起来,地主阶级的“联合武装”,自身难保,因之土匪、溃兵,猖獗一时。这时陈国均自言他在天山学过黄枪会,能“刀枪不入”,可以保家护院。首先在土匪危害严重的五化和石佛一带铺坛授徒,打散了几股土匪,地方暂时安定下来了,人们遂对黄枪会产生了信仰,陈国均也成了当时当地的名人。地主们看到土匪怕黄枪会,不怕他们的“联合武

装”，而且黄枪会散而为民，聚而剿匪，既无军费负担，又聚散灵活，较之雇“炮手”有力，同时也方便得多，所以不少地主也参加了黄枪会，并请有名气的法师住在他们家，镇压土匪。如马杖子的地主兼土豪劣绅王复国（是陈国均的堂妹夫，当时旧社会的师爷）还成了黄枪会的重要首领之一。陈国均、田峻岐就长期住在丛杖子、大黑山一带的地主家，给他们镇匪护院。同年六、七月间陈国均回三爷地铺的一次坛，本村青年几乎全部参加了。会后田峻岐、陈国忠、陈国玉都当法师出去铺过坛。田峻岐是“半瓶子”儿科中医，不久到大黑山一带铺坛授徒，还亲自带领会员打土匪，成了有名的法师。石柱子洼村的胡广生在四龙头沟大梁东、大梁西一带铺坛授徒，就和大梁东村的杨德林一起，成了八肯中一带黄枪会首领，这样黄枪会在半年之内几乎发展到宁城全境。

二、黄枪会的宗旨和人们入会的动机

黄枪会当时没提出抗日要求，只是说：练好了能“刀枪不入，可以保家护院，打土匪。”人们入会的动机也各式各样。有的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人是为了顶门立户过日子，不受人欺负。因为那时的官、兵、匪、土豪、劣绅、恶霸、大地主都有武装，都可以随便压迫和欺负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以为“刀枪不入”就可以反抗别人对他们的压迫；有的人为了作生意，跑行商、赶集，拿上一根梭标，矛头上拴块黄布，过关、过卡、集摊上就可以抗捐抗税。那时候烟、盐、火柴、日用品都有税，收税的人是些兵痞、土豪、无赖们，从汤玉麟时代起就是包税制，他们从县里包下税来，到地方包办税收，保证上缴若干元白洋，余款归己。一般集镇地方，都有他们设的卡，门口两旁挂着“禁止绕越”和“严禁偷漏”的牌子，仍然为集镇上

的一霸。老百姓叫他们“税卡子”。所以有的人练黄枪会是为了对付他们。

三、入会、铺坛、授法

黄枪会的入会和铺坛,实际上是一回事。在铺坛的前几天,先进行宣传,人们亲自去找法师报名,法师当面表示允否。对当过土匪和行为不端的人,要向法师当面保证:“以后改邪归正,永不再做坏事”,才被允许入会。铺一次坛是七昼夜。坛场设在没人住的一两间大房子里,摆上香案,供上关公牌位。铺坛的第一天晚上,报名的人全部聚集在坛场,夜间由法师率领到河里或井边上去净身(冷水浴),回来后由法师对每个会员单独地秘密地授“护身法”,不准第三个人听见,所谓“法不传六耳”。护身法是“无量佛玉皇老爷把身护”这十个字。授了法才算正式入了会。第二天开始,每天上、下午、晚上,都在香案前“喝符”、“吸灯火”、磕响头,这就是练功。符是用黄表纸对叠起来的,在四个角上斜向纸中心写字。字文是:周公旦现灵;桃花女现灵;太上老君现灵;玉皇大帝现灵。每个角上写一个,用朱砂笔写,在香案前烧成灰冷水生服。“吸灯火”是在“喝符”前后,信徒用食指和中指并伸,在油灯(素油灯)火苗上划三个圈(从右向左转),同时张大嘴低头对准火苗猛吸。在“喝符”、“吸灯火”前后都要磕一阵响头。第三天晚上“过砖”,法师先过,在香案前上法,即:右手抹脸,左足跺脚同时默诵“护身法”。然后一手拿砖向另一只胳膊上砸三下,每砸一下嘴里喊一声“呔”,换手再砸,再双手拿砖向胸前胸后各砸三下,最后砸头顶门一下。第五天晚上,“过刀”,法师先过,上法以后,口喊着“呔”的同时,一手拿刀向另一只胳膊上砍三下,然后换手砍,最后双手推刀(一手握刀柄,一手握刀

尖)向前胸砍三下。那时的态度严肃中带有杀气,简直像要杀人一样,信徒们旁观都毛骨悚然。法师过完刀后,指名给信徒们逐个过刀。刀不锋利,是没开过刃的刀。第七天早晨过枪,过枪时都是选择在村头或村后无人的空地上进行。法师叫信徒们跪在地上掐诀念咒,他执土枪走出百步左右,掉转头来向被过枪人放枪。枪内只装黑火药,不装砂子。土枪的引火冒易受潮,十枪九不响,枪不响就认为炼好了。过完枪就算铺坛完毕,练人就算全练成了。枪场和过枪的场地,严禁成年人和妇女接近或窥视,特别是严禁怀孕妇女窥视。铺坛这七昼夜已婚者严禁与妻同室同床,所有信徒都要吃素。七天过后,每月初一十五吃素、平时不准吃高腿牲畜肉,每天早午晚要拜太阳(磕一阵响头)。

铺坛时法师除授给“护身法”外,还授给“避枪法”和“分子弹法”等。识字的人先学会了,可以帮助教给不识字的人,但必须遵守“法不传六耳”的规矩。铺坛结束时,法师还教给信徒作战要领。作战时,上法以后不准弯腰,不准回头看,只许一往直前地口里喊着“呔”向前冲杀,否则法就不灵了,还得重上法。

黄枪会的标志,主要是“黄法带”,黄缨梭标。没有兜肚,法带内也不装符咒。法带是用黄土布约三、四尺,顺长折四折,斜背身上,胸前部分写着“黄砂神兵”四个字,背后部分写着“团结一心会”,也有只写“一心会”三个字的。这些都与红枪会有区别。从这些方面看,红、黄枪会与以前的“白莲教”、“义和团”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四、黄枪会的活动和被镇压

黄枪会的活动,虽然还不到一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1933 年四、五月到八月。这个时期除了在老哈河以南打了几

次土匪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行动。多数是以个人抗捐、抗税或为行商保镖等为其特点。

第二个时期是从八月到十月。八月初,陈国均在老哈河以南铺坛时去哈儿脑庙上看戏,突然在庙上被保安分队(保安队是蒙古兵,当时蒙汉分治)逮捕,连夜解送到喀喇沁中旗大城子王府,于是以王复国、田峻岐为首纠合全县的黄枪会员,去宁城县请愿,要求县长(当时县里正由维持会向立县任命县长过渡)出面,向大城子王府交涉释放陈国均。理由是陈国均无罪而有打土匪之功,逮捕他是无理的。如果县长不去交涉,或交涉无效时,则黄枪会要攻打大城子府。在等待交涉时,黄枪会员不断向一肯中、八肯中集结,当时一肯中庙正唱戏,消息传得越发快,几天之内集中了五、六百人。头道营子的红枪会也由著名的杨法师率领二三百会徒赶来支援。地方的绅士和大地主们首先害怕了。他们一害怕黄枪会大批人吃喝骚扰;二怕打起仗来牵连他们,于是纷纷出面请求县长去大城子交涉,以平息此事。十月初,交涉成功,陈国均被取保释放。李县长和公安局长于虎臣,在“五家”接见了黄枪会的首领和部分会员,劝说他们解散。这时大部分人散了,但是一部分的人看到集中的势力大,大队解散后,又形成以一村或邻近几村的活动。

第三个时期,是从十月到 1934 年一月,这时已到冬闲,土匪也基本肃清,农民们最恨“税卡子”,这些横征暴敛的军伐爪牙,对什么东西都收税,于是各地的黄枪会就砸“税卡子”。人们把他们包围起来,缴了他们的武器,拿走他们的全部财物,吓得他们跪在地大呼求“饶命”,然后人们辱骂着扬长而去。一肯中的“税卡子”就是这样被柳条沟的黄枪会砸的。“税卡子”被砸后,当然要去向日本人告状,保安队也有兔死狐悲之感,怕农民斗争的矛头再指向他们,况且有逮捕过陈国均的前隙,也要求日本人镇压黄枪会。加上四龙头

沟一带由杨德林率领去“新地”打土豪兼汉奸的李焕惨败,于是日军在腊月初八早晨在全县范围内对有黄枪会法师的村子进行抄村。四龙头沟大梁东、一肯中西三爷地、老哈河南一些村子都在这天被抄了村。从此黄枪会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因之销声匿迹。

五、陈国均、田峻岐等法师的被捕

日寇在 1934 年一月大规模抄村镇压黄枪会时,只起到了镇慑的作用,并没抓到几个法师,他们隐藏在外。陈国均、田峻岐都隐藏在大黑山、大杖子一带地主家。在 1934 年夏初,黄枪会抓住了一个自称是探矿的日本人(很可能是个日本特务)名叫形川昭轩,陈、田等把这个人待为上宾,要求他向日本人疏通,说明黄枪会只打土匪,不反对日本,请勿再镇压。经过这个人的斡旋,答应只要不再集中闹事,可以不镇压。此后法师们都回家务农,五年以后到 1940 年春又重新逮捕了陈国均、田峻岐,陈、田当年死于承德监狱。说他们与八路军有秘密联系。杨德林兄弟二人都死在赤峰监狱。

黄枪会虽然被镇压下去,但那时候农民们对他们的印象并不坏。从抗捐抗税和反对压迫这些方面看,他们带有农民起义的色彩,为农民做了些好事。打土匪对农民利益不大(农民的财产不多),主要是对地主阶级有利,实际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这就是没有阶级觉悟,没有政治斗争目标,只靠封建迷信的农民起事,而必然走向失败的原因,也是解放后他们进一步为地主阶级所利用而更加反动的因素。

一九八四年七月

关于红枪会、黄枪会在小新地战斗的回忆

李钟芳

一九三三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攻占热河,地方上蠡贼、土匪蜂起,活动猖獗,宁城县的红枪会、黄枪会在抗拒日寇,剿灭匪患中逐步壮大。到当年冬季,南自山头,北至一肯中,东至老哈河,西至必斯营子成了红枪会、黄枪会的天下。他们为了壮大队伍,逐步向建平方向扩展势力。小塘地区伪保甲团团团长李焕(大塘人)发觉了红枪会、黄枪会的活动,立即调集了二百余名马队团丁驻扎在小新地村,并向日本人报告了情况,日本警务指导官——嘉荷谷接到报告后,亲自率领四十多名伪警察队(马队)赶到小新地,给团丁也带来了充足的弹药,准备过河进行清剿。与此同时,红枪会、黄枪会也把全部会众集结在大明的马占城子、城后一带,准备进击日本鬼子和李焕。约于十二月上旬的一天傍晚,近千名的红枪会、黄枪会在陈法师的带领下进入了天义一带。南自西道北至土城子,各个村庄都住满了人。他们全是农民打扮,身披法带,手持长枪,额头上有一个土中透紫的大疙瘩。对人和蔼可亲,吃的是大餐,小米干饭熬大菜。

次日黎明吃罢早饭,他们就匆匆忙忙地出发了。这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当出太阳时,就过了东小河,排成了长达五里的一字长蛇阵,大踏步地前进。这时候,日伪也正在小新地村西一条坝基上做着部署,准备出击。

会众行至半路,突然扑倒,一跃而起,勇猛地扑向了敌人。顿

时,敌人的阵地上一阵骚动,烟尘骤起,遮天盖地。会众未费吹灰之力就越过了大坝,隐没于尘雾之中了。继而,尘消雾散,战场上竟是一片空空,杳无一人,寂静异常,未过多久在远远的北面又响起了阵阵的枪声。

原来,敌人一见会众人多势大,难于抵抗,便慌忙放弃阵地,退至村中几个大院固守。北面的会众刚到喇嘛营子(在小新地北),发现了一座大喇嘛庙,立即进去磕头。南面的会众虽然已经攻入村内,但被北面会众召唤也进大庙磕头。因此敌人乘机倾巢而出,把大庙团团包围起来,开枪射击。

大庙的东南北三方都有可以凭借的掩体,所以敌人把大部分兵力放在这里。西面是一个平旷的开阔地,仅以少数人封锁着。院内会众只有七、八支枪,只能偶而打几枪以自卫。敌人亦不能冒险向里攻,也仅以间断的枪声相恫吓。这样,双方对峙约七、八个小时之久。

下午三点多钟,会众从庙里出来五、六十人,一出庙门就成队向西急跑。看情况,要到河西去请救兵。待他们跑出一里路时,庙院附近枪声大作,忽从南方拥出三十多名骑警,驰马赶来,追近队尾一阵手提式匣子枪,响声似爆豆,会众纷纷倒下。余众返身还击,狡猾的敌警早已掉转马头向南急驰而去。会众猛追一阵,越追越远。当会众再回头跑时,敌警却又尾随而来,照旧又是一阵猛烈射击,然后掉头就跑。如此往返三、四回合,会众余不满十,且皆疲惫带伤。犹拼命苦战,径插敌群,一人临危几人抢救。敌警一看无计可施,皆拔出战刀乱砍。足足打了半小时。最后会众终因众寡悬殊,全部战死。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战场上又寂静下来了。

太阳徐徐落入西山,夜幕降临了,夜色漆黑漆黑,天空星光闪烁,战场上安谧无声。人们担心庙里被围的会众,惴惴不安,只觉长

夜难熬。岂知,河西数千名会众在天交二更时分已过了老河,前来救援。他们这次用的是哭丧阵。一过老河就嚎啕大哭、大喊,哭声、喊声、跑声汇成了一股巨浪,如洪涛夜惊,震撼四野,如迅雷闪电直取大庙。当前锋到达大庙燃起一把冲天信火时,队尾还在队十里之外。此时,敌人早已吓得魂飞天外,狼狈逃窜,一口气跑出五十里,回了老巢——小塘。这场激烈的战斗,会众以初战惨败,然后又以强大力量吓走敌人而告终。

这次战斗,表现了宁城县人民英勇抗日的爱国精神,其义举当歌。然因囿于愚昧迷信导致失败,其结局可泣。

1984年12月

宁城县的天主教

李仲三 供稿

天主教传入宁城地方是在 1877 年前后。当时正是第二次英法联军进攻中国不久,满清政府被迫与法、英、俄、美四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在条约中,列强把在中国各地自由传教列为重要内容。从此,传教士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在中国各地自由行动,充当着特务的角色,成为各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工具。

一、天主教在宁城地方建立教堂的情况

1、那拉必流教堂:

那拉必流天主教堂在现在二龙镇,于 1877 年建立(清光绪三年,在建堂时地方送的匾额上刻着年月日),它是宁城地方最早建立的教堂。第一个神甫姓南(译者),法国人,以后他升为朝阳教区的主教(主教府在朝阳松树嘴子)。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春,比利时人方裕如任本堂和大司铎。当时该村只有蔡姓和张姓两户是天主教徒。1902 年至 1903 年朝阳松树嘴子等地的天主教徒纷纷迁移到那拉必流落户,由于户数增多,教堂又在原址进行扩建,占地六七亩,有二十来人的女婴孩院和初级小学一所。1939 年方裕如神甫调往义县天主堂主持堂政,雷振东神甫继任,雷也是比利时人。1941 年(康德八年),日本将外国籍神甫全部扣押起来,雷被押在沈阳,解放

后,他从沈阳返回那拉必流教堂,1947年土改运动中,雷拉拢本村落群众进行策反活动,将当时在该村搞土改的干部刘占元拖死。1951年,查清其反革命罪行,将他和另一名神甫越林士(荷兰人)逮捕法办;1951年将雷振东逐出国境,1952年将越林士逐出国境。

2、甸子天主堂:是宁城地方第二个建立的教堂,其建堂时间稍后于那拉必流教堂,赤峰教区成立后,属朝阳教区管,当地教民称之为“南堂”,把那拉必流称之为“北堂”。

3、三座店天主堂:是1937年(康德四年)建立。在1934年,日寇镇压黄枪会后,很多黄枪会员以信奉天主教表示与黄枪会脱离了关系,可以免遭镇压,因此宁城地方的天主教徒一时大增。1936年赤峰教区的赵庆化主教到那拉必流教堂、到有教徒的村视察了一趟,确定在三座店买地建堂。1937年买妥了姓宫的宅院,经过修缮和改建后,建立了三座店天主堂。夏相儒任本堂,夏是中国人。

4、一棵树天主堂:在现在大明镇,由雷振东神甫于1941年前后主持修建,比较简陋。越林士(荷兰人)住本堂,沈振远任副堂。太平洋战争后,由神甫钱鼎章任本堂。

二、教徒的发展情况

天主教在宁城地方,有两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开始设堂时,中国人一般不迷信外国的宗教,信教的人很少。在“义和团”时期,外国传教士遭到全面性的袭击、殴打驱逐传教士,焚烧教徒宅院的事,在宁城地方也发生过。到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满清政府被迫签定了各种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负责对被焚烧的教堂和教徒的宅院赔偿全部损失。教徒们以少报多,都乘机发了横财。那拉必流的高家,平泉街上的张子恒都是这样起家的。

传教士们依仗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地“包揽词讼”,诱惑农民入教。由于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有的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被迫信了天主教。教堂施行小恩小惠,利诱农民入教,如各教堂都设有初级小学,主教府设有高级小学,朝阳松树嘴子主教府还设有中学,北京主教府还设有大学(朝阳工商学院)。教民子弟可以免费上学。在教育落后的中国,有的县城都没有一所小学,所以教堂通过办学校,诱使一些农民入了教。学校设有宗教课(讲古圣经和新经),又诱惑一部分非教徒子弟入了教。通过这些办法在 1900 年以后一个时期,教徒大为增加。

第二个发展阶段是 1935 年前后,由于日寇在 1934 年镇压了黄枪会,会徒为避祸,不少人被迫信了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信徒家家都供有天主像,日寇一见挂像,认为不是信黄枪会的,可以免遭镇压,所以宁城地方在 1935 年前后又发展了大批天主教徒,三座店天主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据建国初期不完全统计,全县有天主教徒众 2,934 名。

三、解放后的天主教

全国解放后,我们国家的宗教政策是:信教自由,不信教也自由。宗教宣传不得在教堂外进行。天主教实行中国神职人员自传自养的方针,不再受罗马教皇厅的施舍。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前被迫信教的农民,现在绝大多数不信了。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不断地提高,因而摆脱了宗教对他们的统治,不仅摆脱了欧洲宗教的迷信,也摆脱了对中国传统的佛教的迷信。

一九八四年七月

宁城县的道德会

于注湘、于有才、李国章、张松朋、刘惠芳
王会川、刘汉杰 供稿 沙万川 整理

一、道德会的宗旨及其创始人

道德会创始于清朝末、民国初年。创始人江希张，号慕渠。山东历城人。约生于 1900 年。据传：江自幼聪明过人，周岁识字，三岁能文，对文人墨客对答如流，有“神童”之称；五岁著《大千国说》，九岁著《四书白话解说》。（笔者现存《四书白话解说》一部，署名著者江希张并有江的照片是否为其九岁所著，待考。）江希张以孔、孟继承者自居，以传孔孟之道而建立道德会。

道德会的宗旨是根据《礼记》中的《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实为大同”。在此基础上宣扬：“五伦八德”、“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父、母、兄、弟、夫妇、公婆、妯娌、姑嫂之道，借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同目标。江希张以此宗旨到美国讲学企图把孔孟之道传布于全世界，故有万国道德会之称。

万国道德会约于民国十几年传入东北及热河地区。这一带的宣传、组织者是王树桐，字凤仪，别号“王善人”。他是朝阳云蒙山王家营子人，雇农出身，由于好学，粗通文字，善于讲演，著有《王善人

讲习录》，因而成名。道德会传入东北以来，王进入朝阳道德会。日本侵占东北后，王进入沈阳道德会。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道德会不讲阶级斗争、不分国界、劝导人们安分守己，对他们的殖民统治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把王树桐请到新京（长春）任伪满洲国道德总会会长，并对他大肆吹捧，有什么：“梧桐生矣，于彼高岗。凤凰鸣矣，于彼朝阳。”的赞歌。1942年王树桐死于长春，将他遗体葬于朝阳云蒙山下，建立“王善人”墓。在新京（长春）道德总会铸有三尺高坐式铜像。

伪满洲国自建立道德总会后，全东北及热河地区都建立总分会（省级）、分会（旗县级）和支会（村级）。

二、宁城县的道德会

万国道德会宁城县分会成立于1931年末（民国二十年）。当时创办道德会的有史玉如和赵福堂。建立之初就设立男、女校。男校教员：李树基；女校教员：杨淑真。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后，由万国道德会热河省总分会派出以刘蒲东为团长的讲演团来到宁城（小城子）。由伪县政府出面邀请全县士绅参加听讲，同时建立伪满万国道德会宁城县分会。

会 长 贾 珍 贾 琳
名誉会长 冯景异（伪县长）
王雅斋（日伪协和会长）
理 事 长 董九如 张志贤（女）
监 事 长 高松林

还有文牍、会计、庶务等组织。除此之外，还设男、女校各一处。男校教员：缪贯浦；女校教员：吴国祯、于化航。在宁城（小城子）还

设孤儿院一处,有孤儿 20 多人,教员石宝玉。解放后,为我民政部门接收,做为福利院、幸福院、敬老院和光荣院的基础。

宁城道德会有地方士绅捐献的土地二百亩。商铺一处,名“德义兴”。商铺、土地的收入供道德会经费的开支。除此之外,宁城道德会还设“义地”一块,供经办道德会人员死葬之地。

道德会的主要成员是地方士绅。他们之所以参加道德会是由于日伪政府的鼓励;捐献一部分财产为了标榜自己是“善人”。同时,道德会又是结识社会上层人士绝好的场所。

还有一部分道德会的成员,他们是“道德”的笃行者,认为“道德、仁义”是人类的本质因而献身于道德事业,其中有一部分过去是宣讲堂的信徒,道德会“虽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念还是根深蒂固的。

道德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讲演团进行讲演。一般各级道德会都设这个组织,个别支会也有不设的,专靠别的讲演团来。讲演的内容都是根据它的宗旨和目的,讲家庭中男女、男男、女女之道,上级道德会有时发讲稿和派来讲演团。其它内部组织都是为讲演团服务的。

道德会的另一项事业是办学校,特别是女校,是各级道德会所不可缺少的。根据道德会的宗旨:要达到大同目标首先是“齐家”,也就是先把家庭搞好。因为女子在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道德会都办女校。女子在女校先学识字,进而学《女子四书》和《孝经》。道德会不主张妇女缠足。道德会的成员在会内一般素食,但外出、回家不拘。

宁城道德会建立之后,在宁城各地普遍建立起支会。支会一般设会长、理事长和女校。他们主要是接待讲演团,个别的也自己组织讲演团。现将宁城各地支会简录如下:

万国道德会瓦房支会

会 长 贾琳

万国道德会八肯中支会

会 长 曹德顺

理事长 温选三 刘 永

设有讲演团并办女校一处。

万国道德会三座店支会

会 长 史洛文

理事长 张效忠

女校教师 刘惠芳 王凤兰

万国道德会马架子支会

会 长 刘名远

理事长 任忠和

女校教师 孙xx 杨xx

万国道德会八里罕支会

会 长 史玉如

理事长 杨萃轩

理 事 赵福堂 李 鹏

干 事 赵国恩 陈万宝 张松朋

万国道德会双庙支会

万国道德会黑城支会

万国道德会甸子支会

万国道德会榆树林子支会

万国道德会黑里河支会(会址在四道沟)

万国道德会汐子支会

万国道德会二龙支会

万国道德会和硕金营子支会
万国道德会地南头支会
会 长 张洪恩
万国道德会天义支会
万国道德会山头支会

(三)道德会的反动

1943 年以来,抗日游击队在宁城地区的活动非常活跃,袭击了榆树林子、必斯营子分驻所和兴农合作社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派兵力到宁城进行讨伐;一面胁迫部分协和会员和道德会的讲演团到各地进行反共宣传。春节前后,由警尉补梁均带的宣传队到黑城、二道营子、头道营子一带活动。他们还配备了 120 多人的武装进行保护。三区队长高桥化装成老百姓亲自到现场侦察。最后决定消灭这支宣传队。

一天夜间,高桥率领三个连将反共宣传队包围。这时梁均还在睡大觉。他得知情况后,村西的敌人已被我军俘获。他下令不进行抵抗,藏在老百姓的糠囤里,后来也被抓住了。他们 120 多人全部被俘。高桥队长对他们队长以上的人进行教育争取,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人员全部释放。道德会讲演团的成员多数是养尊处优的姑娘,她们只能趋炎附势按日伪宣传材料照本宣科。经过这场震动都吓得魂飞魄散,解散回家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宁城县 1290 年发生的强烈地震

内蒙地震局宁城地震台 胡廷荣 供稿

自公元 1038 年(宋仁宗景佑四年)到 1290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全国已有 252 年未发生大于 7 级的大地震。1290 年前,华北已有 165 年未发生大于 $6\frac{3}{4}$ 级的地震;东北地区已有近 80 年连大于 $4\frac{3}{4}$ 级的地震也未发生(据《中国地震简目》)。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震活动平静期。

到了 1290 年,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社会政治、经济已逐步得到安定和发展。宁城地区沿金以来的政治经济地位,元代仍在大定府(今大明城)设路治(元初大定府为北京路总管府,至元七年改北京为大宁,二十五年改为武平路,二十九年复为大宁)。辖今宁城周围地区,“领司一、县七、州九”。(据《元史》),面积 7 万平方公里左右(接近今赤峰市面积)。全路人口 20 多万(据《元史》:壬子年有户四万六千六)。路治大定府的人口估计有数万。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震活动平静,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的较为安定的背景下,1290 年 9 月 27 日(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深夜,在武平路路治大定府附近(今推断在其东部,即北纬 41.6° ,东经 119.3°),发生了近 7 级(国家地震局推测为 $6\frac{3}{4}$ 级,即相当 6.5~7 级)的强烈地震(史书多称“武平(路)地震”,也有称北京或大宁地震者)。关于这次地震的史料存世不多,发现的有关碑刻文字也极少。但我们从中仍可看出这次地震的概况。

根据《元史》所载的地震破坏,今推断这次地震震中附近(包括大定府在内的极震区)的地震烈度(破坏程度)为九度。《元史·本纪》载:“(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压死按察司官及总管府官(均为路级主要高级官员)王连等及民 7,220 人,坏仓库局 480 间,民居不可胜计。”地面破坏也很严重。《元史·赵孟頫传》载:“(至元二十七年)是岁地震,北京(武平)尤甚,地陷(可能为局部沉陷),黑沙水涌出……”。

最近,我们对大明城(元代大定府)现存的辽代地面建筑大明塔(又称大塔)上的破坏遗迹进行了考察,经考证推断,此地震使大塔遭受了严重破坏(有关震害遗迹考证已刊《华北地震科学》,这里略)。塔身至今还留下十处明显的砖砌体扭转错位或开裂(已堵)破坏遗迹(东面扭错最重,自 2-6 层竖向贯穿 5 层,水平错距 15 厘米,垂直错开 8 厘米)。木结构的第一层大檐的正心枋和撩檐枋上(咬榫处)也留下了显著的拉开错位遗迹(有五面被拉开 14-17 厘米)。虽经清代和最近的两次大补修,这些破坏遗迹也难消除。地震还给大塔造成了五条外表时断时续、每条总长度在 10-30 米,一般宽 2-8 厘米的竖向裂缝(主要在 2-7 层分布,即塔的中部),局部裂缝有些宽 17 厘米以上,最宽处为 25 厘米左右(东面三层),里面至今尚积存了大量鸟粪。据其内部透风情况推断,裂缝内部可能有横向贯穿处,大塔的地震破坏遗迹考证认定,为研究武平路地震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关于极震区以外地区的震害,目前只见于辽宁义县奉国寺(距震中 160 公里)有公元 1303 年(元大德七年)重修奉国寺碑铭载:“(大奉国寺)经庚寅(1290 年)地震,欹斜蹇崩,殆不可支。”即奉国寺遭遇武平路地震,经剧烈摇晃颠簸破坏,已将要倒塌。

这次地震发生在深夜,当是地震死亡人数偏高的一个原因,这

是东北地区有地震史料以来地震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地震。其震级比 $6\frac{3}{4}$ 级有可能略大一些, 或为 7 级更妥些(有关讨论见《华北地震科学》1984 年 1 期)。

限于当时的落后通讯方式, 地震五天后(己亥)京师大都(今北京)才得到地震是发生在武平路路治附近的确切报告。忽必烈于是派平章政事(位次于丞相)铁木耳和枢密院官(管军事机密、边防及宫廷警卫等事务)塔鲁忽领兵 500 人视察救灾(据《元史·世祖纪》)。

主震后 15 天, 震中附近又发生了一次强烈余震。盗贼乘隙剽劫, 老百姓更加担心、恐惧。平章政事铁木耳采取了减少租赋, 罢(免)商税、放宽对酿酒业的限制、斩为盗者等措施, 并发钞 840 锭, 转海运米万石进行救灾(据《元史·本纪》)。

元统治者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救灾, 以缓和阶级矛盾。如第二年“以地震故, 免侍卫兵籍武平者今岁徭役”。至元二十九年又“以武平地震, 全免去年税”4, 536 锭, “今年量输之, 止征”2, 569 锭。

元统治者将大地震看为“应人事”的不祥灾异, 乃“召集贤、翰林两院官, 询致灾之由。”并于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丙子, 罢征理司”, 又大赦天下, “以塞天变”。

尽管元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救灾措施, 但必竟有限, 重灾区所处的武平路第二年春发生饥荒, 且“百姓困于盗贼军旅”的袭扰。为拯救百姓, 统治者再次赈武平饥民, “仍弛捕猎之禁”, 并“免其去年田租”(《元史·世祖纪》)。

根据元代因地震更改地名的实例, 有历史地震研究者认为, 元代因地震更改地名的时间(自地震到更名)至少是余震未止的时间(见《地震》1983 年 5 期, 如 1303 年山西洪洞 8 级大震后二年地

震不止,乃更太原为冀宁路、平阳路为晋宁路)。武平路地震后两年将武平改为大宁,目前虽未查见更名原因的记载,但据元代因震更地名的实例来推想,显然也是因震更改地名“以塞天变”。“大宁”比“武平”要吉利得多,统治阶级企图以“大宁”换来地震宁息。据此,可推想武平路地震的余震活动至少持续二年。

武平路地震的晚期(此时已称大宁路)余震活动是明显的。据《元史》载,自 1314 年(延祐元年)3 月至 1315 年 1 月大宁路发生 4 次强烈有感地震。1328 年到 1332 年间大宁路又发生了 4 次强烈有感地震(据《元史》)。

由此推断,武平路地震的序列属主震——余震型。

武平路地震是我国(也是大华北)进入第二个地震活跃期的起始地震(也是一种“信号震”),是有地震史料以来东北地区发生的最大地震之一,也是辽西地区发生的最大地震。

一九八四年十月

宁城进攻战斗始末

段苏权

宁城(小城子)之战,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后,我热中军反击蒋军侵犯解放区的首次进攻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我热河军民战胜蒋军的信心,而且初步取得攻坚战的经验,为积极防御战略创造了条件。

撤出承德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军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八月下旬,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三军分两路向承德扑来:以十三军之五十四师(附八十九师一团)为右纵队,由黄土梁子经大庙,企图从承德的翼侧截击我军;以十三军军部及第四师和八十九师一个团为左纵队,由平泉经六沟前进,指向承德。

承德是群山环抱的战略要地。这里有清代重要的夏宫“避暑山庄”,有建筑壮丽堂皇、富有民族风格的“八大庙”。日寇投降后,我军收复了这座古城。冀热辽党政军首脑机关就驻在这里。

当敌人向承德扑来的时候,我军驻承德地区的部队少,机关多。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走后,这里只有热辽纵队的两个旅和热河军区的十一、十三旅,兵力少,武器不足。面对强敌的大举进攻,

我军遵照军委“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作战方针，决计避其锋芒，主动撤出承德，以便相机歼敌。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迎着山区阵阵秋风，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和热河军区机关及所属部队，有条不紊地撤出了承德。早晨，当我们离开这座古城的时候，群众沿街送别，处处呈现着人民和军队依依惜别之情。我回首远眺，只见绿树掩映中的避暑山庄完整无恙，心里感到宽慰。心想，我们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总有一天，这座美丽的山城一定会回到人民的怀抱。

我们从承德撤出，沿铁路西行，来到距承德十多里的三岔口时，敌八十九师前头部队已迂回到承德北部。于是，我当即命令十三旅，要他们坚决顶住，保障承德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安全。随即，我们从三岔口北上。

二十八日，敌十三军占领承德后，仍对我紧追不放。这天，在我们向隆化战略转移途中，于高寺台地区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军区直属队受到损失。随后，又遭到敌空袭，旅长周仁杰同志左肩中弹负伤。

这次撤出承德是我军有计划的行动。虽然有的铁路、民房遭到一些破坏，倍感痛心，但这种心情旋为强烈的对敌斗争所笼罩。要有所得，就要有所失，从战略全局上考虑，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战 前 整 编

我军撤出承德是仓促的，是由短暂的和平环境转入战时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从热河军区领导机关及所属部队到地方武装，都暴露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庞大的机关给战斗行动带来许多不便，很不适应战争环境。部

队编制庞杂,架子大,人员少,有的旅只有十几个连队。枪支弹药都集中在机关人员手中,战斗连队的枪支短缺,有的连只有八支枪,其他人则是徒手,出现连队枪支不敷使用的反常现象。

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从部队到地方武装,逃亡、叛逃事件时有发生。热西地方武装叛逃达千人;围场支队的一个连出城北后,把连长捆绑起来,全连叛逃;丰宁地方武装的十五个小队有十三个小队逃亡,经过两次战斗只剩下四十来人了。热西的民兵组织也有类似情形,有的投敌,有的为匪。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武装成份复杂,收编的伪军警和土匪没有改造消化,一遇严重情况就逃亡叛变;二是从抗战结束到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经过近一年的和平生活,使有些人斗志衰退,加之战士中有正统观念和浓厚的乡土观念,活动地区略有变动就想脱离部队。

由于头重(机关大、干部多)、脚轻(连队缺员)、根底浅(基础弱)之弊端相当严重,给战斗行动带来一些不良后果,造成一些战斗的失利。九月三日,我军在水泉担任防御任务的一个前哨连,被敌人包围后搞掉了,另有两个排也是如此。像这样整连整排被搞掉,就是在抗战过程中也是罕有的。九月四日又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十三旅旅直及三十八团在荒地受敌袭击。团部被敌火力封锁,机枪连被打垮,旅直钻进敌人的口袋,复又折回,损失可谓重矣!几次失利之后,使我要求整编的心情更为强烈,深深感到:不整编,就不能巩固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能力。要想打破强敌的进攻,必须通过整编使自己兵强马壮,这是此时此刻赢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我的这个想法与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不谋而合了。不久,冀热辽军区采取了果断措施,决定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将十三、十四旅合并为热河十三旅。

九月六日,我们来到位于围场南面的广德成。这是一个紧靠公

路边的小镇，伊逊河从村边缓缓流过，四周是丛山秃岭。热河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整编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军政委员会委员，热河省军区政治委员黄火青同志，司令员段苏权同志，副司令员杨梅生同志，参谋长黄鹄显同志，政治部主任苏启胜同志。明亮的烛光，照在与会者的脸上，室内笼罩着严峻的气氛。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四十团和四十一团合并，旅直归军区处理，充实指挥机构；四十二团缩编为一个营，和三十七、三十八团合编，从三十七团抽出原冀中的若干连归还三十九团。就这样，整编的初步方案确定下来了。

这时，我们虽然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但每天都发生小的战斗。因此，我们的整编工作是在边行军边作战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使整编顺利进行，当时尽管时间很紧迫，但我们还是抓紧行军途中的空隙时间，进行必要的思想动员。九月八日在边墙山村黄火青同志和我召集十四旅连以上干部开会，向大家讲清这次部队整编的重要意义，说明这是为了适应现实战争情况和战术原则改掉“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弊端，同时也是为了给以后部队的扩大打下基础。战争年代的整编较为频繁，思想工作好做。尤其是这次整编，大家从实践中都感到整编势在必行。因此，与会同志都拥护整编的决定。

为了搞好这次整编工作，我们省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作了分工：黄火青、杨梅生二同志负责整编直属部队，处理编余干部；我负责整编十三旅；苏启胜、刘兴隆二同志负责整顿后方机关。当时，后方机关不仅庞大，而且思想混乱，有的守着老婆不工作，有的带着队伍跑到林西去结婚。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就很难保证战斗的胜利。所以，我们决定通过整编对后方工作进行一次思想整顿。经过几天的努力，整编工作就顺利完成了。整编后的十三旅下属三

个团：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团。旅长为黄鹄显，政委陈仁麒，副政委刘汉，参谋长刘禄长，主任雷永通，副主任钟池。各团的主要领导干部均已配齐。经过整编的十三旅，齐装满员，斗志旺盛，战斗力大大提高。

为了打击进犯热河省赤峰地区之敌，在十三旅的整编大体就绪后，我们建议，十三旅配合十六旅围攻小城子。我们刚把战斗任务分配下去，九月十八日下午二点又接到冀热辽军区电报，令十六、十七旅改攻乃林，十三旅两个团进攻马站城子。于是，我们马上修改作战方案。调整战斗部署，迅速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

十九日三点半，秋风呼号。我三十九团副团长白彬率部队以勇猛的行动，突然出现在马站城子，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激战，毙敌六、七十人，获长、短枪四十支，马十三匹。伪宁城警察大队由三座店增援，刚到此地就被我歼灭，五十四名被俘，大队长吴耀东负伤，副大队长被俘。这次战斗是进攻宁城的前哨战，初步地显示了整编的成果，鼓舞了士气，坚定了部队打大仗、打恶仗的信心和勇气。

敌 进 我 进

在我军撤出承德后，转战围场，挥戈边墙山，边整编边战斗之际，敌人步步紧逼，接连占领一些城镇。

八月二十八日，敌十三军占领承德，三十日占领滦平、隆化，九月十一日占领丰宁。与此同时，敌九十三军由叶柏寿分两路向赤峰进犯，右纵队（暂二十二师）由朝阳北犯，九月四日占领建平；左纵队（暂十八师）窜犯乃林、天义。在该师一部南犯时，于华子里沟、乃林等地遭我打击后，行动谨慎。为保障主力的翼侧安全，该师以其

第三团于九月十三日进占宁城。

宁城位于赤峰以南,是赤峰、承德之间的一个重要集镇。该镇南北狭长,居民院落均有土墙。该镇东临老哈河支流之坤头河,地形开阔。西依山地,由西向东有条又深又宽的雨裂沟通镇内。这是一个较大的集镇,现为小城子公社所在地。

在我军攻克马占城子之后,即决定歼灭宁城守敌。九月二十日,我十三旅进驻二道营子。二十二日,我去距二道营子十八里以东的后窑,见到了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省委书记胡锡奎同志、十七旅旅长何能彬、副旅长吴瑞山等同志,共同商议进攻宁城的作战部署。经过慎密研究决定,以十三旅之三十七、三十九团及十七旅之四十九团,由热河军区指挥,担任攻城;以十六旅之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十七旅之五十团及骑兵一个团,由热辽军区指挥,担任打援;调热东分区两个团进至建平以南奎德素地区,威胁敌之后方。随后,我即返回二道营子,召集旅团干部开会,传达上级意图,研究敌情,确定作战方案。

经过侦察发现:宁城守敌十八师第三团是半美式机械化装备,下属三个步兵营及炮兵连、重机枪连、便衣侦察队,总兵力约一千五百多人。该敌占领宁城后,拉夫抓丁,抢修工事和碉堡,并对日伪残留工事和居民院墙进行改造、加修。镇北街中心修一个三层大碉堡,约五米高,能控制镇内街道口;重要路口和居民院也筑有碉堡,并以交通壕、堑壕相连接;重要地段还设有铁丝网、外壕、鹿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形防御。从守敌的这些情况来看,这是一场硬仗。当时,尽管十三旅刚刚整编,装备低劣,又缺乏攻坚作战经验,但大家感到上级把攻城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十三旅,这是对他们的信任,决心完成任务。

根据敌情,经过认真研究,确定的作战方案是:

三十七团担任主攻,从前街由北向南突击,首先夺占中心大碉堡,尔后歼灭前街东西两侧附近之守敌;

三十九团由北向南突破,首先歼灭学校守敌,造成拦腰斩断、分割敌人之势,尔后向刘家大院之敌团部方向发起进攻;

十七旅四十九团从西北突击;

十三旅指挥所设在德聚昌大院附近居民院;热河军区指挥所设在娘娘庙以北居民院内。

接着,各团积极进行政治动员和战前准备。经过控诉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罪行,激发了大家杀敌立功的斗志,纷纷请战,决心打好这次攻坚战,战前准备也搞得热火朝天,大家群策群力,认真研究攻坚的战术动作。这时的十三旅犹如弓箭在弦,鼓足了劲,只等上级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许,部队开始向宁城运动,我们从二道营子出发时,天晴日朗,秋风习习。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乌云满天,顷刻之间,大雨如注,参战的指战员和支前民工们冒着秋风冷雨,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行军,为了战斗的胜利,大家不怕路滑,不顾衣湿,仍然奋勇地向宁城前进,我望着行走在雨夜中的战士们,对这次战斗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奋 勇 攻 坚

漆黑的夜。我们来到宁城北端药王庙之后,马上开设了指挥所。当我登山远望时,只见宁城笼罩在夜色中,整个镇子都沉睡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和敌人的吆喝声。好静的夜啊,这是大战前的宁静。二十一时许,攻城战斗打响了。顿时,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打破了山镇的宁静。

冒着硝烟、弹雨,三十七团向敌人猛攻。敌人凭借坚固工事顽抗,我因地形不熟,连续攻击四次没有奏效,只有一个排从碉堡林立的地段突入镇内。但是,由于孤军深入,站不住脚,在天亮时不得不撤至第一道横街,与敌人对峙。该团二营在镇西侧担任警戒,监视敌人,保障主力翼侧安全。

与此同时,三十九团也从东北方向发起攻击,他们在火力的掩护下,爆破组首先对敌碉堡实施爆破,战士们乘着爆破卷起的滚滚浓烟,迅速冲了上去,前面倒了,后面又跟上去,该团一营进展顺利,只用了十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的城墙防御,进入了纵深。另外两个营虽发动多次攻击,但因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援和爆破器材而攻击受挫。

四十九团也在城西北受阻。

首次攻城虽然进展不够理想,但却摸到了敌人的部署和战术特点:敌人构筑的工事坚固、防御能力强;火力配置也比较严密;善于使用手榴弹,炮火射击准确。同时我们发现,敌人害怕伤亡,不敢反冲锋,有固守待援之意。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集中兵力,打开突破口,才能保障战斗的顺利进行。

天渐渐的亮了。我昨夜虽然没有合眼,但仍无睡意,苦苦地思索着下一步的打法。突然,敌人的一发炮弹带着嗤嗤声从指挥所的房顶飞过,随后在房后发出一声震耳的爆炸声。我走出指挥所,得知这发炮弹使两名战士牺牲、三人负伤。眼前的情况表明,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为保证指挥机关对部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我们马上向前转移了指挥所的位置。

二十四日白天,枪声、炮声时起时落,战斗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整个战场呈胶着状态。

午后四时许,我们在指挥所召集旅团干部开会,何能彬、吴瑞

山、黄鹄显、王星、王振东、白彬等同志都来了。会议开始后，各团简要地汇报了战斗进展情况，然后我领他们到警戒线去视察地形及敌人兵力部署态势。大家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边走边看边议，最后来到三十七团团指挥所。经过商议，决定调整攻击部署：令四十九团避开西北角之敌坚固工事，改由西南方向攻击；三十七团仍按原部署行动，由东北方向攻击，务歼围子外之敌。这时，我们得到情报，天义之敌增援甚急，我军必须迅速解决战斗。因此，我们规定了从不同方向发起攻击的不同时间，要求各部队必须连续推进，不得中断，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又一个战斗的夜晚来临了。二十时三十分，我军再次发起攻击。这次攻击更加勇猛、激烈，刹时间，火光冲天，弹如暴雨，杀声如雷，整个宁城镇被淹没在火光和硝烟之中。

三十七团攻势勇猛。该团二营在火力掩护下，以手榴弹扫清中心大碉堡外围鹿寨、地雷，用铡刀劈开碉堡前的铁丝网，紧接着爆破组冲进敌中心大碉堡，因药量不足，爆破未成，攻击受阻。在二营激战中心大碉堡的同时，三十九团一营从前后街中间向敌发起攻击，在火力掩护下，爆破组首先向敌碉堡实施爆破。在敌堡被毁声中，战士们乘着卷起的滚滚浓烟，迅速发起冲击，前面倒下了，后面又跟上去，仅用十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的城墙防御地段，继续向学校守敌攻击。该团二营在战斗打响后，从右翼发起攻击。该营五连在火力掩护下一举突破，四、六连突入镇街后，采用挖墙连院，逐段跃进，逐屋逐院与敌争夺的战法，将敌压缩在团部大院的碉堡群里。

二十五日拂晓，战斗更加紧张，敌我双方争夺得更激烈。三十七团二营在中心大碉堡前受阻后，该团又令二营爆破中心碉堡。他们在火力的掩护下，首先将碉堡上层摧毁，以爆破筒、手榴弹歼灭

了下层守敌,此时,碉堡中层的残敌仍在顽抗,射孔喷射着火舌。见此情景,共产党员郭端阁同志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碉堡,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将敌堡炸毁,歼敌一个排。随后,该团趁势猛冲,一营沿前街东西两侧冲击,二营沿前街西侧向纵深发展。一营三连进至第二道横街东头北侧时,为固守在院落之敌所阻,两次冲击均未奏效。于是,他们将两挺机关枪集中射击,打开缺口,顺势猛冲,消灭敌人一个排。该营一连在第二道横街北侧将守敌歼灭后,会同三连向敌团部驻地迂回,因守敌火力较强,遂仍以挖墙连院逼进敌人。

上午十点,三十九团一、二营向敌团部发起攻击。指战员们不顾敌人的密集火力封锁,与敌英勇拼杀,手榴弹打光了,就用砖头砸,有的还把敌人投过来嗤嗤冒烟的手榴弹拣起来,然后投向敌人。由于敌人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加之我又缺乏足够的火力支援和爆破器材,使之进攻受阻,因此,该团决定暂停攻击,就地监视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器材,待黄昏时再攻。在我军攻势减弱之后,敌人深知陷入重围,惧怕黄昏被歼,即乘我攻击暂停之际,在敌团长的带领下开始向东突围,妄图打开缺口,逃之夭夭。敌之企图当即被我发觉,该团马上组织反击,打击突围之敌,使敌人企图未能得逞。正在这时,天空传来嗡嗡的声音,敌两架 P 51 美式战斗机前来助战解围。三十七团见敌机临空,马上架起重机枪对空射击。不一会儿,一架敌 P51 型、19343 号飞机冒着浓烟,坠落山谷,驾驶员何家彦就擒;另一架仓惶逃走,守敌见突围受阻,飞机被击落,十分惊慌。三十九团抓住敌人动摇之机,令一、二营分别由敌团部北面、东北面发起攻击。在火力掩护下,我军迅速突入院内,逐院逐屋歼灭敌人。

十一时左右,四十九团以二营主攻,在短促火力急袭和爆破后,五连在五分钟内占敌一个堡垒,打开了缺口,一直攻到敌团指

挥所附近(南端)。在十三旅由北向南突破敌防御纵深时,敌发生动摇而突围逃跑。四十九团在此次战斗中伤亡 200 余人,二十五日中午发起攻击前后,仅团、营、连干部就伤亡近 10 人,副团长霍成忠同志负重伤,二营长梁金标同志负重伤后牺牲,两个参谋和几个连干部伤亡。

十四时,团部守敌大部被歼。

十六时,战斗接近尾声。这时,敌人已被我打得乱了套。警察署大院及南门附近守敌弃阵逃跑时,被我三十七团一营追击,敌人像一群受惊的绵羊被追赶着。三十七团三营迅速插到河套截击逃跑之敌,歼其一部,残敌逃至东山,又被我预置的一个连歼灭一部,其余向天义溃退,又被我打援部队生俘百余人。

至此,宁城攻坚战胜利结束。此战在冀热辽军区的指挥和兄弟部队配合下,毙、伤、俘敌千余人,敌暂十八师师长被撤职,缴获迫击炮二十二门,轻重机枪五十八挺,各种枪二百三十支,电台三部,受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副司令员李运昌、陈奇涵的嘉奖。

在此次战斗中,赤峰、宁城地区广大群众顶风冒雨,夜以继日地支援前线。他们为我军送棉衣、运粮、带路,组织四百多付担架,一千余人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作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宁城攻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迟滞了敌人占领赤峰,大大鼓舞了我热河军民战胜蒋军的信心,对坚持热中地区敌后斗争和巩固赤北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充实了兵员,取得了攻坚战经验,为战略防御创造了条件。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我们深深感到:战前的整编是完全必要

的。通过整编,既整顿了组织,又整顿了思想,使之适应战争的需要。例,如果不去掉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弊端,这个仗是难以打胜的。其次,战斗中灵活地使用战术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如我军攻城受挫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调整了部署,改变战法,使决心更加符合实际。再次,就是扬长避短,发扬我军特长,靠近战、夜战歼敌。战斗中,我们不仅充分利用夜暗的条件,而且抓住敌人不敢反冲击的弱点,用手榴弹、炸药包对其坚固工事,组织连续爆破,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坚强防御。总之,要想战胜装备优势的敌人,就必须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作用。尤其需要着重指出:冀热辽战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不仅适时作出了整编部队的抉择,而且周密地组织指挥宁城战斗,将四十九团投入作战,还将主要兵力部署阻击援敌,保障了宁城战斗的胜利。

(原载《赤峰地区党史资料》1984年第6期)

金丹道教在宁城

沙万川 整理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在敖汉起事的金丹道教,俗称“红帽子”,也波及到宁城境内。此事曾惊动了清朝政府,并派重兵镇压,历时月余,将这次暴乱平息。

辽西金丹道教的来历

金丹道教在辽西一带的首领是杨悦春和李国珍。据《朝阳县志》记载,杨悦春原是个医生,李国珍是唱皮影的艺人。他们住在敖汉旗的杨家湾子。“医生杨彦(悦)春,家中设立教堂,杨某全家皆崇拜之,日久蔓延滋长,如石立虎,白叉沟、曲连沟、耗子沟、上下长皋、金厂沟梁、红山嘴子等村均有教堂,凡为首者,皆称老师。杨彦(悦)春为总老师。”(《朝阳县志》)。

金丹道教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带有浓厚的排外思想,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以“学法术、抗满清、兴大明”为行动口号。平时也劝人吃斋行善,故土人亦称“学好者”,“借不食烟酒,名以学好诱人,实以烧香聚众,近则一月一聚;……自称金丹道教,……久怀叵测”。早在光绪初年,就在朝阳东南炒米甸子、碾盘沟等处设立教堂准备起事。“为师系一道士,夜聚昼散,练刀枪不入之术,男女均可入教”。(《朝阳县志》)

参加起事的另一个组织是“在理教”。它也是白莲教的一派,起于明、清之际,教中有五字真言:“一心保大明”。但到了 19 世纪 70--80 年代,它的斗争目标,也不明显了,逐渐放弃原来的宗旨和行动口号,变成“忌禁烟酒,劝人立志行善,意在保身”的一般社会团体。当时直隶(关外包括热河、赤峰)民间入“在理教”者,“十室而九”,地方官从未禁止。

金丹道教利用了“在理教”的这种合法存在,表面上以“在理教”的“学好”为名,在内部以排外为宗旨发动起事。

金丹道教攻入敖汉贝子府

“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 年)秋十月间,杨悦春见人心已得,以机不可失,遂由原道士召集各教堂首领,如李彬、丁义和、李广、王福、王增、聂武、聂珩等会议,以扫清灭胡为宗旨起首。”他们以杨家湾子为根据地,建青、黄、白、红、黑旗为五队,杨悦春担任“开国府总大教师”,李国珍建号“扫北武圣人”,其余首领,各以王、侯、军师、元帅、副帅、先锋等分封有差。

1891 年 10 月 11 日正式宣布起事。他们仿效汉代黄巾起义的形式,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群众称他们为“红帽子”。在盘踞地,建门旗两面,上书:“替天行道,扫清灭胡”。

“起事后,遂向敖汉贝子府进发。由杨家湾子到贝子府仅二、三十里,半日即到。贝子府内亦有准备,炮台架抬枪,蒙古兵持大鸟枪。起事者到贝子府即鸣枪射击,群向围攻,里面亦颇得手,顽强抵抗、猛烈还击。起事者见一时不能攻下,挨至黄昏以后,又尽力猛攻,孰料府内射枪弹落在金丹道起事者火药车上,立时轰着,‘轰’的一声,将看火药车人轰在半空,府内蒙古兵从远处看到此种情

景,误以为起事者施法术,驾云腾空来府内杀人,遂皆惊慌失措,枪不能放,均委弃之,各逃生命。围攻贝子府的金丹道徒,乘此无人抵抗之际,攻入贝子府内,凡遇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尽行屠戮,府内盟长达克沁,福晋及其三子、格格等统行被杀死。盟长之长孙,经府内奴仆由后垣负出,始得逃命。起事者同时将贝子府的房屋放火烧焚,片瓦未留,并分派队伍赴四乡。”

(以上引文均见《朝阳县志》)

起事的蔓延和发展

金丹道教攻开贝子府后,便以敖汉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大起事范围。扫北武圣人李国珍带队进攻翁牛特乌丹一带;聂珩、郭海等进攻土默特右、左旗的朝阳、阜新一带;南路进攻建昌、平泉一带;西路进攻叶柏寿、建平、宁城、黑水、乃林、楼子店一带。进入宁城地区的有:从叶柏寿—忙农营子—榆树林子,进入一千余人;从建平、二十家子、那拉必流进入一部。所到之处也有很多被胁裹和追随者。蒙族群众争相避难,被杀害者很多;那拉必流天主堂也被围击抢掠。“大名(明)州判(州判署在嘎斯营子)于甫筠带勇抵敌,初犹奋勇死战,后因寡不敌众,全军尽歿,该署州判同时阵亡”。(《东华续录》)喀喇沁右、中旗王府也出兵抵御,奈独立难支。在此紧急关头,右旗派管旗章京海山、中旗派李梅林,一起到平泉告急,要求清政府迅速派兵来宁城镇压。他俩怕自己官小见不到叶大人,就急中生智,冒充邮递员闯进军门驻第,将到军门内门口时,被岗哨推下马来,正在纠缠之际,恰巧叶志超从内走出来。他二人才将金丹道教窜入宁城的事情禀告上去。

清军在宁城榆树林子围剿

因“平泉、建昌、朝阳四州县，东连奉省，西接热河，南靠迁安，北通藩部，方圆数千里，地域辽阔。自金丹道……假以劝人学好为名，煽惑日众，集数万余人到处烧杀裹胁……”清政府“谕令叶志超分兵防剿”，叶志超率军至平泉接到右、中旗急告，命“……统领副将潘万才由五虎马梁一带进剿，于十月二十九日抵榆树林子地方，将贼匪歼除殆尽。现复带队前往西桥头地方剿捕。而西桥头即系喀喇沁王旗地界，前于大兵未到之先，由东向西窜出一股，约二百余人。经该王督同辅国公林沁都尔吉带领蒙古乡勇截击，尽数杀毙，逃者仅二、三十人。……并严飭赤峰县知县李鸿猷严力堵御。”

“十一月初二、三等日，西桥头之贼退并毛家窝铺一带，纠合道匪共二千余名，负固死守。初四日，经副将潘万才飭营官蒋广栋率队分路攻击，杀贼甚多，并击毙贼目多名，贼始退入庄内凭墙抵拒，官兵复三面攻击，当将贼巢击破，阵毙伪大王赵金贵、徐小枝及伪领兵侯陈忠等十余名，马贼三百余名，道匪一千余名，并夺获枪炮马匹旗帜无数，并生擒伪大王刘献堂……。”

剿平金丹道教

“伪扫北武圣人李国珍自十月初十日占据乌丹城，旬日之间诱胁马步贼四、五千人，十分凶悍”。以北大寺为据点，潘万才率兵“于十一月十四日至梧桐花地方”，“于次日四鼓”攻城“鏖战逾时，毙贼五百余名……立将寺院攻破”，杀死道徒很多，余众逃散，官兵四处出击。“二十一日自乌丹东行至敖汉扎萨克王府已无贼踪”。

“二十七日,访得道首杨悦春……逃赴包力虎金厂沟山洞内潜藏……提督城,密饬各队……将金厂沟土山四面包围,按洞搜查,……在洞内将杨悦春父子六名一并擒获,刻即押解来营……自官兵出口剿办以来……所有强悍匪盗,均为杀戮殆尽”。

叶志超率部“于十八日子时冒雪驰往……(敖汉)贝子府……四面围之……部队合力仰攻,鏖战三时之久,贼始力不能支。……亲军小队首先登陴,各营乘势一鼓而入,立毙贼首王正、王福、冯二老师等名,枪毙刀砍五百多名,余贼越墙逃窜……复经预先派定马队四面围攻,追杀数十里,又毙贼三百余名,夺获大炮八尊,火枪刀矛不计其数……此役统共杀贼将及千人并无一名漏网……酌留马队驻守”。自此金丹道起事暴乱告平。

(以上引文均见清光绪朝《东华续录》)

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跳崖小记

蹇国安 整理

1944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三)三区队袭击小城子之后,日伪调集大量兵力扫荡承、平、宁地区。三区队为了缩小目标,灵活机动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经常化整为零分散活动。3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七),三区队二连副连长舒殿有和区队部干部刘相廷,带领三区队二连二排、三排和区队的部分干部战士共七十多人,活动在宁城县山头朝宝沟川。入夜,他们来到该地的孙营子北沟,准备在这里吃点晚饭,休息一下。该村十家长朱兰廷说这里地处沟口,不安全,派其侄子朱文才带路,将队伍送到了朝宝沟里的西南沟村。队伍到西南沟村时,已是夜间九点多。

当时,有一支讨伐队也在这一带活动。约十时许,这支讨伐队来到马营子村(距西南沟二、三里路),准备在这里住下。这支队伍进村后还没住稳当,就又集合走了,奔向了西南沟。

这天晚上,三区队二连二排八班班长董国政带班站岗,他发现敌情,立即向连部报告。当时部队子弹已很少,不宜迎战,副连长舒殿有和刘相廷决定立即突围。西南沟村当时只有十几户人家,东、南、西三面环山,很象是一个椅子圈。舒殿有、刘相廷等负责人率领队伍迅速抢上了村后的西山。

部队刚撤出村,敌人就进了村。当时,有一个姓聂的战士,犯了癫痫病,另一个战士背他走,行动不便,两个同时被敌人打死。另有

一名战士,从院内向外跑时,掉进了门前的沟里,摔伤了腿,被敌人抓住。敌人进村后,把全村的人都从家中赶出,年轻力壮的被绑在村后的西山脚下,都跪倒在地,老人、妇女和孩子,都被圈到村南头的水泉子沟头。

部队抢上西山以后,敌人随后紧追,部队继续向西行进。到李营子前山一带时,西面、南面也有敌人围上,部队便拐向北进。到李营子前山,遇上了悬崖。当时天色阴黑,看不清山崖究竟有多深,子弹又已很少,舒殿有、刘相廷等人研究决定,宁可跳崖牺牲,也不当俘虏。跳下去一旦能冲出包围更好。于是,他们率领全体干部战士跳下了山崖。这一带的山崖最高处有五十多米,干部战士们跳下以后,部分当即牺牲,部分被摔伤和摔昏。当即牺牲在这里的有刘相廷等八人,舒殿有的头部被摔伤,昏迷不醒。

英雄们果断跳崖,甩开了敌人的追击。受轻伤的战士和摔昏后苏醒过来的战士,简单地摸索着检查了一下战场情况,抬着或扶着受了重伤的舒殿有等,趁着夜色继续向对面山上突围,在黎明前突上了李营子后山。走到李营子老北沟时,舒殿有停止了呼吸,战友们用石块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那里,然后奔向了黑里河川。

第二天(农历二月十八)上午,敌人都回到西南沟,把全村的人集中到村前的沟沿上,当着群众的面,把那位摔伤腿的战士绑缚在地,让四个敌人用刺刀把他刺死,然后割下三位遇难战士的头颅,带着离开了西南沟。

十七日夜敌人进村时,曾问农民李文章营子里有没有八路军,李文章回答没有。在时间已过一天之后(农历二月十九上午)敌人又回到西南沟,并把附近马营子、孙营子等村的群众也赶来,当着群众的面,以“私通‘八路’罪”用战刀砍下了李文章的头。

1985年11月

拔 谢 杖 子 据 点

蹇国安 整理

一九四三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三区队和地方游击队互相配合，在平泉境内的帽子山下，一举击毙了日伪喀喇沁中旗协合会事务长仁科信夫，消灭了他率领的“剿共协合队”，给了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敌人很快又派了一个名叫山本的日本鬼子，继任了仁科信夫的职务，继续镇压和破坏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

山本上任以后，带着他的主子的命令，在其他方面的配合下，到处增设据点，妄图以步步为营的战术，剿灭三区队和地方游击队。当时的承平宁联合县第六区，现在的石佛谢杖子，就建了这样的一个据点。这个据点的建立，对于驿马吐川抗日活动的开展，对于承平宁抗日游击区继续向东发展威胁很大。于是，三区队队长高桥和政委黄云等负责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

由于谢杖子一带是三区队和地方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仁科信夫也是在离这不远的地方被打死的，因而敌人对这个据点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都较强。全据点共有日军七十多人，是一个守备队的编制，配有机枪、小炮、掷弹筒等。队长名叫东山岛，山本也经常住在这里。面对这样的强敌，如果硬攻，不但会伤亡大，也不易攻下。于是，高桥提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作战方案，派游击队长张野溪率领游击队去把敌人吸引出来，然后伏击之。

张野溪奉命以后，带着游击队专门到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并

故意让群众去传风报信。日本鬼子东山岛和山本果然上钩了,他们带着五十多名鬼子兵,扛着机枪,疯狂地向游击队扑来,妄图把游击队一口吃掉。

张野溪见敌人已经上钩,就和敌人兜着圈子,把敌人引进了事先定好的地点——和宁城县相邻的平泉大沟。平泉境内的大沟,两面是山,中间是一条狭长的谷地,三区队就埋伏在两面的山上。敌人进入埋伏圈以后,高桥喊了一声“打!”首发一枪,就击毙了山本。紧接着,两面山上一齐开火,很多敌人立即毙命。最后又发起冲锋,大部分的敌人都是在这里,只有少数几个逃回了据点,队长东山岛的尸体也扔在了战场上。

这次战斗,是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史上一次重要的战斗,战斗中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十九支、手枪两支。这次战斗以后,谢杖子据点的敌人就撤走了,这颗钉在抗日游击区内的“钉子”被彻底拔掉。

(转载于1985年8月21日《宁城报》,转载时对个别字句做了修改。)

袭击三座店鸦片组合

靳春田 供稿 王维新 整理

日伪时期,侵略者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疯狂搜刮人民群众。要粮干、逼烟干和多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把人逼得走投无路,濒临家破人亡的境地。

一九四三年夏,我八路军三区队高桥队长为了打击日寇,夺回被敌人搜刮的人民的劳动果实,决定打日伪三座店组合。

驻三座店日伪的军事势力有:以乌景显为所长的警察分驻所和梁殿英的防卫队。高桥队长认为只要教育争取乌景显和梁殿英两个人,打三座店鸦片组合可以不费一枪一弹。于是先用和平方式制住乌和梁,迫使他们就范。

梁殿英的家,住在三座店村大金沟甲东沟。高桥首先去梁家教育说服梁的父亲,让他转告其儿子:在我打三座店鸦片组合时,不要武装抵抗。乌景显住分驻所附近,要亲自去教育争取他,首先得找人给他透个信,约好时间、地点。高桥找到苏家窝铺甲五家跑牌的(即甲事务员)吴振喜。吴是小商贩出身,为人圆滑,能说会道,下能拢络群众,上能取信于统治者,虽系跑牌实是甲长。

一天,高桥化装成警察去吴振喜家。吴不认识高桥,便问:“兄弟您是哪分所的,没见过?”高桥答:“我是高桥,来找你给办点事。”吴深知高桥的厉害,忙陪笑脸说:“是高队长,久仰大名,今天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快请屋里喝茶。”高桥进屋后除对吴进行抗日救国

的教育外,问吴:“你认识乌景显所长吗?”吴答:“我三六九去分所办事,与他时常见面。”高桥说:“你给他送个信,说我要见见他,约个时间、地点。”吴答:“我一定完成任务。”于是约定两天后听回话。

按约好的时间高桥又去吴家。吴讲他已和乌景显约好明晚在他家里会面。高桥问:“我们双方会见的形式是怎么定的?”吴答:“乌所长没敢说别的,他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见面时他不带武器。”高桥说:“他不带我们也不带,我们只去两个人,但是到时候你得给我们带路。”吴答:“行行,决不能误。”

第二天,高桥队长和二区长贺仲一一起找到吴振喜,当晚在吴的带领下进了三座店街。乌景显家住三座店街里老何家后院,前门是大街,后墙有丈数高,紧靠坤头河沿。高、贺二人先攀上何家后墙,然后放下绳子把吴振喜拉上去。进到乌景显的窗下,高桥命吴先进屋通知乌。趁吴进屋之空,高桥把带去的小手枪交给了贺仲一,并示意他插在腰中隐藏。乌景显毕恭毕敬地把高、贺二人让进屋,寒暄一气,献茶,茶罢,点起大烟灯招待高、贺二人。高桥说:“我们只会喝酒,不会吸烟。”于是乌命其妻把事前备好的酒菜端来,四人围坐喝酒。高桥对乌景显说:“你这个所长在这一带老百姓中还算是可以,我们不难为你。今天来主要是给你讲讲抗日斗争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任务。”高桥在给其讲形势任务之后说:“你知道我八路军主要是削弱敌人的后方势力,牵制敌人的侵略武装,解放全国老百姓。最近我们打算捣毁你们的鸦片组合,你是个中国人,如果有一点爱国思想,可配合我们,把你们警察和自卫团派下去催烟干。”乌听了之后,面带难色,哼哼两声,没说出话来。高桥看出他是怕在他的管制下出了事没法向主子交差,于是以锐利的目光盯视着他。乌在高桥的逼视下不敢再犹豫下去,于是说:“好!好!明天我就把弟兄们派下去催烟干。你们打算多咱来?”高桥说:“时间未定,反正

最近一、两天。”乌说：“如果你们来到之后，听见枪声，可叫人奔分所东边的炮楼，那里有馈赠之物。”说完话又喝了会儿酒，高桥留下贺、吴二人与乌闲谈，一个人去何家后园子梁殿英住处。梁见来了不速之客，不敢怠慢，忙向屋内让。高桥进屋后问：“你是梁队长？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高桥。”梁殿英因前几天听其父亲说高桥要他做的事，所以今天和高桥见面未感突然。于是说：“久仰，久仰。”高桥在对梁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之后说：“明晚我们部队要袭击你们的鸦片组合，一是请你躲一躲，二是把你的防卫队员派下去催烟干，怎么样？”梁没敢说“不”字，赶紧说：“照办！照办！”

第二天晚上约九点钟左右，高桥带领部分队员和动员去的群众赶着二十几头毛驴馱子，配有一挺轻机枪，进入三座店街。到鸦片组合门口，高桥用手枪向空中打了十几响，院内仅有的几名更夫和院警，听见枪声早吓得抱着武器藏到墙角的黑暗处了。高队长听见分所院内响了一枪，赶紧派人冲进分所东炮楼。去的人回来扛了十几支步枪和一千多发子弹，还捕捉了乌景显和他的秘书郝文廷、张敏等。枪支子弹是乌的“馈赠”，捉乌等人是为了给其开脱“罪责”。之后，高桥带领队员和群众砸开鸦片组合的大门，冲进去打开所有仓库，满满装了二十几馱子烟干和烟奶子，并让乌景显、郝文廷等也用油布各背一包烟土。在天还没亮之前，队伍压着大烟平安地离开了三座店街向山区转移。第二天把背送大烟的乌、郝、张等人放回。

高桥队长就是这样教育争取了敌伪人员，未费一枪一弹袭击了三座店鸦片组合，缴获了大批烟干，充实了八路军的实力，震慑了侵略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

中央访问团访问宁城县抗日根据地

1951年9月，中央访问团奉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指示，来宁城县，访问了当时四区、十一区、十二区的抗日根据地人民。

9月5日，中央访问团分别到达三个区进行访问。八里罕、瓦房两个完小的业余剧团及宁城县中苏友好协会的幻灯配合访问。重点访问了十二个村，其它村发给了慰问信。

中央访问团到达各村后，首先召开了村代表会，在会上传达了访问精神，评选受奖人名单，了解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调查、了解当地群众抗日斗争的事迹。过了三、四天，召开群众大会，访问团的同志讲了话，亲手给受奖者戴纪念章、发毛主席亲笔题词，同时奏乐致贺，台下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发完奖后，访问团全体成员向受奖者及根据地各父老兄弟姐妹致谢。然后受奖者上台讲话，一般都是表示感谢毛主席的关怀慰问，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好好生产、发家致富。会场上群情振奋，人们都感到无比的光荣。四区范杖子村给毛主席写了回信。

这次中央访问团的访问，给苦尽甜来的抗日老根据地的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幸福的记忆。

中央访问团授予50人纪念章，96人获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名单录制如下：

获得纪念章者(50人)

四区

范杖子村:李学惠、张振礼、张喜、李树林、林树枝。

西打鹿沟村:牛连元、孙玉海、刘凤和、吴青山。

上拐棒沟村:王凤、路万寿、郭凤鸣、梁珍、李玉田、姚德义。

道西(须)沟村:吴广才、杨振坤、杨德全、邹德玉。

十一区

南厂子村:戴万朋、徐凤玉、夏景和、吴金华、王凤玉、高凤。

北厂子村:

李文奎、郎占英、姜连启、尹成增、尹成云、刘清泉。

小梁子村:林寡妇、郑喜海、王书廷、王生。

十二区

双庙村:张殿、王彬、杨占元、张振福、曹景春、邹国顺。

北台子村:苏明。

张麻子沟村:王相忠、李长存、赵金财。

榆树林子村:王清珠、高连清。

朝阳湾村:石振山、王岐山、刘凤阁。

获得毛主席亲笔题词者(96人)

四区

道西(须)沟村:陈山、李福生、李树春、任德生、吴广生、董连玉、孙玉明。

西打鹿沟村:卢文明、刘凤春、郑金喜、傅振荣、张刘氏、木金生。

上拐棒沟村:刘起、阎有、陈国祥、陶文山、陶文明、吴洪彬、姚大成、李殿树。

范杖子村:于振昌、张振彬、高林、王喜福、郭春年、李春风、马永生、范振刚、王道荣、陈珍、邹积仓。

十一区

南厂子村：杨顺德、薛文广、姜连明、安福才、许明学、梁文臣、黄云生、张均、戴万廷、梁发、朱杨氏、徐凤仪、朱俊德、高凤山。

北厂子村：李桂春、卢凤明、李文玉、李文波、姜登材、张玉树、辛安荣、彭玉成、刘李氏、王卿。

小梁子村：张书廷、吕吉宫、王振昌、郭振武、孟繁贵、于明坤、吕国卿、孙德木。

十二区

榆树林子村：任在公、高福、张甲。

张麻子沟村：于俊、朱有桂、傅生、白万春、王占荣。

北台子村：赵凤山、兰生、毕占林、董喜才、王义明、朱兴合

朝阳湾子村：李景山、李井龙、李坛、卢青珍。

双庙村：张瑞、赵寡妇、郑喜、姜殿阳、李洪山、董臣、陈贵庆、郭臣、姜殿信。

碾子沟村：齐德贵。

鸡冠子山村：于占海。

狍子坡村：张清儒、张清、韩青山。

（根据 1951 年档案资料整理）

日寇在宁城制造的“无人区”

胡世秀 周凤玉 调查整理

抗日战争期间,在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上,沿长城内外两侧,日寇实行了残酷的集家并村政策,制造了纵深千里的“无人区”。宁城,正处于这条“无人区”的北缘。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将宁城山区的近 3 万人民群众赶入“部落”,过着悲惨的生活。

日寇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制造“无人区”,从战略上来讲,是“确保满洲”;从战术上来讲,就是破坏人民群众同共产党八路军的“鱼水关系”,达到“竭泽而渔”的目的。

—

宁城的集家并村,是从 1942 年开始的。重点是把黑里河、南北厂子深山中散住的居民驱赶到大村落里居住。群众称之为“小集家”。大规模的集家并村是在 1943 年春至 1944 年秋。集家并村的重点是:四道沟、大营子、西泉、八里罕南北厂子、热水、存金沟和三座店山里,这些地带都修了围子;头道营子、甸子、石佛、五化、山头、榆树林子等地的山区也进行了集家并村,大部分部落没修围子;马架子,八素台等山区是 1944 年开始集家并村的,没来得及修围子。

据调查,宁城地区共修部落围子(当地人称“人圈”)75 个,没

修围子的集家点 78 个,共集家 7200 户,并自然村 630 个。

集家地点一般选在大川靠近公路的地方,便于日伪统治。在推行集家并村政策时,首先做欺骗蒙蔽性的宣传。说什么“共产党是‘共匪’”,“共产共妻”;说集家并村修筑部落是为了达到“民‘匪’隔离”,“王道乐土”之目的。

集家开始时,敌人是采用先驱赶群众修部落然后搬家的做法;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们便先驱赶群众搬家后修部落。在强迫群众进入部落时,日寇及其爪牙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因抗日工作需要或家有病人,怜惜财产不肯搬家者,敌人先是组织“镐头队”扒拆房屋,后来干脆以火焚之。有的在房屋被扒被烧后,仍不肯搬进部落,又在原房框子里或到深山里搭起马架房居住。敌人对这样的人除用打骂手段强迫搬入“人圈”外,则以“通匪”罪名逮捕入狱或打死。

部落的围墙,一般 4 米多高,1 米多宽,也有 1 米半宽的。围墙基础用石块,上面有用泥和穰秸垛的,也有用土打的,也有下层用土打,上面用泥垛的,互不一致。围子门最多开四个,也有开一个的,也有的开个大门再开一个小轿门的,不尽一致。

围子门旁设岗楼(也称警卫室),四角设炮台。在门口附近搭高架子设瞭望台,上面有鼓、钟之类的报警设备。围墙四周都有泄水的阳沟。最大的围子占地近百亩,一般的五、六十亩,最小的也占地二、三十亩。

二

集家并村以后,敌人对部落的统治是非常严密和残酷的。一般的部落设警长一名、警察十四、五名(部落警),负责部落内的治安。

部落内重编甲牌,户口重新登记,十五岁以上的人发给《证明书》(良民证),《证明书》必须随身携带,对查无《证明书》的人,便拘留审查。围子的大门,整日有人站岗,日出开门,日落关门,不许早出和晚归。夜不归宿者,必须请假。未经批准,夜不归宿者以“通匪”论处。岗楼上日夜有人守卫,设有流动岗哨。还把部落内十八至四十岁的男女都组织起来,有的发给一根镐把(群众叫棒子队),有的什么也不发,只要一有情况,以敲钟或打锣为号,都得持械而出,有镐把的拿镐把,没镐把的拿棍棒,还有的什么得劲拿什么,如烧火的拿掏火耙,捞饭的拿笨篱,切菜的拿菜刀等,按照部落警的指挥去围追八路军或抗日工作人员。为了检验群众是否听从指挥,敌人经常搞这样的演习,不出动者或不持械者,皆以反满抗日论处。有时,敌人假冒八路军去叫门,如果开了门,他们就说私通八路军,非抓即打。后来人们摸着了敌人的规律,敌人冒充八路军来,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还会受到表扬。

在部落里,敌人安插很多特务秘密监视人民群众的行动。夜间,如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唠嗑就逮捕审查。在谁家里发现茶缸,手电筒、小铁锅、灰色或黄色衣服之类的东西,就按“嫌疑犯”论处。若在谁家发现枪支弹药、八路军的粮票等,均按“国事犯”严惩。八里罕南厂子辛家窝铺部落,由于特务张凤山侦察报告,于1943年腊月三十夜间,逮捕了我地下工作人员李华,伤员李万和以及掩护他们的代云宽、朱俊德、张均、米俊富、李清河、二老吴、王老二、姜连朋的父亲等十人,押往承德。其中除有四人在途中侥幸逃跑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杀害了。又如四道沟姜廷怀、姜鹤令(姜廷怀长子)、杜永安、安彬、田士坤、于德明、于增、郅文合、朱德福等人于1944年正月初六早晨,因与八路军有联系,以“国事犯”罪名逮捕入狱。于增当场被打死。姜廷怀在阜新监狱被折磨致死。其余被判刑,刑

满后释放。还有八里罕北厂子李文奎因给八路军送过信,在1943年9月被宪兵侦知,逮捕后即遭毒打,不到半月死去。

三

集家并村以后,几个村、甚至几十个村的群众搬进一个村子。少数有亲戚关系的可以寄人篱下;部分有条件的搭个马架棚居住;大部分,特别是那些房屋被烧掉的只能弄点榛柴围个圈拦住,不论男女老少,是病是晚都合住在一起。牛棚、碾房、场院屋、街头墙角都是住宿的地方。夏天,任凭雨淋日晒;冬天,任凭雪打风吹。

部落里的老百姓,不仅住处困难,更缺吃的。原来的大部分土地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不准耕种;租种点土地,打的粮食大部分要交给地主,就是这样,还要交“出荷粮”(粮干)。种大烟要交“烟干”(种大烟的交烟土除去水分,老百姓叫烟干)。有土地的交亩捐、有牲畜的交牲畜税、有车的要交车牌税、各家都要交门牌税。除此之外,地方上还摊派保甲费,供自卫团开支的费用等。生活必需品布、盐、火柴等奇缺,市上根本没有卖的,只靠官方“配给”,还多数被地方爪牙克扣。有的十八、九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西泉哈拉卜荷沟的杨福及其母亲并到李家营子,因没房子住冻死在炮楼下;西泉土豹子沟的李树才,也并到李家营子,因为衣食无着,父亲冻饿而死,后来把妻子卖掉,数九寒天趴在猪身上取暖;四道沟二道梁子路文明一家三口,妻子没衣穿,腰中只围条破麻袋片,全家一条被子也没有,一间破马架房,还被烧掉,只好用榛柴搭个小窝铺,铺点莜麦糠,讨吃度日,在一夜间,就被寒冷、饥饿、疾病夺去了全家三口人的生命;1944年秋,八里罕南厂子一个姓张的给姓蔡的富农扛活,由于劳累饥寒而染重病,一天晚上,蔡家把他抬到围子外的

炮台根丢下,还没断气,就被狼狗吞噬。狼啃他的脚后跟时还在呻吟,当时他的儿子才十三岁,也给蔡家放羊,哭喊着要到围子外看他的父亲,自卫团不许,还把他毒打一顿;马架子北台子的贺功,并村并到娘娘庙,住在徐瑞希的场院屋。他的大小子叫大丫头,二小子叫跟丫头,跟丫头傻点但能干活。因为生活无着,他们夫妻认为都活着也是一起受罪,死一个少个累赘。在全家痛苦声中,叫大丫头用石头将跟丫头砸死。以后,贺功饿死在家,贺功老婆要饭到四十家子,找个打伙的住下,大丫头逃荒远去,不知下落……

夏季部落里遍地泥泞,污水粪便到处皆是。苍蝇、蚊子等害虫恣意肆虐;伤寒、霍乱、痢疾广泛流行。每至传染病发生季节,“人圈”里天天都得往外抬死人。

当时的“人圈”,就是人间地狱。

四

日寇随着集家并村政策的实施,在我县黑里河山区、存金沟脑、八里罕南北厂子,马架子、八素台等地划了“大满洲国无住禁作地带”——“无人区”。“无人区”一般是被集家者的土地和山林。这里以黑里河的“无人区”最为典型。南至光头山,北到王营子沟里,东到西打鹿沟,西至承德围场境内,纵横百里之外。“无人区”内:一不准耕作;二不准放牧;三不准砍柴;四不准夜宿;日伪岗哨在瞭望台上日夜监视。还有大批日军和讨伐队巡逻。凡遇人畜进入打死勿论,凡有烟火升起之处,就是日伪军攻击的目标。

划归“无人区”后,所有的东西统视为违禁物。房子要烧掉,牲畜、粮食衣物要抢走,人要枪杀。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一万多间房屋被烧或扒掉;四万多亩耕地荒芜;上万头大牲畜被敌人抢去杀死

吃肉或死掉,粮食及其它物品的损失无法统计。“无人区”内,从集家并村到日寇投降共有 4000 多口人被打死、病死冻死或饿死,其中有 200 多户死绝。西泉打鹿沟未集家前有 260 户 1600 口人、1100 间房子、2872 亩耕地、34 匹骡马、510 条牛、120 头驴、1400 只羊。1945 年日寇投降后,仅剩 183 户 721 口人、360 间房屋、75 亩耕地、44 条牛、18 头驴、200 只羊。减少的 107 户有 20 户死绝,减少的 879 口人有 420 口死掉,其余逃往他乡。据建国初期调查资料记载,大营子的道须沟、上拐、西泉的范杖子、东打鹿沟四个村,烧毁及拆除的民房 1127 间,抢走和打死的牛 271 条、骡马 17 匹、羊 764 只、驴 41 头、小鸡 6 麻袋,杀、病、冻、饿死者 799 人。

八里罕南厂子辛长河一家 6 口,辛长海一家 3 口,赵宏歧一家 7 口,齐五一家 3 口、赵春祥一家 2 口,辛长春一家 4 口,齐六一家 1 口共 7 户 26 口人死绝。

大营子道须沟的任富有、郎福才因为誓死不进“人圈”被活活打死;大营子八沟道三道沟门刘金贵是部落长,因修不上围子被打死;八素台长胜村孙占武,因一间房没拆掉被怀疑为“通匪”,被抓到宁城(小城子)警察署严刑拷打。释放后回家一看家里三口死光。西泉郭杖子一天死过 32 人,打鹿沟门 1943 年一冬天就冻死 82 人。

五

敌人集家并村的目的是使游击队和老百姓隔离,把抗日军民的血肉关系割断。但事实与侵略者的愿望正好相反,“人圈”只是摧残了民众的身,不能征服民众的心,只是使抗日斗争更加艰难,更加残酷些罢了。集家并村一开始,军民就团结一致,进行了反集家

斗争；集家并村以后，山区根据地仍然巍然屹立，游击队仍然坚持战斗在“无人区”，并不断向敌人后方挺进。

群众反抗集家并村，一是拖延、破坏修围子，使敌人的集家计划不能顺利进行。一开始，群众不去修，后来是白天修，晚上扒。大营子三道沟门在垛围子墙时，里头放上干草，一下大雨，围子墙就倒了。二是群众进入部落以后，一部分与游击队有关系的人坚持不进部落，“猫”在山上，负责沟通情况，筹措粮款鞋袜，养护伤病员。西泉范杖子的郭春年、黄茂荣，房子被烧了，坚持不进部落，在房框子和山上的小窝棚里，先后养护了李志华等八名受伤和染病的干部战士，黄茂荣的父亲因此被敌人抓去打死。大营子道须沟吴广才两次集家也没下山，把房子烧了，就到大山沟里去，盖一间小马架，养护八路军伤病员。西泉西打鹿沟崔文贵，坚持不进部落，多次给八路军送信，为八路军带路，房子被烧了，锅给砸了，被敌人抓去打得死去活来，因会点武术，又跑了回来。进了围子的抗日群众与山上的抗日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大营子小拐陈国相（修桂英的丈夫）住在山上，杨雨民曾在他家住过。从围子里敛的鞋粮，收集到的情报，就送到他家，转交游击队。

在那艰苦的环境中，群众给游击队送饭、送药、送粮、送鞋、送情报、帮助养伤、带路……，军民血肉相联，同仇敌忾，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43年，北厂子李万海的母亲、李万臣的母亲等四位老太太冒着生命危险给游击队做衣服，南厂子汪茹兰是抗日堡垒户。一位姓迟的战士冻坏了脚趾，在她家养了40多天，她按时送水送饭，每天晚上用花椒水或茄子秧水给他洗脚，使这位战士伤好归队。归队时，这位战士用剪子将大黄褂子衣襟剪下一块送给她说：“大娘，我也没什么，要走了，把这块衣角给妹妹们做一个鞋布当纪念吧。”

敌人虽然对部落里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统治,但他们色厉内荏。有些部落,敌人只是白天去转一转,到夜间就不敢去了,仍然是抗日群众的天下。游击队常常在夜间到部落里开会,发动群众,筹措军需,一旦被敌人发现,群众就机智地掩护起来,转移出去。更值得深思的是,在敌人残暴地推行集家并村、残酷统治、严密封锁、疯狂扫荡的时期,1943年冬,三座店丰水山、大城子的贾家梁同时建立党支部。杨秀章、任忠善、金宝善、任风岭、任瑞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面对残暴的敌人,“无人区”的人民同游击队生死与共,同舟共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由于敌人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宁城山区的数百座村庄,化作灰烬或废墟,抗日志士的鲜血染红了“无人区”的山野,筑成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

今天,当年的“无人区”,美丽富饶,百花争妍,那是用游击战士和人民群众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现在还有几段当年的围子墙立在那儿,告诉人们,告诉后代,不要忘记过去。

附:

- ①黑里河山区集家并村情况调查表
- ②宁城县西部山区的“部落”分布图
- ③大营子部落示意图。

1985年9月

附：

黑里河山区集家并村情况调查表

乡	并村点	并进自然村	集家户数	集家人口	扒房烧房数	并村后死亡人口	围子		
							南北(丈)	东西(丈)	大门位置
四道沟乡	四道沟	小柳树沟、大柳树沟、无门子沟、半截子沟、铎把子沟、獐豹子沟、爬齿子沟、车圈子北沟、羊草沟、车圈子窑沟、狹狍沟	180	700	560	230	115	75	
	上三道河	小打鹿沟、北沟、西沟、小鹰窝沟、大鹰窝沟	50	250	101	61	45	30	
	下三道河	西沟、吊窝沟、半桥子沟、刘忠沟、西沟门	80	270	190	100	60	30	
	达子沟门(北毛)	上东沟、下东沟、杏叶子沟、河夹心、打鹿沟门	100	450	320	120	70	40	
	庙前营子	杖房沟、张虎子沟、大冰郎沟、小冰郎沟、老道沟、烂眼子沟	65	310	210	72	60	30	南北
	兴营子	旗杆掌子沟、老道沟、羊草沟	62	210	162	70	60	40	东、西
	南道(二道梁)	李札子沟、拐帮沟、北沟、板桥子沟、西梁底	81	320	230	98	60	60	东、西

续表

乡	并村点	并进自然村	集家户数	集家人口	扒房烧房间数	并村后死亡人口	围子		
							南北(丈)	东西(丈)	大门位置
大营子乡	大营子	河南、河北	102	408	103	160	50	100	东、西
	道须沟	雹神庙、范营子	58	300	240	100	40	50	
	山神庙	西大梁、冰郎沟门、小道须沟	67	370	200	60	70	120	
	三道沟门	獾子沟、米家店、南沟门、二道岔	150	610	470	370	60	30	东南
	头道沟门	二道沟门	41	208	130	95	40	35	
	羊草沟	元宝沟(部分)	48	200	180	70	30	60	东、西
	陈杖子	元宝沟(部分)、桥头、大南沟、半截子沟	120	600	380	300	60	90	东、西
	李家营	小松树沟、小冰郎沟、小元宝沟、大松树沟	98	420	380	160	60	60	东、西
	姚家店	上店、盘梁道、小拐、大拐、大冰郎沟、杨树沟、大松树沟、小冰郎沟	120	480	460	160	60	90	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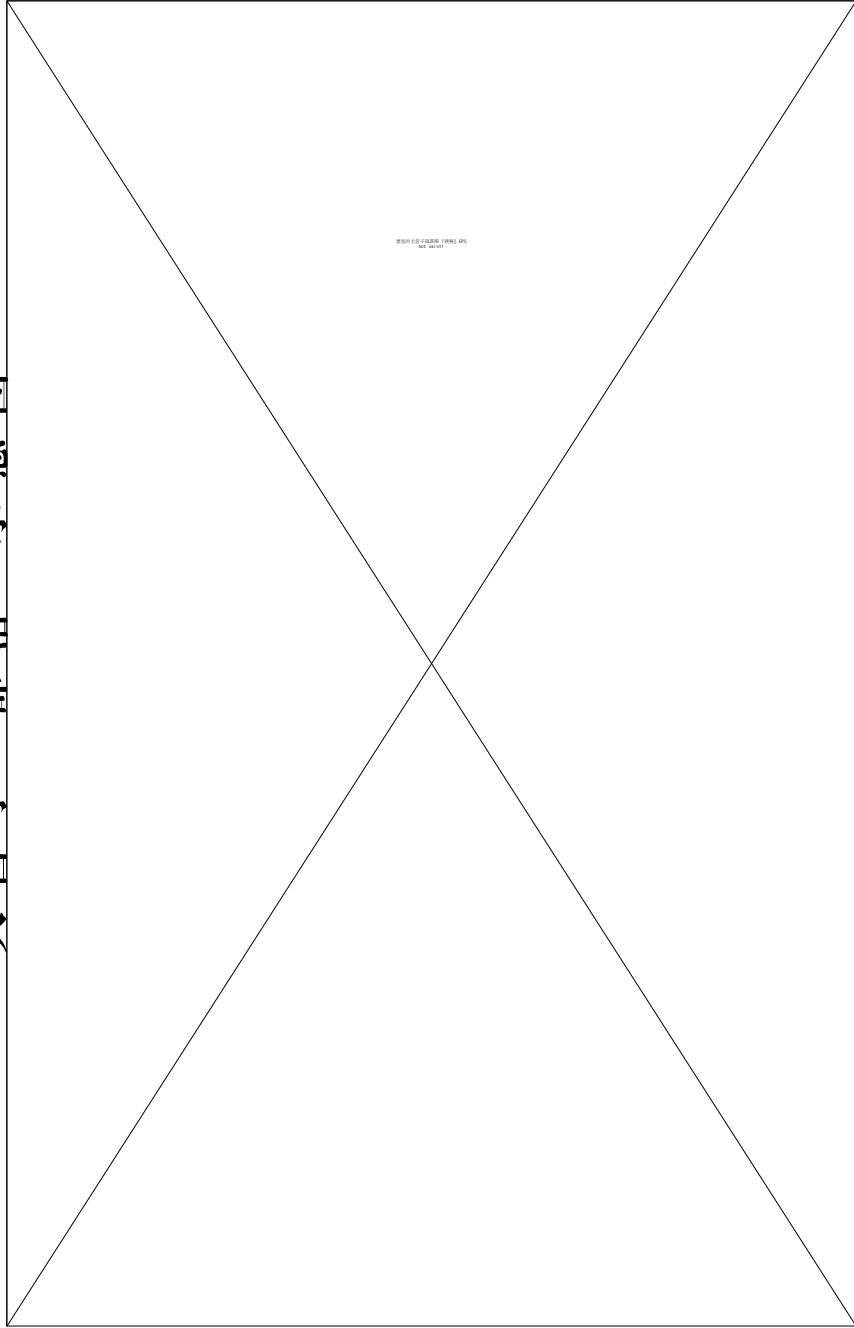
续表

乡	并村点	并进自然村	集家户数	集家人口	扒房烧房间数	并村后死亡人口	围子		
							南北(丈)	东西(丈)	大门位置
西 泉 乡	石洞子	南沟、乱石通沟、湾子北沟、冷家营子	110	420	360	190	40	75	南(小轿门) 北
	兰家炉	丛家营子、杨树沟门、河南、北沟	36	150	150	20	45	50	东、西
	魏家子营	赵家营子、西南沟、西沟、石砬子沟、张家沟、宋家营子、连洼	52	200	180	60	40	60	东、西
	姜家子营	河南营子、河东营子、碾子沟门、房框子沟、大西沟	17	70	50	10	30	20	西南
	陈家子营	东杨树沟、张家营子	15	70	30	10	25	15	东
	郝家营子	李家营子、北沟	27	100	50	10	40	80	南(小轿门) 西
	李大	二道沟、三道沟、三道沟门、四道沟	70	300	300	140	60	70	东
	窑沟						60	70	南
	王家营子(范杖子)	齐家营子、胡家营子、碾子沟门、范杖子、山咀	150	600	580	250	150	75	南、西
	西郭杖子	上台子、马场、小马达子沟、大马达子沟、石子沟、聂家沟、南洼、北岔、打梁道子沟、王家营子、庙前、梁子后、上营子	130	600	500	200	60	45	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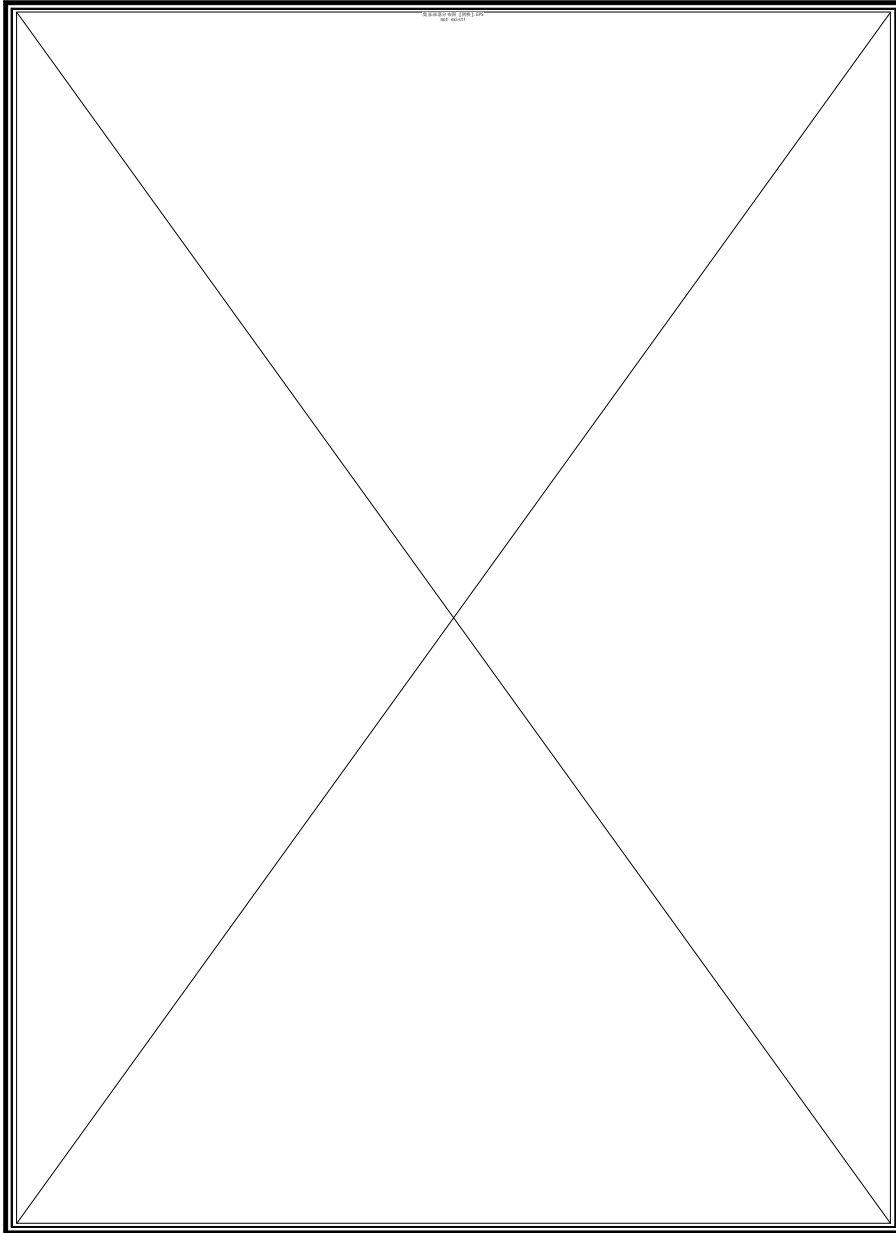
续表

乡	并村点	并进自然村	集家户数	集家人口	扒房烧房数	并村死亡人口	围子		
							南北(丈)	东西(丈)	大门位置
西泉乡	林家营子	郭杖子、大西沟、小西沟、吊窝沟、小杨树沟、辛三沟、赵家营子、冯家营子、拉拉沟、三岔口、石子沟、正沟、杨树营子	78	420	200	140	75	30	西
	毛家营子东	程家营子、老年沟门、庞家营子、小东沟	26	120	200	80	30	25	南、北
	毛家营子西	仓子沟、东打(部分)	35	150			40	30	东、西
	西泉	东泉、河北、陈家营子	80	500	300	100	75	90	东北小轿门 东西大门
	王营子(大兴)	杜家营子、彭家杖子、杨家营子	110	450	290	60	35	150	西、北 东、
	榆树底	杨树沟、打虎石、西洼子、杨家营子、槟榔沟	167	800	420	300	60	80	东、北 西、南、
	李家营子	二东沟、土豹子沟、陈家营子、大窝铺	71	300	180	50	45	60	东、西
	盆底沟门	东山、二东沟、大东沟	50	200	100	40	70	70	北小轿门 西、东和
	上马圈子	郭家沟、马家沟、仲家洼、黄土梁	110	500	180	90	80	90	东、西
下马圈子	东南沟、花子匠沟	80	370	120	30	60	70	东、西	

大营子“部落”示意图



宁城县西部山区“部落”分布图



一起假农会残杀贫农的事件

周国相 供稿

1948年土改运动中，在乃林沟陶家营子村发生了一起地富篡权的假农会杀害贫农陶小爬、崔凤山的事件。

乃林沟陶家营子村，在未搞土改之前，就已建立了农会，但是个假农会。农会主任张友发已被大地主陶满珠、伪甲长曹凤贵、狗腿子陈万增收买。

当时的二区，区政府临时设在三座店西窝铺。区委书记张广经得知陶家营子农会是个被地富篡夺了权力的假农会的情报后，于1947年冬，派出土改工作队到陶家营子查明。工作队进村后，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了假农会，打击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另组建了新的农会政权，让农会的权力掌握在真正的贫农手里，秘密选举了陶家营子村六牌贫农青年陶小爬、崔凤山为农会主任、武委会主任。准备由他们二人接替假农会的领导权，领导群众搞土改。1948年1月，为了夺回被地富篡夺的农会权力，他们在土改工作队的支持下，突然向全村11户地富发起清算，将地富家产、粮油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并封闭了他们的家门。这时，已快到春节了，工作队便撤出了村，准备春节后再进行第二步工作，彻底清算，平分土地。

工作队撤出不长时间，地主陶满珠、伪甲长曹凤贵、狗腿子陈万增趁机与下台的假农会主任张友发串通勾结，暗地活动，在

群众中造谣说：“陶小爬、崔凤山是假造反，他们反对农会，反对贫农，反对共产党领导，阴谋杀害区干部尹凤山，陶、崔是反革命，是土匪，非镇压不可。”他们暗地活动串联，把一个村分上下两派，张友发为下半村一派，崔凤山为上半村一派。准备挑起两派群众斗争。

1948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上午10点，假农会紧急通知召开全村群众大会。上下各牌群众各自举旗，持棍棒、斧头、火炮、刀枪等，集结在农会院中。陶小爬、崔凤山一派没做思想准备，没有提防。伪甲长曹凤贵指挥埋伏在院中的打手一涌而上，把崔凤山一派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就地捆绑，拉出院内。把陶小爬、崔凤山打倒捆上、顺着街拖（耨高粱茬）。陶、崔二人后脑勺、脊背、脚跟肌肉全被拖掉，露了骨头，鲜血淋漓，昏死过去，又用凉水喷醒，关进黑屋子。

大年三十，陶小爬的母亲和崔凤山的弟弟去送饭，被“看守”拒绝，说是有令，不准看，不准送饭。陶母和崔弟哭着走开了。陶、崔闻听母亲、弟弟的声音，挣扎起来要和亲人说几句话，也被“看守”拒绝，二人只有隔窗望着亲人离去。正月初一，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拜年问好，庆贺新春，一提起陶、崔两个小伙子，都为他们慨叹，不知他们犯了什么罪，遭到这么残酷无情的迫害，过年都不放过。

为了杀害陶小爬、崔凤山，陶满珠、曹凤贵、陈万增、张友发等人阴谋策划，采取“先斩后奏”的阴险手段。陶满珠亲自写下状纸（联名折子），签名划押，准备杀害二人后，谎报罪名。指定二牌老兵痞周老六持枪击毙，商妥事成之后给他250两大烟土。

正月初二（1948年1月23日）一早，假农会秘密派专人向

全村各牌通知，上午 10 点召开全村群众大会，“公审”陶小爬、崔凤山两个“反革命分子”，各牌每户一个不能缺，不去人者处罚。在 10 点以前，全村六个牌的群众全都到齐等待开会。农会门口戒备森严，早已准备好桌案、“惊堂木”，刽子手两旁站列。伪甲长曹凤贵厉声喊道：“大家都到齐了，现在开会！把陶小爬、崔凤山两个反革命分子押上堂！跪下！”“不跪！”陶、崔以愤怒的眼光对着他们说。曹问：“你们俩犯了什么罪？”“我没有罪，是斗地主。”“你们两个反对共产党，要谋杀区干部尹凤山一家，抢劫民财，是反革命，土匪，必须枪毙！”曹凤贵把惊堂木“叭”的一拍，“拉下去枪决！”早已准备好的六个刽子手一涌而上，把陶小爬、崔凤山两个青年拉到前河套沙滩上，用火枪、杀猪刀连打带刺杀害了。他们才二十七、八岁。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为之流泪，哭声不止。他们不准陶、崔两家的亲人收尸，邻居们把两人的尸体暂放保存。

杀害二人之后，这伙人心怀鬼胎，当日下午张友发携带杀人案卷到二区政府汇报，张友发被当场扣押。区委书记张广经立即派区干部到陶家营子村查明此案。由于斗争复杂，案情重大，涉及人员多，一时查不明真相，于 1 月 27、28 日（正月初六、七），区政府又派 12 名土改工作队员（政委戈瓦，指导员队长唐永生），重新进入陶家营子村。进村后宣传党的土改政策，稳住敌人，发动群众，揭露杀害贫农案件的阴谋，把杀人的主谋者曹凤贵、参与杀害者周老六先抓起来关进监狱。陶满珠、陈万增畏罪潜逃。而后，工作队逐个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使受蒙蔽的群众提高了思想觉悟，检举揭发了假农会的内幕和他们篡权杀人的罪行，进一步清理了阶级阵线，重新建立农会，选举贫农张瑞祥为农会主任，使土改运动轰轰烈烈

烈地开展起来。把潜逃的大地主陶满珠、狗腿子陈万增捕获归案。土改工作队又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宣判了曹凤贵、陈万增死刑，在三座店枪毙。陶满珠被判刑死在狱中，张友发也被关押判刑，为贫苦百姓除了一大害。

1948年春，土改结束了，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翻了身，春耕生产搞得轰轰烈烈，家家争取多打粮食支援前线。青年们踊跃参军参战，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奔赴战场。

1985年6月

· 历史资料 ·

中国历史上的“中京”

我国古代，先后有六个地方被命名为“中京”。

一、南朝时，称洛阳为中京，一直到唐代。

二、唐至德二年(757年)。京城称中京。即今陕西长安县治。

三、唐时渤海中京显德府。即今吉林西南之苏密城。

四、辽大同元年(947年)二月“升镇州为中京”，在今河北省正定县。

五、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建辽中京大定府，在今宁城县大明城。

六、金主完颜璟以宋故西京为中京。府曰金昌。府治即今河南洛阳县。

(编辑)

老局子河畔的惨案

沙万川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2月的一天下午,地处塞北的宁城山区老局子河畔,尚没一丝春意,寒风卷着黑沙,打在人们的脸上麻簌簌的疼。远方不时传来几响枪炮声。大多数老百姓都藏匿在家中以避战祸;也有些好事的人到外面观察战争势态。这时只见从老局子河畔离溜歪斜走下一个人来。走到南沟口——高秀山树林子边就打起转儿来。到跟前一看,啊!他的双眼被挖去,鼻子被砍掉,全身血肉模糊!喉咙里还能发出吼喽吼喽的声音。这个人中等身材、高颧骨、脸清瘦,看样子在三十上下。他穿一身灰布制服,脚穿家做便鞋。身体时而打转儿,时而坐下,时而站起,使人惨不忍睹!

人们只是呆呆地看,他,姓什么?叫什么?家是哪里的?谁也不知道,更谈不到了解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的毒害了。看着、看着,时近黄昏。凛冽的寒风刺着人们的肌骨;它又加速受残害者的死亡。受残害者一动不动地躺在高秀山的树林里。在日军的铁蹄下,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死人是司空见惯了的,但没见过象这个人死的这么惨!人们向西南望了望日军驻地而默默散去……。

高秀山是当地的绅士,死难者还在他的树林子里,处理后事的任务,自然落到他的身上,也许是害人者故意这样安排的。高秀山就让崔振起(高家的小牛倌,今年六十二岁)、赵小邦、xxx三人将死难者遗体草草埋在河东双岔子沟边。由于河道迁移,坟墓和遗骨

早已付诸东流,死难者的尸骨早已化成“轻烟蔓草”。

五十三年过去了,今年(1986年)10月初,宁城县委统战部突然接到安徽省淮北市统战部陈松涛同志的来信:要求帮助在老局子找一找他父亲的坟墓和遗骨。并附上王行思同志供给江苏省铜山《文史资料》1986第五辑中的一篇珍贵的稿件——《陈子实先生千古》。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非非”,发表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4日《新闻报》(星期一)拾伍版上。宁城县委统战部长刘志阁同志接到信后,便于10月7日到当地访问。经遂生、遂得潦、遂德山、杜天祥、崔振起等老人的回忆,弄清了死难者的临终惨状。刘志阁同志把这篇文章,读给当地群众,听者无不泪下。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了解到:死难者是一位“随热河失去的记者”叫陈子实。从这篇文章中我们看到:陈子实先生的品德是那样的高尚,他爱我们的国家,是那样的热忱。如果没有象子实先生那样一些先辈,东北四省如何能摆脱殖民地的命运;如果没有陈子实先生等先烈,我们岂能有今天?

子实先生死了,而且他的死已经过去五十三年了。他的鲜血洒在老局子河畔;他的遗体在这里没留下一丝痕迹,留下来的仅有几位老人的回忆和群众的眼泪!

做为烈士牺牲地的人,今天才知道这桩惨案的缘由,太有愧于先烈了。我们感谢王行思同志提供给教育我们的珍贵教材;我们感谢铜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表了这篇文章!老革命根据地的老局子河畔因受革命烈士鲜血的浇灌,她将生长出革命的鲜花映红祖国大地。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们用臧克家同志的这两句诗来安慰我们的英勇烈士吧。

1986年11月27日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

沙万川 周凤玉 调查 沙万川 整理

伪热河省地处伪满州国西南国境线上。自 1940 年起，就是日伪与中国共产党双方激烈争夺的地带。做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警察讨伐队，起到了日寇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在围剿抗日军政人员上是穷凶极恶的，他们在执行“三光”政策上，是极端残酷的。现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把它的大致情况简介如下。

伪满初期（1933——1938 年间），日寇在伪热河省南部派有重兵驻守。当时也没有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活动。长城沿线的青龙、兴隆、滦平、丰宁等县也只设警察署、所。偶而有反满抗日活动的出现，便临时抽调警察组成讨伐队或警备队赶赴出事地点，执行警戒任务，维护当地警察署、所的安全和稳定出事地点的治安。当时把这种工作称为“应援”。一旦治安情况好转即解散回原机关。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腹大患：1938 年建立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1941 年 4 月建青（龙）、平（泉）联合县；1943 年 5 月成立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和承平宁工作委员会。这就使敌人慌了手脚。他们开始调集和组建伪热河省和县、旗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的成立及其历史背景

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是在日军指挥下以汉奸、叛徒为骨干,网罗地痞、流氓、土匪、烟鬼及少数无业青年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他们的核心领导人物是岸谷隆一郎、姜全我、陈天喜、和皆川、富之亟。岸谷在伪满州国成立后,(1932年)就任伪通化省警务厅长、是围剿抗日联军的元凶。1943年调任伪热河省次长(解放后夫妇共同自杀于承德)。姜全我原名姜义原是奉系东边道镇守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充当围剿抗日联军的急先锋,任伪满州国通化省长,后任热河省长(1944年病死)。陈天喜又名陈尔玉、绰号陈大炮,辽阳人,二十年代末期留学日本。伪满州国成立后任通化省辑安(现集安)县县长,后任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一心总队”本部司令。皆川(日人)在通化时就组建伪警察讨伐队,后任“一心总队”本部副司令。

伪热河省讨伐队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满州省委根据周恩来同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大批动员革命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中做工作,一方面指示各地党组织创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1935年至1936年由游击队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当时共有十一个军,人数达三万五千人。东北抗联的发展和壮大,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与侵略计划构成严重威胁。关东军为了巩固东北这块侵略基地采取了增兵讨伐的办法。1936年初,日军竟增至十二个师团、四个混成旅和一个长驻间岛的“朝鲜派遣军”的师团,外加铁道守备队以及伪满军

的兵力。敌人对抗日游击区采取：定期、定点、定线的大讨伐。他们集中兵力纵横扫荡来回拉网，所谓“蓖梳式”、“踩踏式”办法对付抗联及广大群众。实行了军事上、政治上（招降）、经济（断绝给养来源）上全面的大扫荡。日本总兵力约三十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抗联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他们组成日伪警察讨伐队掉转枪口来残杀自己的同胞。

在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伪中央警察学校（长春）、伪奉天警察学校、伪通化地方警察学校培养出一批警察讨伐队骨干分子和
中层讨伐队骨干。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也可以说是伪满州国的讨伐队。原因：
①别的省份没有；②它受全满州国战事的支配，哪里战事最吃紧就把它调到哪里去。伪热河省的警察讨伐队，基本上可分省、县两级。在通常情况下，省级讨伐队由省警务厅调遣；县级讨伐队归县警务科指挥。但县警务科也有权调用驻在本县的省级讨伐队。省、县两级讨伐队，彼此没有隶属关系。讨伐队的名称是根据大队长名字的前两个字而命名的，如曲焕讨伐队的大队长叫曲焕文；刘其队的大队长叫刘其昌等。……讨伐队的名称时有变动，那是因扩大编制或被打垮后重新编制的缘故。现将各省级讨伐队简介如下：

（一）程斌讨伐队。它的大队长叫程斌，曾用名程杰、程志平。男，汉族，生于吉林省伊通县。1922年入伊通小学读书；1925年入伊通职业学校读书；1927年入长春市自强中学读书，1929年毕业。1930年入长春市大恒表店当学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乐光介绍加入盘石县抗日救国会，并参加了义勇军。1932年春，由

刘×介绍,于伊通县三道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第四小队队长。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治部保安连政治委员。1934年任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师师长。

1936年7月,抗联一军一师西征失利,重返恒仁县(现辽宁东部)老秃岭子一带活动。1938年春,一师进入本溪县老和尚帽子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此地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一师虽然和军部及杨靖宇司令失去了联络,但部队在程斌领导下仍同日寇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给敌以沉重打击。这时日寇调集以黑骑游击队为主的大批人马,对一师进行了疯狂的讨伐和围剿。与此同时加紧实行“归屯并户”和“集团部落”,使一师同当地群众基本上切断了联系,致使一师给养发生极大的困难。程斌感到在此地难以坚持下去,便带领部队向宽甸一带转移。在这一带的深山里,日寇的扫荡、讨伐更紧,加之人地两生、立足困难,斗争无法开展。面对这种情况,程斌决定率师重返本溪老和尚帽子根据地。

早在1937年3月,日寇长岛工作班就将中共柳河县委瓦解破坏,逮捕了原县委书记冯剑英(崔凤官,朝鲜族)。冯贪生怕死,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叛变投敌。在他的阴谋策划下,长岛工作班于同年5月派员潜入一师的根据地——桓仁、新宾、宽甸、本溪、凤城等山区。他们对抗联进行袭击逮捕和瓦解。同年12月21日,原一军军事部长被捕后叛变投敌;1938年2月13日,原一军政治部主任安广勋也被俘叛变。这些叛徒为效忠日寇,而献计献策:程斌事母至孝,可秘密逮捕程的母亲和哥哥以逼使程斌归顺。

1938年夏,长岛工作班沙山伍长和叛徒胡国臣等人前往伊通县东上坎程斌外婆家抓住程母张氏;又到公主岭抓到程斌的哥哥程恩。然后将程母及程恩的照片印到传单上,到处张贴、散发,以此

做为人质要挟程斌投降。

一师在行军途中，程斌在日寇散发的传单上得知母兄被关押在本溪县碱厂街，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他既担心母兄的生命又感到军队处境险恶，加之日寇讨伐日紧，特别是军队经常断粮不得不以野菜充饥，几次派人和军部联系都没有结果，他对斗争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失败和悲观情绪在程斌头脑中占了上风，投敌想法逐渐成熟。

1938年6月27日上午，一师行军至本溪和凤城交界处分水岭以东十华里的山沟里休息。下午，程斌召集六团政委李刺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又名金钟汉朝鲜族）开会，以研究去碱厂赶给养为由，试探二李对投降的态度。此时六团政委李刺苏（朝鲜族）已窥知其意，对程的投敌意图进行了抵制，俩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程斌不耐烦的说：“我们没有给养你说怎样办？”李刺苏坚定的说：“就是三天三夜不吃饭，我们也要革命，投降敌人是可耻的。”程斌做贼心虚，见李刺苏已明其意。深恐他的投降计划受阻，就在他站起来回走动的时候，程斌开枪将李刺苏打死。然后又向李向前开枪。李向前胸前装有笔记本，枪未能打透，转身就跑。程又向李开了一枪将脖子打伤。李带伤逃走。周围正在采野菜的同志们，听见枪声急忙奔来。程斌对战士们说：“这两个政委都是叛徒，他俩要叛变。六团政委被我打死了，那个受伤逃跑了。”战士们听了半信半疑，默默散去。

傍晚，程斌带队继续向黄柏峪方向前进。22时，六团机枪连连长甄旭光在搞给养时携枪逃跑，到碱街投降了长岛工作班，并供述了一师的全部情况及程斌准备投降的动向。

6月28日，一师队伍行军到黄柏崖沟里。在吃早饭的时候，程斌写了一封亲笔信，由送给养的一个老乡带到警察分所，再转交长

岛工作班,策划投降事宜。

下午2时许,程斌在双岔头(湖底)宿营地召集班长以上干部会。程斌身子依在一棵树上。他身后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保安连战士。程斌开门见山地说:“这些天的情况你们都看见了,军部已经联系不上了;日本人已经把汽车路修到老和尚帽子山了,现在山下到处是日本人的帐篷,他们对我们追逼得很紧,我们是没有希望了,我要领着你们投降去!”

干部们一听就乱了营。有的说:“我们抗日这么多年,下去还不让日本人杀头呵!”有的讲:“当胡子为了钱卖命,投降后,让日本杀了图个啥!”

程斌觉得不好,掏出手枪,把眼一瞪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打算怎么办?”大家一看程斌的手枪叫着“狗头”又看到他身后的保安连战士架着长短枪,谁也不吱声了。程斌稍缓了一下口气说:“下去要杀头,不过是杀我一个人的头,你们当兵的还有个活路。”他见大家仍不吱声,又说:“我是一定到满州国去,见见我的母亲。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已尽忠了,现在我要为母尽孝。我的母亲和我的哥哥都被日本人抓去了,我不投降,她(他)们就活不了……你们要不愿意去,我自己去。”程斌一边说一边摆弄自己手中的枪。见大家闷声不响,他不耐烦地说:“你们快说,到底想怎么办?”

排长栾占奎站起来说:“师长不必这样,我们跟你这么多年了……师长说怎么办吧。”程斌又问大家:“你们说怎么办?”大家说:“栾排长已经说了,师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程斌把手枪收起来说:“那好,就这么定了。”

这时哨兵报告山下来了两个人,一个穿军装、一个穿便装,要见师长。程斌对哨兵说:“让他们上来!”说完他抽出橛子,顶上火,说:“是我的哥哥便罢,不然就让他们变枪粪。”

来人中,穿军服的大个子是投降日寇的一个土匪,叫韩永海;矮个、穿便衣的是程斌的哥哥——程恩。

二人来到山上,程斌给哥哥行了一个礼。程恩说:“你革命还要妈不?”程斌说:“不革命也要妈!”程恩听了坐下就哭。程斌说:“哭有什么用,有一个人顶着不就够了吗。”说完,把二人引进程斌住的帐篷;三人密谈了二十多分钟,二人顺原路下山。

长岛玉次郎得知程斌将于二十九日傍晚带一师队伍下山投降。为了防止有变,立即调兵遣将做了严密的军事部署。黑骑游击队长带八十人,长岛工作班出动八十七人,由黑骑统一指挥。首先封锁了将要会面的地点——短脖子沟附近的交通要道,然后在沟的四周潜设埋伏。下午2时一切布置完毕。

傍晚,程斌带领师部人员和机枪班、保安连六十一人,由南野娘子沟下山,留下保安连长何贵有监视留在山上的六团战士。程斌走前,对留在山上的人说:“我先带人下去看看,要死我先死。我不死,大家都有活路。你们在山上等信。我不打发人来,谁来叫你们也不能下去”。

晚6时,程斌等人进入本溪县第四区短脖子沟,与其兄会面。敌潜伏部队按黑骑发出的信号收缩包围圈。叛徒胡国臣向程斌喊话:“程师长我是胡国臣。你们部队已经全部被包围了,再抵抗也没用了,早放下武器投降吧!”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程斌,犹豫了一阵之后,终于对他的部下下令不抵抗。晚8时,程斌带队伍到达本溪县第四区八楞树村,向长岛工作班缴械投降。

6月30日上午,程斌派吕永祥等人前往双岔头(湖底)六团宿营地,将六团三十三人带下山到八楞树向长岛工作班申请投降。

7月1日拂晓,程斌派保安连长何贵有在兰河峪西侧五道沟找到军需部三分队,同指导员孟海之密谋后,由孟率全队二十一人

在 10 时到碱厂街向长岛工作班投降。

至此抗联一军一师一百五十人在程斌挟迫下，背叛革命投降日寇。程斌等投敌时携带平射炮一门，炮弹三千余发，机枪五挺，长短枪一百七十四支，子弹六千二百余发。

值得一提的是，一师队伍并未全部叛变。就在 6 月 29 日程斌召集干部投降以后，三十多名坚决不投降的战士在祁排长和宣传科长常靖带领下，离开一师继续坚持在本溪县境内同日寇进行斗争，7 月中旬，祁排长同十几名战士在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程斌等一百五十人投降后，有三十五人因年老体弱，被日寇处理回家。程斌等八十多人编入长岛工作班。在木溪经过二十多天的初步整训即开赴通化庙沟，驻南天营进行改编和训练，正式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队。从 1938 年 10 月开始，程斌在日寇直接指挥下开赴辑（集）安、临江等县讨伐杨靖宇将军及其领导的抗日队伍。程斌由于过去在抗联一军中任重要职务，不仅了解杨靖宇将军的战略战术，而且了解关系到抗联生存与斗争的军需供应方面的机密。因此程斌的叛变给靖宇将军及其领导的部队造成极大的威胁和严重的危害。

1938 年 7 月末，长岛玉次郎调往间岛省（现延边自治州），富森接任工作班长兼警察大队长，程斌任付警察大队长。1939 年 8 月，程斌任伪通化省警察队大队长（警佐衔），当时驻防地在临江县八道江。在此期间，程积极效忠日寇，多次参加讨伐杨靖宇领导的抗联军队。他主动向其主子献计献策，并亲自带队破坏我抗联建立在密林中的一些被服厂、医院、修械所及粮食、武器、弹药的秘密储藏点，使抗联蒙受巨大损失。

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将程斌从前线调到濛江（现靖宇）县城，叫他确认牺牲后

的杨靖宇的尸体。经他认定后,日寇将杨靖宇的头颅割掉,在濛江县举行“讨伐杨靖宇庆功大会”。程斌也率队参加了这个会议。

1941年8月,程斌大队调到伪热河省增援日寇扫荡。驻守地主要在滦平鞍匠屯一带,也时常去青龙、兴隆等地参加讨伐八路军,后编入“一心总队”,常驻遵化。他们协助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杀害百姓、烧毁民房,制造“无人区”。关于程斌和姜全我之间还有一段趣闻,就是姜全我曾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程斌。这是汉奸与叛徒更加紧密的结合。

二、曲焕队。队长曲焕文、字梦华,伪通化省临江县六道沟东马鹿泡人。他家是个大地主。二十年代末,他先在伪锦州交通大学读书,后转到沈阳冯庸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伪满临江县六道沟村当村长。他任伪村长期间,积极效忠日寇,受到伪临江县参事官谷川章(日本人)的赏识。1933年提升为六道沟伪警察署长。1938年——1940年冬任临江县警察大队长。在任讨伐大队长期间,因讨伐有功,伪满州国治安部曾授予他“警察最高赏”的奖励。1943年升任为隆化县警务科长(警正衔)。1944年调任“一心总队”任警察大队长。在此期间,他率部在长城内外对八路军大肆讨伐、围剿屠杀抗日军民。

三、刘其讨伐队。大队长刘其昌,字瑞符。原奉天(辽宁)省辽中县中兴堡同合屯人。他生于1890年,幼年时期家境比较贫困。1906年前后在家放猪。1907年至1909年领瞎子出外算卦。1909—1911年在本屯私塾边做饭边读书。

1912年(民国元年),他跑到奉天当募兵,从此开始了兵痞生涯。次年随军到河南直至1914年在于华忠部由普通兵任司书。1921年在奉军五〇团先任传令兵后升为班长。同年12月考入军校。1922年回到五〇团任中士班长。1924年任少尉排长。1925年

在冯玉祥国民军第四军任连长。1926年第四军归吴佩孚节制时任连长。1927年5月,到北京投到张学良部下任警备五团三营五连长。1934年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后,他逃回老家——辽中县。1935年,他投入日伪辽中县警察队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1936年3月1日,转到东边道围剿抗联部队,因围剿抗联有功升任少尉排长。1938年辽东县警察队改编为抚松县警察游击队,刘任小队长。1939年刘其昌被编到唐振讨伐队任中队长。1940年刘其昌升为唐振讨伐队的副队长。在围剿杨靖宇的部队中,除日军外,主要是唐振队和程斌队。杀害杨靖宇的直接部队就是唐振队,直接杀害杨靖宇的凶手就是三中队的苏子奎。刘其昌在围剿抗日联军中立了大功,得了日本的最高奖赏,特地让他到日本参观四十天。在他回国后的12月,就成立了刘其讨伐队,晋升警佐。

1941年刘其队由东边道调到热河讨伐八路军。哪里有抗日军队他的部队就到哪里。刘其队的驻地主要有:滦平、青龙、兴隆、伪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玉田、遵化一带。据他自己供认:三年间他率部杀害我干部战士七百六十名。高桥以及十七名三区队抗日战士就是由他两个中队围剿而杀害的。1945年刘其队也调入“一心总队”。

四、王熙队。队长王熙祉,辑(集)安县人。副队长尹夏泰,又名尹正日,朝鲜族。是抗日联军的叛徒。这个队有抗联叛徒四、五十人,王熙队1942年调入热河省,驻地有:凌源、平泉、宁城、遵化。他们曾多次讨伐我八路军和帮助日寇实行“三光政策”。1945年编入“一心总队”。

五、梁润队。队长梁润武。1944年由通化调入“一心警察讨伐总队”。

六、吴太队。队长吴太福。1944年9月调入“一心警察讨伐总

队”。

七、姜大队。队长姜大祥。1942年由通化调入伪热河省。常驻：青龙、蘑菇岭、建昌营一带。1944年编入“一心警察讨伐队”。

八、唐振队。队长唐振东。土匪出身，伪通化省抚松县人，不识字，性凶残。他手下的士兵多是土匪。调入伪热河省后常驻喜峰口、界岭口、义院口。后编入“一心警察讨伐队”。

九、李兴队。队长李兴绍，通化人。1942年调入热河常驻青龙县。1944年编入“一心警察讨伐总队”。接替原石振(东)大队长的职务。

十、王超队，队长王超山。是原通化省警察讨伐队。1943年调进热河省。1944年编入“一心警察讨伐总队”。

十一、孙德队。队长孙德英。1942年由伪通化省调到热河，常驻青龙、杨树窝铺、钟响沟一带。1944年编入“一心警察讨伐总队”。

十二、胡国臣工作队。胡国臣是抗联一师的叛徒。投降后在长岛工作班长期做特务工作。成立“一心警察讨伐队”后仍做特务工作故名工作队。

除此之外，调入热河而没编入“一心总队”的还有：范文队，队长范文喻，伪间岛省长白县人，1940年7月1日任伪延吉县游击队队长，1943年调到热河常驻伪喀喇沁中旗；桑文队，队长桑文海，伪间岛省(延边)濛江(靖宇)县人，1943年调入热河，常驻丰宁、滦平一带。

伪热河省警察讨伐队兵员、武器配备情况

省讨伐队的兵员一般是250—300人。武器配备：轻机枪6—8挺；步枪209—262支；手枪36—49支；自动短枪2—4支。这种兵

力,武器配备情况,从建立到瓦解大致如此。

伪热河省的旗、县讨伐队

一、青龙县讨伐队。青龙属伪满州国西南边防。1939年中共冀东军区就向这里派出了武装抗日队伍。特别是1941年袭击凉水河后,日寇惊恐万状。1941年冬,从东边道调到该县的警察讨伐队前后计有十三个之多。这些讨伐队有的就在青龙长期驻防,有的是做应援工作。

1943年伪青龙县警务科正式组建青龙县警察讨伐队司令部。由警务科长池尾(日人)兼任,副司令张金祥兼巡防队队长;作战主任金杉;经理业务张敏;业务朱云甫。

伪青龙县讨伐队司令部成立之后,把调集在青龙的各种杂牌军改编成十三个警察队,大致情况如下表:

队名	队长	副队长	兵力	一中队长	二中队长	三中队 长	活动地区	备 考
张金 队	张金 祥 张金 池		150 250	张兴周 李凤阁	罗振邦 赵辅臣	李润田 周世杰	二区南杖 子	1943年7月张 金池接替张金 祥职务
于友 队	于友 三	户上 (日) 于建堂	200	白振山	阎 杰	龚殿贵	孤山子、 熊虎斗、 八道河	1942队由东边 道调入40人, 由派遣队编为 讨伐队
张雪 队	张雪 涛	高林菊 太郎 (日)	150	李致中	吴桐森	孙左臣	苇子沟、 梓楞树、 龙王庙、 马心山、 安子岭	1941年调入, 队长武修忠 1942年7月被 八路军十二团 打垮后改编

队名	队长	副队长	兵力	一中队长	二中队长	三中队长	活动地区	备 考
赵福队 李凤队	赵福辰 李凤阁		150				二拨子、蘑菇峪、凉水河、建昌营	赵大部分官兵有烟瘾纪律很坏,1944年春,赵被撤职由中队长李凤阁接替
李兴队 罗景队	李兴绍 罗景仁	森山(日)	200				草碾、七道河	李兴队由石振(东)队改编1944年李与森山不和将李调往“一心总队”
朱胜队	朱胜林		150				龙须门、椴楞树	1942年由东边道调来
姜振队	姜振忠		150				上胡同、梨树沟	1944年调往外地
罗振队	罗振邦		100	林滨州	龚殿贵			
李墨队	李墨林		100	白振山	于子清	丁秀林	五指山、石杖子、八道河、牛心坨	1943年时为道路警备队,1944年改编为警察讨伐队
杨东队	杨东阁		200				八道河、牛心坨、王厂、草碾	
张炳队 赵辅队	张炳文 赵辅臣	张兴周	200	张凌义	宋九来			1944年秋,张兴周在无双山扫荡被打死,1945年2月张炳文到迁安扫荡被歼一个小队,撤职由赵辅臣接替。
刘福队	刘福臣		150				三叉榆树	1944年组建

二、兴隆县讨伐队

兴隆和青龙一样,是敌我斗争带最激烈的地带。从1940年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有二十多个讨伐队驻扎在这里。兴隆县的讨伐队都是从外地调入的,并且时有变动。现将1943年驻扎在该县的讨伐队记录如下:

1、邢昌队,共188人,其中警佐衔1人,警尉补1人,警长48人,警士138人;

2、马玉队,共164人,其中警尉1人,警尉补8人,警长41人,警士119人;

3、郭建队,共194人,其中警尉1人,警尉补2人,警长46人,警士145人;

4、李勇队,共185人,其中警尉1人,警尉补4人,警长41人,警士139人;

5、宋庆队,共186人,其中警尉1人,警尉补9人,警长48人,警士128人;

6、金殿队,共194人,其中警佐1人,警尉补11人,警长72人,警士109人;

7、孙德队,共83人,其中警佐1人,警尉21人,警长46人,警士15人;

8、唐振队,共238人,其中警佐1人,警尉补21人,警长95人,警士121人。

在兴隆讨伐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副大队长由日本人充任,通讯设备悉由日本人管理。讨伐队一般装备:三八步枪、轻机和掷弹筒。

三、伪承德县的警察讨伐队

伪承德县的警察讨伐队,是在1942年(伪康德九年)由县警务

科着手组建的。当时对外名义是警察训练所。1943年(伪康德十年)正式建立了五个讨伐队。

1、王禹讨伐队。队长王禹。下属三个中队120人左右。

装备都是杂牌步枪,还有三挺歪把子轻机。活动在承德县的北部。

2、李旭队。队长李旭康,是从警察署调上来的人员(警佐衔)。装备:“三八”式步枪,还有掷弹筒和轻机。

3、那文队。队长那文泉(警佐衔),家住承德西大街炉渣子沟。常驻东河堡(现归属兴隆),听日本守备队的差遣。

4、朱景队,队长朱景民。

5、兰学队。

除此之外,还有由伪承德警务科警防股长黑岩(日本人警佐衔)多次成立过临时讨伐队。它的兵是从各警察署临时抽调,有时达40人。黑岩队凶狠残暴,在执行“三光政策”上是其它队无可与比的,仅上谷村被他杀害的就有20人。当地人都以黑岩来吓唬哭闹的孩子:一说“黑岩来了”!孩子就不敢哭啦,他的翻译贾庆功(大连人)也是一个残忍的家伙。

四、伪滦平县的警察讨伐队。

滦平在伪满边防来说,属于第二防线,日伪统治比较稳固,因此在这里招募了一些人成立了警察讨伐队。伪滦平县讨伐队由警务科长酒井次郎(日本人)直接领导。该县讨伐队共有八个。

它们是:

1、刘宗队,队长刘宗功,警佐衔,滦平县三道梁人,活动于营子、石承湾一带;

2、姜振队,队长姜振忠,警佐衔,滦平五道河人;

3、胡新队,队长胡新民,警佐衔,滦河人;

- 4、孟庆队,队长孟庆恒,警佐衔,三道梁人;
- 5、柴如队,队长柴如松,警佐衔,三道梁人;
- 6、彭明队,队长彭明汉,警佐衔,汤河口人;
- 7、房德队,队长房德福,警尉衔,长山峪人;
- 8、田富队,队长田富,滦河人。

兵力、武器配备情况与其他旗县的警察队大致相同。

五、伪满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的警察讨伐队。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所谓“第二线”的喀喇沁中旗,也有了重大的武装抗日活动。这里除了刘其、王熙、范文等省的讨伐队外,本旗也建起了警察讨伐队,在喀喇沁中旗建立的讨伐队有:纪东讨伐队,韩全讨伐队和长期驻在宁城的道路警备队。

(一)纪东讨伐队。该队 1936 年(伪康德三年)开始组建,1938 年(伪康德五年)正式建成。队长纪东阁又名纪云陵,生于 1907 年,原籍平泉北洼子店人,后移居平泉小教场。纪东阁不识字,由于积极效忠日寇,由警士升到警佐,当时称“建国警”。他娶两房女人:大女人姓王,西窝铺人;小女人姓李,凌源人。小女人是他任宁城警察署长时在宁城高级小学挑选的。

讨伐队部当初在平泉街小教场,1942 年(伪康德九年)7 月搬到平泉卧龙岗西窝铺村王殿甲东院。

纪东讨伐队开始是一个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共 150 人。1942 年扩大番号改为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个中队 100 人。

大队长,纪东阁,警佐级。

大队副,王和谦,监督警尉级

大队副,山下(日本人)监督警尉级

队部设:内助(阎青林等三人);警防特务(穆彩廷);庶务(王玉山);其它各系分别由警长担任;勤务兵是他的儿子纪成国。

第一中队长,周凤彩监督警尉级

第二中队长,禹信臣监督警尉级

第三中队长,王品卿监督警尉级

中队下设小队,每小队 30 多人。小队长执行警尉级或警长级。曾任过小队长的有:高尚德、唐连弟、李超升、王贵春等人。小队下设班、每班 10 人。

1944 年 2 月 5 日(正月十二日)夜,伪喀中旗宁城警察署,被抗日三区队袭击,兴农合作社、鸦片组合被捣毁后,纪东队乘汽车赶赴现场,协助当地警察署维持地方治安。后到老局子、大金沟游动了三天,一无所获,回驻地待命。

1944 年春,纪东队配合当地警察署到山头、五化、南榆树林子等地摧促集家并村,对已集中到指定地点部落的村民,抓人拉夫赶修围墙;对人已搬走房屋尚无拆迁的放火烧掉;对逾期未迁入部落的人强行驱赶,未拿走的东西被抢走或捣毁一空。

1944 年夏,纪东队到官坟梁一带讨伐,途中劫获一批贩布商人。当时土布(家织棉布)的贩卖是违犯《经济统治法》的。按规定:人要法办,布要没收。纪东阁把人放走,将布纳入私囊。

1944 年冬,纪东队到黄土梁子、樱桃沟、柳溪、布拉哈沟一带无人区进行大搜查(当时称搜山)。在车轮桥放火烧山。因坚持斗争的山区群众已经转移隐蔽,未发生大的流血事件,但给坚持山区斗争的群众造成重大威胁。

纪东队到各地集家和对无人区的搜捕,给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讨伐队的抢掠当时也有令禁止。按当时规定:凡讨伐队出动,按人次日数领取行动费,在“治安肃正”费项下开支。但讨伐队下乡,从杀猪宰鸡到用柴米油盐从不付钱,大项行动费则纳入上级警官私囊。更有甚者,虚报战果领取警察赏金。

1945年(伪康德十二年)春,抗日地下工作人员杨凤叛变。纪东队通过杨凤告密逮捕了在平泉小道虎沟水泉老王家的抗日地下人员李志华同志。他们将李志华同志转送到承德牛圈子沟特务队。五月间,李志华同志串联被捕地下人员三人越狱赴滦平小营八路军驻地。

(二)韩全讨伐队。队长韩全福,蒙族,原籍宁城北洼子庙,后迁居大城子东五家。

韩全福在民国年间,就在喀喇沁中旗王府保安队,后任班长。1943年日军占领宁城,中旗王归顺日伪。日伪成立喀喇沁中旗设保安队时,韩全福任骑兵保安队长。

1944年伪警务科决定成立蒙古警察讨伐队,韩全福任队长。队部设在三座店。部队的兵员大部分是在当地招募的。

队部:队长,韩全福

队副:山下(日本人)

教练官:赵连山

队部内设:内勤、特务、庶务各系。

第一小队长:徐德山,第二小队长:高洪奎,第三小队长:张福才。

小队下设三个分队。全队大约一百七十多人。

武器装备,“三八”式步枪,轻机三挺。

1944年3月军事训练完毕后,就向宁城西部山区进行搜索扫荡,终于在王坟沟,小塘土沟和我方以贺仲一为首的抗日干部遭遇,由于讨伐队尾追不放,终因寡不敌众,贺仲一牺牲、三名区干部被俘。残暴的韩全队将贺仲一的头颅割下,悬挂于三座店卡子门外的杨树上。当地群众无不暗自落泪。

1944年5月×日,韩全队出动向宁城东部讨伐,夜宿营于步登

皋村。村内顿时鸡鸣狗吠，恰被隐蔽在前山村中的游击队侦知。根据敌情，布阵伏击：先将队伍埋伏在山口。派出岗哨数人登上前山山顶，特意暴露目标，诱敌出击。韩全队果然发现山上有游击队流动，立即全员出动，分三面包围前山。当讨伐队将到山顶时，我前哨鸣枪两响，乘势由山后撤出阵地。韩全队在夜幕中敌我难分，竟自己打起自己来。经发现联络信号，始知上当受骗。在回撤时，又遭我军伏击，被击毙数十名，负伤几十名。在这种情况下，韩全队撤退到山腰密林中，拂晓才敢下山。当他们再搜索游击队时，早已安全转移，连影子也找不到了。韩全队吃了败仗，不能向警务科如实报告，只有虚报战况，敷衍过去。

(三)道路警备队。

喜峰口——平泉——八里罕——宁城(小城子)——赤峰的公路，叫做赤喜公路。以八里罕为中心，西到黑里河，东到天义均有道路可通。日寇为确保道路畅通，在八里罕建立道路警备队。

队长先是关荣发，后由李跃章接替。李跃章，警佐级，平泉小寺沟人。原任伪喀喇沁中旗天义警察署长，后调到敖汉旗四家子任警察署长、后又任伪敖汗旗司法科长。在职期间因与日本警察有矛盾，弃职还乡。因在家受不了日本宪兵队的刁难，1943年出任伪喀喇沁中旗八里罕道路警备队长。该队在关荣队时期就没有重大军事行动。李接任后，只是四处巡逻。

伪热河省只有以上五个旗县有警察讨伐队。

伪热河省、县讨伐队的末日

自1944年9月成立“一心讨伐队”以来，以陈天喜为首的总部一直驻在遵化县城。1945年8月13日，他们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在陈天喜、程斌、曲焕文、吴太福等策划下，发动哗变，将一心总队本部八十多名日本人全部处死。严密控制队伍，以观时局变化。

1945年8月15日，我八路军第十五分区警卫团杨政委前往“一心队”本部驻地商谈受降问题。这时，陈天喜一面派人到唐山与国民党联系；一面命程斌与八路军假意谈判。程斌对杨政委虚与委蛇并实行软禁。

陈天喜、程斌等在投靠谁的意见上：国共双方都愿意收我们，但要看投谁有利。几经策划，陈天喜等决定投靠国民党。原因：（一）七、八年来同共产党八路军积怨太深，旧账难平；（二）国军（国民党军）是正统的军队，八路军是“共匪”，不如国民党名正言顺。因而将杨政委在狱中折磨致死。

1945年9月，陈天喜等率部投靠国民党军。所部被编为东北行辕直属第三纵队，陈天喜任总司令、程斌任副司令，讨伐队中大小头目各有所差，驻守在遵化县城。陈天喜、程斌令其部下拆房扒庙、修筑工事，与我对抗四个月之久。在陈天喜、程斌指挥下，仅在我军进行遵化的一次战斗中，就打死打伤我军一营人数之多。并在城内残杀区村干部和无辜百姓二十余人，他们将尸体投入井中。我军解放遵化县城时，给敌以重大打击。在国民党飞机掩护下，陈、程率残部逃往唐山。陈明仁将其残部收编为第六师。陈天喜为师长、程斌为上校师长，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进犯，并侵占我新民、彰武等县。

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正式生效。6月7日，陈天喜、程斌率部下一千七百多人向我军占领的法库县城进犯，俘我人员三十余名。当日11时侵占法库县城。因程斌侵占法库有功，当即提升为少将副师长。当“三人小组”前往法库调查事实真相时，

程斌等多方设置障碍,并伪造6月6日侵占法库的证据。他收买了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姓夏的天主教徒)与两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做伪证,以逃脱破坏停战的罪责。另外程斌还组织特务匪徒化装成老百姓向“三人小组”控告我军,制造混乱,破坏调查正常进行。他们还布置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以招待员名义监视我方代表行动。在调查事件中,对我方代表百般刁难。他们接到东北行辕密令:将100多名蒋军士兵化装成八路军。待与“三人小组”谈判失败后,乘“三人小组”返回沈阳之际,在途中将调查组的人员全部杀死,烧毁汽车企图嫁祸于我方,以掩盖国民党第六师侵占法库的罪行。

1948年2月,陈天喜调往长沙,程斌调国民党五十三军任上校高级参谋。11月沈阳解放。程斌见蒋军土崩瓦解,遂带其母张氏、妻尤贤贤及两个男孩乘飞机逃往北平匿居。暗中同国民党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办公厅主任陈天喜勾结、准备乘机逃往长沙。

北平解放后,陈天喜下落不明。程斌隐瞒其罪恶历史伪装进步,于1949年2月,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

1951年4月28日,程斌在北京市东单牌楼胡同11号被我逮捕归案。经北京市公安局审核批复,将其解至热河原地处置。1951年5月12日叛徒程斌,被我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处决于承德市。

曲焕文随同陈天喜、程斌等投靠国民党后,改编为保安第三支队后改为独立第三师。曲焕文任该师上校参谋长。1947年调任东北剿共总司令部上校高参。1948年辽沈战役被俘,全国解放后被镇压。

刘其昌随同陈天喜投靠国民党军。1946年充任杜聿明部陆军第六师十七团长。同年8月任四十六团团副。1947年4月,国民党

进攻长春时,调往德惠作预备队,后退守四平。解放军第一次进攻四平时四十六团全部被歼。7月刘其昌被撤职,到军官队任上校。1948年10月回辽中老家开聚隆昌杂货铺。沈阳解放前夕逃往北京。住隆福寺门牌七十七号。1951年被捕归案。镇压于兴隆县。

唐振东随陈天喜投靠国民党军后,跟程斌活动。在辽沈战役中被俘,因罪行严重,1951年解送回他的家乡——抚松,就地枪决。

其他如:王熙祉、李兴超、吴太福、王超山、孙德英、梁润武、胡国臣、姜大祥等均在辽沈战役中下落不明。

伪满各县、旗的警察讨伐队,在日本投降后,多数被我八路军改编,少数逃散。如青龙县的警察讨伐队副司令张金祥带领他掌管的八个讨伐队、一个骑兵队和一个特务队以及设在龙王庙、隔河头、双山子、大仗子、汤道河、冷口大地等处地警察署的武装警察二千多人,投降了八路军。冀察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接收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旅)张金祥任司令员。下设两个团,十二个连。第一团长是原讨伐队长李凤阁,第二团长是原讨伐队长赵辅臣。

伪喀喇沁中旗(平泉、宁城)的警察讨伐队大多数遣散,少数为我收编为平泉支队。1945年“八·一五”后,纪东阁、韩全福连同伪警务科长申麟书伪协和会长王雅斋被我监禁。9月间在平泉马路口东大桥被枪决,道路警备队长李跃章在任时对我和当地群众没有恶意,得到群众谅解。解放后,回家务农,1977年因病死去。承德县的那文泉也是如此。

本文资料依据:吉林省党史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文集》(第七辑)刘善业、鞠路滨编辑整理的《程斌叛变始末》,通化市敌伪档案;杨金珍编辑的《伪青龙号警察讨伐队的建立与演变》,李朝春供稿沙万川整理的《纪东讨伐队》;靳春田供稿沙万川整理的《韩全讨伐队》;通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稿件1984年3卷32顺序号《曲焕

文和他参加讨伐队的情况》及其作者曲冠军的访问,兴隆县公安局存《刘其贤档案》;林森立供稿杨晓忠整理的《伪喀喇沁中旗的武装警察》,滦平县党史资料第22期中《滦平县、伪县村军警队主要头目名单》,对承德县政协委员孟昭科的访问;对伪通化省警务厅警尉于中兴的访问;对原王熙队副队长尹正日(尹夏泰)的访问。

1987年12月

· 历史资料 ·

内蒙古蒙古各部

科尔沁(6旗) 扎赉特(1旗)
杜尔伯特(1旗) 郭尔罗斯(2旗)
喀喇沁(2旗新增1旗) 土默特(2旗)
敖汉(1旗) 奈曼(1旗)
巴林(2旗) 扎鲁特(2旗)
阿鲁科尔沁(1旗) 翁牛特(2旗)
克什克腾(1旗) 喀尔喀左翼(1旗)
乌珠穆沁(2旗) 浩齐特(2旗)
苏尼特(2旗) 阿巴噶(2旗)
阿巴哈纳尔(2旗) 四子部落(1旗)
茂明安(1旗) 喀尔喀右翼(1旗)
乌喇特(3旗) 鄂尔多斯(6旗新增1旗)
(阿拉善厄鲁特 额济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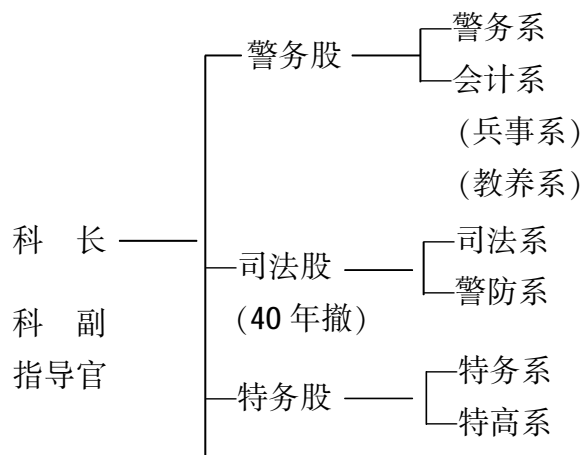
(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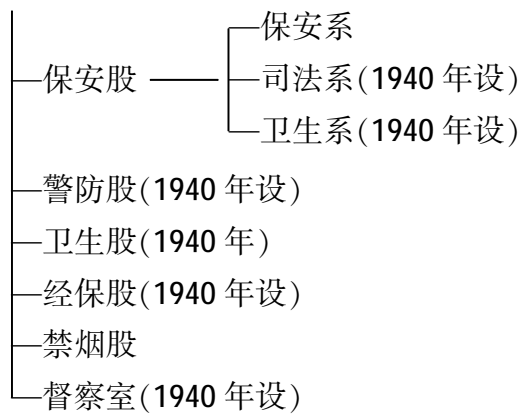
伪满时期宁城县的警察机构

欧阳相一 周凤玉 整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宁城后，于1934年1月建立了县公署警务局，设宁城(小城子)、八肯中、西桥三个警察署；1937年在大城子建喀喇沁中旗，旗县分治，建立了旗公署警务科，设大城子警察署，同期宁城县公署警务局亦改称警务科，在现宁城境内增设八里罕警察署，将杜家窝铺镇警察署迁天义，降八肯中警察署为分驻所，1939年旗县合并，警务科随旗公署由大城子迁往小城子又迁往平泉。1943年增设山头警察署。

一、警务科机构设置(1937——1945)





二、警务局(科)长更迭

一、宁城县警务局(科)长

局长：

孔×× 1934年前

丁惠民 1934年任

张志祥

海注川 宁城县人 1936年任

科长：

陈永涛 沈阳人 1937年任

指导官：

野板数雄 武藤 大野 浜口

朝日 谷桥

二、喀喇中沁旗(大城子)

警务科长

科长：

白复三 宁城县人 1937年前

王绍堂 宁城县人 1937 年任
(散珠拉甘吉)

科附:

仁科信夫 奥田重美

三、喀喇沁中旗(宁城、平泉)警务科科长

科长:

王绍堂 宁城县人 1937 年任
(散珠拉甘吉)

甲斐寅藏 日本人 1941 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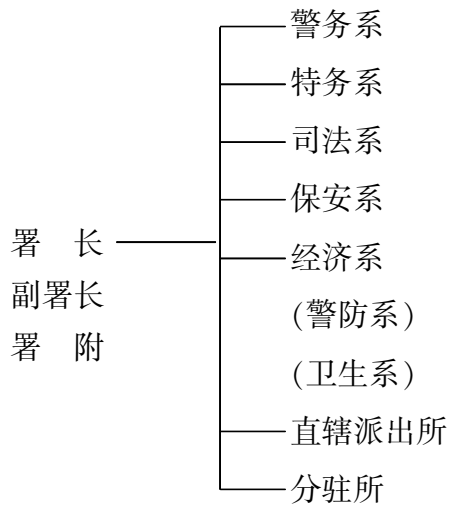
横内 日本人

申麟书 东北人 1944 年任

指导官:

近藤嘉藏 武田安夫 门真喜代治

三、警察署机构设置



四、各警察署历任署长及所辖警察分驻所

署名	建置时间	历 任 署 长		所辖警察分驻所
八里罕	1938 至 1945	李耀章 赵云波 刘振远 马翼轩 崔延福 宁德本 王瑞候	平泉县人 平泉县人 平泉县人 平泉县人 辽宁人 辽宁人 平泉县人	头道营子 甸子 三岔口 黑里河 二十家子 榆树底 老局子 白塔子 热水 四道沟
宁城小城子	1934 至 1945	王瑞候 马耀轩 栾学田 范垂功 乐学田 陈国玺 汪锦章	平泉县人 平泉县人 东边道人 奉天人 营口人 宁城县人 宁城县人	
天 义	1934 至 1945	赵大朋 马耀轩 许维汉 纪东阁 谭德泽 龚广宽 齐子珍 李耀章 张宗武 斋藤 千作 增根 立川 王和千 周维明 郭治臣	宁城县人 平泉县人 山东人 平泉县人 建平县人 建平县人 宁城县人 平泉县人 宁城县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平泉县人 沈阳人 平泉县人	

八肯中	1935 至 1936	齐子珍 宁城县人	八肯中 二肯营子 三十家子
山头	1944 至 1945	周维明 辽宁人	五化房 谢杖子 必斯营子
大城子	1937 至 1939	陈国熙 白复三 宁城县人 宁城县人	

伪满州国宁城县喀喇沁中旗的协和会

王志栋 口述 沙万川 整理

伪满州国的协和会,来源于日本东京大正诹赞会,和伪蒙疆的“亲仁会”、伪汪精卫新中国的“新民会”同出一辙。大正诹赞会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项内容,它的宗旨是代表民意(中、上层人士)参政议政的机构。当日本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在占领区则为笼络中国上层人士宣传侵略政策的一种工具。在伪满州国则有搜集反日情报,训练青年征剿抗日游击队的任务。

伪满州国协和会本部从 1931 年起设在新京(长春),一直到日本投降(1945 年)。本部长是桥本虎之助。本部下设:

宣传部,部长姜学谦;

指导部,部长甘柏正彦;

文化部,部长曾田进(日)。

直属中央本部的还有人事科,科长王恒仁。

各部科所属工作人员有:部员、嘱托、雇员等职位共 200 多人。从康德八年(1941 年)部下职位改称:参赞、参事、副参事、部员、部员补、嘱托等职。

伪热河省协和会的机构设置

省本部长由省长兼

本部下设:宣传科 科长 北洋(日人);
指导科 科长 松本(日人)。

伪宁城县、喀喇沁中旗的协和会

伪宁城县,喀喇沁中旗协和会始建于康德二年(1935年)。当时叫宁城县协和会。本部设在宁城(小城子)县,本部事务长仁科信夫(日人)。

仁科信夫是日本山形县人,生于1914年,他的父亲在日俄战中死于旅顺。因此日本政府对他很重用。他受的教育对外是保密的。当人们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时,他总是说:比中学高一点儿,比大学低一点儿。他来到宁城就住在本地大户老王家(王志栋家)。还认王志栋的父亲为干爹。本地大门小户他经常去串门。在王家住时,打水、扫院子什么活都干,下棋、打麻将、下连(在地面划出相连接的四个田字格,一方执草(木)棍儿,一方执石子对奕)他也参加。到了宁城他就努力学习汉语,不到一年和中国人谈话就不用翻译了。谁家孩子生日、娘满月凡他知道的都去送礼。他对官吏欺压老百姓往往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对共产党反满抗日活动却异常敏感。从他的言行来看,是在执行一条“以华制华”的政策。他利用红枪会打抗日游击队;他组织协和青年(由协和青年训练所训练出来的人)打八路军。

1943年5月,仁科率领红枪会和协和兵尾追周治国率领的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在平泉北长盛沟的盘道梁设伏,仁科及其行动队遭到伏击,仁科战死。

仁科死后伪喀喇沁中旗公署召开追悼大会,一些上层分子及家属还为仁科之死流下了眼泪。仁科的妻子——凌波仙子及其子

女由日本军方护送回国。仁科的儿子是康德四年(1937年)生,现已五十一岁了,还有一个比男孩小的姑娘。

伪宁城县协和会在宁城设:

指导班,班长王雅斋;

宣传班,班长富宝斋,

庶务班,班长高洪桥;

青年训练所,所长由副县长吉川武德兼,主事仁科兼,专任指导员王志栋,指导员吴瑞、毕占鳌,辅导员王树先(翻译),助手四、五人。从编制上看,对青年训练所是非常重要的。

康德八年(1941年)本部迁至平泉称喀喇沁中旗协和会。组织机构与宁城县协和会大致相同。因为青年训练所组织膨胀,经常和本部发生磨擦,因此在本部内设统监部,统监部设:协和青年团,义勇奉公队和青年训练所。本部长由事务长代理,主事是山田正立(日人)。

伪宁城县(喀喇沁中旗)协和会的分会

一般分会设分会长一名,有的设有副会长,常务员,这些都是专职,一般设有顾问(地方有力者兼任)。根据村镇大、小有的只设分会长或常务员。

伪协和会宁城分会共有两个:汉族协和分会和蒙族协和分会。汉族协和会长最早的是王介夫,后任天义国民优级学校校长。

伪协和会平泉分会。分会长刘凤阁(旗县合并时由县长退下来的),后当分会长的有李汉唐、孟鹤亭、石配恒等,顾问张鹏云,常务员等共三十多人。

伪协和会瓦房分会,分会长陆相臣。

伪协和会大城子分会、分会长乌勋龙。

伪协和会三座店分会,分会长由村长梁殿英(兼),常务员夏禹田。

伪协和会二十家子分会、分会长李德元。

伪协和会八里罕分会,分会长孔巨川(村长兼),副会长金起篆。

伪协和会热水分会,分会长蒋文斋。

伪协和会甸子分会,分会长卢麟章。

伪协和会黄土梁子分会,分会长项耀东。

伪协和会南坡分会,分会长xxx。

伪协和会南五十家子分会,分会长xxx。

伪协和会小寺沟分会。

伪协和会山头分会。

伪协和会五化分会。

伪协和会南榆树林子分会。

伪协和会必斯营子分会,分会长杨玉荣。

伪协和会榆树底分会,分会长杜瑞廷。

伪协和会一肯中分会,分会长李巨三。

伪协和会八肯中分会,分会长杨注东(德兴永的掌柜)。

伪协和会汐子分会、分会长赵墨林。

伪协和会和硕金营子分会,分会长王绍军。

伪协和会天义分会,分会长海百川。

伪协和会头道营子分会,分会长杨惠南(村长兼),副会长蔡焕廷。

伪协和会的会议制度——联合协议会。国家、省、县每年各举行一次。哪一级召开由哪一级拨给经费,分会的协议会费由会长自

行解决。参加协议会的成员由上层分子参加。国家的协议会皇帝出席听取“民众”意见；省级协议会省长出席；县一级协议会县（旗）长出席。村、街级协议会，村、街长出席，但村、街级因经费关系一般不召开。

· 历史资料 ·

中国历史上的“北京”

我国从古到今，先后有六个地方命名北京。

一、太原府。公元七世纪及十世纪，唐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唐、晋、汉三代，都曾将它的发祥地——太原府称为北京，五代末北汉并以此地为国都，故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源镇。

二、大名府。宋朝庆历二年（1042年），宋仁宗赵祯为表示准备“亲征”抗辽，将真宗赵恒“亲征”时驻蹕过的大名府建为北京，故址在今河北省大名县。

三、临潢府。金代天眷元年（1138年），熙宗完颜亶改辽上京临潢府为北京，故址在今巴林左旗境内。

四、大定府。金代贞元元年（1153年）由于中京大定府在新迁都城大兴府之北，因而将大定府改北京，故址在今宁城县大明城。

五、开封府。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开封府为北京，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

六、顺天府。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其袭燕王时的封地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永乐十九年定都于此，治所在大兴、宛平，即今天的北京市，后又曾改称京师北平。

（编辑）

高桥头颅葬礼记实

徐子均

高桥同志是热河人民最敬仰的抗日英雄之一。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那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始终在人民群众中传颂着。1944年3月29日，高桥同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拿到承德向其主子请赏，并示众。高桥同志的头颅示众后埋在何处，其说不一，有的说埋在承德水泉沟；还有的说在日寇投降后就埋在宁城的巴素台（布日嘎苏台）。那么，高桥同志的头颅究竟埋在何处呢？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我来到了高桥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宁城县八里罕区（三区）任公安助理。当时，翻了身的人民对高桥同志十分怀念，特别是对高桥同志头颅的下落十分关注。1946年春节后，中子坡村的一个叫刘英武的地主，受群众的委托，乘马车去承德找高桥同志的老战友、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杨雨民、高桥、赵瑞东等领导同志经常在刘英武家落脚，因此同刘英武比较熟悉。刘英武到承德时，杨雨民副主席已把高桥同志的头颅找到了。原来，高桥同志的头颅示众后，被一抗日市民偷偷地装在一个大玻璃瓶子里保存下来。几天后，刘英武就把高桥同志的头颅带回区政府。

高桥同志的头颅被带回区政府后，宁城县委宣传部长王东旭、县民政科长张成哉专程从宁城赶到八里罕，与区委书记刘瑞

林、区长于作华商量安葬高桥头颅一事。区政府从八里罕的一个叫孔巨川的大地主家里弄口大松木棺材安放高桥头颅，并为高桥的头颅配置一具木制身体，埋葬在八里罕佛爷庙北山坡上。

高桥头颅的葬礼举行得十分隆重。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和自动参加的群众组成了一支四、五百人的送葬队伍。当时还不时兴花圈，群众自发地糊了不少纸人、纸马、纸牛、纸羊、纸车，附近几名喇嘛自动为高桥同志念经“超度”，几位民间吹鼓手还举着喇叭、笙，一路吹奏不止。我们这些区干部都佩戴黑纱，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佩戴的黑纱。大约早晨九点钟，送葬队伍护送着高桥的头颅从八里罕街出发奔向墓地，三里来地的路程，大家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墓地后，首先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区委书记刘瑞林主持，县委宣传部长王东旭讲了话。王东旭在讲话中介绍了高桥同志的生平和英雄业绩，号召人民学习高桥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化悲痛为力量，保卫和平，保卫解放区，反对内战，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追悼大会后，高桥的头颅下葬，并在墓前立了碑。这块墓碑是由石头刻制的，大约有一米高，上面简略地记述着高桥同志的生平。

(王继明整理)

解放战争时期宁城县 地方人民武装——宁城县支队

李仲三 沙万川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宁城属平泉县。当时的县地方人民武装——平泉支队,共100多人,驻在平泉街里(该年9-10月)。支队长刘士华,是陕北老红军,陕西张县人,六十至七十年代在沈阳空军任职;政委焦洪光,七十年代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军区政委;参谋长王彩辉,四川古蔺县人,长征老红军,1948年在承德头沟前山战斗中光荣牺牲。11月份,平泉支队移驻八里罕。这时支队已发展到三个连300多人。11月24日,“大明字”匪队到八里罕诈降,被县支队打散。12月10日,支队又配合主力部队九团,在马站城子聚歼国民党地方土匪武装杜耀亭别动队。

1946年,国民党十三军进攻平泉。为适应战争形势需要,平泉、宁城分为两县。遂将平泉县支队中的三、四、五连抽调出来,组建宁城县支队。刘士华任支队长;王彩辉任参谋长。四连长王宽;五连长李成林。王宽是宁城支队创始人之一,他先任侦察员,继任排长、连长。他胆大心细,经常深入到敌人心脏,侦察敌情,准确无误,深受战士干部敬佩。解放隆化前夕,在臭水沟战斗中光荣牺牲。李成林后也参加了主力部队,现已由沈阳工兵部队副政委任上离休。支队四连一排排长曹臣是承德县宝河村曹家店人。他1942年参

军,先在冀东军分区十一团特务连当战士,1944年7月入党。1943年5月在冀东军分区高桥率领的第三区队当战士,后任宁城支队四连副连长、独立二团二营副营长,北京空军警卫团副营长,军委空军干部学校四大队十九中队中队长。1964年因患风湿性心脏病逝世于南京四五四医院。安葬在南京市雨花台花神庙空军基地。

1946年9月,宁城支队配合主力部队十三旅、十六旅进攻宁城(小城子)取得重大胜利,消灭国民党九十三军一个团1000余人;击落美制P51型飞机一架;俘虏二十多名国民党警察。10月,配合十九分区警备团在二龙山前截击九十三军往赤峰运送给养的汽车六辆,断绝了驻赤峰国民党军的棉衣供应,阻止了敌人继续向热北的进犯。

1947年2月,向庸任宁城支队政委。向庸同志是陕西渭南人,现已由南京空四军后勤部政委任上离休,住在杭州。

5月1日,宁城县支队配合主力十六旅进攻凌源,接受国民党将领韩梅村起义。6月23日,配合热中警备团解放了凌源。

是年秋季,宁城支队编为热中分区独立二团,向庸政委重组宁城县支队。

1948年2月,独立二团到山头驿马吐平息红枪会暴乱。

1948年向庸任宁城支队(新)的大队长兼政委。下设三个连,十个区小队。到1949年,该支队有两个连的编制,共330人。一、二、三、四、九区共有区小队60人,其中九区(山头)30人。当时县支队有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只,冲锋枪10支,步枪足用。

宁城县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县的主要武装力量,在对敌斗争、锄奸剿匪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向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干部和战士,为我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85年11月29日

宁城县种植罂粟的历史概况

李仲芳 王维新

罂粟,俗称大烟,日译名阿片。

宁城县种植罂粟始于清代。咸丰九年(1859年),清政府鼓励喀喇沁地区种植大烟,但实种亩数不多,以后又种过两年就禁止了。民国初期时种时禁。民国六年(1917年)河北乡有些人偷种大烟,被平泉县县官朱重庆发觉,命令禁止。河北乡地面大。也最富。人们常说:“河北乡的乡约管的宽”。那时候乡约(即乡长)是牛善美,是特等乡约。平常见县官有坐,赴县开会、在招待会上坐独席。但这次朱重庆却亲自下手谕,勒令他立即限期铲除干净,否则查出一棵烟苗,要铡他的“牛头”。看来,民国六年以前是禁种的,而且很严格。到民国七年(1918年)政策突然改变,当局不限制了。民国九年(1920年)又禁止了。民国十二年(1924年)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军阀汤玉麟占据热河。民国十四年,在偏僻山区有人乘时局动荡有少量种植。民国十五年(1926年)汤玉麟为收烟税筹措军饷,取消禁令,鼓励多种大烟。从此开始有了烟税。纳税的方式是种烟上税,出摊买卖上税。民国19年(1930年)平泉县(含宁城)种烟一千一百多顷。后来又强行每亩追加2-7分,还是达不到要求的亩数,当局管烟地人员就在测量烟地亩数时将弓号缩小。这样种烟人吃了亏,下年均不愿种。

民国20年(1931)热河省政府强行下达任务,在县局强行劝种

下,始完成八百二十顷零三十亩零四分。

民国时期,烟土买卖自由,价格不定。汤玉麟收烟时在各地发展烟贩,购价随行就市。八里罕孔家就是给汤玉麟收买大烟的坐地贩子。因为本县西部山区产的大烟,含白面(即海洛因)多,所以汤玉麟在该地区收烟最多。那时烟季的烟价,每两烟土银洋一元左右。每到烟季,孔家出价高,全县烟贩抢着给他送,他很快就收起大量的好烟奶和烟土,然后把奶子晒干,用汽车运往承德。汤在避暑山庄设有制烟厂,用大烟制成白面,连同烟砖运往外省销售。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汤玉麟由八里罕运往沈阳十几汽车烟土,未来得及处理就被日本人没收了。汤在热河盘踞七八年,走私贩毒发了大财。日本进攻热河时,他却逃跑了。

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把热河省定为产烟区。第一年准许照旧种,未及过问。第二年仅收了一次税完事。但是到了第三年,也就是1935年,他的“阿片统治制”就出笼了,严禁私人买卖,施行大烟统购。当年各县设立了烟政科,下设烟政、管烟两股。各村公所设立烟政系,执行烟政。在沈阳设立禁烟局,着手建立制烟厂。在大烟放花前,烟政科派人下乡,连同村烟政系人员以及地方甲牌长参加勘查烟地,丈量亩数,以定税额;根据烟苗长势以定“烟干”(烟膏扣水)。凡核定产量一律缴纳。

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收缴与倾销大烟政策和手法是极其野蛮残酷的。起初是在春季成立了由商人集资、官府拨款、官商合办的大满号,以收购大烟。烟土上缴禁烟局,有定额利润。后来在县内设总号,内有日本董事和担任其他工作的日本人。接着招考了一大批人下乡设分号。分号都设在警察署及其分驻所的地方。这种大满号,每到烟季(大致在6-8月份)到指定地点收烟,烟季过后结束。大烟上缴县总号完事。人员多是季节性的雇员。

大满号内设人员有经理、会计、鉴定、秤量、出纳、事务员、勤杂等。经理多是商人。鉴定是伪政府经考试录取的，多是旧时的大烟贩子，少数是失业的旧职员。警卫是临时派遣的警察。

大满号收烟有定价，一两干烟土伪币 1 元，叫做补偿金。烟分一、二、三等，等外品不收或没收。收烟会计制度周密严格，手序健全，采用流水作业传票式，每道手序必须签名盖章方能生效。烟户卖烟要先经鉴定看，烧或炒，根据色、味、质和含水量定出等级和干度，然后经过秤得出毛重和皮重，再经事务员计算得出结果，由出纳开票付款完结。烟土上缴经理必须保证质量和数量，超额得奖，鉴定有份，因此老百姓卖烟很难得到公平和便宜。

大满号办了两年就撤销了。1937 年，日本人以大满号为基础，又搞起了官办的收烟机构——阿片组合。负责人改称主任。县组合有日本副主任，基层组合无日本人。人员改成了职员和临时性的雇员。其工作方式和会计制度仍无大变化，不过统治的比以前更严格了，并采取了边收边催，最后清缴烟干的措施。所谓清缴烟干，就是在烟季过后，各地阿片组合均已撤走，烟户的卖烟数字，已经统计成册，从九月份开始派出大批缉私队——后期称特高队，下乡到各警察署的管辖区，依据卖烟和定产册子，让甲长领着挨家挨户催缴拖欠，清查剩余。这时候，在警察署地方的组合尚留有少数人员收缴尾欠。不管路程多远，所欠之数必须交到阿片组合。这就是人们最怕的烟干清缴。清缴人员队伍极其复杂，是土匪、地痞流氓的综合体。他们一到，对欠烟户或查有“存烟者”，敲诈勒索、捆绑吊打、无所不为。有时日本人带领警察参加，更加毒辣凶狠，动不动就灌凉水掺辣椒面，有些人被灌的死去活来，致残或致死者很多。种大烟最怕遭雹灾，如遇开刀（收烟开始）后，遭冰雹更惨，不产烟，还得花钱私买烟上缴。种烟户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弃家而逃。这种清缴

一直闹到年末才能停止。经过这样折腾,有许多人不敢种大烟了。种烟面积少了,日伪又强迫种植。然而在人民的抗种下,到日本投降时,种烟面积比大满号时期减少了许多。1945年,宁城地区种大烟面积约有5万亩。老百姓最恨日本人的阿片政策,所以在日本投降时,许多阿片组合被抢光。

日伪为了实行大烟统销,自1936年起取缔了在城镇私人开设的大烟馆。但仍准许个人申请,发营业证,成立专卖官烟的小卖所,在烟政科属下设立制烟所,用土法制烟泡供应小卖所,从此大烟实行了专卖。到了1938年,沈阳禁烟局的大型制烟厂已用烟土制成了“麻药”(即海洛因,日本人美其名曰麻药,因是白色片剂,所以土名白片),剩下的渣滓制成官烟泡。由警察署特务系调查登记麻药和大烟的吸食者,发放吸食证和领取通帐,撤销了小卖所和县制烟所,接着招考了一批职员,成立了官办的管烟所。管烟所由烟政科管辖。

管烟所专卖从沈阳禁烟局发来的官烟泡和麻药。两种产品,包装规格各异,烟泡与纸烟包装相同,“麻药”用铁筒装。烟泡每个重2分,价两角,麻药一片两角。

管烟所的设置与小卖所不同。小卖所仅城镇地方有,管烟所则遍设于街村。其人员编制分为甲、乙两级。甲级三至四人,有主任、事务员和勤杂;乙级只有主任和勤杂。凡在警察署地方都属甲级,兼卖麻药,其他地方的无麻药。吸食者,按定量领取,记入通帐,无证者不卖。按日伪官方说法这是为了控制扩大面,达到禁烟目的,真是弥天大谎。

管烟所按月结帐,到烟政科管烟股交款领货。管烟所直到日本投降完结。

日伪时期大烟的统销政策,毒害了人民。因吸毒扎毒而致死者

千千万万。因吸毒扎毒丧失劳动力而沦为小偷小摸或卖老婆孩子的也大有人在。其流毒之广,遗害之深,是无法估量的。

1946年,宁城县军政形势比较混乱,当年农民自由种植大烟约1万亩,烟土产量约有15-20万两。

1947年,我人民政府从维护农民利益着想和经济形势的需要,没有禁止农民种植大烟,并以合理价格进行了收购。当年实收6500两,换取轻工产品或救灾物资发放给灾区人民。另外,解放军杨苏纵队也收购了4200两。

1948年,人民政府开始严禁种植大烟。对已种的,强令铲除。从此,结束了宁城种植罂粟的历史。

一九四九年大明城里特大水灾

乌安林

1949年7月24日(农历6月29日,头一天交大暑)夜,洪水暴发冲破大明城西北城角小坝,城里遭到特大水灾,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受灾中心为现在城里村委会所属一、三、四、五组的全部地面。

大明城中,共有三个自然屯,即城里、三姓庄和南城。城里屯为水害中心。三姓庄屯地势略高,只有几户房墙被泡倒之外,人畜无患。大水浸没范围:东西六华里;南北三华里,在十八平方华里之中,深水七尺,浅水五尺。城里成了一片汪洋。

那天晚上,城里下着小雨。屯民俱各安眠。屯民乌昌令,白天趟地,晚间正在喂耕畜(约在十点左右),发觉大水进院,他一面招呼家人快起,一面用土挡大门。这时水已进了房屋。同时听得东邻王殿林也喊:“大家快起来,大水进院了!”

正在熟睡的人们听到喊声,朦胧中急起摸衣服,灯也顾不得点燃,水已进屋上炕。人们扶老携幼由屋里向院中高处跑,顷刻间水已涨到三四尺。有的没听到喊声的人,觉得身下冰凉,一摸是水,以为孩子尿炕了,惊起。这时人们呼救声,水浪声混做一团。约数十分钟后,人声顿息,只听到传来扑咚、扑咚地房塌墙倒声。漆黑的夜伸手不见掌,避在高处的人,四顾只见白亮亮的一片大水之外,还见远处水上有像灯火似的光亮。

这次水灾,被难十四户;男女老幼死亡 33 人:

(一)张玉良,当时三十一岁,全家八口人,内弟探亲同时遇难。一屋之中共死七口人。洪水进屋全家急起,玉良急忙抱起四岁小儿云起向外跑,将过外屋门,房盖倒塌,九口人全被压在土房之下。玉良手抱云起,拼命在房檐下挣扎而出,回头抢救别人,奋力拖出父亲放于碾盘之上,再去抢救,已来不及。当危急之时全屋中人以为房子有柱坚固,耽误之间房盖拍下。玉良之妻、一女孩、一妹妹、一弟妹丛氏、一内弟、玉良母当即死亡;其父虽被救出,越二日亦死。只有玉良和其子云起幸免于难。

(二)孙治国全家六口。治国与妻、三个孩子、俱避在炕沿上,房盖向后落架,五人全压在下面。其父孙玉秀因在窗台之上,被屋中之水一澎而出,得救。

(三)董希朋当时十一岁,全家五口。叔、母、姐、外甥四人淹死。因他和孙玉秀同在窗台上,幸免。

(四)王殿五全家四口。其妻及小儿被淹死。殿五和长子因当时不在家而幸免。

(五)马述海全家五口。一子二女被淹死。

(六)胡凤海全家三口。妻和子淹死。因凤海头戴苇莲头(草帽)系着帽带,被洪水冲出数百步远抱住一棵小树,得救。

(七)刘振生之妻傅氏及四岁小女被淹死。

(八)雷鸣忱之九岁小女淹死。其妻雷王氏在慌忙中误把邻居的女孩,当自己女孩抢救,事后一看不是,大哭一场。

(九)刘子良之子刘代,年十六岁,在墙头上,墙倒落入洪流而死。

(十)国中祥之母及三岁弟弟被淹死,冲出半里远。

(十一)孙绍武之子留喜十五岁,冲入洪流淹死。

(十二)胡廷杰之女十一岁,被大水冲走时连声喊妈,冲到塔后而死。

(十三)胡廷仁六十二岁。大水进屋,他急跑出屋外,煞时房倒、被水澎入洪流淹死,尸身飘到大塔后。

(十四)陈义祥被淹死。

这三十三名遇难者,有的被水飘走,有的淤在泥中,还有的在房盖下挖出抬至屯外,多数无棺掩埋。

发水时,有的人家躲到房顶,有的人攀到树上。马林,挣扎着攀上一个四尺多高的石桩上,勉强脱险。我家妇幼六人俱在多年大杏树上幸免。

全屯被淹颗粒不收的农田八百余亩。全屯共有瓦房 237 间。倒塌 174 间。全屯共 500 来间土房,只有 27 间歪斜存在。其余房屋和院墙,成了一片土堆。当时全城里住户是一百四十余户。

一夜之后,到明晨东城墙冲破出口,水势渐渐下流入老哈河。但是全屯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及禽、畜,全被漂走。人们无柴、米和房屋,无法生活。多数人家在泥水中,扶老携幼四出投亲奔友;有的到城墙上搭棚,或在自己居宅上搭窝棚暂住,用泥汤水做饭度生。秋季灾民陆续归来,维修简陋房屋,准备收秋过冬。

原有河道因洪水淤塞河床提高,河水由西北城角直奔入城里。大灾过后,一秋阴雨连绵,每逢下雨城里就成了河身。

秋后,区、村政府督促当屯居民临时堵口。

那时,宁城县政府驻在八里罕。水灾翌日,县委、县政府组织干部前来抢救,对受灾群众进行慰问。并动员全县职工、干部、教师捐款捐物,救济灾民。

五〇年春,县拨给五万斤高粮及大量小米,组织群众修筑防水大坝。并动员附近区、村农民前来支援。每抬一立方米坑土,付高粮

五市斤。由东至西南北城墙之间,修筑一条大堤。

注:(一) 本文内容曾向本屯八十余岁的四人,七十余岁的八人、六十余岁的十人和四九年担任村干部的三人,以及遇难家属,被水淹的村民进行详细询访,他们都说死亡三十三人。第一辑《宁城文史资料选辑》中,说死亡人数是三十五人,《宁城县志》中为三十七人,均有误。原因是,水灾后,初期上报死亡户时,把出外不在家的家属,列于死亡数内。

我参加东北反人民战争的回忆

许义濬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要想长期统治中国,奴役中国人民,对外进一步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主权,对内则排除异己,荼毒人民,积极发动内战。当日本帝国主义刚一投降,蒋介石即电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将暂编 24 师留驻云南。其余第 60、93 两军及暂编 19 师和暂编第 23 师归第一方面军指挥,由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领进入越南受降。我当时任第 93 军暂编第 18 师师长。入越受降任务告一段落,于 1945 年 10 月底,蒋介石又电卢汉,将所属部队整编为 60、93 两个军,准备调去东北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妄图消灭东北的人民军队。当时国共双方已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就说明了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而是骗局。因为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还不够,部队大部还在西南,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一方面借和谈来欺骗人民,一方面借和谈为烟幕,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

在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接获将所属部队整编为 60、93 两个军调赴东北的消息时,大多数人都很惊异。认为我们是云南的部队,官兵都是云南人,怎么会调到远在万里以外的东北。卢濬泉军长就约着我到方面军司令部去见卢汉,探听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卢濬泉是卢汉的么叔,我们去时没有经人通报就直接到卢汉的办公室。当卢

濬泉问到这个消息时,卢汉说:“我也在怀疑是否电令弄错了,现在我已去电询问”。这时已是午饭时间,卢汉留我们两人吃饭。在吃饭间,卢汉笑着向我们说:“要是真的调你们去东北,你们这些官兵将来要在东北做一世祖了。”过了几天,整编部队调东北的命令正式发表了。我当时存在着贪生怕死的思想:感到我当了几十年的军人,要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是为国家,为民族,是光荣的,要是在内战中送了老命,不值得。因此在卢汉召集各军师长的整编会议上,我就要求辞职,准我编余。卢汉未允。整编完毕,我仍继任 93 师暂 18 师师长。不久,蒋介石由重庆来电,令两军军师长分别到重庆去见他。两个军长去了回来后,我们各师长也接着同乘一架飞机到重庆。在召见中,蒋介石对我们表示很信任。他说:“这次派到东北的部队是八个军,都是美式装备,而且是最精锐的部队”。蒋介石还讲了东北的重要性。大意是说,东北是我国的国防要地,又是工业基地,资源丰富。没有东北,就没有国家,因此必须把东北的共党肃清,你们到东北就要担负这一重大任务。他还指示:“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同俞济时局长接头”(俞济时为蒋亲信,当时任军务局局长)。谈话后蒋介石还用他和宋美龄的名义请我们吃饭。这次召见我们的时间大约是 1946 年 1 月底,是在国共双方达成协议,下达停战令以后。由此又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和谈、对协定,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在和谈中以及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始终坚持发动反革命内战。

我们由重庆转回越南后不久,蒋介石即来电,令第 60、93 两军由越南出发,开往东北,归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指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回云南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第 60 军在海防集中后,即乘美国舰艇赴东北。1946 年 2 月底,93 军由越南出发时,我奉命率暂编 18 师先头部队即由河内乘

火车到同登,由同登徒步行军。经睦南关——凭祥——临明——明江——南宁——宾阳——贵县到达梧州,改乘拖轮经西江到达广州。到达广州后统计,全师官兵逃跑几达十分之一(官兵多系下级军官),这种情况不仅暂 18 师发生,其他各师亦同样发生。60 军虽是在海防船运,但官兵们一得到开东北打内战的消息,即相率成批的由越南逃跑回云南。这也说明了当时一般官兵都不愿到东北打内战,为蒋介石卖命。

部队到达广州后,要转往九龙乘船,因此在广州休息了十多天,整顿军容及领取美式服装;然后按前令继续由广九铁路车运九龙;由美帝国主义的登陆艇运送东北。

我率暂编 18 师由九龙乘登陆艇航行四昼夜,于 1946 年 4 月 30 日午后五时在葫芦岛登陆。我一登陆,兵站司令何世礼就来找我,转交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的命令,叫我立即接替北宁铁路。当时共军常常派遣小部队破坏铁路,尤以山海关至绥中这一段骚扰得厉害。所以我这个师的任务非常重大艰巨。

我在锦州住了两天,见过孙渡并访晤了总部各处,于 5 月 3 日由锦州乘火车转绥中师部;部队一切布署完毕,制定了维护铁路安全的措施,进占了明水塘边门,维护了铁路一时的安全。

1946 年 7 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他亲自飞到沈阳,布置军事行动,对杜聿明面授机宜。同时,召集在东北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官员训话打气;并用笼络手段以他和宋美龄的名义宴请吃饭,同他一起照相。蒋在讲话中大言不惭地说:“三个月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我参加了宴会照相。由沈阳回到师部后,93 军即奉令向热河推进。我师奉令由锦西出发,经杨家杖子、岳王庙、六家子、牛粪洞子、龚营子扫荡前进,到叶柏寿集中待命。

8 月初,我率暂 18 师全部由锦西出发,按照指定路线前进。沿

途还算“幸运”，没有遇到抵抗。行军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到达热河省的叶柏寿。军部和暂 22 师系由锦州车运，已先行到达。93 军到达叶柏寿后，奉令接替 13 军石觉的防务，并作进攻赤峰的准备。石觉的 13 军交防后即进驻承德。当时 93 军的部署是：军部及直属部队驻叶柏寿，暂 22 师进驻建平，暂 18 师进驻天义，侦察赤峰方面的“敌”情、地形，作好进攻赤峰的一切准备。

我师进驻天义后，大约在 9 月 10 日前后，东北长官部电令军部叫转令我派兵两团进驻乃林车站，派一团进驻宁城（小城子）。我奉到这个命令，深感这样的部署是一个挨打的阵势，师部成了一个无预备队的空司令部。因为乃林、宁城（小城子）两地过分突出，两地均离天义四十公里以上，两地相距又在 50 公里以上，中间空隙太大，兵力分散孤立，不能相互支援。并且这两个地方都无险可守，尤以宁城（小城子）位于两个山中间的一个夹槽箐底（这一带地区，我到天义后，曾率队到十华子里沟解救暂 22 师赵思齐团之围，后就便到建平与暂 22 师师长龙泽汇会晤联系，然后又由建平经大魁德素、汐子、马占城子、八肯中梁、小城子一带地区了解情况，认识地形，所以这一带地区我都到过，大体了解）；而这一带地区都是解放区，人民完全站在共军方面。93 军这样的配置准是挨打送死，我认为就要采取积极大胆的行动，马上进攻赤峰，否则以防守天义为适当。天义地形比较好，易于防守，天义左方是一高地，与天义互为犄角。前面有一条河流（忘其名），以天义及其左方高地为主阵地，射界开阔，进攻不易接近。以前面河流为警戒前沿，再于天义与建平中间之大魁德素，派兵一营驻守，与建平暂 22 师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可以堵塞两师之间空隙，驻防天义，可以节约兵力，控制强大预备兵力，既可以从事休整，养精蓄锐，以待进攻赤峰，又可

接应各方。我曾将这个建议提出，未见采纳。我对这个部署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中只好遵照命令。派副师长李长雄率领第一团（团长宋德裕）及第二团（团长安永松）附炮兵一个连、工兵一个排进驻乃林；派第三团（团长保如光）进驻宁城（小城子）。后来情况演变也是这样。9月18日宁城（小城子）及乃林同时被共军包围攻击，当中宁城（小城子）系牵制作用，情况较为缓和。乃林方面共军以数倍于守军兵力，四面包围攻击，围攻达三昼夜，战斗极为激烈。副师长李长雄在被围时不断在无线电话中力竭声嘶地请求救援。我此时仍象在前卫、前所时一样情况，两手空空，徒唤奈何，也只有勉励他固守待援。

9月20日晚，军长卢濬泉来电话指示，派暂22师第一团（团长邹谷君）归我指挥；并说该团由建平出发，明（21）日10时以前到达乃林。叫我和该团联系，另外派坦克一辆、汽车十辆，限今晚到达天义，归我指挥。我立即用无线电话与暂22师通话联系，请邹谷君团于21日10时前到达乃林，向乃林北面进攻，截断共军退路；并告知我同时到达，向乃林南面的共军进攻；还告知李长雄援兵到达的时间，并令抽出一部兵力向乃林西面出击。21日晨我率师直属特务连、工兵营（缺两个连）、通讯兵一个排附坦克一辆，乘汽车按时赶到乃林。暂22师邹谷君团亦已按时到达。但共军已于拂晓时猛烈攻击后，大部向乃林西北高地后方主动撤退。仅在乃林西北高地，留置警戒部队及在乃林周围置少数监视兵。我进攻部队到达时，稍行抵抗即行撤退，乃林之围即解，乃林之能坚守待援，由于工事的构筑坚固及共军尚缺乏大炮，幸免于被歼。

我原拟解乃林之围后，继续去解宁城（小城子）之围，但经用无线电话与宁城（小城子）第三团联络时，包围宁城（小城子）的共军亦于是日拂晓攻击后主动撤退。按当时情况去宁城（小城子）已无

必要,乃林亦无留兵驻守必要,即由无线电话向军部请示,准将所有部队连同暂 22 师邹谷君团一律撤回天义。我回到天义三、四天,于 9 月 26 日夜,又接第三团团团长保如光由无线电话报告,共军又以数倍兵力包围宁城(小城子),猛烈攻击,请求派兵援救。我得知后深感共军用兵灵活机动,行动神速,忽东忽西,忽聚忽散,来去飘忽,真是神鬼莫测。

判断这次围攻宁城(小城子)之兵力,可能是上次围攻宁城(小城子)、乃林两地的共军,集中全力攻击宁城(小城子),若不迅为救援,三团必被吃掉,乃据情转报军部。9 月 27 日晨,我再次率领我师第一团之第二营(第一团缺第二营驻守天义)、第二团及暂 22 师之邹谷君团、师直属特务连、炮兵一连、工兵一连、通讯兵连(缺一排留天义)驰往救援。这个时期东北正是青纱帐时期,沿途不断遭受共军小部队埋伏于行进道路两旁阻击。我判断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迟滞 93 军的行动,不要为所牵制。因此,我命部队照直前进,由本队派遣适当兵力驱逐,令各完成任务后归还本队。

在行进途中,看到沿途埋伏的共军战士个个表现得英勇机智、生龙活虎。看到一两个共军战士吸引我部一班甚至一排的兵力。又在青纱帐中,两三个共军战士很迅速地变换位置射击,到处是枪声,使人听了迷糊,不知道有多少兵力。这种表现,我感到我在军事学校教学生们战斗教练演习,都表现不出这样的动作。而且每个战士都能独立作战,完成阻击、迟滞敌人的任务,真是刚胆、沉着、热心、慧敏,这几个条件,共军战士都充分具备了。我部于午后四时到达距八肯中梁约十华里地方的时候,发现右前方九龙山有百余人。左侧方亦有一高地(忘记山名,标高较九龙山低),发现共军数十人向行进部队射击,目标很显露。我判断共军实际上也只会这么

多,不然,何以明显地暴露目标,并且射击都在有效射程以外?这显然是为了迟滞我之行动而设置的疑兵。我仍令部队继续前进,由本队派兵两连驱逐九龙山的共军,派一个连驱逐左侧高地的共军。各完成任务后到八肯中梁归还本队。午后五时前卫已通过八肯中梁,到达八肯中梁西端高地,我也率本队到达八肯中梁,但是派出驱逐九龙山及左侧高地共军的部队为共军所吸引,竟未按照指示归还。我深恐兵力分散,被共军个个击破,不得不暂时停止,收容派出之部队。同时,部队行军一日,尚未休息,官兵亦感疲乏饥饿。乃命前卫即在八肯中梁西端高地停止、警戒,本队各队即各就原地停止、警戒休息,并迅速做饭晚餐。令通讯连开设电台与宁城(小城子)三团联络,用无线电话询问三团目前情况。通话后,据第三团团团长保如光报告,共军兵力过于强大,并且战士人人奋勇,前仆后继,攻势极猛。全团官兵苦战一昼夜,已尽最大努力。现在外围据点已全部失去,退守核心工事,共军居高临下,迫击炮弹、掷榴弹如雨点般落到核心工事内,形势非常危急,现已无法支持了。我告诉他我已到达八肯中梁,叫他再支持四小时,我一定排除万难,按时赶到。保如光回答说,他至多只能支持两小时。当时我考虑到倘若共军在两小时以内解决了第三团,势必转移全力来对付我。时间已快进入黑夜,共军擅长夜战,而且我在前进途中有无阻碍,四小时能否赶上难预料,这样,不但第三团救不了,恐怕我所率全部亦有被歼灭的危险。只有第三团突围,我率全部撤回天义,较为上策。于是我就问保如光,你既不能支持到我到,突围可不可能?保如光答说可能,我又再问他有把握没有?他答复我说有把握。我看了一下地图,认为从南面突围较为安全。于是在我指示他从南面突围和突围后经过的路线后,就叫他准备突围。这时派出之部队亦已归回。我于是下令,前卫改为后卫,后卫改为前卫,撤回天义。

很奇怪，我们在前进时，沿途均有共军小部队在道路两侧伏击，在撤退中反而没有听到一点枪声，部队安全地于夜间撤回天义，但损失极为惨重，伤亡失踪官兵达七百余（该团在前卫、前所战斗中损失的，于战后已由军补充团补充足额，这次又遭受重大的损失），各机炮连骡马几全部损失，重机枪枪架及迫击炮炮盘亦多有丢失。当即将经过情形及损失情况用电话先行向军长报告，并请求免我的师长职务。而处以丧师失地应得之罪。

我申请处分后，静待处理。后接军长卢濬泉电话回答说，东北长官部电令，认为我处置不当，应加申斥，并叫我仍继续负责，戴罪立功。我根本就厌恶内战，随时总想设法摆脱，自到东北后，更明显地看出蒋介石顽固地与人民为敌到底；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革命力量，内战不知要打到哪一年！而国民党一般高级将领大多昏庸无能，指挥军队、部署兵力处处被动挨打，疲于奔命。尤以暂 18 师在北宁铁路及这次乃林、宁城（小城子）的部署使我不满，而共军的作战处处主动，机动灵活，神出鬼没。若再恋战，后果不堪设想。上面既然说我处置不当，不如乘此机会摆脱较易。于是我下定决心，坚决表示不干。托词亲老子幼，体弱多病，败军之将不可言战，在部队已无威信，尔后已不能再指挥部队等为理由，一再要求准我辞职。结果终于得到准我一个月的探亲假，我就在 1946 年 10 月 4 日摆脱暂 18 师师长职务，离开部队回云南了。

另外，在宁城（小城子）战斗后有一件事使我感动最深，永远忘不了；就是暂 18 师第三团从宁城（小城子）突围时，大多数负伤官兵都遗弃在宁城（小城子）。我们回到天义的第三天，共军派民工用担架把负伤的官兵如数送到天义，并且都经过治疗包扎。据负伤的官兵谈，他们受到共军无微不至的照顾，阵亡的官兵亦经殓埋，被俘的官兵也受到优待等等。这件事情，我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这

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过去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如何杀俘虏，如何活埋伤兵”等等骗人的鬼话，而今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的无耻谰言和欺骗宣传。

原载《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八 爷 府

欧阳相一 整理

“八爷府”位于宁城县大城子镇钓鱼台水库上游四华里处的呼和村。它的西北南三面环山，东面是发源于马架子乡碾子沟山麓的大城子河。该河经由夜里皋沟门、周家店，从八爷府前流过，到大城子镇(西五家)汇入坤都伦河。

八爷府本来叫巴爷府，是喀喇沁中旗第四代扎萨克王爷玛哈巴拉的次子巴拉苍的府第。因为“巴”和“八”谐音，后来人们把巴爷叫成“八爷”，巴爷府也就叫成了“八爷府”。

八爷府建府之前，这个地方叫“玛林格日”(马棚的意思)。这里天然资源丰富，是喀喇沁中旗历代扎萨克围猎、游牧的地方。每年秋后，各族系都到这里集中，盛况非常可观。巴拉苍的父亲玛哈巴拉就出生在这里。玛哈巴拉五岁承袭王位，乾隆四十年(1775)袭公品级扎萨克，一等塔布囊，五十三(1788)年封辅国公，道光九年(1829)赏给贝子衔。晚年、离职后，又居住在这里。

巴拉苍生于嘉庆八年(1803年)，是玛哈巴拉王爷的次子。他生得眉清目秀，王爷喜得脱口而出：“苍天赐我也”，遂取乳名叫“苍”。苍长到七、八岁时，王爷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教他习文练武。十七、八岁时，他就练就了一身很好的骑马、射箭功夫。道光年间，多次随父巡查木兰牧场(现河北省围场县境内)，击败入侵牧场哄抢马匹的匪贼。因此受到清帝的表彰，被理藩院送进宫内当了

御前侍卫。取其父名的后两字与他的乳名“苍”相连，叫巴拉苍。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武汉三镇，进而欲夺取南京。这时，巴拉苍奉皇上御旨，回到玛公旗搬兵。他挑选蒙古精兵百余骑，带到京师，编入僧格林沁军。他在该军中任苏木达，巴拉苍在僧格林沁指挥下，在山东高唐州一带屡胜捻军，战功卓著，于是他的名字一时轰动全军。同治元年，新皇帝登基，并召见各路领兵和有功之臣，僧格林沁被封为“亲王”，巴拉苍被封为“贝勒”（带涅红顶子），成为皇上最亲近的人。

同治三年，巴拉苍回到阔别已久的玛公旗，受到盟旗贵族的热切欢迎，被安置在其父晚年离职后居住过的“玛林格日”。其兄德勒格尔王爷在此地给他建造了府第。同其兄一样，府第有专人保卫，除了不下数十人的使奴、侍女外，还有贴身保卫人员。

巴拉苍晚年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甘寂寞，经常带着警卫人员上山打猎，出去一趟好几天才归。德勒格尔王爷怕他出事，常派兵进山寻找和保护。

咸丰年间，连年灾荒。山东、河北两地的穷苦人逃荒到关外的很多。王爷府、八爷府和大户人家，常有饥民讨饭。巴拉苍很同情这些饥民，凡到他府讨要的，他都一一施食。要饭人都很敬重他。有些人跪在门前哀求给他当奴隶。他们说：“我们虽然不会打猎，但会给你开荒种地”。巴拉苍收留了他们。

由于这些人辛勤劳作，这地方的农业生产发展了，逐渐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巴拉苍也成了有名的大地主。在一肯中、八肯中、西大山、平泉黄土梁子，开了许多荒地。小部分由奴隶耕种，大部分出租。每到秋收时节，就派奴隶到租户收租。

巴拉苍到晚年娶了九房太太，有汉人、满人、也有蒙古人。

光绪元年，新帝即位，为喀喇沁部贵族加俸。这时巴拉苍已经

去世。他有两个儿子，长子七、八岁时就死了。八爷府的产业由次子林希道尔吉继承。

林希道尔吉，汉名乌维龙，光绪二年生，是个梦生，其生母是巴拉苍的九房太太。林希道尔吉聪明过人，但不务学业，府上卫队练武，他总跟在后面比划着学，母亲也管不了。

光绪十七年，林希道尔吉的母亲在汉罗扎布妻（福晋太太）陪同下，前往北京面见光绪皇帝，陈说孤儿寡母没有靠头。光绪帝念老巴爷一生的功劳，又封了林希道尔吉“四品台吉”，辅佐于汉罗扎布王爷，承袭了巴爷的品位。

林希道尔吉性情暴烈，喜人奉承。人们称他为“林太爷”或“巴太爷”，他就笑容满面。而当他稍有不如意，就对下人加以皮鞭、棍棒。有时，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幸免。但他在吃喝上却从不打算盘。他吃什么，下人就跟着吃什么。他与其父一样，不但好使枪弄棒，也爱好打猎。每次猎获的野味，都分给奴隶们吃。下人都对他敬而畏之。

林希道尔吉交结很广，远近一些有名的地主老财，出入他家，往来不断。每逢客人来，他总是以酒肉相待。由于生活奢侈，浪费无度，家里总是入不敷出。因此，经常向大地主、大买卖家借贷。

民国十三年（1924），军阀割据，独霸一方，本地土匪四起。有名的土匪头子有“安”、“喜”、“明”字。成群土匪明抢暗夺。主要是抢大户。林希道尔吉为了保护自己及中旗王府府第，在附近招收了一部分会武术和懂枪法的人，同他的卫队人员，整天习练枪法。他自己的枪法很高，乌鸦从头顶飞过，保证一枪落地。他卖掉了一部分土地，买了枪弹。带人打了几次土匪，都取得了胜利。因此，他的名望也就更大了。远近的一些地主老财、大买卖户，都带着丰厚的礼品登门拜访，求巴爷出兵打匪。土匪都很怕他，一听说巴爷来打，就吓

得一哄而散。

民国十五年,林希道尔吉向锦州商人田志云购买枪弹,因无积蓄,就将附近的一百多亩好地兑给了田。因此,田志云就在巴爷府落了户,安了家。现在呼和村分销店就是田志云的院落,至今还保存着旧式东西厢房六间(分销店库房)。

民国十七年,平泉县李效鹏县长听说林希道尔吉能打匪,亲自带了枪弹登门拜访,并委任他为“打匪队队长”。林希道尔吉把打匪队扩大到一百三十余人,又亲自请来大金沟的梁殿英和瓦房的李松林,分别任副队长和教官。八爷府四周修了坚固的高墙和炮楼,一百三十多人的打匪队全吃住在府内。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春占领热河。同年三月,喀喇沁中旗被占领。第一个到中旗王府和八爷府来的日本人是警务指导官仁科信夫。他在王府组织了“度治局”,将王府卫队和八爷府打匪队(卫队)改编为“王府保安总队”,王绍棠任总队长,仁科信夫任指导官。

伪满康德四年(1937年)一月,日伪推行“权益奉上”,施行“属人行政”的方针,在大城子建立旗制,将喀喇沁中旗末代王爷汉罗扎布抬出来当了挂牌旗长。将原“保安总队”改编为“治安队”,由王绍棠兼任队长,日本人稻田秋作任指导官。治安队只能由热河省第五军管区指挥和调遣。为了对付我抗日力量,1942年又把王绍棠调出当了旗长,把治安队编入关荣发警察讨伐队,对我抗日地区进行清剿和扫荡。

康德十年(1943)三月,承(德)、平(泉)、宁(城)地区的抗日活动取得很大进展,捣毁日军据点、警察分驻所、警察署多处。为进一步镇压抗日军民,关荣发警察讨伐队副队长门贞喜岱治、原保安队指导官稻田秋作找来原保安队的小队长林希道尔吉的干儿子韩全

福,进行密谋。认为,林希道尔吉在中旗王府和蒙民上层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说话有一定的号召力,就通过韩全福、梁殿英等去八爷府,做林希道尔吉的工作,要在中旗境内再成立一支防卫队伍。林希道尔吉没有同意,还把梁殿英等好一顿训斥。

林希道尔吉有一匹好马,个儿大,跑得快。稻田秋作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总想把它弄到手。他又让韩全福去八爷府活动,又被巴爷顶了回去。

稻田秋作对两次拉拢林希道尔吉的失败,并不甘心。康德十年(1943年)旧历二月二十八日,是林希道尔吉六十七岁寿辰。稻田秋作与梁殿英、韩全福等商量后,乘汽车拉上枪弹、厚礼,带着几个日本警兵去八爷府祝寿。在酒席宴上,稻田秋作大讲“日满亲善,满蒙一家,康德皇帝也很关心巴爷”等,把林希道尔吉说得滴溜溜转。乘着酒兴,稻田倒头跪拜,认林希道尔吉为干老。林希道尔吉受宠若惊,终于被日本人征服。尔后不但把马送给了稻田,还在稻田操纵下,于旧历三月初,组建了以林希道尔吉为司令,韩全福为大队长的“喀喇沁中旗八爷府防卫队”。稻田秋作任防卫队指导官,掌握着防卫队的实权。稻田还把原治安队时的一些骨干,如徐德山、黄金元等安插在防卫队里任大小头目。防卫队直接受日本人和旗警务科领导,林希道尔吉不过是一个挂牌司令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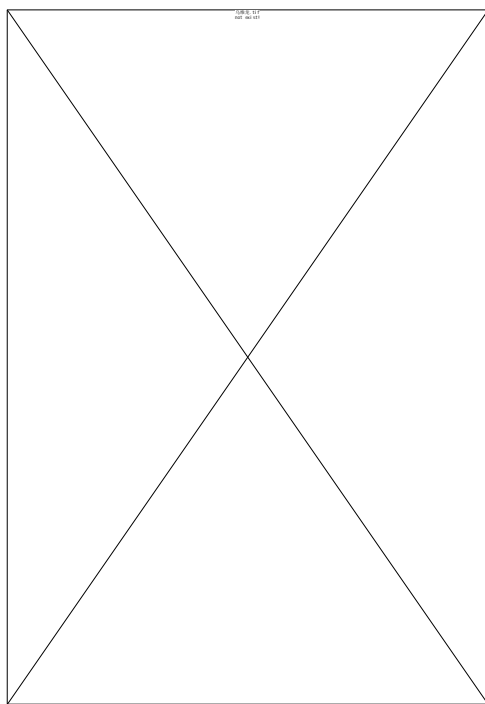
八爷府防卫队初建时近百人,编为四个小队(其中一个卫队,主要负责保护八爷府和巴爷)。每个小队设一名小队长。每个小队下设三个分队,每个分队十多个人,有正副班长。防卫队官兵均着伪军退役的旧军装。武器全由日本人供给。有机枪两挺,连珠枪一百支,每个队员佩带五十发子弹。十余支手枪分配给小队长以上及“卫队”头目使用。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手榴弹。

康德十一年(1944年)旧历正月十五日,稻田秋作和韩全福密

谋后,韩全福以去大城子看戏维持秩序为名,在大城子街里张贴告示,正式与林希道尔吉脱离关系。巴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韩全福不仁不义,一气之下得了气恼伤寒,不久便病故。稻田也溜之大吉了。韩全福把队伍拉出后,把大本营安在三座店街里,到处招兵买马,将近二十几天,集中起一百多人。他自任大队长。韩全福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日本人派来警务指导官山下中西任副大队长。至此,“韩全警察讨伐队”成立。

林希道尔吉生前娶了两房太太。二太太名叫香瑞,过门不久得了疯病,于康德七年(1940年)去世。大太太比林希道尔吉小一旬。她于民国八年(1919年)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乌吉乐布和,汉名乌振宵。林希道尔吉去世时,乌吉乐布和正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政法大学读书。他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就急返八爷府奔丧。他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又将八爷府防卫队中没有被韩全福拉走的人马招回,在父亲生辰这一天(旧历二月二十八日),宣布“乌振宵自卫队”成立。“乌振宵自卫队”下设三个小队,一个卫队,每小队三个分队,每分队十几个人,共一百三十多人。

一九四五年祖国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乌振宵接受共产党的民族区域政策,在苏联红军的支持



巴爷林希道尔吉(乌维龙)像(1876~1944年)

下,其“自卫队”被我八路军改编为县公安大队第四连。乌振宵担任过一段县公安大队参谋长,1946年任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公安科长,1949年4月去世。

注:(一)本材料根据朱岫云、陈云书、张宝良、石得珍、张文山、于海峰等人忆述整理而成。

朱岫云(1895年生),小城子柳树营子人,原王爷府“马卫队”小队长。

陈云书(1900年出),大城子镇呼和村人,原八爷府“打匪队”差遣。

张宝良(1914年生),大城子镇呼和村人,原“八爷府卫队”队员。

石得珍(女,1915年生),林希道尔吉儿媳,乌振宵妻。

张文山(1909年生),大城子人,原喀喇沁中旗人民政府代旗长。

于海峰(1925年生),原“八爷府防卫队”队员。

(二)关于“八爷府”的建造时间,有人说是在玛哈巴拉王爷离职时在玛林格日建的;也有的说是玛哈巴拉王爷次子巴拉苍打败太平天国军回来后,同治三年建的。其说不一,究竟哪种说法正确,无从查考。

喀喇沁玛公旗巴爷府世袭录(1840-1949)

世袭年代	生卒年
(1840-1844) 玛哈巴拉	(1771-1844) 辅国公--盟长。
(1864-1876) 次子巴拉苍	(1803-1876) 贝勒--二品塔布囊
(1891-1944) 次子林希道尔吉	(1876-1944) 四品台吉塔布囊
(1944-1949) 乌吉乐布和	(1919--1949) 1946年任县公安科长

大明字

沙万川

“大明字”原名王喜凤，又名王相臣，“大明字”是他的匪号。他的家是现宁城县二龙镇二十家子村。

“大明字”民国年间就当土匪，那时他当土匪特点是不在本地干，在外行抢之后，就回家隐避，需要的时候再出去。他在家干农活也开肉铺，无论做买卖还是干农活，身上总是带着手枪，他的枪法很准，双手都能打。

伪康德十年（1943年）夏的一天，日伪军警 50 多人包围了他的住宅，他手持双枪打了出去。日伪军警强迫二十家子群众上山搜他，并且扬言：“搜不出来要血洗二十家子！”出去很多人搜了半天也没捉到，既使碰上谁能惹他。搜不着又无法交差，经过当地头面人物向日军孔翻译送礼说情，全村百姓得以幸免血洗之祸。

“大明字”被日军追捕后，我抗日干部王旭昌曾争取他抗日，他支支吾吾二心不定。同时日伪也动员他去当特务。

1944年宁城抗日游击队大部南撤。他在这个时候当上了日伪特高队员（特务），活动在喀喇沁左旗、建昌、凌源一带。他在日寇的指使下侦察抗日军政人员的活动、缴收民间武器和鸦片。这时的“大明字”既是日本的鹰犬，也是地方上的祸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也交结了一些江湖上的朋友。

1945年“九·三”（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10月间就

组织起一支有 100 多人的匪队,匪队成员主要是伪满警察、特务和惯匪。他们活动在二龙、汐子、天义及宁城中北部,开始他们是以抢劫为主的。当时宁城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他们就自称是“八路军”。我军为了使这伙武装不致跑到国民党方面去,12 月间,在名义上收编了他们,并发给他们军大衣。名义上虽被收编,实际上他们还是自行其是。收编不久,一列客车(当时火车有时通有时不通)到二十家子(离二龙站不远)因缺水停车。大明字匪队抢了旅客所有的财物。

杜耀廷回宁城组建国民党先遣军——别动队时,他们之间就有来往。经过杜的策动,大明字真心为敌,假意为我。11 月 22 日杜耀廷别动队袭击山头区公所时,以贾桂为首的天义区小队诈称“野狼”叛变,大明字暗中策应,天义区公所的干部大部被俘。这时大明字还假意出面要人,匪队只交了区长朱寿昌和建平县的张科长。大明字为什么假意要人其中有更大的阴谋,原来他和杜耀廷商定:搞垮了山头、天义区公所后,就袭击宁城(小城子)、八里罕。因为八里罕有县支队,让大明字以投降为名从中取事。

11 月 23 日下午,大明字携同梁殿英率匪队来到八里罕。当时县(平泉)大队有六个连的兵力,副政委是焦洪光,为了整编队伍,县委副书记徐瑞林、民政科长王旭昌也在这里。副大队长是蔡树芳,蔡是收编过来的敌伪人员,蔡和大明字有过交往,蔡感到投了八路军之后寸功未立,想在收编当中立个功。原来和大明字虽有过收编谈判,我方答应他们为平泉县支队的骑兵支队,让他当骑兵大队长。

对大明字的到来,县支队毫无准备,那天下午,县支队分 4 个点在操场练兵,没有外出,因此大明字认为是有准备的。这时正赶上枪走火,打伤他们一匹马,更使他们增加怀疑。因为他们是打着

投降旗号来的,就得按他们投降来接待。蔡队长首先迎出,把他们让进客厅(原孔家的客厅)。他们很野蛮,个个横眉立目,有的怀抱机关枪、马枪都上着刺刀,手枪叫着勾头。当谈到他们投降事项的时候,大明字东拉西扯。当讲到“野狼”时,他说“野狼”把天义袭击了,他们袭击完了,我去,他们就逃了。用来打掩护。在这个时候王旭昌出去解手,他走进厕所时,发现墙犄角有两个人,一看是张科长和朱寿昌,冻的直打寒颤。他们向王旭昌说了“野狼”袭击了天义区公所的事。当王旭昌问及大明字是否下手时,他们就不说了。王科长理解他们的意思,就回到屋内问大明字:“方才我见到两位自己人,为什么捆在那里?”大明字难为情地说:“那是‘野狼’他们干的,我跟他们要出来的。”他一边说一边骂下边的人:“他妈的,你们为什么还把他捆着?”王科长随即说:“既然这样就把他们解开吧,快冻死饿死啦!”王旭昌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点儿,这样他们才把两人放开。朱、张二同志到屋内吃了饭,又把土匪袭击天义的情况报告给王科长。王旭昌据此断定:大明字不是投降而是诈降。

王旭昌到客厅与大明字寒暄了一阵儿,让他们住,他们不愿住。让他们住在街里,他们偏要住在街外;要给他们换衣服,他们嫌少不换。县支队的目的是稳住他们,大明字目的是搞垮县支队。最后商定:县支队住街里,土匪队住街外。

晚上,徐瑞林、王旭昌、焦洪光、蔡树芳并找上被绑来的两位同志,经过分析研究,决定乘机消灭这股土匪。但是,这个县大队都是新兵,除了新参加的农民就是改编过来的敌伪人员,搞不好会弄巧成拙。于是决定往平泉打电话,要求大部队增援。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断定是被敌人破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送信,决定让王旭昌去。找人一打听,东门、南门都有敌人的骑兵在打转。因此,派一个排的兵力选七匹好马和七名战士同王旭昌一起出西门到平泉

搬兵。

以徐瑞林为首的作战指挥部研究决定搞个宴会,请土匪大、小头目参加。为了拖延时间,把宴会安排的晚一点儿,就这样请土匪们来赴“鸿门宴”。匪徒抢来的两挺机枪放在大明字的两边。大小头目都披着大衣全副武装、枪叫着勾头,气氛非常紧张。

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插曲:也不知哪位同志把酒盅碰到地下,“叭”的响了一声,土匪们认为是掷盅为计了,都纷纷站立起来,有的站在凳子上亮出了武器。还是闯过江湖的姚连长很有应付能力。他抽出手枪大喝一声:“干什么!?你们的胆子也太小了,打了个酒盅就这样,打个盘子该怎么着哇!”骂了他们一通,匪队一看确实不是计,才平静下来。

大家坐下来吃饭。大明字发现王旭昌不在就问:“王科长上哪去了?”徐瑞林答道:“王科长有事一会儿就来。”过了一会大明字又问:“王科长怎么还不来?”我们有的同志说王科长有事今天不能来啦。这时,大明字好象察觉了什么说:“不能呀!抗日的时候,他派人向我联系,现在我来了,他怎么不相信我们呢?这里头一定有问题!”他一甩袖子说:“不吃饭,走!王科长不来我们不吃饭啦。”这时还没到僵局,还得以礼相待。匪徒们往外走,徐瑞林、蔡树芳往外送,送出东门,老蔡要求大明字说:“王队长,你把队伍集合一下让我讲几句话,你看,兄弟本人是支队的副队长,你是大队长,弟兄们来了,我讲几句话,以后好办事呀。”有人说:“不用讲了。”老蔡坚持说:“不行、不行,总得让兄弟讲几句。过去咱们是朋友,今后咱们是同志了嘛!”大明字说:“在这讲不行,再往东走一走。”大明字在老蔡要求之下,整理了队形(三面)。老蔡站在当中背朝着东门,刚讲了“弟兄们……”忽然东门上空升起了三发信号弹,又听见焦洪光高喊:“大明字我叫你跑!”接着枪声就响了起来。

原来大明字及其匪徒正要吃饭的时候，焦洪光接到平泉的电话。这个电话是杨思路同志打来的。杨旅长命令焦洪光：一定要拖住土匪，部队马上乘汽车出发。大明字一定要走，部队还没到，焦洪光就带领战士们开了枪。

枪声一响，敌人就乱了营。土匪们骑上马跑了。这时焦洪光带着一连战士冲上前去。战士们犹如下山猛虎，吓得土匪屁滚尿流。有的从马上掉下来跑到老百姓家避起来。这一下共俘获 20 多人，十几匹马。匪徒们逃向建平、喀左一带。从此大明字正式投靠了国民党。他又拉起三、四百人的队伍。改名王相臣，又讨了一个姓唐的小老婆。他的小老婆是喀左瓦房赵炳文送给他的。1945 年大明字当特高队时跟赵炳文结交，当时唐正新寡，是赵炳文的拼头。这次大明字见到赵，赵以唐相赠。大明字为了显示他的飞黄腾达，曾带领队伍和小老婆回到他的家乡活动。1946 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夜，我军包围了二十家子，又将这股土匪打散并打死十几名匪徒。这样，大明字跑到平泉杨树岭被国民党收编，先给他一个团的建制。当时那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杂牌军赵团，团长赵子阳知道他的底细，控告大明字是土匪，劫过火车。承德国民党军当局将大明字逮捕入狱，将他的部队改编到李司令手下。1948 年承德解放前夕，承德国民党监狱放松看管，大明字乘机逃到锦州。他又网罗旧部投靠锦州国民党军，充任锦州外围的防务。在我军向锦州攻坚战斗中，大明字被击毙。

伊斯兰教与宁城清真寺

吴殿珍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目前,阿拉伯各国和伊朗、阿富汗等国的居民,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在我国,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清真教、天方教等。它的主要信奉者是回族人。其次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伊斯兰教是在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顺从。伊斯兰教信徒通称为穆斯林,意思是顺从者。伊斯兰教是一种神教,信奉唯一的神“安拉”,说天地万物都属于“安拉”,并且由“安拉”安排,它是唯一的“真主”。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是“先知”。他在创教过程中的说教,后来被信徒们整理汇编成书,称为《古兰经》(一译《可兰经》),是这个教的最高经典。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宋以及与其同时的辽、金、夏时期,大量的阿拉伯民族来我国经商定居。特别是到了元代,来自大食、波斯和中亚各国不同身份的穆斯林,通过不同渠道来华,长期与中国各民族杂居融合,蕃衍繁殖,逐步变侨居为永住,开始了中国回回民族的形成过程,已出现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杭州等一些地方专设了“回回区”。十三、四世纪中,新疆、青海、宁夏一些地方的统治者,信仰了伊斯兰教,这个教的传播就相当广泛了,当地的一

些少数民族几乎都信了该教。

清真寺,也称教坊、寺坊礼拜寺。是穆斯林举行教会活动的场所。其建筑形式,除保留一部分西方建筑固有的结构外,也融入了部分中国古寺庙建筑结构。它设在穆斯林聚居区,由一位阿訇担任这个寺的教长。所有在这个清真寺举行宗教活动的教民,都是这个寺的“高目”(阿拉语音译,意为“居民”),在宗教上都归这个教长所管辖,和其他教坊没有隶属关系。由有管事乡老(社头或学基),主持财务和一般事务。阿訇多由外坊人任职,可更换、可连任。

清真寺内的主体建筑是礼拜大殿,殿两端为“窑殿”,其右侧为“闵拜尔”,是教职人员宣讲教义的地方,还有沐浴室(俗称水房),有作大净(洗全身)和小净(洗脸面、口鼻、手脚等)的汤瓶,吊罐等设备。门前左龙右虎,居中山门大殿,门前有照壁。中国的清真寺建筑,从外表看几与僧道庙观无大差异。

穆斯林有三大节日:尔代节,即开斋节(十月一日),此前(九月),凡回民十岁以上健康者都应“把斋”。即黎明以后不得饮食,俟落日见星后方可饮食,更不能吸烟饮酒、有房事。过此日的十月初二、三见月开斋。古尔邦节(十二月十日)即宰牲节,俗称“小开斋”。此日,回民皆沐浴净身,着盛装到清真寺做礼拜,家庭中有宰牛羊鸡鸭者,做油香互相馈赠或自食。圣纪节(三月十二日),相传是穆罕默德诞生的日子,称圣纪,又是其逝世的日子又称圣忌。诵经、赞圣,宰牛杀羊,设宴聚餐,以示哀悼。

宁城县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是回族。(明朝前称回回,明朝起称回族)。全县回族人口近 2000 人,主要居住在天义、忙农、二龙和瓦房。这四处的居民,是从清光绪年间,通过经商、务农等途径从全国各地分别来于此的。都有清真寺及阿訇。清真寺旁皆有浴室,清真寺规模较小并简陋。但都比较清静整洁。一切宗教活动都

由阿訇主持。阿訇除负责组织宗教活动外,还负责宰牲,阿訇上了年纪后,也培养接班人。凡需宰牲的伊斯兰教民,必请阿訇主刀宰杀,方可食用。除当地外,距阿訇稍远的教民需宰牲者,牵所宰之禽畜至阿訇处,或请阿訇到彼处进行。宁城县阿訇的宰牲,很有名气,“文革”前,经宁城阿訇主刀宰杀的牲畜,专供中央和全国其它一些区、部门回民食用。回族人喜清洁,在饮食上“清净的皆相宜,污浊的受禁止”。牛、羊、骆驼、兔、鹿等反刍畜类,鸡、鸭、雁等素囊禽类皆可食;驴、骡、猪、狗等不反刍类,鹰、鹞等贪残的禽类禁食。自然死亡的禁食。

宁城县伊斯兰教的节日活动形式与外地大体相同:

尔代节,俗称“大开斋”。这日前的一个月内是“封斋月”。具体执行时间是他们按规矩准确掌握。封斋期间,除老、弱、病残者外,凡体魄健壮的男女穆斯林都执行把斋,一天两顿饭,见天上的星星时才吃。意谓让富人也知饥饿之苦。“大开斋”是封斋(把斋)的最后一天。这天,穆斯林作沐浴,着新装,进入清真寺礼拜。拜后互相拿手、道歉祝福。从这日起,恢复白日饮食。

古尔帮节,也称“小尔代”、“小开斋”、“宰牲节”。在阿拉伯语中叫“尔德·古尔帮”或“尔德·阿祖哈”。“尔德”即节日。“古尔帮”、“阿祖哈”都含有“牺牲”、“献身”之意,因而又称古尔帮节为“宰牲节”。此节在大开斋后的 100 天过,连续 10 天。宗教传说是“真主”安拉启示伊布拉欣宰羊代献子演化而来。节前,穆斯林家搞卫生、宰牛羊、制糕点。节日这天由阿訇讲古义经、讲教义,穆斯林沐浴礼拜,盛装歌舞,相互祝福,以肉食馈赠亲友、贫民。

主麻日,也称聚礼。每礼拜五为主麻日,这天下午,穆斯林主动到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以答“真主化成之恩”。再由阿訇向穆斯林讲党的宗教政策,全民信教,爱国爱教。这一天,被穆斯林视为吉

日。

对圣纪节,伊斯兰教太阴年三月十二日是安拉“钦臣”穆罕默德无常纪念日。穆斯林为纪念他,于古尔帮节后的 100 天在清真寺诵经礼拜,追念他的遗德。

穆斯林除上述节日外,其他节日与汉族同。

万丹卫征陵寝地发现始末

靳 堂

一、历史追溯

万丹卫征(亦作万旦伟征,蒙古正音字为 Eandaz EaiijiaQ),为蒙元重臣济拉玛(者勒篾)十四世孙,生年不详,卒于清顺治十三年(公元 1656 年)。明末清初,与其兄苏布地同为喀喇沁部著名酋首。在推翻明朝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谓功勋卓著。是喀喇沁乌梁海部头等塔布囊^①,也是明末清初称雄长城边塞的一位杰出的重要历史人物。

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 年)二月,喀喇沁部塔布囊苏布地、万丹卫征等迫于察哈尔林丹汗(林丹呼图克图汗)和明王朝的军事压迫,为寻求反对外来压力的同盟军,遂遣使至书天聪汗(皇太极),以示求盟之意。七月,喀喇沁部又派出由朗素等 4 名喇嘛带领的 530 人的使团到繆克顿(满语,兴盛、腾起之意,正音字为 繆克顿,汉语亦称盛京,今辽宁省会沈阳)“乞盟”。八月,通过刑“白马乌牛誓”,与后金大汗皇太极达成联盟协议。

白马乌牛誓,据《旧满洲档》记载:“十九日,因为喀喇沁汗的使臣郎素等四位喇嘛、五百三十人到来,阿吉格台吉、硕托台吉、萨哈

^① 塔布囊:汉意为驸马。为清代喀喇沁乌梁海部蒙古贵族爵称。

廉台吉前往迎接,宰牛羊,设宴,迎入城内。二十五日,以来礼,宰牛羊,设大宴招待。八月初三日,与喀喇沁之众,为结盟之事,共向天地盟誓言。”

满洲人和蒙古人(爱新国与喀喇沁)向天地刑白马乌牛的对天地告誓仪式,绝不是一般的礼节,而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类似于现代国家之间举行的签订条约仪式。“誓词”就是条约书。焚烧誓词后,即正式结盟。

喀喇沁方面的誓词内容如下:

“满洲,喀喇沁,我们二国,为了和睦相处,为天刑白马,为地刑乌牛,一碗盛酒,一碗盛血,一碗盛白骨,各说信言,告誓天地。喀喇沁若不践盟言,不与满洲和善,除了原有的赏和大都贸易外,与汉人秘密结盟,中察哈尔汗之计而背叛,则天地鉴谴喀喇沁,执政的拉斯喀布、布颜、莽苏尔、苏布地、赉格尔为首的大小诸塔布囊,殃及罪孽,生命变短,像此血出血而死,被埋于土下,像此骨变为白骨。如遵行向天地告誓的誓言,天地垂佑,寿命延长,愿我们子孙千古享受太平。”

爱新国方面的誓词内容如下:

“喀喇沁,满洲,我们二国,为了和睦相处,为天刑白马,为地刑乌牛,一碗盛酒,一碗盛肉,一碗盛血,一碗盛白骨,烧香,各说信言,告誓天地。满洲若不践盟言,若不与喀喇沁和睦而背叛,对喀喇沁有贰心,怀毒计,则天地鉴谴皇太极、古英、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岳托、多尔袞这些全部满洲人,生命变短,像此血出血而死,被埋于土下,像此骨变为白骨。如遵行向天地告誓的誓言,无犯行无毒心,则福满寿延,子孙繁殖,美誉满天,心想事成如雨降临,直到万世。吉祥”

这次结盟,皇太极、莽古尔泰、多尔袞等后金(爱新国)最高统

治者和拉斯喀布、苏布地、万丹卫征等喀喇沁最高执政者，以对等的身份，用同样的仪式，向天地告誓，结为盟友。这是一个反明朝、反察哈尔的政治、军事同盟。在明朝、蒙古、满洲三足鼎立的当时，这次誓盟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喀喇沁部在三方势力中所处的政治立场，即喀喇沁应属满洲阵营。

天聪三年(1629年)六月，苏布地等率部再至盛京聚盟，皇太极酌其仍守旧牧地。这时的喀喇沁部驻牧地稳定在大宁城(今宁城县大明城)为中心的老哈河高勒^①(老哈河)、敖沐沦^②(大凌河)、锡伯高勒^③(锡伯河)流域。十月，皇太极亲率满、蒙、汉大军入关伐明。此役，以喀喇沁部塔布囊布尔哈图为进军向导。

天聪六年(1632年)四月，皇太极率军西征察哈尔部林丹汗，喀喇沁部出兵从战，林丹汗弃土西遁。是年，喀喇沁部塔布囊，万丹卫征兄苏布地逝。

天聪八年(1634年)十月，皇太极派遣国舅阿什达尔罕、塔布囊达雅齐前往外藩硕翁科尔地方为已归顺的蒙古诸部划分牧地，明确各自领地，划定四至边界，而后严禁各部互相兼并、争夺，如有违反和越界者“坐以侵犯之罪”。从此，喀喇沁、敖汉、奈曼、扎鲁特、阿鲁科尔沁、巴林、翁牛特、克什克腾等部驻牧地正式固定下来。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下令诏编喀喇沁、土默特两部佐领，建四旗。将土默特部编为土默特左旗(今辽宁阜新)、土默特右旗(今辽宁朝阳)。将喀喇沁部编为喀喇沁左翼旗(今辽宁省喀

① 老哈河高勒，为西辽河两大支流之一。源于喀喇沁中旗柳溪川光头山(今河北省平泉县境)和霍尔霍克川(今宁城县黑里河)。

② 敖沐沦，今指流经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大凌河。

③ 锡伯高勒，今指流经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境内的锡伯河。蒙古语中，沐沦、高勒均为江河之意。一般情况下，将河水较大的称为“沐沦”、稍小的称为“高勒”。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喀喇沁右翼旗(今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个部落酋长齐聚盛京,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大统的继承者,并上“博克达·彻臣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奉戴为共主。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更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从此,包括喀喇沁部在内的漠南蒙古诸部尽皆臣属于清,清朝既解除了征明的后顾之忧,又为南下进军增加了大量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力。

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万丹卫征在内的蒙古诸部随皇太极南下征明,至长城各边口,为南下进关扫清了障碍。

崇德九年(1644年),满蒙联军正式攻入长城各口,攻取京师,明亡。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万丹卫征卒。其子额琳臣、其孙茂秀世袭罔替塔布囊爵。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喀喇沁右翼旗格日勒(万丹卫征曾孙)所部发展繁衍,已积至38佐领。格日勒故自领众,奏请朝廷理藩院增编设旗,清廷遂准予其请,命其在本领地增建一旗,“授扎萨克^①,掌中旗事”,始为喀喇沁中旗。格日勒为中旗首任扎萨克。起初,旗治所拟选在格根浩特(今大明城里)、道日浩绕(今小城子)、赳嘉浩绕(马市营子)等地,但最终将旗府确定在巴颜查干^②和巴颜哈拉^③两山之间的玛拉图地方做为中旗王府的扎萨克之地(今宁城

① 扎萨克:清代旗级行政官衔名称,蒙古语意为执政者。每旗置扎萨克一人,掌旗政令,统率部众,相当于旗长。

② 巴颜查干:山名。今指大城子镇下五家村一组(南大庙)前山,距镇政府驻地约3公里。

③ 巴颜哈拉:山名。今指大城子镇松树台村宝蚌沟后山主峰,山峰陡峭,巍峨高耸,距镇政府驻地约8公里。

县大城子蒙中与中蒙医院位置)。

作为历史资料,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万丹卫征做为喀喇沁乌梁海部的大塔布囊,在明末清初中国北方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着实发挥了其他部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后金、漠南蒙古、明朝三方政治、军事势力之中,整个漠南蒙古处在明朝与后金之间,对其双方实力的消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金要战胜明朝,就必须拉拢和征服漠南蒙古,不能让漠南蒙古与明朝联合起来。而明朝要抵御后金,也必须争取漠南蒙古,不能让其倒向后金。因此,双方都尽力争夺这一军事和战略要地,特别是喀喇沁部,在漠南蒙古诸部中首当其冲。它地处东部长城各边口,游牧于敖沐沦(大凌河)、老哈高勒(老哈河)、锡伯高勒(锡伯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对长城内外的山川地形了如指掌。尤其是在苏布地去世后的24年中,万丹卫征做为喀喇沁部头等塔布囊,在辅助后金进关伐明的“国战”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朝初期,蒙古各部上层加入其联合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满蒙联合政权。他们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贡献了力量,结束了明王朝腐朽动荡的割据局面,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

二、线索发现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名震塞外的喀喇沁乌梁海部塔布囊万丹卫征去世。300多年来,他的坟茔一直不为世人所知,一代雄杰的陵寝到底葬在何方?这是中外史学家一直关注和探寻的问题。2005年7月,笔者在宁城县存金沟乡八家(乃门格日)村搞文史采访调研时,偶遇一老人,在交谈之中忽然发现了这一重要线索,一

代王陵万丹卫征的灵柩所在终于揭开了沉睡三个多世纪的神秘面纱,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是宁城县政协委员,热衷于政协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因本人蒙汉语兼通,到民族村下乡采访颇感方便。2005年7月26日,在存金沟乡党委宣传委员黄双喜同志的陪同下,首先来到位于存金沟东川(松根那)的芦家店村将“康宁寺”的历史概况做了采访和搜集。而后又来到存金沟西川(乃仁高勒)八家村调研采访,因为这里是清代“率性寺”的所在地,也是人文资源和蒙古族文化较为丰富的地方。下午3时许,到达乃仁高勒川的八家村,在村委会主任阿拉坦达来(宫达来)同志的引领下,来到本村二组村民宁守业老人家中采访。

“八家”是“乃门格日”的翻译语,建村于明末清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里蒙古语言基础和环境保持良好,每逢春节全村都贴蒙文对联,男女老少皆讲蒙语,是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大地蒙古族文化保持最好的一方净土。本村现共有293户人家,总人口1231人。其中蒙古族225户,人口897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75%。其余25%的汉族多为土改时期移民后裔,受蒙古族历史文化和环境影响,这里的汉族群众也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在全村蒙古族八大姓氏(包、宁、陈、候、吴、梁、宫、白)中,现65岁的宁守业老人最具代表性,他高度重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延续传承,对八姓蒙古族的来历如数家珍,了如指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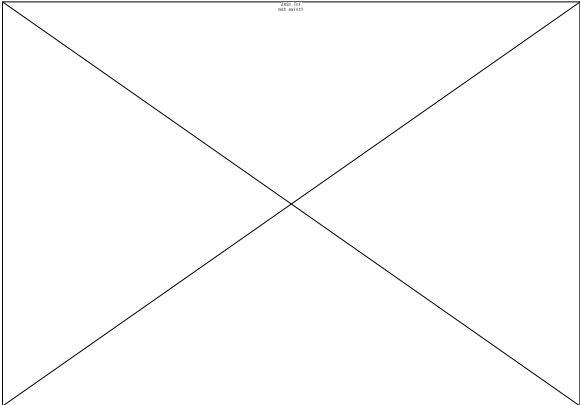
当谈起“率性寺”的历史时,宁守业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具有重大线索价值的史话……。他说,率性寺的蒙称叫“希日琳苏莫”(蒙古语正音字为Sari> oz Soi<Z),汉译为“舍利之庙”。我当即问道:为什么叫“希日琳苏莫”?他说,因清朝早期庙中供奉的是喀喇沁中旗一个先祖王爷的灵位,这个王爷去世后在火化遗体时出

现了黄光,并有舍利出现,后人将其舍利供奉于乃门格日苏莫(八家大庙,学名率性寺)正堂,故蒙语将本庙称为“希日琳苏莫”,而他的骨灰则葬于庙西五里之遥的呼什格台陵地。我又问到:您知道这个先祖王爷的名字吗?老人随即回答:叫“万丹卫征”……

宁守业老人接着讲到,历史虽然过去了 350 多年,但本村的蒙古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习俗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乃门格日(八家)的“包、宁、陈、候、吴、梁、宫、白”八姓蒙古人的祖先,实际上都是守陵人,是陵丁户,蒙语称“赳拉沁”(iolaciz),是受清代喀喇沁中旗第一任扎萨克任命颁布的专门看守中旗先祖王爷万丹卫征、额琳臣、茂秀等人陵墓的守护者。这个秘密只八姓陵丁户内部知晓,外界只知这有王爷坟莹,但不知葬者何人……。另外我们还有相关的历史文献可以佐证,现整个乃门格日八姓蒙古人中,仍存一份完整的历史记载文书,存放者叫陈立军(小名祥全),现属本村三组村民……

为核实历史记载文书的具体内容,我们又辗转来到陈立军家,于是,这份保存多年的历史文书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文书选用的是清代优质毛头纸,长 55 厘米,宽 50 厘米,用毛笔自左至右竖写,皆为蒙文,正稿原文如下:

Miai AoloC oz toirw iy Aafhoy dw GaByx Aolaz biigolohsaz iiaR . SEaJ_w Hagaz w Aoiyx dw Eaadaz EaiijiaiZ tay Yz NoYaz y tariVz iarkZ tavrmaiZ ArVmjilaJsaz NoYaz w kkz vlbsw Nariz Hosigaday dw vy .. Moiz NoYaz w tariVz Acz vidoJsaz Gahcz bgadoR vrhaz w Sari> vlbsw . Naimaz kroz Soi<x dw vy .. AVz w VibVz Araciz dw iarkZ ialganjilaz . Hošoy Aabhay iy Holvjw Av, vlgabZ .. AVnw Aaalgoz vlbsw SoaJKX iiz Aagolaz w AoijoVR oz Goo> vnbZ vy . AVnw VibVz Moosiw iarkZ iy ialganjilaz . Hosigoz w tosalahcy vlgabZ . AVz w VibVz kra> dw toirw iiz kkZ iy Holvjw Hosigoz w tosalahcy vlgabZ .. kra> iasac NoYaz Hosigoz w iakrohcy iasac vlhsaz tolz . byx tariVlaz toiro> oz NoYaz viVdakR y ialajw toisimoz tay ioifdaz klalcaw tohdagooz Moiz iolaciz takRx tay AcikZ Moosiw tay Yz



王府文书影印件

NoYaz w Aaldaz YakZ kkz y kra> iasacq NoYaz . toidw iiz tabgaz Acz NaVlkz AoijoVR oz kkz w iaVz byx dw ialajw Aorosigolhw dw . Aalbdw taz y HagalgaX iisiyx bR tagodajw Aabcigaoz iaKhsaz Aaw . taz y tagodahsaz AociR vlbsw taz

y Aoiyx Aolariz kkz y SaKhw iolaciz vlgagaoz . taz w AoiRx AacimR y ciny Aoisbcw tadajw Aafhw Aoiky . tasorabcw Namjw AoiJV Aoiky . bsz NoYaoz NoYaoz oz ViriYaz dw taz w AoiKoz VibVoz y Aiajy dw Aafhw Aoiky . Aanidw iiz ViriYaz dw AoiKoz VibVoz y AVridz iarohw Aoiky . bsz taz w HariYadw NoYaoz oz AalibZ ioii> oz AalbZ viVz y Nikmsoz Aoiky vlgagaoz taz y AVridz iasacq oz Aaldaz YakZ kkz y Vidalosy Aoiky tagagoloz Yavgolhw tolz . Hagalgaz Acz Aalbdw taz w tologay iiz kjikZ iy Gorbz bri< Aoiladakjw Aohdologaoz . taz dw AmskV tologay dw cagaz cagasoz Malaq[. byx dw cagaz Amskijw . Aoiimsw Godo> tay coi< cagaz AoiJcw Amskkoz . kkz y tagajw Aanidw cioaVR vlgahw tolz . taz w Somw Somoz dw Garhw A>x ioii> oz AalbZ w MoiaJV iogoC tarkZ Mory Aordw AohoR bq[Saq[AalbZ iy cinw Nikmsoz Aoiky vlgabZ .. iolaciz taz dw AalbZ biihw vlbsw AVridz Hoji< taz w iaajK, Viatw NaR Acijw AalibZ ioii> oz AalbZ Aavyx kmaz NamJsakR Aafhw Aagaoz kmaz tasolaz iaKbZ . bsz iolaciz taz w AVridz NamaV bgorahw tohdam> brihw AalbZ ciny Simacoz tay Nikz Aadaly Somw Somoz dw Hariyx Aoiky bR kkz w ioiiZ tw iarohw . SioEaz Nomhw . kVR Aorosigolhw . ViriYx Hasiyx iy iasahw . cacq cacq tw Saaiz Acz vdaq[Virdakmw kmaz tohdabZ . bsz kkz kkz y NoYaoz toisimoz tay tagajw VirkV bZ NoYaoz oz A>x ioii> oz YakZ bYaR oz kraiz tw Acijw MoirVV dw . Aoidz Homq oz bgoda> y Gargahw . bsz EaziZ oz Hosigoz w NoYaoz toisimoz . iialsadaz tay Acijw kkz dw MoirVV dw . Aoidz Homq oz Vimsow . Ma> oz

LiYow Absw iarkZ iy iolaciz dw Gargagaz Somv Somz dw Nikmsoz Hariyx Aoiky . bsz NoYaoz oz Aolagaz cagaz kraiZ tw Gorbz iarkZ bR Gargajw AoiJV iogoC y Nijakoz HosiYaoz Gorbgoz MiaJq[Acz AilaVw Aoiky . bsz NoYaoz oz Aolagaz cagaz kraiZ tw Yagoz Acz AilaVw Aoiky HoriYahw caq tw tamq[tw BciiZ Virbsw AoiJdoky . tamq[Aoiky vlbsw AoiJcw vlhw Aoiky . bsz Moriz AabZ Garhw caq tw . ArokZ viry Acz Garhw iogoC tavgaz iagoz . cariiZ Aalaz dw Nikmsoz Hariyx Aoiky . bsz kkz w HariYadw viV Aagolaz w Modw toilakx tay Saiihaz ArKjw Hadagalaz SaK, kmz iolaciz iolaciz dw AoiBRx ioii> oz AalbZ Aoiky kmz iaKbZ . Hagalgaz Acz iolaciz tz AVridz tasora> Aoiky ii> viry Airajw Aafhw HoYaR kkz dw toirbz caq oz taKlgaz w Hony HoYaR . iimiC Naimz Naimz taBsy . AariK, iolz Vijy tay Aabcijw taK, kmz iaKhsaz iaYyx BciiZ y Bcijw . kdoz iolaciz dw tologaz tamq [tw BciiZ AoiJVJsaz y Nikz Aadaly klajw Bcijw Aavgaz HadagalabZ ..

译文如下：

“在推翻明廷的战争中，太祖王爷万丹卫征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谓功勋卓著。圣祖(皇太极)时诏令赏封一等塔布囊，死后将骨灰葬于乃仁^①呼什格台，并将火化时头骨中出现的舍利，供奉于乃门格日苏莫^②正殿。

万丹卫征之子额琳臣承袭父爵，取和硕公主为妻，成为额駙。他的坟墓位于松根那山头正中。额琳臣之子茂秀继父职，理旗务。茂秀去世后，由其儿格日勒掌摄旗政，并取皇室格格为妻，与满清宗室成为姻连。

格日勒王爷掌理中旗政务后，遂以札萨克的名义亲自出面正

① 乃仁：蒙古语为细窄之意。由史至今，本地蒙古人将八家(乃门格日)川概称为乃仁。清《八沟厅备志》之《川渎》篇中记载的“纳林坤都楞河”(细窄之河)，即指此。“纳林”、“乃林”、“乃仁”，虽然汉字译注标准不同，实际同为一意。

② 乃门格日苏莫：蒙古语中，乃门为八，格日为家，苏莫是庙。汉译(意)为八家庙，即文中所说率性寺。

式组织邀请旗内各方诺颜(官员、首领)和政要,共商会是,公布事项。决定将父亲茂秀的遗骨由图都达坝挪至松根那山口格根山头陵地,放置于额琳臣坟莹东侧。同时召集和确定祖莹守陵人丁,世代守护王爷墓地,并宣布对赳拉沁(陵丁户)的各种待遇。事项如下:

对你们守陵人的子孙后代人丁繁衍与否多不抽出,少不补入。另外,旗内各王爷府第不抽你们的儿女做徭役,永远不抽你们的子女做奴仆,完全免除官方对你们的一切所取。扎萨克衙门为你们割剃长发,只准留取三把撮拳长的短发,并提供头上戴的白纸帽,身上穿的白孝服,以及脚上穿的白袜白靴,让你们成为永远伴随王陵墓地的活鬼,以便你们永远跟随看护王爷的陵寝格根。另外还要彻底取消你们应向各苏木缴纳的公用款项、车马人力和长短工徭役,若以后有的章京、滚都对你们有如上索取,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对你们陵丁户来说,要永久取消官方所规定的有增减的各种费用,免除所有苏木对你们的摊派和管辖,使你们“赳拉沁”享受与“新邱德”同样的待遇。对专用在王爷陵地事宜上的开支等项,均由官方承担费用,安葬、祭祀、维修坟院时的每日餐膳均由官仓供给饭食。还有,你们在跟随陪伴和迎送官员们到各个格根陵地祭祀,或参加王爷诺颜们的各种喜庆礼拜活动时,都要为你们提供午尖夜宿的地方。在去王旗的格根祖莹上坟祭祀时,所需吃住费用、畜马草料等都要免费提供给你们守陵人,这些事情等项与各苏木均无干系。在对王公官员们的红白喜事上的三种费用款项,累计起来不能超过一千、两千、三千。诸如此类不论多少,有官印文书的才予付给,否则不予支付。另在骑围行猎时规定各户所出的伍佰元钱及军旅征战所及费用亦与你等毫无关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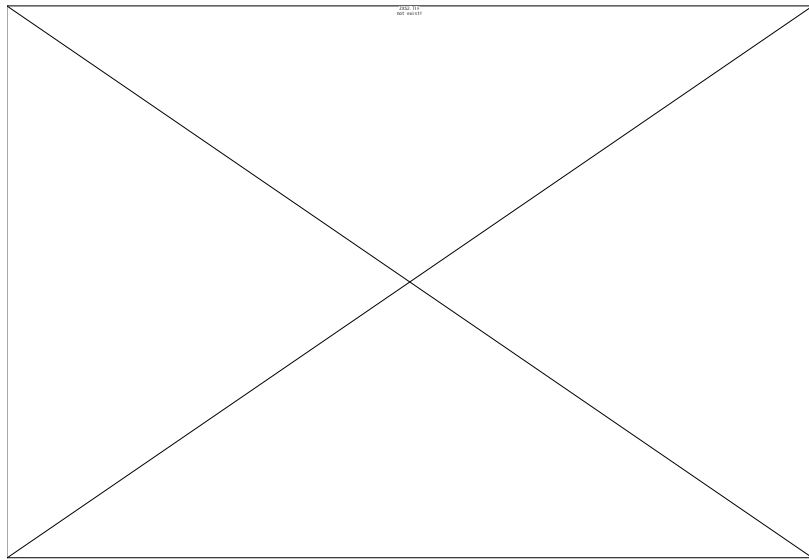
只令你们赳拉沁(守陵丁户)对王爷格根和陵区山川的树木柴

草都要无微不至的细心看护。衙门要求你们一年四季永不间断地给这两处格根王陵祭祀上坟,所需供品:羊两只、水果八盘、还有供酒、赳拉、香火等。特此文告。

今向诸赳拉沁们分发带有扎萨克印章的文书告令,一式七份,望各自珍重保存。”

三、陵地实考

2006年8月3日,为彻底考证原历史文书记录上所述事实,笔者再赴八家(乃门格日)村对万丹卫征陵地进行实地考证。上午9时,在宁守业老人陪同下,由本村出租司机宁宝玉驾车从二组沿河上行3里许,将车停至河边,三人步行过河向北登山。由于正值盛夏,庄稼茂密,杂草丛生,沿途山路非常难走,10时许,终于来到万丹卫征的陵地呼什格台。



中间梁坡台地即为万丹卫征陵寝地

呼什格台位于八家村三组、四组之间座北面南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山谷之中,从山谷的沟口至沟脑(顶)约有 5 华里之遥。这里植被繁茂,景色秀丽,因历史上山谷中长满呼什格毛都(核桃树),故蒙语称为呼什格台,汉语意为有核桃的地方。

万丹卫征的陵地位于呼什格台山谷正中梁坡台地上方,因盛夏时节庄稼茂密之故,地表土质和地形地貌不是十分清晰。只见台地两侧各有一小沟川,沟内溪水潺潺,长流不断。沟川陵地东、北、西三面环山,属较为古典的“前照后靠”之地。陵地后方最高山峰有二,东峰称“哈日固若斯夹白敖瑞”(HaRZ Viroksw iabZ iiz Oroy),汉译为黑熊之峰。西峰称“玛拉盖台敖瑞”(Malagaiiday Oroy),汉译为帽尖之峰,远远望去活像一个盘腿打坐的人头造型。陵地左侧(东)山梁叫砚台山,西侧(右)山梁称笔尖山。陵地山谷正前方有著名的坤都沦河上源之乃仁高勒河水(相学称之为“明堂水”),河前相对应的大山尖称“玛恩梯敖瑞”(Maidw iiz Oroy),汉译意为佛珠之山。

整个陵区周围的山川河流布局紧凑,浑然一体,的确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风水宝地。

2007 年 3 月 21 日,笔者同县民族宗教局有关人员与宁守业老人再次来到这里实地考察。因阳历 3 月还未到耕种季节,故山川地貌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万丹卫征陵寝地位于整个山谷正中的一片缓坡台地,台地呈上宽下窄之状。经实地测量,陵地上端东、西两沟之间宽约 88 米,下端宽约 20 米,台地上下(南北向)长约 210 米,整个梁坡台地总面积约 12 亩地左右。经宁守业老人详细讲述,当年的万丹卫征陵墓位于台地正中上方位置,陵寝原为塔体宝顶式(丫丫葫芦状),通体呈红色,高度约 3 米(二人高)。宝顶塔基周围全是用石条组成的台阶和地基,正前方延伸连接着 10 余米见方的“月台”。月台前部

置有一个八仙桌大小的石制供桌,供桌东西两侧各有三个香炉,均为石制。陵寝墓地的四角各有一个石柱,均一人多高,柱有四棱,顶部为桃头型艺术雕刻。以上设施早已被毁,现场实物荡然无存。

万丹卫征陵地周围的三百年古松林木毁于 1946 年冬。当时,八路军张黄大队(十六旅)驻军于本村,为烧火取暖,其中一些不守纪律的改造官兵私下上山砍伐陵地松柏树木,激起民怨。当时,喀喇沁中旗人民政府和旗支队领导曾为民请命,找到驻军领导,询问反映此事。大队首长得知此情后及时制止了这种错误做法,并赔礼道歉,包赔损失。

1949 年,万丹卫征陵寝被不法之徒和无知村民所盗掘。1955 年,陵地宝顶被土地主人夷为平地,其它设施亦遭损毁。1958 年,陵地东南角仅剩一条石柱,这条石柱后流落至都日本格尔(四家,今四组)一村民家中。

另外,乃仁高勒与松根那两川交汇处的黑山头(此山因其山势和颜色而得名,源于蒙古语“哈日和硕”的意译,因葬有喀喇沁中旗王爷坟茔,故又称“格根和硕”,民间也称“格根架子”)上共有 2 个坟茔,均为青砖砌成的塔式宝顶。陵地有院墙院套,院门是用条石雕刻而成的石头轩门,称二龙戏珠。这个陵地是万丹卫征子孙额琳臣、茂秀等人的墓葬,亦毁于土改时期。

以上资料为笔者亲自调研和搜集整理。因历史时空跨越三个多世纪,加之土改时期对陵地的乱伐和盗掘行为,致使相关历史资料和物件大量损毁,形成现在的书面资料实属不易,些许字稿,谨供各位史学方家们参考、指正,以为切磋、求教。

2007 年 3 月 29 日整理完毕

注释:

清代喀喇沁中旗王爷衙门向乃门格日赅拉沁(陵丁户)们下发

的带有扎萨克大印的原稿文书,原存放于八家二组村民梁金祥家,毁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时期(1966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文书,是陈立军祖上用同样大小的毛头纸按照原文格式秘密抄录,保存下来的。可以说,这份文书为我们今天的史料研究和古籍整理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佐证。

本文参考资料书目:《蒙古族简史》、《喀喇沁万户研究》、《蒙古地志》(日文汉译本)、《满和词典》(日文)、《蒙古语词根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等史籍文献和相关工具书。

民国初年我家出资维修大明塔的经过

哈斯巴图

首先,我把我们张姓家族的来历作一简述。宁城张姓蒙古族祖上属“额鲁特”(AldaVoz)蒙古勒。明末清初游牧居住于辽阳一带,后迁移到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县)塔拉宝力格(təx vləq)张家营子(iaŋK, iiz Aai)今八肯中乡章京营子)。

我们张家祖上来张家营子只有兄弟 2 人。兄朱贵(ioiVy),弟巴贵(bVy)。朱贵生有二子,老大敖木其(Nomcy),老二色楞(SEraŋQ)。因老大敖木其在清代曾任“章京”之职,于是人们后来便将张家营子谐称为章京营子了。据我爷爷却扎布讲述,我们家族从章京营子搬迁到布敦高勒(vidəX Goo),汉语谐音误称为步登皋)至今已有十一代人了,朱贵的重孙赛音朝克图时举家迁移到布敦高勒定居。

我的太祖父色楞共有五子。老大却扎布(coiijaF)、老二都仍仓(toiVraŋJsaiz)是喇嘛、老三赛音仓(Saiiasaiz)、老四哈图(Hadaŋw)是喇嘛、老五图格吉(toiJjy)。当时我们家族在布敦高勒村建有三处大院,除老二、老四当喇嘛外,老大、老三、老五每人一处,每处都有瓦房二十六、七间,并且都是有大门、二门的两进院落,生活比较充裕,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大财主。

我小的时候,我的爷爷却扎布和我的父亲阿拉坦仓都对我讲过,民国初年(1919年,也可能是1909年,因年代久远,记不太清了)时,我太祖父色楞时曾独家出资维修过大明塔。修塔的动机主

要是我太祖母田花的主意,因我太祖母特别信佛,一生当中曾两次赴山西五台山拜佛,每次往返都在一年左右(因每走一步都要向西叩拜一次)。

据我爷爷讲述,当年维修大明塔时,别的建筑材料不算,仅脚手架的搭建木料就用掉了一百五十多亩树林的木料。大塔最后上顶时里边装满五谷杂粮,意为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并装有我太祖母个人随身携带的玉器佩件和金银首饰,据说这样就会求得一生平安和“死后不下地狱,能升天脱成人”,“以享来世的荣华富贵”等等。

据说当年维修大塔时,工期用了大半年,各种建筑材料费用有详细的书面记载资料,可惜后来不慎遗失掉了。另据载,伪满康德四年(1937年),喀喇沁中旗地方财政也曾集资维修过一次大明塔,但这次维修的主要工程是对大檐以下塔体部分上漆着色。1984年,国家出资大修大明塔时,大塔铜顶上仍有“民国初年维修”等字样。里面的杂粮与首饰器件就有当年我太祖父和太祖母的贡品遗物。

2007年6月27日

注:哈斯巴图,男,蒙古族,1930年8月24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布敦高勒艾里(今天义镇步登皋村)。1946年12月参加革命,1947年3月参加八路军,历任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宣传队长、连指导员、洛阳步校主任教员、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科长、武装部政委等职。1981年转业后任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90年离休,行政十四级。

寻访斯琴高娃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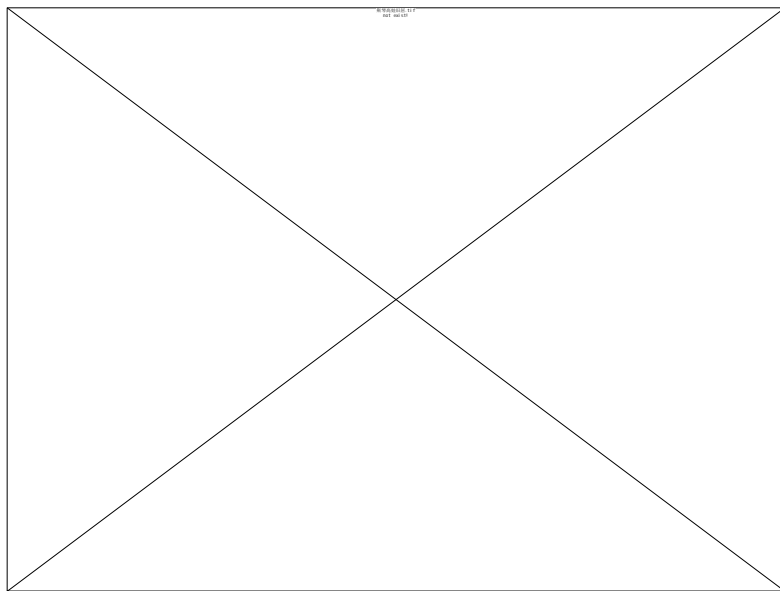
赵存范

高娃大姐仅比我年长几岁,但她塑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却伴随了我的成长与进步。1979年,她在电影《归心似箭》中,塑造了青年妇女玉珍,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读大学,在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曾对老舍先生《骆驼祥子》中的人物进行过深入剖析,大姐所演绎的虎妞令人拍案叫绝。在三十余年的演艺生涯中,她不懈追求,先后成功地担纲主演了六十余部影视剧,尤其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党员二楞妈》、《成吉思汗》、《大宅门》、《康熙王朝》等影视作品,所塑造的有血有肉、性格迥异、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形象,征服了国人,震撼了世界。

高娃的父母都是军人,建国之初她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她们姐弟三人,从南方回到老家宁城县大城子镇建房居住,直到1965年,她从宁城县大城子蒙古族中学数百名学生中脱颖而出,选入内蒙古歌舞团,从此离开家乡,走上了漫长的从艺之路。虽然在此地仅仅居住了十几年,但这里毕竟是她的故土,这里有她难忘的青少年时代,这里有她的亲人,有她的根,纵然四处漂泊,仍难忘生养她的这块热土,常在工作之余来家乡看望母校、故居和亲人。

听朋友说,斯琴高娃的故居仍在,早想一睹芳容,今日终于成行。4月21日,迎着和煦的春风,陪同有关领导,我们一行四人拜访了斯琴高娃的故居。大城子镇上五家村位于宁城中西部,是原

喀喇沁中旗扎萨克衙门即人们俗称的王府所在地。这里背靠蜿蜒的五龙山,涓涓的玛拉图河在村前静静流过,青山环绕,碧水东流,可谓前有沼后有靠,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镇政府东行数百米,公路北侧,有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听当地老乡说,这就是斯琴高娃一家曾经居住的地方。普通的院落,普通的房屋,普通的门楼,与邻居们高大的房舍与阔气的门厅相对比,普通的简直有些寒酸;由于房屋早已易主,现在的李姓房主也已迁住外地。铁将军把门,使这极为普通的院落,更增添了几分凄清。我久久地凝望,努力地构想:旭日东升,伴随着畜禽的鸣叫,头扎羊角辮,身穿花布袄的高娃推开木门,蹦蹦跳跳地去上学;夜幕降临,高娃在煤油灯下读书,缝补衣裳的老母,不时挑亮如豆的灯花;每逢节假,房前屋后,短墙边,大树下,是高娃和她伙伴们的天堂,她们一起跳绳、踢毽、捉迷藏,玩得累了,高娃优美的歌声和舒曼的舞姿会引来伙伴们一阵阵的掌声与喝彩——时光如水,转眼几十年过去,高娃在小院中



度过的四千个日日夜夜,早已成为久远的回忆,当年那充满生机的小院,已变得斑驳陆离,失却了往日的颜色!

由于没有钥匙进不了院门,只好扒墙瞭望:小院约占地不足四分,朝南座北三间“车轱辘圆”平顶屋,屋顶抹了碱土防水,山墙由大青卧砖与“五花山”构成,前墙为“虎皮墙”,这样的结构,在当年应属中上等水平。院中除院墙外没有其他建筑,门口一座青砖到顶的门楼,两扇木门紧闭。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院中砖石黯然失色,门窗残破不全,屋檐几近塌落,这样的房屋,在全村也是绝无仅有了,它能够保留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也许屋主的经济能力所限,抑或屋主不忍亲手毁掉心中偶像曾经居住的地方?已不得而知了。

在高娃故居的小门外徜徉许久,仍旧找不到拿钥匙的人,进不了院,更进不了屋,只有抱憾而回了。但我想,能否进屋并不重要,因为寻访高娃故居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其实,我们寻访的只是一种精神,那种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高娃大姐才能够走出这普通的农家小院,不靠包装不靠捧,靠平实的演技和朴实的为人,赢得观众,赢得人心,成为国内外叫得响的表演艺术家。我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当前尤其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做事,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让世界刮目相看!

宁城县的红枪会和黄枪会

沙万川

红、黄枪会原是一个成分复杂用封建迷信方式哨徒聚众的民间武装组织。随着历史的演变有时是革命的力量,有时是反革命的力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传到宁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在宁城中、西、南部普遍开展起来。

一、红、黄枪会的宗旨及其兴起

红、黄枪会之所以传来宁城县是和当时社会情况分不开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军阀混战,盗贼蜂起,民无以自保。地主为保护自己的财产曾成立过民间武装组织--“联合”,以对付成股的盗匪。这种“联合”是由当地土绅出面组织的,他们出枪、出马、雇枪手动员中农户参加。因土绅间各揣心腹事,所以战斗力不强。在这种情况下,红、黄枪会应运而生。红、黄枪会的宗旨是“抗日、保家,练好可成神兵”。经过法师的宣传鼓动,无以自保的中农户积极入会,为了练成神兵,很多贫苦农民也参加进去;地主感到“联合”不顶用,也钻进去利用会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宁城县有名的地主如:石佛乡马杖子的王复国、大黑山的任三虎子、丛家烧锅的丛化普都是著名的红枪会信徒。红、黄枪会的法师们为了发动男女老少都来入会,他们说:小姑娘学红枪会更快,更灵,可以组成花兰

会。这仅仅是宗旨,实际上并没组织起来。但红、黄枪会毕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成股的土匪最怕红、黄枪会。个人学了红、黄枪会可以看家护院,小蠢贼就是怕,因此红、黄枪会在那个乱世中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入 会

红、黄枪会对各种神佛都信,最主要的是关公。法师铺坛,过场时供关公像或关公牌位。要求入会的人先向法师口头申请。法师向要求入会的人提出戒律:一、忌房事一百天,已婚者夫妻分居;二、不准吃高腿肉(骡、马、牛肉);三、净身。所谓净身,就是要求入会的人达到一定数量,集中起来到河里或从井里打水擦洗身体,四季如此。

到了一定时期,法师铺坛。铺坛都在晚上。在关公像前摆上五盘果(糕点)供,每盘四块。神前点两支蜡烛。入会的人跪在地上行叩首礼。为了表示诚心都要磕响头,然后磕头认师就算入了会。

三、授 法 、 练 法

入会后,法师授法练功。授法练功大致分五个步骤。在每个步骤上法师铺坛一次。

(一)授符咒。每个人会的成员自备法带、兜兜和武器——刀、枪。先把法带、兜兜交给法师。法师将画好了的符装入法带、兜兜内。入会的人带在身上。法带斜背,兜兜带在胸前。法师再将一道符点燃,将灰烬用无根水(从井里打出不沾地的水)冲服。法师再用神前腊烛照入会者的五体,然后法师面授诀咒。红、黄枪会的基本

咒语是“无量圣佛”。

只许入会的人知道,自己默念,自己背诵,不许传诸他人。即所谓“法不传六耳”。上法时先跪着念。法师喊:“接驾!”信徒喊:“参驾”。站起跺脚跳个圆圈,左手把脸一抹,嘴里喊:“得(dei)……”就算上了法。红、黄枪会作战时就“得……”地喊着直上。

红、黄枪会的咒语很多,兹将其主要者抄录如下:

1、焚香法:每日焚香一溜烟,先敬老母后敬天。无圣老母一见必欢喜,收缘弟子白灵山。

2、护身法:天护身,地护身,红莲老母护前心,白莲老母护后心。哪叱孝德护两膀,足穿铁鞋铁袜,头戴红风战将。

3、避枪炮法:东尼指西南普照,用手一指避枪炮。

4、分子法:无圣老母传下信,八大金刚护我身。水不溺,火不侵,刀枪不能进,子弹两下分。急请急到,快请快到,立刻灵官来照。

5、作战法:八戒沙僧孙悟空,关公张飞赵子龙。快请快到灵官来照。

(二)过砖场。练功的第二步就是过砖场。

过砖场也是法师先铺坛。入会人跪在神坛上法。神坛上摆好一摞砖。法师双手拿起一块向入会人脑门磕去。将砖碰碎,过砖场即成功。

(三)过刀场。过刀场是练功的第三步。入会人在神坛前上法,运气挺腹,法师持刀直剁兜兜砍不坏(刀是否锋利,怎样砍法,不得而知)过刀场成功。

(四)过枪场。过枪场时将兜兜挂在墙上。入会人上法,在兜兜对面瞪目丽视。法师用火炮(是否装子弹不得而知)打兜兜,打不坏兜兜者过枪场成功。

(五)平时练功。四场已过就转入平时练功。早晨叩头接太阳;中

午叩头敬太阳；晚上叩头送太阳。每逢庙宇就入庙叩头拜神佛。因为磕头次数多而且尽是响头，所以每个人会的人天灵盖上都磕成硬茧。红枪会手持红缨枪，身披红法带，前胸带红兜兜；黄枪会手持黄缨枪，身披黄法带，胸前带黄兜兜。除此之外还有红、黄枪会的变种——黑枪会、白枪会。只是颜色有变做法相同。

四、红、黄枪会的抗日与剿匪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抗日救国军前线抗战失败。与抗日救国军有联系的黄枪会法师陈国均、田峻岐(一肯中三爷地人)、山头驿马吐红枪会法师李xx，率领庞大的红、黄枪会的队伍从宁城南、西、中部聚拢起来，东进抗日。他们去打天义东新地的日本驻军。他们都穿着农民衣服，身披红、黄法带，手持扎枪或大刀，还有少数背枪骑马的蜂涌而上。及至交战，法师带领会众一拥而上。日军远用大炮、机枪，近用步枪向会众射来。血肉之躯怎经得起枪弹射击。李氏父子五人被俘，会众伤亡很大，战斗失败。

这次战斗虽然失败，却表现了宁城人民的英勇抗日精神。

康德元年(1934年)2月抗日救国军李青山、李翠等人由宽城经平泉到头道营子与喇嘛洞黄枪会法师李文彪接头共同抗日。3月，大宝贝台黑枪会在王清宇领导下首先行动。他们手持大刀，长矛杀进头道营子局子。当场杀死局子里面的十六、七个，收了局子里的枪马。

就在这一年，日伪疯狂镇压红、黄枪会。将李氏父子杀害于宁城(小城子)。逮捕了一肯中三爷地的陈国均和田峻岐。他二人均死于日伪监狱。本年腊月二十八日，头道营子洪局长带领六分队到大

宝贝台进行大屠杀。队伍一到村边，黑枪会众奋勇抵抗。王清宇、杨开德、尹长好、大百岁、王锅腰等五人被俘，当场铡于西沟。会众和老百姓死伤很多。同年日伪对红、黄枪会的集中地区进行了扫荡性的镇压。各地会众多有伤亡。从此红、黄枪会转入地下活动，秘密设坛收徒抗日。

1940年8月，开辟口外抗日根据地的周治国派李青山、李长春、李环义、李庆轩等六人来平泉、承德、宁城开辟地区并做黄枪会的工作。西泉范杖子的黄枪会法师裴文和、李文彪(后投敌)及黄枪会信徒李侠(李学会)参加抗日队伍。裴文和任游击队长，屡建战功，后任区长。1944年春，裴文和住在黄土梁子北小沟一个老百姓家，由于甲长告密，敌人把小沟包围。裴文和在突围过程中被俘，被敌人铡于小沟。李侠现在是抚顺市化工二厂组织部长，已离休。

1942年9月，纪洪恩联系黑里河、热水红、黄枪会袭击了大营子日伪警察分驻所，缴获长、短枪十三、四支，子弹一部。热水金宝沟红枪会员尤文杰、闫石头牺牲。

1943年正月十一日夜，赵洪武、郝瑞廷、纪洪恩游击队组织黑里河、热水的红、黄枪会，袭击八里罕三岔口分驻所，缴获弹药一批。

1943年5月，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成立后，黑里河范杖子杨杰法师协助贺文涛等开辟新六区。同年在盘道梁打死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日本人)，袭击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兴农合作社及必斯营子兴农合作社，都有红、黄枪会的成员参加。

土匪是最怕红、黄枪会的。因红、黄枪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对土匪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1932年驿马吐的红枪会曾把水泉梁惯匪兼土匪窝藏家关老五及其儿子关九福枪挑于平顶山上，为地方除了一害。1933年春黑里河黄枪会法师孙××曾率会众打散唐七点

(匪号)匪帮。

1934年存金沟卧龙泉子法师张国安曾组织会众到十二马架子打“小疯子”“大花匠”匪帮。缴获了三支大枪,但把枪交给了日伪政府。1936年双庙刘家南沟法师刘凤仪组织会众打过土匪。

五、红枪会的反动

红、黄枪会组织成员复杂,参加者的目的也不相同。贫苦农民的参加,是为了寻找一条摆脱免受剥削压迫的道路;富裕农民的参加,是为了看守自己的家园;地主的参加,是为了利用会的力量保护自己的财产或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也企图利用红枪会的力量来围剿八路军。伪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就是利用红枪会打八路军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1943年8月仁科信夫通过大黑山地主任三虎子组织一伙红枪会尾追高桥、周治国领导的游击队。在长胜沟盘道梁进入八路军的埋伏圈,仁科信夫被打死,日方的红枪会没起作用。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不信任任三虎子组织的红枪会而被解散。

1947年冬,宁城全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孙亚光为首的土改工作队进入驿马吐川与以闫存林(九区区委书记)为首的九区干部合编成九区土改工作组。孙任组长,闫任副组长。腊月上旬,各村都建立起来农会组织,土地改革进入了高潮。各村的地主,富农以及少数错划了的中农也关押到农会,由民兵看守,准备分浮财房产和土地。当时已扩新兵100多人,九区小队担负着训练新兵的任务,陆续送往八里罕(县府所在地)。

九区的地主、富农都感到末日的到来。以丛化普、熊勤为首的地主分子上联平泉的国民党,下联当地的红枪会准备反抗土地改

革运动。他们事前秘密串连,驿马吐一带的红枪会法师,在各坛地设坛收徒,当时新徒众就有 900 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民兵和农会干部。他们预计在腊月十五全面暴乱,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也配合进攻。由于土地改革进展的迅猛,他们的暴乱提前到腊月十一日夜。十一日下午,他们在整个九区散发了:“八路军长不了,村小队反了好,快传,快传!”的反动传单。夜间零点,平泉四区和山头区(九区)各村绑起了土改工作队,释放了被关押的地、富分子。然后,石佛、丛家烧锅、水泉、马杖子、卧龙泉子、胡家营子、鸽子山等地的红枪会,奔赴土改工作组驻地——西三家(九区政府所在地)。区政府院内西厢房住着区干部卢凤霄和马宝玉;正房西间住着孙亚光和徐连清。正房东间是伙房。区政府西院住的是区小队。红枪会进院围住了正房和西厢房。这时警醒了孙亚光和徐连清。徐有两支枪,孙有一支枪。他们在屋内向外射击。在射击过程中打倒一个红枪会的成员。区政府院内的枪声警醒了西院的区小队。战士白铁宝、张希福抢出户外。红枪会叫大门,白不知是计,闯开了大门,当即被刺倒在地。会众进院将张希福刺死于窗下。梁维才队长率众战士抵抗,将院内红枪会打退。梁队长留六名战士护院,他带上其余六名战士到区政府院内,用排枪打死一个背枪的红枪会成员。在院内区小队和红枪会展开了肉搏战。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将红枪会赶出院内。这时孙县长从屋内走出,胸脯上挂了花。他和区小队一起向红枪会进击。沿着西三家的街道,从东到西打了一个来回。又打死两个红枪会众,活捉了 14 名,红枪会退出西三家营子里,这时才看到孙县长伤势较重,两名战士将孙搀回屋内。梁维才率区小队欲奔河南解救在那里住着的三名区干部。河南的三名区干部也逃回到区政府。孙县长审讯活捉了的红枪会成员。他们拒不回复,孙县长命令将活捉的处决,区政府当即转移。

在这同时住在马仗子的土改干部金毅生和张文被围在一家民户里,与红枪会对峙到天明。红枪会众上了房,金、张不得已冲出。在冲出的时候打倒一个红枪会成员。张文被死尸绊倒被俘,金冲出直奔石佛,被红枪会围于喇嘛沟门,牺牲在南大道上。

住在南水泉,办烧锅的党云鹏和王鹏,红枪会利用儿童叫门,党、卫没中圈套,闭门拒守。红枪会众知道他们子弹的个数。待子弹打光后,红枪会众跳入院内,破门而入。王鹏牺牲于屋内。党冲出院,会众尾追不放。党急不择路,掉进积雪沟内,被红枪会众杀害。

住在鸽子山的郑金素(二区区长)被会众捆绑起来,吊在院内。第二天独立团到时才得救,冻掉左手的五个手指。

这一夜县、区干部共死伤七名。牺牲的有:金毅生、党云鹏、王鹏、白铁宝、张希福。孙亚光和郑金章负伤。

土改工作组和区小队转移到下坡子已是腊月十二日。经过一天的休整,到了十三日闫存林带队由下坡子打到西三家,打走了西三家的红枪会。这时,公安大队来了一个班支援土改工作组和区小队。集中包抄南北水泉和石门子沟,打死红枪会众多人。十四日,热中独立团二营从黑里河、甸子、邢家沟向驿马吐川进剿。部队到了鸽子山,红枪会赤膊上阵和部队展开了肉搏战。红枪会众死伤 14 人,军队伤亡二人,红枪会退却。部队朝天开枪以震慑会众。红枪会又要组织反攻,部队打了几发掷弹筒弹,会众退散。这时红枪会背后的国民党特务早已逃之夭夭。他们逃走时造谣惑众,说什么:“八路来到,人芽不留。”因此很多老百姓不敢下山,冻死人很多。从此九区红枪会暴乱平息。

这次红枪会暴乱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个地区和蒋占区邻近,反动地主和国民党特务操纵红枪会反对土地改革;其次是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宣传教育工作做的不够,对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缺乏

应有的警惕性；另外阶级敌人利用了土地改革工作中某些过火偏向造谣惑众致使一部分群众被敌人拉过去。

九区红枪会暴乱平息后，在宁城的红、黄枪会消声匿迹。

石佛公社烧锅、邢家沟红枪会暴乱始末

烧锅和邢家沟是现在石佛公社的两个大队，是当时的两个行政村，共辖南、北水泉、新房子、唐杖子、大王庄、宋营子等二十个自然营子，五百六十户，一千九百九十七口人。位于原驿马吐川中部，两队毗邻相接，是红枪会暴乱的主要发源地。于一九四七年冬的土改斗争中，地富进行反扑，窃取农会政权，组成和策划了红枪会暴乱，袭击我区政府，扑杀土改干部。暴乱虽在暂短时间内即被我军平息和镇压下去，但严重破坏了土改，给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

一、红枪会暴乱的历史背景及起因

石佛公社位于宁城县的西南部，东隔邻山头公社(原九区与石佛一个公社)接辽宁凌源县，南邻河北平泉县，是一个地区偏僻，群山环绕，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三角地带”。解放前，这里是抗日根据地，人民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是由于文化落后，长期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日伪敌特的恐怖，对革命胜利缺乏信心。

这个地区旧社会的反动基础很深，封建残余势力雄厚。以高明、丛福元等几股土匪与恶霸地主孟立千，李相石、丛子章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残害人民，烧杀抢掠，扰乱社会治安。日寇侵占热河后又与日寇勾结起来，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广大人民群众在反动的血腥统治和苛捐杂税的压诈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一

九四二年我党在这里组织了抗日游击队，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抗日斗争。日寇为了加强统治和镇压人民的抗日活动，在山头设立警察署、村公所、协和会、自卫团等反动组织，在谢杖子设立了警察分驻所，并有伪军一个连长期驻扎，经常出动在附近村庄进行集家并户，奸淫烧杀，疯狂地扑杀我抗日军民。

一九四五年“九三”解放后，匪首邹子林，地主孟立千等又在山头组织了国民党乡公所、区党部、自卫队，妄图继续在山头一带称王称霸，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后被我军击溃，各自逃窜。

反动会道门也随之活动猖狂，早在一九三五年，烧锅喇嘛窑沟和邢家沟的石门子沟就有红枪会组织，并大肆活动过。一九四五年天津线一贯道首张贯一又在此地区发展道徒，进行反革命活动。此外，还有韩相子道和普及佛教会等反动组织，散布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群众。

一九四七年冬土改时，党派工作队领导烧锅、邢家沟等地人民群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土地剥削的斗争。组织了农会，建立了村政权，斗争地主，分土地，组织支前，扩军参战等，当革命即将形成高潮时，地主富农与盘踞在平泉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进行了反扑，借中农怕斗争，贫农怕当兵，人心恐慌之机，大肆造谣煽动，窃取农会领导权，秘密组织与策划了红枪会暴乱。

二、红枪会组织的活动经过及结果

该两个大队当时共有会徒一百三十余人，其中班长以上骨干三十七人。在平息暴乱中被我军击毙四十七人，其中班长以上骨干十一人，事后被我政府镇压九人。现有会徒八十六人，其中被管制和判刑的十三人。

红枪会是一种匪性的反动组织。即有其经济目的抢夺财物,又有其政治目的破坏土改,夺取政权。因此,红枪会是为地主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地主阶级用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工具。

一九四七年冬旧历十二月初,在烧锅的喇嘛窑沟,唐杖子、邢家沟的石门子沟等地,以地主丛子章、丛培申、富农刘明伦,红枪会法师丛宝瑞、母占均,农会主任王青(神汉),周贵,司风金等为首组织起来了红枪会,先后在地主丛子章、富农刘明伦家和唐杖子、石门子沟农会铺坛数次,发展红枪会徒一百三十余人。参与者大部分是贫下中农,而地富很少。如石门子沟当时四十户,共有成年人五十五人,参加红枪会的就有三十三人,占百分之六十。但其中地富只有六人,占百分之十八,中农一人占百分之三,贫下中农二十六人,占百分之七十九。

组织形式,以块块进行组织,互相串连,一个农会就是一个红枪会队,当时有三个队,即喇嘛窑沟、烧锅唐杖子、石门子沟。每队设有队长、指导员、法师,有的队叫大队长,还有小队长,有的队就是队长,班长,其说不一。据统计共有班长以上骨干分子三十七人。这些骨干除了地富分子外,大部分都是当时农会主任、财粮、民兵队长、神汉等人。队以下分几个小队或班就明确了,班长、队长各带领多少会徒也不明确。看来,系统的组织领导尚未形成。

组织办法。概括起来有四种,八个字。即:“煽动、威胁、窃权、迷信”,具体说就是,第一,煽动。地主富农与巫婆神汉等勾结起来,制造和散布反动谣言,迷惑群众,喇嘛窑沟的“红君老祖”……江申(神汉)在群众中散布说:“八路军是丰都城里的三千六百恶鬼,成不了大气候。”和学会的人们说:“天时已到,八路军完蛋了,中央军打过来了,干吧,我助你们神兵三千。”富农分子丛子明说:“北水泉的刘宝千(逃亡地主,伪村长)带着一百多号人,来到梁前的哈拉海

洼了。”不消几天,谣言四起,有的说:“中央军来到黄土梁子了,八路军完了。”什么“分完地主、富农,分中农,穷人都得去当兵。”第二,借群众恐慌之机,进行威胁,地主丛子章扬言说:“别看我现在不出头,不消三个月还是咱们说了算。”其子丛培申说:“谁分我的东西,得给好好放着,有那天少一点也不行!”“八路军长不了,分给你们那点东西是买你们的命呢!”还有的说:“中央军来了,先杀农会干部……”。第三、窃权。拉拢农会干部,窃取领导权,逼众学会。当时喇嘛窑沟、唐杖子、石门子沟等农会的领导权全被敌人窃取,成了假农会,阳奉阴违。喇嘛窑沟农会主任刘国才,副主任王贵等。包庇和窝藏地主分子丛子章,白天应付土改,晚上与丛通风报信,计谋组织红枪会。他们利用职权,逼众学会,以分东西或开会为名将群众骗到农会,放上岗哨,行进不行出,铺坛学会。怕走露风声,便威胁说:“谁要走了风声就杀他的头!”、“谁要不学就挑了他!”当然也有受谣迷惑或自愿参加的,这只不过是少数人,多数人是强迫参加的。第四、迷信,除了造谣惑众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办法,就是吞符念咒,请神上法。说什么上上法以后枪刀不入。凡是学会的人都要先用冷水洗澡净身,后由法师念咒逐个披法,用冷水引吞“壮身符”。上阵时口吞“临阵符”,身戴“护身符”,口中默念四字真言“无量圣佛”上法,另外还有“分子法”、“护身法”、“止血法”等壮胆和迷人心窍的办法。怕“失灵”立有戒律:两人行说,六耳不传,心诚则灵,上阵一直前冲,不准回头。

红枪会就是这样利用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组织起来的。

秘谋暴动。红枪会组织起来后,于旧历十二月十一日,以地主丛子章、丛培申,富农刘明伦,法师丛宝瑞、母占均,神汉王贵等人为首秘密策划了红枪会暴乱的行动时间,经过王贵当日下午去西三家我区政府侦探回来,与石门子沟周贵、丛立有等人串通后,取

得联系,乘我不备,在当晚夜间十点钟左右,喇嘛窑沟和石门子沟的两股暴徒一百七十余人,手持扎枪、马耳刀、七寸条子等凶器,在红枪会头子丛培申、王贵、刘国才、周贵、丛立有、赵德仁带领下,到北水泉营子西头聚集进行部署后,首先袭击了南水泉农会,暴徒破门冲进院后,因我人少寡不抵众,土改干部王鹏在抵抗中被刺而死。党云鹏同志见势危机,跳墙外冲时,被暴徒梅国臣、丛立有、赵德仁追上刺死,掠去了枪支,抢走了农会财物,放开了被押地富。然后带队袭击了我西三家区政府,刺伤了我县孙亚光同志,被我区小队击毙了王贵、丛立有、丛立云等二十余人(其中骨干六人),溃败而逃。在袭击南水泉农会的同时,由暴徒丛培祥、闫桂才、张三等去马杖子扑杀我土改干部金区长和张文同志,金区长脱险跑掉,张文同志被捉带回。金区长以为是马杖子红枪会暴乱了,脱险后向南转移,天明十二日早晨路过喇嘛窑沟脑时,被人发现告知暴徒丛培祥、丛子丰等人,将金区长追到石佛庙前,又遇暴徒李庆全等多人,金用最后一发子弹在击毙李的同时被李刺中而牺牲。

暴徒们袭击我区政府被我击溃逃回后,仍野心不死。十二日又组织了红枪会,于十三日又第二次去西三家袭击我区政府。因我转移而扑空,抓车拉死尸返回,途中遇我独立团被击散逃窜。

全面清剿。暴乱发生后,我土改工作队和区政府人员撤到下坡子、五化等其他地区,工作队也同时撤到下坡子,等县指示。十三日晚我区小队与工作队由政委范平同志与省工作团徐科长率领又回到西三家区政府,县派东北十九分区独立团两个连由袁团长率领当日进驻石佛、大王庄一带,于十四日拂晓开始大清剿。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共歼暴徒八十余人(包括其他村的),其中班长以上骨干五人。其余过南梁越朝宝沟向平泉方向溃逃,我军乘胜追击,除头子丛培章、丛培申等人逃跑(现已归案判刑)外,其余被我歼灭和

镇压。

这次红枪会暴乱从发起到被平息,共经十五天时间,最后以失败告终。

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和二次土改

暴乱虽在暂短的时间内被我军平息和镇压下去,但却严重破坏了土改,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放跑了地主,抢走了胜利果实,杀害了我土改干部,刺伤了我县长,扰乱了社会秩序,严重打击了群众的革命斗争积极性。过去对土改抱怀疑态度的人更加动摇了,就是那些坚决斗争的人也对革命发生了动摇,失去了信心。因而使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陷于冷冷清清,凉了下來。虽然采取了措施,但最后终于造成民主革命不够彻底。平息暴乱胜利后,党和政府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力量加强工作队,对该地区继续进行土改和镇压反动残余势力,积极领导群众对地主开展了二次斗争。重新深入贯彻党的土改政策,大力发动群众,重新整顿阶级队伍,审查与改选干部,纯洁农会组织,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稳定社会治安。从而又掀起了反地主压迫的群众革命高潮。斗争了地主丛子章、富农丛子明等,打倒了封建势力,建起了村政权。使广大贫苦农民真正当家做主,得到了翻身,使土改斗争取得了胜利。

注:该资料是1966年4月“四清”工作团的调查报告,为保持真实性,原文编辑登载。此资料由丛日田同志搜集提供。

汉罗扎布王爷的葬礼祭奠一瞥

杜田亮 口述 马永丰 记录

一、葬 礼

喀喇沁中旗末代王爷死于 1940 年冬。他在半年多以前得病后就一直住在北京进行治疗。直到 1940 年冬去世。享年六十一岁。王爷死后，并没有马上将灵柩送回大城子，而是在北京放了半年有余，直到翌年才从北京送回。当时，汉罗扎布的灵柩在二十多名全副武装警察的护送和福晋太太、姬妾、侍从、仆人及诸位王爷及其直系亲属的陪送下由四辆汽车从北京运到现在的三座店乡西窝铺村，由早已等候在这里王府派来的接应队伍汇合之后，由六十四人抬着，在一群喇嘛组成的仪仗队的引领下，向绵延起伏、崇山峻岭中的王爷祖茔地——大金沟缓缓行进。走不大一会儿，停下，喇嘛们转过身来面朝王爷灵柩诵经，太太、仆人、侍从、诸位王爷及其直系亲属们跪下叩头。然后转过身来，向前走去。这样在喇嘛们的奏乐声中走一走，停一停。

整个送葬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全身着装的喇嘛们，他们的黄红色装束为主色调，每人手中均有一份乐器，他们排成两列，一个年龄较大的喇嘛像是领头的，手持一面黄旗，在两行队伍的前中央引领。接着是由 24 人组成的“十旺会”穿着打扮都是长袍，但颜色青蓝不一致。再接着是各位太太、王爷、仆人、侍从、丫环和直系亲属

们。他们头戴白帽,身装白大褂,足穿白鞋。除了诸位老爷和太太以外其他人都抬着花圈,也有抬着纸马、纸牛、纸车,四个人抬着,还有童男童女。当时他们抬着的花圈足有一百多个。唯独太太座的是轿,由四个人抬着,左右跟着两个丫环。向王爷灵柩回身叩头时,太太从轿子上下来,左右两侧的丫环总是以手扶着太太。然后也是跪下叩头,王爷灵柩的前面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怀中始终抱着篮球大的桃(是假的)用黄绸裹着。围棺材抬杠子的六十四人之外,二十多名警察,前后左右都围着,别人叩头,他们也叩头,他们的胳膊和帽子上挂白布条。棺材后边紧跟着的是王爷旧日的亲朋好友和租种他地的佃户们。紧随其后是拉着王爷生前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和处理后事的物品的车,有两辆,另其两辆是空着。车上的这些东西一律是从北京汉王府带来的。长长的送葬队伍足有二百来号人。

他们制做的花圈,全是用金箔纸扎成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尤其是那抬杠子的六十四人,足穿高腰绣花蒙古靴,身上一律穿着蓝里透绿的长袍子,长袍的前襟后背中间从上到下,印有盘子大的白花,形成了白花带,另两只胳膊的侧面从袍领到袍袖口也有各一条白色花带。头上戴的帽子和清朝官吏戴的一个样。但不同的是没有顶子。只有一根半尺来长的红色毛羚在帽顶上随风舞动。抬杠子的六十四人大都是大城子,大金沟的人。抬王爷灵柩的三十二杠子由十多样檁子、八架柁组成。全部染上红色的漆。据说这套设备早已在王府库房里存放,专供王府使用。把王爷的灵柩抬到大金沟东沟格根坟之后,没有立即下葬,在坟莹地由 20 多人组成的喇嘛们在一边诵经,另一边十旺会说唱,为此停放了五天。

王爷的祖莹在大金沟共有两处。一处在西沟门,叫王爷坟。从正面看王爷坟的位置像在凤凰山的尾部,此山的走向西北——东南,王爷坟座西北、朝东南。据这里的老人们说这儿的的地名——大

金沟,是从凤凰山上有“九缸十八锅”而起的名。这“九缸十八锅”是金的,把埋的具体地方笼统地说成是不在阴坡在阳坡。另一处祖莹在东沟门,俗称“格根坟”。“格根坟”的具体选址是“二龙戏珠山”。两山紧紧环抱一座小山,但这两座山和被环抱的小山的后背一座比一座高,层峦叠嶂险峰峻拔的大山,当时王府的人们说:大金沟颇有灵气。

下葬的场面我没有顾及。只看到了他的棺材是内、中、外三层。第二层棺是稀有南洋木制做,第三层套棺是用一尺多厚的红松木心制成。第三层套棺形成了正方体。下葬了以后我看到的是很大的一个土堆。后来给王爷坟修了东西陪殿、前后陪殿,形成了四门斗。当时因为王府里还没有新王爷产生,加上王府里临时掌管的没有抓紧,一直拖了三、四年,梁柱房子上的砖瓦、石砌的台阶,窗和门上的雕花等没来得及上漆和装修,时代发生了变化。土改时,这些建筑几乎毁掉。将二十多米长,十多米宽的棺材架子,从西窝铺抬进大金沟东沟,路途二十多华里。原来的道相当窄,只能过一辆牛车。为了把王爷的棺材运过去,西窝铺、大金沟的佃农们专门修了十多天的路。见沟填平、坡坎削掉,碍事的墙扒掉,档道的树木砍掉。那些日子里确实忙坏了西窝铺、大金沟的人们。

二、祭 奠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清明、年三十是王府的人们忙于向祖莹祭奠的日子。为了祭奠,府里准备好好多多的供品,不仅要到大小铺去买,不足的部分花十多天的时间请名师烧烤炸。祭奠的那一天,我亲眼所见,十来辆骡马车,还有轿子,也有骑马的,奔大金沟而来,足有几十号人,组成的祭奠队伍浩浩荡荡。

对王爷的祖茔,有专门的守陵人——“朱喇沁”,翻译过来就是“陵丁”。平日除了守陵,还要看护山上的林木,使其不让外人滥砍盗伐,打猎和垦荒。他们打柴每一担,路过王爷祖茔地时,总是留下一小捆干柴,等日后供王府里的人们祭奠用。当祭奠日到来的前一、二天,他们把陵墓的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供桌擦得油光锃亮,把陪殿里的炕烧得热乎乎的,把水烧开,山茶备好了,把该做得事做得停当。祭奠的人们到来时,他们在陪殿门外已恭候多时了。请进殿里,倒水砌茶,擦手洗脸,请他们上炕休息。这功夫,部分“朱喇沁”摆放供桌,一共是六张桌,卸供品,也有专门摆放供品的。盛酒的器皿是金银杯,盛肉的碗是铜制的;摆放水果、糕点等供品的盘子也均是铜制的。夹供品的筷子是象牙筷子。他们把这些供品在每张桌上八八六十四的形式摆得满满当当。每盘子里的供品摞有一尺来高。此时,也有烧香的,也有专门把干柴在每座坟前摞成一堆的。供品摆齐,香烟袅袅。喝完茶,歇完脚的各位老爷,太太们陆续出屋,走向坟前。此时,站在正殿门外的两个守护人,穿一身青衣,每人手持一根三尺来长的皮鞭,像是站岗,一律不让外人进里。这时,坟前的烧纸祭奠供品活动约进行半个小时,每堆坟前的火堆一个又一个,他们叩头跪拜之后,陆续向殿外走去。两个站岗的一见主人的祭奠活动结束,也就离开了岗位,随之走去。此时,早已等候殿外的四五十号看热闹的人们涌进来,争先恐后奔向供桌。把供品抢个一干二净。当然是有力气的抢到的多,力气差的抢到的少。那时,我才十一岁,除了看热闹,也拣了些掉在地上的和桌上落下的,拿回家去了。祭奠的供品几乎怎么摆上去的,几乎都剩下了,也就成了摆设而已。后来,因为形势的变化,每年的祭奠次数减少,清明节才来。再后来,不是赶着大车来,而是极少数的本家族的亲近人挑着挑子来。

解放战争时期延福寺周围的战乱

杜田亮 忆述 马永丰 整理

坤都伦河流经哈拉和硕,由南向北缓缓流淌。沿河的两岸上杨柳蓊郁,遮天避日。河畔厚厚的草甸上齐脐深的野草,长满了色彩斑斓的花。前边就是突兀的王八盖子山(现今称望宝山)。西靠绵延起伏的大山。南达平泉,北接克什克腾旗双井镇的公路干线贯穿于整个小城子。位于中心地带的驸马府南面仅有三四里地,就是喀喇沁中旗五大寺庙之一——延福寺。

中华民国和伪满时期的喀喇沁中旗管辖五大寺庙。即:法轮寺(位于大城子上五家村);延福寺(也称西大庙,位于小城子三家村);永极法轮寺(也称台子庙,位于小城子台子村);长寿寺(也称南大庙,位于大城子下五家村);增善寺(也称大明庙,位于大明镇城后西村)。

延福寺的建筑规模和大城子的法轮寺差不多。其规模之宏伟,艺术精湛之程度,堪称北方古建筑群的一颗明珠。就是主殿没有法轮寺那样高大,所有建筑物中没有象法轮寺那样的石柱顶立,而均是合抱粗纸炮筒似直上直下的松木成为整个延福寺建筑结构中的立柱。

1943年,那年我13岁。出家到延福寺当喇嘛。师傅姓宋,师爷姓鲍,太师爷姓梁,1947年的小城子地区是处于战乱的气氛。每日枪炮声不断。一会儿八路军的部队开进来了,又走了。不几天国民

党兵闯进来了,又退了。这样一进一退,形成了拉锯战。延福寺里住过两次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是1946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住进来的,1947年农历4月撤退的。足有一个团的人马,近一千多人。他们在延福寺的四周修起了四座大炮楼,每座炮楼三层楼高。第一、二层住着国民党兵,最上边的一层里国民党兵持枪轮流站岗。每层楼的周围都有不大的枪眼,每个枪眼处均架着一挺机关枪。炮楼外紧接着挖得是9米宽、3米深的壕沟。壕沟里筑有20多处暗堡。再往外是用木头锥筑成一道防线,尖尖白桦桦的,密密匝匝。再是用铁丝网围了一圈。最后一道防线是埋的大地雷,每个地雷都有大碗那么大。大庙的中心安置了营房,指挥部就在这里。庙里供佛和诵经的场所都成了国民党兵的住处,把庙里的大部分喇嘛都撵出去了,要不然的话他们住不下。远看是庙,近看是兵营了。

国民党兵住延福寺期间,不时的出兵和八路军部队交火。有一次是在四龙梁上,没派正规军出战,派的是梁殿英的警察大队。还有一次是全团出动,在去汐子的二八台梁上大干了一场仗。这次他们的损失惨重,把死人弄回来之后都埋在了小城子街里的土地庙墙根,把墙推倒,用墙土把死人埋上了事。还有一次他们往北去,部队开到楼子店折回来。梁殿英是国民党警察大队长,因回三座店大金沟老家返回途中在三座店街里被八路军部队包围。驻在延福寺的国民党兵的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派三营,由营长带队前去解救。返回途中路过敖汉营河套,那时河套已结了冰,国民党的兵大部分是南方兵,所以最怕冰。过敖汉营子河,加之后有八路军追赶,他们连滚带爬,终于返回小城子延福寺驻地。死伤十多人。为此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兵全团大会上,三营长被撤了职。最后一次是国民党兵足有600来号人,在延福寺只住了两宿,第三天早晨还没出太阳,这些兵全部不见了踪影。据别的喇嘛讲,他们往南走了,说

是去了平泉。

国民党兵住延福寺的日子里,寺里可遭了殃。金银佛被他们抢光,连铜制的佛都没有剩下,都被他们拿到街里找铜匠打制成了大小铜碗,以及手镯等装饰品,归己所有。不仅把寺里的合抱粗的松树砍倒当柴烧,还把成摞的经书都抱去当引火柴烧了。77间庙殿几乎成了空壳。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日

土改前国民党战斗机 对三座店和瓦房的袭击

整理者 胡廷荣

1945年9月12日(8月15日天皇宣布投降)日军正式投降。一年稍后,我军攻克国民党宁城县政府驻地小城子镇。同年10月,国民党93军22师进占赤峰并复占小城子镇(我军主动退出)。此后,战争双方进入“拉抽屉”时期。国民党军为搜集我方情况,常派飞机对坤都伦河、老哈河川解放区一些集市驻地进行低空飞行侦察(直到47年初夏才少见)。其间曾对三座店两次投弹、扫射,对瓦房南村扫射一次。而对三座店的一次扫射中,竟致使无辜平民伤亡,让人愤慨不已。

一、国民党飞机两次对三座店集市的袭击

1946年11月6日(农历10月13日,立冬前2天)三座店集日(在关帝庙前老街里,今已面貌全非),约早晨9点多,已是人群熙熙攘攘。这时,一架国民党战斗机从小城子方向(东北)突然低空飞临街市上空,飞过街西南头上空后又盘旋至村东北端。集市上的部分人紧张起来,纷纷涌入各店铺躲身。紧接着便见飞机呼啸着从东北方向俯冲掠过,投下一枚炸弹并向街市射出两梭机关枪子弹。

炸弹落在街外南侧河边,离街市尚不足百米,幸未伤人。机枪子弹分别射向街市两边的连栋房屋和民宅院落:其中一发从“裕和兴”商店房盖射入,击穿炕上火盆后进入炕内;又有一发射入邻街不远的魏虎家碾房。还有一发后果严重,子弹从陈长生、胡永明合开的杂货铺门中下部斜向下射入,不幸击中正在门内侧蹲下(准备趴下)从门缝朝外看照料自家货摊的小商人陈长生。子弹从其小腹射入,从臀后下方射出。并将肉炸开一茶杯口粗的弹洞,由于伤及动脉,抢救无方,流血不止,当晚半夜死去。这位无辜受害者时年40岁,河北玉田县人,只身一人在三座店做买卖,来飞机这天,伙计胡永明去凌源进盐未归,他受伤时店铺内顿时混乱,一些较值钱的货物(如布匹等)被趁火打劫者偷走。胡次日返回,只能自己收拾处理这个悲残破落局面,当时没有哪个政府或政党、军队能帮助解决这事。一天后,他给伙计陈长生送了葬,将灵柩暂囚到自家(租房住)大墙外。原二人合伙的店铺也只好关门(只开了一年多)。一个月后,在玉田县老家的陈长生的儿子才来大车将灵柩运回。

这次飞机扫射,还伤及二个外村来赶集的人,有人说这二人也因外伤医治不及时死亡。此说是否属实?还有待调查。

第二次国民党飞机轰炸三座店是47年春天的事,时在快到清明的一個集日。自从46年深秋那次国民党飞机袭击三座店集市死人事件后,集市便迁到今供销社后约半里多远的大桥沟里(近沟口较宽广处),一些摊贩为躲避飞机再来袭击,还在沟边崖上挖了一些防空洞。

这天上午约8点多,国民党军用飞机突然飞临集市上空,并投下2枚炸弹。其中一枚落在集市边上,将地面炸出一个直径约3米、深约2米的大坑。翻飞出的土正巧将一个烟叶贩子埋上,但未造成伤害。另一枚落在附近的一坟地上,未响。

自 1946 年冬到建国初的数年内，由于受到这两次飞机轰炸、扫射的惊吓影响，许多三座店人一听到飞机响，就吓得马上躲起来，或趴在炕沿下等处找个安全地方，有些人腿都打颤。百姓遭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部分口述者：苏占英、辛树森，皆 69 岁；胡玉英，女，68 岁。口述时间 2004 年 12 月 2 日)

二、国民党军用机对瓦房南村集训新兵的袭击

1947 年春，解放军一批集训新兵分驻在瓦房南村各家。快近清明的一天(疑与国民党在三座店投弹同一天)，这批新兵正在本村地主刘广谦家园子地集训。上午约九点时，突然从三座店方向飞来了 3 架国民党军用飞机，飞抵训练场地上空后使用机关枪向集训新兵扫射。当场打死新兵 3 人，受伤 7 人，事后新兵领导说，新兵缺乏经验，有些人没有及时卧倒，而是乱跑，否则不会有这大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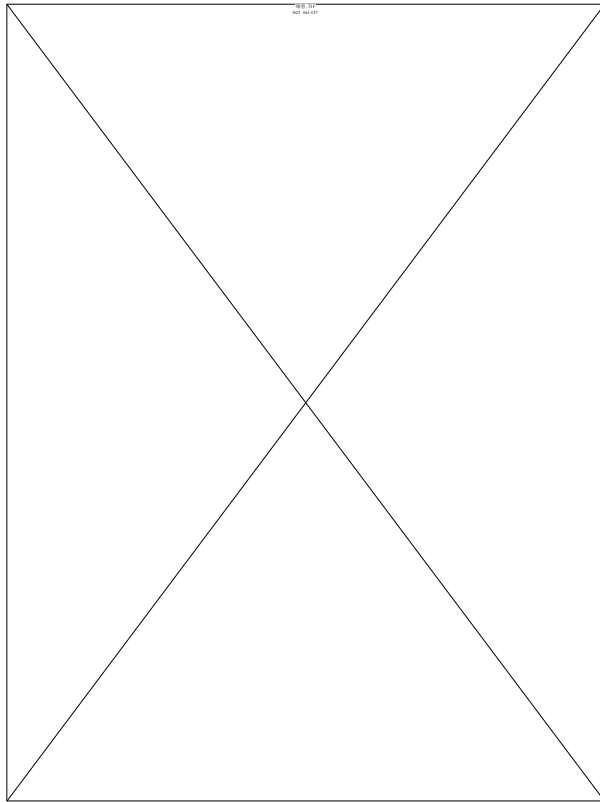
46 年秋到 47 年春之间，国民党飞机常飞临小城子、瓦房、三座店、八里罕一带侦察，但在瓦房扫射袭击只这一次。

(这一部分口述者李义山，退休工人，71 岁，口述时间 2004 年 11 月 27 日)

宁城发现地球上最早会飞的哺乳动物

赵晓明

2006年初,我国古生物学家在内蒙古宁城道虎沟地区发现了一枚带翼膜的特殊动物化石,科学家在这一地区的同一个地层曾发现过有毛翼龙、蝶螈等化石。新化石引起专家的高度重视,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孟津与该所胡耀明、王元青、汪筱林和李传夔5位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迅即展开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根据化石研究,远古翔兽的小脑袋大约长35毫米,体态轻盈,身长不过12-14厘米,体重约70克,差不多等于12枚1元硬币的

重量,化石尾椎共保存了 18 枚,总长 18.7 厘米(由于不清楚翔兽的尾椎到底有多少枚,所以 18.7 厘米是一个保底数)。同时,翔兽的四肢很长,前后肢与身体的比例分别达到 0.68 和 0.77,舒展张开后,就如一只小巧精致的风筝。

翔兽最明显的特征是它保存精美的皮膜。皮膜直接附着在翔兽的手掌和脚掌处,连接着尾巴与颈部,主要由四肢和尾巴支撑,整张膜浑然一体。与其娇小的身体相比,翔兽的皮膜显得很大,科学家由此推断它很可能具有较强的滑翔能力。翔兽的后肢与尾巴间的皮膜具有多层构造,说明它虽紧绷在腿尾之间却不失韧性,降落后还可以折叠收起。此外,不像翼龙的翼膜充满固定的纤维,翔兽的皮膜上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绒毛。翔兽的皮膜比翼龙或蝙蝠的翼膜更厚,也更坚韧。

翔兽的骨骼特征(如善于攀爬的手指与脚趾)显示它是一种树栖动物。科学家猜测,在攀爬时,翔兽将皮膜折叠收入躯体间;在滑翔时,翔兽先用后肢把身体从树木高处弹起,然后伸展四肢,迅速张开与四肢连接的皮膜向目标滑去。除了收放自如的皮膜,翔兽还有一条扁平的尾巴,这样的尾巴在滑翔中可以起到稳定和平衡身体的作用。虽还不能真正飞翔,它的滑翔能力足以让它在树林间自由活动。

根据它所具有的一些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比如全身披覆毛发、下颌由一块完整的齿骨构成等,科学家将它划归为哺乳类,同时,也是一只带翼膜的动物,也就是说,它是一只会飞的哺乳动物!当远古的一只树栖哺乳动物第一次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树时,它创造了地球生命史上的奇迹。

这一发现,将地球上哺乳动物会飞的历史提前了至少 7000 万年:从北美洲约 5100 万年前的蝙蝠化石提前到距今至少 1.25 亿

年前。

由于这种哺乳动物以前从未发现，古生物学家不得不在哺乳动物族谱里专门为它创建了一个新的类别——翔兽目，并把它命名为“远古翔兽”。

2006年12月14日，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英国《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这项重大发现，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东北地区一种中生代滑翔哺乳动物》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国内古生物界的震动。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是第一次用中国古生物复原图作为封面。更可贵的是，这张复原图是由中国人自己绘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由外国画师垄断中国古生物复原图制作的历史。

二官营子“突围战”

靳 堂

1946年,国民党中央军以优势兵力向我热中解放区发起猖狂进攻,相继侵占了锦承、叶赤铁路沿线的锦州、朝阳、赤峰、承德等地,并且仍在继续北犯。因而,各地形形色色的土匪还乡团和地主武装也嚣张起来,他们为非作歹,勾结国民党军疯狂反扑,活埋我农会干部,袭击地方各区苏木政府,对我军后方根据地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官营子“突围战”就是1946年冬发生在喀喇沁中旗五区苏木(今宁城县大双庙镇)二官营子村的一场战斗。63年过去了,为缅怀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采访当年参加突围战斗的幸存人员和目击者,现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这次事件始末做一记述。

—

1946年是国内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有利形势下,喀喇沁中旗很多蒙古族热血青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自治的号召,踊跃参加由乌兰夫(云泽)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广泛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内蒙古自治运动。

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意见》和“民族自治”

指示精神,经热河省委、省政府批准,在中旗所在地大城子隆重召开了喀喇沁中旗旗民代表大会。热河省委书记胡锡奎、热河省教育厅副厅长金起铎、热中地委书记宋诚等到会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会议正式成立了喀喇沁中旗人民政府,旗政府下辖四个苏木,即:大城子苏木、小城子苏木、八里罕苏木、大宁(大明)苏木。

5月,中共热河省委在平泉党委会议上,将平泉县分为平泉县和宁城县,在小城子组建宁城县人民政府,与喀喇沁中旗旗县并存,实行蒙汉分治制。

10月,喀喇沁中旗增建苏木政权,一区苏木(大城子)、二区苏木(三座店)、三区苏木(八里罕)、四区苏木(黑里河)、五区苏木(榆树底)、六区苏木(忙农营子)、七区苏木(和硕金营子)、八区苏木(大明)。九区(山头)当时尚未建立蒙区苏木公所。

当时,二官营子村就归喀喇沁中旗五区苏木政府管辖,旗支会主任于乐图、旗长武尚志和旗支会成员哈斯(白玉坤)、满达夫等同志带领的队伍就经常到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五区苏木支会主任张巴图、区长王森的一队人马更是来往不断,这里的蒙汉群众都非常拥护他们,军民之间已经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虽然这里仍是敌我双方的“拉锯”区,周围的天义、山头、平泉等地还有几个孤立的据点被国民党军占领,地方顽匪也时有袭击。但是饱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广大群众亲眼看到小城子(宁城)的敌人已被全部消灭,南边的凌源和平泉的敌军也不敢出城骚扰了,解放战争即将反攻,胜利的喜悦已在喀喇沁中旗广大农村沸腾起来。

二

进入1946年的深冬季节,喀喇沁中旗境内已经处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残匪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但以李玉、李锦廷为首的国

民党热河别动队(地方土匪武装)还在垂死挣扎。这一小撮马队武装的土匪与国民党 13 军搜索营一部,于 12 月 15 日(农历 11 月 22 日)清早从东部马站城子方向往西路过二官营子,恰巧前一天夜里刚到这里住宿的喀中旗蒙古族骑兵武装遭到了他们的突然袭击。

这支由旗支会、旗政府和旗公安队伍一起组成的 18 人的马队,是前几日从旗政府驻地八里罕佛爷庙村出发,游击活动在五区三官营子、巴里营子一带,搞清算斗争和扩大新区工作的。这天傍晚来到二官营子宿营,准备在这里开展扩军工作,分别住宿在乌云龙、乌瑞清、乌显德、温都苏等四户人家(均为堡垒户)。次日清晨,因为村里住了兵,各家房东都起早打开大门,做饭喂牲口的忙活起来。

这时,住在村子最东头起早出门在外捡粪的韩常海老人亲眼看到了匪队进村后发生战斗的全过程。土匪们悄无声息地从村东大路进村,首先经过路北的乌云龙家,他们发现大门敞开,且院内拴着战马,顿觉情况异常,前边拿着手旗的人遂向后传出消息,后面的土匪纷纷下马包抄过来。于是,乌云龙家就成了第一个被袭击的对象。当时,刚刚起床后正站在窗外台阶下洗漱刷牙的旗政府司法科长齐国瑞同志还没等反应过来,十来个土匪已经冲进院内,不由分说,用枪逼着他就往院外走。来到大门外一个土堆旁,几个土匪上前就把他的棉衣棉裤给扒了下来,挣扎当中,匪队朝他就是一枪,打中大腿根部,血当时就流了下来,但侥幸未伤着骨头。

陷入敌手躺在地上的齐科长深感自己已是寡不敌众,一边想到宁可战死,也不能投降,一边偷视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很快,敌军大队人马已经向西走过,去包抄我方驻军的另外几处院落了。不一会,西边枪声大作,齐科长趁看押他的两个土匪向西察看枪声时

对他稍不注意之际,突然起身就往院里猛跑,不顾腿上流着鲜血,急速翻过两米来高的后墙。刚要向东北方向后山跑,一看村东头不远处有一群敌人的战马,并且有人看守,于是又向西奔,一口气跑过西营子来到四、五里外的高丽台沟(蒙语,盖伦台沟)。这时正是寒冬季节,他已冻得全身青紫,腿上的血已经结成血块,他顽强坚持着找到一户老乡家,热心的老乡看到他的样子,迅速给他找出可换的棉衣棉裤,然后往八里罕三区哈日胡硕(今甸子镇十家营子村)家里捎信来人接回去疗伤。和齐科长一起住的新战士叫张国瑞(龙潭沟人),因刚参加工作还没发到军服,敌军进院搜查时他正在屋里,已经来不及撤退,在这性命攸关的紧急时刻,老房东铁桩(乌云龙父)急中生智,说这孩子是自己的儿子,才得以躲过这一劫难。

土匪顽军在不知我方底细的情况下,小心紧张地向第二户驻军人家乌瑞清家搜索,他家是位于道南胡同东侧的一个院落,住的是五区区长王森、区长助理姜××、区小队战士格布楚、钱广德四人。这天王区长他们起来也很早,村长乌显令正赶到这里向区长汇报工作,房东乌瑞清起床后背着粪筐出去拾粪,忽然听到枪声,接着听到乌云龙家门口有人高喊:“里面的人赶快出来……”。随后,看到后街有一群土匪由东往西直奔他家而来,他赶紧跑回家里汇报敌情。王区长等人一听马上分头撤退,战士钱广德一出大门就奔向胡同口,结果正赶上土匪们从胡同里迎面冲过来,小钱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敌人乱枪击倒,当即牺牲。王区长和姜助理他们听见胡同口枪响,就直接跳过南墙,穿过菜园子隐蔽起来,没被敌人发现。几乎就在同时,敌人冲了进来,满院搜查后没发现我方武装人员,只看到几匹战马拴在那里,于是就叫村长乌显令和房东乌瑞清给他们备马。正在这时,从大门外又冲进两个土匪,不由分说开枪就打,其中一颗子弹擦过乌瑞清胯下,击中乌显令大腿动脉。乌瑞

清受轻伤,村长乌显令受重伤,经治疗无效,半月后离世。

三

村里我方驻军的第三户是与齐科长所住西院邻居(隔几家)乌显德家。他们家是个比较大的院子,除上房外,还有东、西厢房,因此在他家住的人最多,有旗支会秘书科长哈斯、旗公安队负责人巴图布和(乌均义)、公安队班长张永贵、战士陈明显等八名同志。其中一位叫鲍乐喜的小伙子(三官营子人,小名满仓),是一名新战士,他曾经是乌显德家的长工,刚参加工作还不到三天。由于他熟悉本村的情况,夜间就安排他负责在外巡逻放哨,但由于经验不足,麻痹大意,清早天光大亮后认为不会有什么情况了,就到村西头乌瑞章家取暖理发去了。刚进屋里,就听村东头响起了枪声,知道情况不好,拔腿就往回跑,可还没到地方,就被敌人抓住。在乌显德家住宿的其他人听到枪声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跳墙向北突围。后经司法科长齐国瑞同志证实,那几位同志在往北边山上突围时,被敌哨卡发现,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班长张永贵中弹牺牲,余人悉数脱险。

在村子最南头温都苏家住宿的是旗支会副主任王音、宣传科长满达夫、五区苏木支会主任张巴图(张晓辉)、战士陈明海四人。这几个人都是温都苏在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崇正国高时的同学,因有校友住到家里来,温都苏自然非常高兴,早晨起来的也较早,然后开始清扫院落。当听到村子后街一阵枪响,就知道情况不好,赶紧叫老同学们起床,他们动作异常神速,边穿衣服边拿枪冲了出去,接着传来激烈的枪声,打了一会枪声渐渐远去了。没多会儿,院中冲进来七、八个土匪,押着那个被俘的新战士搜查来了,土匪们荷枪实弹地搜了一气,什么都没找到,就用枪逼着温都苏给他们备

马。尽管这些土匪仍然气势嚣张,但都显得气喘吁吁,神色紧张的样子,当时门外躺着十来个死伤的敌兵,活着的已经扎上绷带,显出哀嚎痛苦的狼狈相。趁着敌人一片混乱之际,温都苏假装去门口牵马,借机跑到西院邻居家,又从西院翻墙躲到后院老康家去了。

多年后,满达夫同志回忆这场战斗时说到,温家相距后街约有200多米,如果没人带路,敌军是不会这么快找到这里的。当时,他们四人冲出温家后,出大门向北一看,一大群土匪顽军急奔而来。他们当即趴到大门外的农家粪堆上(那时冬季农村各家门外都有粪堆),利用有利地形向土匪猛烈开火,立即毙伤敌军十余人。可是敌人倚仗人多势众,一面还击一面疯狂向前进攻,他们四人一看抵挡不住敌方攻势,立即决定两人一组分头撤退。满达夫、王音二人往南过老哈河向哈日努达方向撤退,张巴图、陈明海二人往西山嘴方向撤退,土匪们也分头继续跟踪追击。当时河南哈日努达那边驻防着我军大部队,听见二官营子这里枪声大乱,又发现有两人向他们所在方向奔跑,断定被追的一定是我武装人员,于是当即给与火力掩护。敌人一看河南有我军大部队出击,继续追赶肯定没好果子吃,就乖乖地夹着尾巴回去了。

向西撤退的张巴图和陈明海二人,被七、八个骑马的敌人紧追不放,当跑到村子西南头的树林地带时,陈明海体力渐显不支,动作迟缓之间,中弹身亡。张巴图猛然听到枪声,回头一看自己的战友已然倒下,深感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背水一战,先抓上几个垫背的再说。当时他最庆幸的是匆忙之中没忘了戴近视眼镜,所以心里非常有底,正好前面有一个土坑子,他迅速趴到那里,寻找射击目标反击敌人。这时,追击的敌人也纷纷下马,以一处坟群为掩护,很快包围过来。张巴图主任沉着应战,以静制动,瞄准射击,一枪打中前面手中拿旗的匪首脖子,当场死去。其余土匪意识到

他们遇到了神枪手,吓得再也不敢向前进攻,把同伙的尸体扔上马背,灰溜溜地跑回去了。

张巴图同志这一枪打出的是一颗决定胜利的子弹,阻止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而结束了这次惊险被动的突围战。此次突围战斗,我方阵亡4人,伤2人,被敌劫去战马18匹,骡子一头,长短枪6支。敌死9人,伤8人。

1946年底,经过认真总结这次血的教训,喀喇沁中旗旗支会和旗政府反复研究后决定,任命靳守廉同志为第五苏木支会主任,康林祥同志为苏木达,重新开展五区苏木的工作。

2009年3月25日

注:2005年11月12日,笔者亲赴二官营子村二、三组实地采访,经乌瑞清(79岁)、乌瑞章(85岁)、康志明(76岁)等老人回忆述说,初步整理本文。

2006年10月7日,赴我县甸子镇崔家窑村(蒙地名哈日胡硕)一组,采访了当年突围脱险的齐国瑞同志(84岁)。

2007年秋,本人在出差呼和浩特时,采访了离休在家的满达夫同志(原内蒙古林业厅厅长)。

2008年1月,又参考了温都苏同志(原县经委副主任,80岁,离休在家,现居天义)撰写的回忆录。

2009年3月22日,笔者在县石油公司经理乌学军、北方装饰社经理乌德文的陪同下,再次赴二官营子村核实采访了乌瑞清(83岁)、乌云龙(82岁)、康玉英(83岁)三位老人。最后,将几年来搜集的素材资料综合整理,最终形成本文。

黑山头“遭遇战”

张国武 靳 堂

1946年9月13日(农历8月18日),位于喀喇沁中旗和林格尔(今宁城县存金沟二十家子)松根那(东川)、乃仁高勒(西川)两川交界处的黑山头地区,国共两军地方武装之间发生了一起遭遇战,史称“黑山头事件”。

黑山头因其山势和颜色而得名,源于蒙古语“哈日和硕”的意译。清初,因葬有喀喇沁中旗先祖王爷坟茔,故又称“格根和硕”,民间也称“格根架子”。

1946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内蒙古各盟旗广泛开展民族区域自治运动。1月,成立了喀喇沁中旗人民政府(大城子),6月,成立宁城县人民政府(小城子),实行蒙汉分治、旗县并存的“属人主义”体制,旗下设8个苏木,县下设9个区。当时,在八里罕(巴尔罕)区部同时设有我党领导下的蒙古三区苏木政府和汉民三区政府。

同年农历8月2日,国民党占领军由宁城(小城子)进攻八里罕,三区苏木政府和区小队避敌锋芒,向山后乃仁高勒(乃林沟,今存金沟八家村)转移,并就地开展剿匪和稽查烟客活动……

当时,小城子已被国民党中央军占领,我喀喇沁中旗支队被迫转入布日嘎苏台山区一带活动。农历8月15日夜,旗支队排长潘国柱率部叛变,带领秉国荣、宋文才、迟希富等各班人马连夜转移

到三座店邱固勒(汉语谐音称为臭沟,今已改为进宝沟)。8月17日一大早,叛匪探知我蒙三区政府和区小队在乃仁奈门格日(乃林沟八家)驻防,遂全体出动,奔袭而来。

午前9时许,三区苏木小队获得情报,说下面来了军队,但不知其身份和番号,区小队于是紧急集合,在区长带领下往沟里转移,到三家北山,占据了制高点。下午3时左右,八家村长宫xx上来叫区长郭凤岐、主任高梦舟和区小队长宫相德下山,说有事情汇报相商。太阳快落山时,小队长宫相德在山下吹哨呼叫:“你们都下来吧,区长主任都在下营子等着呢,是咱们旗政府的旗支队来了”。这样,区小队全体人员下山来到八家营子,进了梁家大院(今八家二组梁金祥家)。互相引介之后,双方对排站队,旗支队站西面,区小队站东面。随后,由旗支队的头领潘国柱、秉国荣和宋文才等人分别给全体人员讲话:“你们听着,天义、小城子、大城子等地都被国民党军占领了,八路军已经不行了,中央军势力大,我们合并在一起去投奔国军警察大队吧!你们当中有不愿意干的可以缴枪回家”等等。这时旗支队的另一部分人已在暗中将梁家大院包围起来,至此,陷入重围的蒙三区干部战士才恍然大悟,知道被诱骗胁迫,上了大当,但为时已晚。当时,三区苏木除金济农、金树德、金玉田三人没在场外,只有组织干事靳守廉、副班长黄宪廷、战士靳刚、康凤祥、赵玉久、郭荣等人提出不参加编队,当晚离去,余下12人被迫悉数参加了叛变。叛军当晚在此宿营。

这就是所谓“蒙三区叛变”事件始末经过。

同日,汉民三区公安助理张万春受区长于作华委派,带领区小队第二班十余人去存金沟执行保护群众赶集和查找烟特任务,当晚住到喇嘛沟门董茂元、冷金堂、于顺等三户人家。

18日早,执行站岗任务的区小队战士于占存、李万福二人忽

然发现两个背着钱褡子的人由东向西疾走,行迹可疑,于是令其停下接受盘查,这两人非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向黑山头方向跑去。于、李二人遂开枪追击,区小队其他人听到枪声也随后跟着追了上来,撵到黑山头附近时,恰逢已经叛变的潘国柱匪帮 40 余人从乃林沟八家下来,两路人马走了个正着。当时正值深秋季节,庄稼十分茂密,彼此看不太清,也不知对方身份底细,马上交火,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枪战,汉三区区小队战士于占存、李万福当场牺牲。这时,匪队里有人高声喊道:“不要打啦!咱们都是自己人,误会了”。他们利用欺骗手段向汉民三区区小队靠拢包围过来,随后将全体人员的枪支下掉。当时,除三名战士突围跑出外(其中一名姓窦,以后不知去向),其余 5 名全部被捕。

当晚,叛匪们押着公安助理张万春和其余 4 名战士住在三座店巴特营子(今八台营子),连续两天给这几个人刑讯过堂,逼问汉三区政府领导人员和物资储备等情况,获知于区长近日正在强行筹备与佛爷庙村的蒙古族姑娘金子兰结婚。第三天夜晚,张万春等人趁看守松懈之际,互相解开绳子,越狱逃出。第四天(农历 8 月 21 日)下午,叛军一部突袭八里罕,把正在雹神庙村三义和大院(今平房村三组)举行婚礼的区长于作华、金子兰夫妇和公安干事张志文以及通讯员牛春发当场抓住,经八里罕街到迭卜营子(今存金沟格日勒图村)住宿,第二天押至小城子王家大院。夜,于区长遇害身亡,金子兰、牛春发被我军救出。

黑山头“遭遇战”始末即此,史称“黑山头事件”。

2009 年 4 月 25 日

注:①此文根据“黑山头事件”部分健在者回忆访谈以及宁城县公安局《喀喇沁中旗公安史》档案资料整理而成。

②2009 年 4 月 14 日,县民族事务委员会靳堂同志、县公安局

张国武、卢广辉、崔宝利等同志一同赴存金沟和林格尔（二十家子）、乃仁奈门格日（乃林沟八家）以及八里罕佛爷庙（今高树营子村二组）、雷神庙（今平房村三组）等地对“蒙三区叛变”、“黑山头遭遇战”、“于区长婚变”三个连贯事件的时间和地点再次进行了调查核实。

③此文所述事件已过去 63 年了，且当事人大多都已作古，为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笔者从文史资料的角度出发，本着尊重历史，客观务实的态度对于区长举行婚礼和被害事件发生前后的真实经过做一注释：

据当时经组织调查和群众反映，当时金子兰与其亲属家人并不同意与区长于作华结婚，是迫于时任三区区长于作华的压力胁迫被动成亲的，村民亲属不同意者有多人因此被押入狱甚至丢了性命，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事后，时任县委书记王丕年对此人此事曾提出严厉批评和警告，于作华是冀东地区派来的抗日干部，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但抗战胜利后贪图安逸，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更不该逼人成婚。敌人来袭之前，本已收到敌情通报，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撤离劝告，一意孤行，最终搭上了自己的性命，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回忆喀喇沁中旗蒙古六区儿童团

青秀荣(乌兰达赖)

“咱们的儿童团,真正要勇敢,抓洋针、拿懒汉,还要捉汉奸,捉住个大汉奸,送到咱本县(旗),从今后,我屯再没有大坏蛋。”这是当年我们儿童团广泛传唱的歌谣。

我于 1935 年 11 月 25 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呼和苏莫艾里(今辽宁省建平县三家蒙古族乡呼和村)。因三岁丧母,无人照料,遂由姑姑接至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县)蒙古忙农营子家中抚养。

1947 年夏,新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刚刚成立不久,这年我 13 岁,在小学读书。这时,经喀喇沁中旗蒙古六区苏木区长宫双令同志积极倡导,发动成立了蒙古六区忙农营子、古尔班格日(今忙农三家)、白兴古德(今白胜皋)等地的儿童团。这是当时全中旗八个蒙区苏木当中成立最早的儿童团,全团共有 100 多人,都是蒙古族,儿童团长姓白,我是一名普通儿童团员。

我们儿童团的任务是:在蒙古六区苏木政府的领导下,在上述蒙古艾里(营子)一带开展站岗、放哨、除奸活动。目的是通过宣传教育,扩大影响,使刚刚获得解放的还比较落后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群众提高自强、自立和自信感,提倡勤俭、勤劳、勤奋,反对消极、懒惰、浪费行为。彻底铲除旧社会丑恶现象,消除吸毒、扎毒行为,为区政府做好耳目,配合蒙区苏木的各项工作。

蒙古六区政府成立之初办公地点在乌兰岗(岗岗营子),后挪至忙农营子三家朱家大院办公。区长(苏木达)宫双令,当年20多岁,是二区苏木和林格尔(二十家子)人。宫区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经常给儿童团讲一些故事感动教育我们,希望儿童团员们认真协助苏木政府做一些有益的事。宫区长为了鼓励我们大家的积极性,还强调说:“你们抓懒汉要认真抓,不管是谁,要一视同仁,包括我本人在内,你们也可以抓我的懒汉,如果你们抓住我就奖励你们。”

有一天早晨天刚亮,约在四、五点钟之间,我与几个儿童团员一大早就来到宫区长住宿的地方,真的抓了他的懒汉,并把区长的裤子拿到苏木区部,宫区长当即买了三篓水果奖励我们抓懒汉的儿童团员。

六十年后回想起来,宫区长让我们抓他懒汉,实际上是在鼓励我们。从此,我们儿童团员们的积极性更加高涨,干劲倍增,积极参加了蒙古忙农营子、古尔班格日(三家)、白兴古德(白胜皋)艾里一带的站岗、放哨、抓懒、除奸等各项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由于伪满政府号召本地民众种植罌粟(俗称大烟),致使农民群众在种植罌粟的同时,也染上了抽、扎大烟的坏习惯,逐渐形成萎靡思想,懒惰习性滋生,给很多农民家庭带来了肉体和经济上的损失,人们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社会不良风气到处蔓延。

为使吸毒、扎毒之人戒毒,远离毒品,惩治懒惰,消除腐朽观念和不良风气,喀喇沁中旗蒙古六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并要求我们儿童团员们积极行动起来,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当时,附近各村的“烟民”们三五成群、四六结伙的公开扎洋针(即扎大烟),有的人扎大烟都得了“遮背风病”。我们儿童为响应区部的号召,以宣传教育为主,述说扎洋针的危害,检查收缴毒品、毒具,

鼓励戒烟、戒毒,用不同方式对吸毒、扎毒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先杜绝他们的行为,然后促其转变思想观念,远离毒品,真正戒毒。

有一次在忙农营子抓住几伙人正在扎毒,儿童团当场没收烟针 20 多支,大烟若干两,全部上缴六区政府集中销毁。像这样的抓毒行动我们开展了很多次,这是一项长期抓捕,反复进行的工作,只有坚持不懈的去做才能收效。

蒙古六区儿童团在苏木区部的领导下,经全体儿童团员共同努力,整个六区苏木的禁烟戒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使抽、扎大烟的人数由多渐少,由公开变为隐蔽,由隐蔽变为彻戒。让许多人从毒品毒害当中解脱了出来。

整个 1947 年春夏,我们蒙古六区全体儿童团白天坚持读书学习,早晨、晚上、节假日就分组进行活动,使那些好吃懒做、贪吃贪睡的赌徒懒汉们变成早睡早起、热爱劳动的勤俭持家之人,帮助那些扎毒吸毒的烟民们改掉坏习惯,成为对新社会的有用之人。

另外,我们儿童团员们还在蒙古忙农营子、古尔班格日(三家)、白兴古德(白胜皋)以及附近村屯的街头巷尾和十字路口站岗、放哨,对可疑人等进行严格盘查询问,发现情况及时汇报给区部政府。

1947 年秋天,《土地法大纲》颁布实施,喀喇沁中旗全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秋末,六区苏木政府挪至天义街里办公。随后,儿童团在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斗地主、分田地,配合区政府进行斗批改运动,对当地的地主、富农在思想上进行改造,在行动上进行监督,在政治上进行教育。为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2007 年 9 月 15 日初稿

2007 年 12 月 8 日完稿

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六师 组建前后的一些记忆

哈斯巴图 供稿忆述 靳 堂 整理

我叫哈斯巴图,蒙古族,1930年8月24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布敦高勒(今忙农营子镇步登皋村)艾里。

1936年随父去翁牛特左旗王府小学读书至1943年,1944年考入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兴安学院读书。1946年11月入林东内蒙古自治学院行政部蒙语班学习(我的班主任叫清格尔泰,喀喇沁中旗布日嘎苏台人)。1947年3月参加八路军,在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十军分区宣传队工作,历任宣传队长、保卫干事、连指导员。建国后曾任洛阳步兵学校主任教员、科长、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科长、武装部政委等职。1981年转业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任书记、局长,后任承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至1990年离休,行政十四级。在解放军洛阳步兵学校期间被评为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分子,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作战和江西剿匪战斗等。

现将我参加革命后所在部队——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组建前后的一些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1948年春节刚过,部队正好结束新式整军运动,这时接到上级命令,部队奉命从昭乌达盟政府所在地巴林左旗林东出发南下,开往前线参加冀察热辽军区指挥的春季战役。部队连日行军,经宝日浩特(乌丹)、乌兰哈达(赤峰)、宁城(小城子)一直来到喀喇沁中旗八里罕三区所辖的甸子村驻扎下来,进行整训。

当时我在师宣传队任分队长,我们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战时深入前沿阵地做宣传动员工作,另外还向敌方投掷宣传单在内的各类宣传品,配合主力作战部队开展对敌方的政治瓦解工作,有时还帮助抢救伤员,组织民工和担架队等后方后勤工作。

整训半月有余,这时传来消息说上级准备正式成立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部队主要由冀察热辽军区十九分区独立团、二十分区警备二团和在克旗经棚、林西等地新组编的地方部队以及原驻凌源的国民党起义部队等共约三个团的兵力组成。师部主要由热北二十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为主组建而成。

独立第六师的成立大会是1948年3月1日在甸子村北叫马架子的小村子(全村共有20多户人家)南大地上召开的。大会主席台下面是用石滚子当底柱,台面是用地主家的大黑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会上首先由冀察热辽军区领导李运昌司令员宣读组建令:任命韩梅村为师长,钟辉任政治委员,周志飞任副师长,张荣森任参谋长,邹日清任政治部主任。

全师所属三个团的基本情况是:十六团主要由冀察热辽军区十九分区独立团组成,干部战士大部分成员以宁城、凌源籍居多。十七团、十八团主要由二十军分区警备二团和新建独立团为主,干

部、战士来源多为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

部队组建之后，所属三个团分别驻扎在甸子村附近的哈拉浩特(黑城子)以东，梅林营子(榆树底)以西各村，师部暂住甸子本街。

二

独立六师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对盘踞在热河地区承德、平泉一线国民党王牌部队十三军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当时我军计划实施的春季战役。第一仗我记得很清楚，是在3月中旬，部队从休整地甸子一带出发，急行军一夜，突袭驻扎在平泉以东干巴河子一带的敌十三军八十九师一部。拂晓时分战斗打响，经一上午激战，至中午战斗结束，共歼敌二百多人，随后部队撤回蒙和乌苏、五十家子、哈拉浩特(黑城子)一带休整。

我记得当时为转送我军伤员，还特地在八里罕、甸子一带动员支前担架20多付，及时将伤员送到苏日图(今四龙头沟)、煤窑五家一带冀察热辽军区后方医院。当时，喀喇沁中旗地区因连年旱灾，而且又闹了春荒，群众生活处于极为困难时期。但经土改后的各族翻身农民支前热情特别高涨，两人一付担架，抬一名伤员，一天走六、七十里路，中间只吃一顿稀粥，愣是没有叫苦叫累的。

1948年4月中旬，驻承德国民党十三军主力第四师和八十九师一部企图偷袭进犯我后方根据地，气势汹汹地往甸子、八里罕方向开来。当时上级命令由独立六师十七团部分兵力诱敌深入，准备待机围歼之。十七团二营接到命令后迅速前移部队，在乌呼尔达坝(乌呼玛梁)一带设伏阻击敌人。

战斗打响后，敌人多次冲锋都被我军打了下去，战斗中胶着状

态整整持续了一天,到下午太阳快落山时,敌人才发现我军主力从东、西两侧向其左右迂回,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撤出战斗向南回逃。上级领导抓住战机,命令我军全线出击追歼残敌,但敌方多为机械化部队,坐上汽车跑得很快,我军一直向南追赶,到平泉街(八沟)后兵分两路继续进击。南线到平泉以南的南五十家子、党坝一带,西线到三沟、六沟,也没追上。这次追歼战使得敌人很狼狈,他们跑到承德和下板城后守城闭户,不出来了。

这时,恰逢冀察热辽军区主力部队东北第十一纵队也开至承德一带,军区领导遂下令独六师与十一纵捕捉战机,运动作战,迅速形成了对隆化的包围态势。

5月下旬,解放隆化的战斗打响,经激烈战斗和顽强攻坚,至5月25日,踞守在隆化的敌人被消灭。迫于我军对热河地区的攻势和压力,驻平泉县城的国民党八十九师主动弃城逃往承德,上级命令独六师连夜急行军,火速赶往承德、下板城一线截击平泉逃窜之敌。第二天早上拂晓时分,下板城阻击战准时打响,至午后战斗结束,共歼敌四百多人。另外还有跟随国民党军从平泉逃出来的土豪劣绅、地主还乡团等亦被悉数抓获,缴获武器辎重不计其数。战斗中还缴获了两辆大卡车,一辆吉普车,送后方军区机关。

三

春夏战役结束后,主力十一纵队开进关内作战,独立六师留在承德、平泉一带,继续寻找战机,流动作战,前后经历大小战斗六、七次,共歼敌千余人。9月末,部队奉令开往辽沈战役的辽西走廊战场。这期间比较大的战斗有砬子山阻击战(塔山右侧),还有解放沿海重镇绥中的攻坚战及配合友军参加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此役

我部为预备队)。

辽西会战消灭廖耀湘兵团的捷报传出后,部队得到上级命令,立即开往关内参加平津战役。

1949年2月,迫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北平(北京)国民党守军宣布和平起义。至此,古都北京获得解放。其后,独立第六师在京津地区开始整训,三个月后开始南下,与人民解放军各兵团一起参加了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渡江战役。随后,连续解放了江西省会南昌、上饶、临川和景德镇等地,并就地开展剿匪作战。

1950年1月,独立第六师一部分被改编成空军。一部分改编为地方武装,继续剿匪。还有一部分被编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这支光荣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出现了两位全国战斗英雄。一位是“新时代的花木兰”——郭俊卿(原籍喀喇沁左旗,今属辽宁省凌源市,在昭盟林西参军);一位是爆破英雄邢文治(记忆中他也是昭乌达盟人)。

独立第六师在喀喇沁中旗(今宁城)、平泉、承德一带作战牺牲的烈士约有170多名,现承德县六沟镇墩台子村立有革命烈士纪念碑,英灵永祭。

2007年5月忆述、整理

回忆伪满时期喀喇沁中旗 蒙民裕生塾发生的两件事

盟和巴图 供稿忆述 靳 堂 整理

伪满时期，满洲国各级行政部门中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垂直管理机构，这个机构是专门对境内蒙古族实行慈善救济和开展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管理的职能部门。国务院直属设置“蒙民厚生部”，各盟旗设置“蒙民裕生会”，裕生会下设“蒙民裕生塾”。“塾”同“书”，实指学堂教育。

喀喇沁中旗蒙民裕生塾始建于伪满康德八年（1941年），由中旗公署蒙民裕生会管理，是一个专门培养蒙古族子弟的慈善式教育机构。裕生会每年按季度、月份下拨教育经费，对在校学生的吃穿住行实行全部免费制，还经常派员到塾视察教学工作。

1943年（康德十年），中旗蒙民裕生塾招收了第一期学生，有30余名。第二年又招收了第二期学生，包括我本人在内，第二期共有35名学生。裕生塾的办学宗旨就是培训、教育、深造贫困蒙族学生。塾长是朝水武南老师（日本人），郭喜荣、伊宝元两位老师分别教任蒙文、算术（数学）课，索永昌老师是上届毕业生，留塾担任校内的生活和后勤工作，铁佐老师（日本人）教日文兼体育课。

1944年下半年，日本侵华战争处于节节败退时期，加上日、

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兵力衰竭，已属强弩之末，处境难保。这时，地处喀喇沁中旗旗公署所在地的蒙民裕生塾校内也不太平，接连发生了两起使日本人恐慌，中国人高兴的事件。现将其详情分述如下：

一、改“蒙”字为“盟”字事件

是郭喜荣老师发起改“蒙”字为“盟”字的，他说为什么要将蒙字改为盟字呢？我们蒙古族目前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蒙古”两个字的第一字用汉字解读就是愚昧钝知、民智未开的意思，故尔落后。而“盟”字合“会盟”、“盟发”之意，国家、民族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强大。所以倡导将蒙字改为盟字，这样，盟古民族的博大精神和才学素质才能充分发挥，才能兴旺发达。

此事经郭老师发起后，我和靳守廉等很多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意见，再加上蒙民裕生塾的学生都是蒙古族，这个意见也比较容易接受，因此大伙一致同意改字之事先从本塾做起。随后我与几个同学又同大城子国民优级学校部分师生取得联系，不想此校德高望重的金铺元老师也正在极力倡导此事。学生们听后也都同意这个改字意见，取得共识后师生们共同决定，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先把课本上的“蒙”字改为“盟”字，然后再逐渐推广普及，今后所有书本上的蒙字也都改为盟字，大家群情激昂，兴高采烈，因为今后我们就是“盟古人”啦……。

但时过不久，风闻日本人要抓郭老师，我们听说后，都开始为他担心起来，此后一段时间再没见郭老师来塾讲课，不知他去了哪里。

1945年，我考入兴安总省国立兴安学院（时称王爷庙，今乌兰

浩特)读书。有一天在王爷庙街上突然与郭喜荣老师相遇,不禁喜出望外,高兴之极,我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言谈中郭老师告诉我说:当时有位挚友告知日本宪兵队要抓人,叫他赶快出去躲避风头,于是他就离开家乡,辗转来到王爷庙,在亲属家里一直呆到现在。我说老师你没事就好,远离家乡安然至今,亦属万幸。后来我就想“改字事件”日本是怎么知道的呢?忽然想起朝水武南的可疑性最大,因为他平日里与日本男女人等接触频繁,中旗所在地机关单位的人见到他都敬而远之,他是一个城府极深的神秘人物,很可能是“特务”,为此后来裕生塾的师生都很少接近他了。

值得一提的是,郭老师在倡导改“蒙”为“盟”事件上虽有“唯心”之意,但他不愿当亡国奴,爱国爱蒙古民族兴旺发达之心是十分迫切的,为此我们对他很钦佩。从那时起,我的名字也由蒙和巴图改为盟和巴图,我认为年青一代应该用实际行动学习和继承他这种可贵的民族精神!

二、伊宝元老师殴打“铁佐”事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伊老师与铁佐在塾内浴室相遇,铁佐说:“现在裕生塾体育课太少,应当安排时间加大力度进行强化训练,如按原课程这样继续下去对日中亲善和建立王道乐土大大不利!”伊老师平素对日本教师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做法本来就很有意见,听了铁佐的话马上就用日语予以反驳:“南达(胡说什么),学生每周有三节体育课,每课二个多小时,况在校学生年龄尚幼(多在十五、六岁之间),你想把孩子们都折腾死咋的?!”二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争执起来。铁佐嚷道:“我是管体育的,我说了算!”伊老师听后火冒三丈:“你这个混蛋,我让你说了算!”一边动手打他,

一边伸手抓住铁佐头部往水里按。铁佐抵不过伊老师，喝了好多洗澡水，又挨了打，吃了亏，于是向塾长朝水告了状。伊老师虽面对着被校方追究责任的巨大压力，但仍不屈服，还准备坐火车去承德热河省塾去告铁佐。

同学们听说以后，都替伊老师担心害怕起来，幼小的心灵里都暗暗祈祷伊老师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同时敬佩伊老师不畏强暴，敢于与强敌斗争之精神。但事过不久听说铁佐调走了，上前线当“炮灰”去啦，当时我们不懂“炮灰”是什么意思，老师们就给我们解释说：“当炮灰就是上前线挡子弹去啦，是去送死。”我们听后都高兴的不得了。

朝水武南是时驻喀喇沁中旗日人中资历最深者，又是老谋深算的“中国通”，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可能是怕事情闹大了沾上麻烦，追究起来不好收场，故尔此事不了了之。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伊宝元老师爱国爱民族的抗争精神仍历历在目，他是我们喀中旗蒙古族的骄傲，我们永远敬佩他、怀念他。

2007年11月29日

注：盟和巴图，蒙古族，又名李宝森，今年80岁，1927年出生于喀喇沁中旗玛拉图苏木（今宁城县大城子镇瓦北村四组）。1948年参加革命，历任河北省平泉县银行金融员、农行副行长，榆树林子区区长，河北省战备三线工程团团长、政委等职。

宁城地区抗日斗争故事

——治安区烽火

付国兴 口述 李文 采访整理

日本人统治宁城时期(1933—1945),宁城蒙制也叫喀喇沁中旗。日本人在宁城建治安区,先是实行保甲制,后又改为实行村甲制,村下设甲,甲下设牌。每10户设一个十甲长。同时还建立了“治安队”,1943年后改为“讨伐队”。日本人曾标榜喀喇沁中旗是他们的最好的治安区。警察局子里是“自卫团”,都是雇的本地人,穿黑衣服扎绑腿,不干好事,老百姓叫他们“黑狗子”,这是局子里的武装。各甲组织“挺身队”,18—45岁之间的男子全部参加挺身队。这些地方武装的任务就是派粮派草派烟干,维持地方治安,主要针对八路军游击队。甚至开大会,讲怎么打八路军。在榆树林子庙会广场就曾开过。治安队每到一处,抢驴抢马骑着走,抢吃抢喝,无恶不作。治安区里到处都是特务(密探),形势很紧张。

在西部山区就是集家并村修围子搞“无人区”。

我的父亲当时私通八路,家是堡垒户。有一个晚上,家里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受伤的,父亲就赶紧用棉被将窗户挡上,母亲就给他们做饭吃。吃过饭,这三个人给讲了个真实的故事:

一肯中村茂福沟甲西头靠山坡,有一家住户,老头姓孙,他儿子是八路军游击队队员,儿媳刚坐月子生了个小子没还出满月。一

天游击队在他家开会,开紧急会,商量怎么破坏日寇治安政策,怎么打击汉奸、特务的气焰。游击队队长姓李。老孙头在山包上一边打麻绳一边瞭望放哨。这时,突然听到村里鸡叫狗咬,一看,发现了敌人马队,老孙头马上飞也似的回家报告,队员们陆续进了地洞,地洞在锅腔子里,这时还剩下老李没来得及进地洞,敌人(日本人和自卫团)的马队已进院。老孙头把石板一放,锅一扣,随手把老李推进了西屋儿媳的产房里,老孙头把红布挂到了上门框上。

日本人进村是直奔老孙头家来,日本人把战刀搁到老孙头脖子上,让把八路军交出来,翻译把话翻译过来,老孙头说:“我不知道什么八路!”自卫军这时跑过来报告说:“都搜过了,没有。只还这一间没搜。”日本人让进去搜,自卫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翻译对日本人说:“这是月子屋,忌讳。当地人有个令道说:进月房屋的人,上战场会掉脑袋的。”老孙头说儿媳:“你把小孩子给他们举起来让他们看看。”儿媳举起了孩子,孩子哭,日本人抬起手就朝孩子开枪,万幸的是孩子马上放下了。这时穿旗袍慢悠悠的走过来的洪甲长低三下四地笑着对日本人说话,意思是让“上我家去吃晚饭”。日本人因没有搜到八路军游击队正生气,上去就抽了洪甲长一个耳光,洪甲长挨了这一耳光给打懵了。翻译和洪甲长关系不错,翻译为保护洪甲长,替他说情,指着太阳说:“要落山了。”日本人害怕天黑遭八路的袭击,上马走了。

敌人走了之后,游击队紧急会议照常召开,研究是谁告的密?经仔细分析,断定告密的实际就是这个洪甲长。老李连夜派了几个游击队去洪甲长家敲门。“谁?”“皇军!”洪甲长一听是皇军又来了,赶紧起来开门,刚开门就被抓走了。家里人都害怕了,这下当家的没命了!

游击队将洪甲长抓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洪甲长以为会在这里

被处死,老李训他:“你是中国人不?”洪甲长吓得赶紧点头:“是,是。”“是,你怎么给日本人干事?你这是投敌叛国罪!你通风报信,充当汉奸,你这种人该杀。”洪甲长表示他今后不再当汉奸,千万别杀他。老李说:“你也不用害怕,我们今天不杀你,今后我们就上你们家住。你敢告,日本人就杀你;日本人不杀,我们也杀你。日本人那边你也得联系,有事给我们报信,你就搞两面的。”

当时,谁家住过八路军,让日本人知道了就枪毙谁。村里有个傻柱子,穷,就光杆一个人,整个拿个呱嗒板儿要饭。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经常闹的日本鬼子不安宁,抓又抓不着,遍布的特务又打听不着,就训这些甲长、财主、汉奸,说他们不中用。一天,汉奸被催的不行了,就找个替罪羊,密告说傻柱子暗通八路,日本人抓去就砍了。弄的很紧张,老百姓人人自危,担惊受怕,同时也恨死了汉奸和日本人。傻柱子被砍死都好几天了,后来付国兴的五大爷出于行善,找几个人把傻柱子埋了。

从那时候开始,为了保护穷人,游击队尽量少去穷人家,采取新的策略,采取新办法:我们接触穷人,日本人就杀穷人,这回我们也走你们财主路线,公开出入财主、甲长家,大摇大摆。你们怕就两面派,应付着日本人还给我们通风报信。这样一来,使财主、甲长、汉奸们哭笑不得,也不敢告密。

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争取了敌人,通过给要争取的财主、甲长、村长们讲抗日道理,讲利害关系,讲共产党的政策,讲抗日办法,使不少甲长成了两面甲长,多了耳目,消息更灵通了。有时,游击队的人大摇大摆地从韩甲长家出来,别人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洪甲长家去。”反而安全了许多。也有游击队和治安队都到同一个甲长家去,碰到一起的时候,甲长就把治安队安排在前屋,把八路军游击队安排在后屋,互不着面。更玄、更传奇的是,有时在

甲长的安排下，把治安队的人和游击队的人都搁一个桌上喝酒吃饭，彼此都不认识，治安队的以为既然在甲长家，可能都是自己人。划拳之际，喝酒中间，把敌人的秘密就都套弄出来了。但甲长的头上却捏着一把汗，心提留着。

由于八路军游击队在宁城的活动，采取了争取财主、村甲长一致抗日，教育分化了一些人，打击了日本人，敌人的嚣张气焰也给打掉了许多。

八路军游击队在此期间打了榆树林子、黄土梁子、草沟门、小城子局子，多少次都是通过两面甲长搜集到的准确情报而进行袭击的。打榆树林子时把局子里的大烟土和枪都整去了；打黄土梁子缴了两挺机枪，打死 4 个日本人，打死 10 多个伪军（自卫团的黑狗子）。

八路军有时整住死心塌地的特务也给他活埋，震慑敌人。在榆树林子就活埋过，吓的自卫团的黑狗子不敢出来，闹的日本人不敢再在榆树林子呆下去了，把局子搬到天义，天义安着警察署，自卫团才敢出门。

尤其大明、榆树林子、小城子等，这些地方已不是日本人的治安区，其实已是烽火连天的战争区。打榆树林子局子就打了好几次呢。

特务也恶着去了。罗振江的奶奶因没交大烟干，被痛打了一顿，又被绑到门板上灌凉水。后来是于甲长给特务跪下求情，说：“都那么大岁数了，饶了她这次吧。”特务才放了她。于甲长因在村中人缘好，不替日本人做坏事，所以土改后没清算他，他老死在家里。

我三大爷的姑娘让特务看上了，让村中李三区（区：指对人净使坏心眼）的老婆给说媒。特务说：“如果说不成，我就说你李三区

家私买了三颗枪,一颗枪就几石米,到时就抓起来跟你要枪。”姑娘死活不同意,到处藏。八路军游击队得知此事以后,决定为民除害,就借甲长的名义,让甲长密告到榆树林子局子,说他私通八路,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日本人来抓特务时,特务正要娶亲,连“岳父”都叫了。借日本人之手将这个特务砍了。

宁城地区,随着抗日烽火的熊熊燃起,抗日的革命力量逐渐壮大,日本遭到的袭击越来越频繁,八路军游击队和抗日民众除袭击警察局、消灭日伪军外,还扒火车道,天义就扒过火车道,平泉至凌源段火车就栽出轨去过。把日本人的治安区破坏了,宁城没有治安了。

后来,日本投降后,村长陶玉璞因民愤太大,枪毙了。八路军曾经常大摇大摆出现在老丁家、孙绍武家的这两家甲长,后来孙绍武也被枪毙了,农会都出面保过,可能是被坏人咬进去了,但他对老百姓好,没做过坏事。有些甲长都变成民主人士了,如:茂福沟的洪甲长、二肯营子的李甲长、南城的于甲长。平房的韩甲长(韩佑阉)成了开明绅士,把家产土地都分给了穷人,全家都参加革命了。

老百姓参加游击队的不少,基本都是长工。

霍田慧,曾是抗日英雄高桥的警卫员,后来当过平泉县长。1952年、1953年时(记不准确了)他讲过打黄土梁子战斗,说缴两挺机枪,杀死4个日本人、10多个伪军等,这些都符合当时情况。

2005年6月16日初稿

2006年7月9日完稿

平 房 事 件

张国武 卢广辉

平房系宁城县大明镇的一个自然村落。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属平泉县第五区(天义)马站城子村管辖。1946年5月,平泉、宁城分县后仍属五区管辖。

1946年1月,国民党13军第一次占领天义后,马站城子包括平房村,就成了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经常派兵进行骚扰。天义区政府和区公安队也只能在老八区(一肯中、八肯中以西)活动。1946年5月,叶赤战役胜利后,区部才迁返天义。为贯彻“五四”指示,进行了土改试点。正在减租减息,清息反霸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国民党93军于7月第二次占领天义。马站城子的郝雨廷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马站城子乡乡长,下设自卫队,实行保甲制。国民党93军18师搜索营一个连也驻在马站城子,此时区政府被迫撤到一肯中、八肯中、白塔子一带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活动。而马站城子的国民党也时常派特务打扮成农民模样进行间谍活动。

1946年9月11日,93军又占领了宁城(小城子)。10月赤峰失守后,特务往来横行。马站城子搜索营一连长李连堂,通过地主张凯(哈尔脑人),打听到区部人员在叶树沟梁一带活动,即派特务肖彦有(哈尔脑人),带领搜索队员二人去侦察情况,被区部的戴国恩(哈尔脑人,抗日时期张立文发展的基干队员)发现,报告区长孙

信后,将肖彦有和那两个特务抓获。经审讯后得知张凯、姜兴舟(伪职员,平房人)存有枪支,与驻天义的国民党有联系,当即将特务处决。

1946年10月29日,孙信区长带领骑兵连陈连长、戴国恩等24名区部人员以及公安队和骑兵战士,经哈尔脑到平房。全部人员正在韩家大院吃午饭时,突然被驻在天义的国民党宁城县警察大队赵永泉和潘国柱的两个中队包围,战斗持续一个半小时,孙信区长、陈连长、王玉民、张坤、刘德、公安队班子刘昆、周成林、两名指导员和一名排长等18名同志在突围中牺牲。在这次突围中,失落12匹马,9支大枪,5支手枪,其他财物一大部。

2009年4月22日

外国神甫操纵假农会 惨杀公安干部事件

张国武 卢广辉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得到了广大贫雇农的热烈欢迎和积极拥护,喀喇沁中旗、宁城县各级干部组成了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实地,发动群众,召开大会,控诉地主之罪行,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各级公安部门也积极配合,深入土改斗争第一线调查研究,作好锄奸保卫工作。土改斗争正在全面展开的时候,第七区那拉不流村发生了一起外国神甫操纵假农会杀害公安干部的事件。

一、那拉不流

“那拉不流”原系蒙古语。光绪十六年(1890年),有几户蒙古人来此游牧,发现此地有一个水泉子常年流水不息,泉水清澈而透明,是一个好地方,就在此泉子南边建村定居,后将泉子称为“阿如布勒格”,意思是村子北面的泉子。随着历史不断演变,人们谐音叫成了“那拉不流”。

那拉不流系宁城县二龙镇的一个村落,现分为四个自然村——四平庄、蒙古营子、那拉不流、前那拉不流。在日伪统治时

期,这里是一个甲,归三十家子村所辖。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归天义(五区)辖。1946年5月,归天义(六区)辖。同年7月,国民党93军占领天义后,在这里设保公所,归三十家子乡公所辖。10月,划此地为七区的一部分(半游击区)。1947年6月,喀喇沁中旗、宁城全部解放,该村归和硕金营子(七区)管辖。

二、那拉不流村土改斗争和假农会

1947年7月11日下午,七区土改工作团和区部,为贯彻《土地法大纲》召开了全区土改积极分子大会,会后即开始平分土地。区政府决定派公安干部刘占元同志负责那拉不流、三十家子等村的土改斗争和锄奸保卫工作。这天,村长毛振峰(天主教徒)从区上开会回来,比利时天主教神甫雷振东怕的要死,秘密找毛振峰商量对策,于12月4日,由毛出面,找来教徒霍亮、丛汉儒、王世贵、李潜、张祥等12人,在天主教堂会客厅里大摆酒宴。雷振东说:“我把大家找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天主教堂不受损失,请你们保护着。国民党来了,天主教堂还能保护你们。里面的东西,你们给保存好。”饭后,毛振峰将王世贵、丛汉儒、张国柱、杨俊、刘玉林等人叫到另一间屋子里研究:“工作团马上就要进村了,斗争就要开始,咱们研究把农会的班子再充实一下,马上报给区部好迎接工作队进村……”。研究后,毛振峰仍任村长,王世贵仍任农会主任,补充丛汉儒为财粮,杨俊为保管,张国柱为村公安委员,刘玉林为武委会主任。王世贵说:“别看选我当主任,办事得靠大家,好花还得绿叶扶着!”。

12月7日,土改工作队胡占一、魏玉田(系借干,是公安助理刘占元的助手)先到那拉不流,找上农会主任王世贵等人研究召开

全村大会,要求一户也不能落下,开完会后将五户地主留下,关押在农会等候处理。

12月9日,开始对地富“过堂”(审讯)。此时,公安干部刘占元也参加,一个一个讯问完了,刘占元说:“雷神甫呢?”在场的王世贵说:“也在院里呢!”刘占元说:“他怎么没关押呢?”王世贵说:“他就在这院里,也不能跑,他的东西也在这院里,也飞不了。另外,又都是在教的。”刘占元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批评了王世贵说:“你这农会主任怎么当的,本来关押者就有雷振东,你们为什么不关押,还叫他在院子里自在,你们纯粹是在包庇他,你这样领导群众,还能翻身吗?”当场刘占元就宣布撤掉了王世贵的农会主任职务,并将他与雷振东一起押进农会的另一间屋子里。刘占元推举张国柱为农会主任,就到别的村检查工作去了。村长毛振峰、财粮丛汉儒、农会主任张国柱开会研究办法说:“无论如何也得把雷神甫和王世贵放出来。”并找来中间人陈山与刘占元说情。刘占元说:“放出倒可以,必须戴高帽游行!”这样又戴了高帽游街,放回家去。

三、煽动陷害

雷神甫、王世贵放出后,雷在群众当中煽风点火,大造舆论说:“刘占元这小子真可恶,他要给农会干部们要烫个眼。你们到区上告他去,如不整死他,早晚是一个祸害……。”在雷的鼓动下,张国柱、丛汉儒、王世贵等开会密谋,想法干掉刘占元,他们给刘占元搞黑材料说。“刘占元他母亲烧纸节,大操大办;刘占元接收礼物;包庇韩老二到天主教堂要地;押了韩老二,还要给农会干部烫个眼(枪毙)等。他们将材料凑好后,派张祥、杨俊、张国柱、霍亮等十余人到区部告状说:“我们农会的干部不干了。”当时接待的是尹区

委,听了汇报后,立即去喇嘛营子骑兵支队,找支队派出四骑到三十家子将刘占元逮捕,押解到那拉不流农会反省,刘占元在反省期间越狱逃跑一次,又被王世贵、温广风抓获后严刑吊打,致使刘伤痕累累,起不来炕。

四、惨遭杀害

刘占元被押后,神甫雷振东继续鼓动农会的几个干部说:“国民党在平泉不久将要打回来,你们应当早下手整死刘占元,不整死他,咱们都没命。你们找上几个能替咱们讲话的,到时候能异口同声,再找上一两个人顶案的,不怕刘占元不死……。”丛汉儒接着说:“这好办!给他加上一条说他在阜新当劳工时,在井下打死一个人。”王世贵说:“他吓死张凯坐月子的老婆,霸占妇女金溜子,各村给他送酒、肉、包庇地主……”雷说:“这很好,就这么办!”张国柱就去做顶案人的工作,他第一个找到张凯说:“王海风到你家起东西时,把你老婆在月子吓死了,你就说刘占元干的。”张凯答应下来。第二天又找于成林,叫于成林顶替刘占元在阜新当坑长时,打死他的儿子,于成林也应允下来,其他几个干部也分头活动。有下通知开会的,有整理刘占元材料的,有到区部接人参加大会的,有布置会场的,有写报告的,万事俱备,一触即发。

1948年1月20日(腊月初十),那拉不流农会(天主教堂大院),集中有十几个村的代表和本村群众几百人,公审处死公安干部大会。只等任某某部长到来签字问斩。任部长到后,听取了农会干部的汇报后说:“刘占元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是穷苦人,他有错误由政府处理,政府可以判他的刑,你们不能一哄而起随随便便就枪毙他!”丛汉儒、王世贵说:“他的罪恶不轻啊!你不信可以问问在场的群

众啊!”这时,王世贵指名顶案人讲话。张凯、于成林站了出来后,就哭啼啼地说:“刘占元,你还我的儿子啊!刘占元你还我的老婆啊!”此时会场乱成一团,王世贵开始喊口号:“你们说枪毙不枪毙刘占元啊?……”大伙没有人吱声。王世贵又喊道:“同意枪毙的举手!”此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前面的几个人(事先安排的),把手举得高高的,也随着人群的沸动,一个个地举起了胳膊。站在主席台上的任部长对农会干部说:“我是坚决不同意枪毙!”下了主席台骑着马走了。此时,王世贵在台上喊:“大家说怎么办?”下面的群众也跟着几人喊:“枪毙!”正在这时,丛汉儒不知什么时候把天主教堂的一头骡子牵来(拴上绳子),几个彪形大汉就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将刘占元从台前提了起来,有的拳打脚踢,有的扒衣服,很快把刘占元头朝后,脚朝前拴在了骡子的后面,一个骑手跨上马鞍就拖了起来。刘占元愤怒地喊:“我没有罪!我是斗争地主啊!”不少群众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场面,不少老贫雇农哭喊着:“可别拖了!放下!放下!”此时已经拖出半截地了,围观的人在后面跑着也无济于事。他的爱人也赶到了,哭得死去活来。当刘占元被拖出一里地左右没气绝时,假农会事前用二斗小米雇用的杀手刘玉林用三八枪对准刘占元又开了两枪。

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就这样被假农会杀害了,牺牲时年仅 31 岁。

2009 年 4 月 22 日

关于高桥所毕业军事学校的考证

蹇国安

中共承（德）平（泉）宁（城）联合县工委委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十三（冀东）军分区三区队队长高桥，抗日战争时期率领八路军主力部队战斗在承平宁地区，开辟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最后牺牲在宁城八素台（布日嘎苏台）老西沟，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宁城及热河地区的级别最高的中共负责人和军队领导人之一，是著名的抗日英雄。

几十年过去了，关于高桥所毕业的军事学校，有说黄埔军校，有说洛阳军校，有说东北军官学校，表述很多，说法不一。1982年中共宁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所编《党史资料》第一辑第26页有一段考证，具体表述是：“传统记载高桥曾有毕业于黄浦（埔）军校洛阳分校之说。据考究黄浦（埔）军校办停时间的历史，高桥如是该校毕业生，应是（一九）二七年前，按（一九）二七年说，高桥当时仅十一岁，似不可能。有东北军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之说，虽无更多证据，但按其家乡居住，这种说法较黄浦（埔）军校之说贴近。”这段考证，一是没能定论，二是也有错误。高桥所毕业的军事学校的正确表述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亦可表述为“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现就有关情况考证如下。

一、关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允许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于当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人,到会165人,其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占40%,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王烬美、李维汉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作为代表亲临会议。会议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基本政策,被称为新“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自此开始。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的1月24日,孙中山作出“关于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开始筹办国民党的第一所军事学校。由于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故又有“黄埔军校”之别称。“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于1924年6月开学,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国民党),李济深、邓演达任教练部正、副主任,王柏龄、叶剑英任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来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任总教官,同时还有熊雄、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张秋人等共产党人担任教员和负责其他工作,苏联也派出部分教官到学校任教。一批共产党员相继进入该校第一至五期学习,陈赓、徐向前等人是优秀代表。

北伐战争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广州、武汉、南京曾先后有三处国民党的军事学校。三处军事学校,名称虽有变化,但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或者说是“黄埔军校”均为一体,都是一脉相承。

广州黄埔军事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自开始起,国民党中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广州黄埔“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时曾使用“中国国民党党立陆军军官学校”的名称,以排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中的地位。1926年3月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组学校,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全部离开学校,苏联教官回国,学员锐减。1928年5月之第六期只有718人毕业,当时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李济深曾将学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1929年9月10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改学校名称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1930年9月第七期学生毕业后,广州黄埔的军事学校停办。

武汉军事学校。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两湖书院旧址开办政治训练班,后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并将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的学员亦从广州移到武昌就读。12月,又将黄埔军校第五期的炮兵科和工兵科从广州移至武昌。1927年1月19日,学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扩大改组武汉分校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武汉的军事学校停办,被称作黄埔第五期学员被迫提前毕业离校。革命家宋绮云、赵一曼,文学家谢冰莹等人在此校毕业,被称为黄埔第五期。

南京军事学校。1927年底,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与广州黄埔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称。1928年3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名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基本

上是恢复了军校在广州黄埔初建时的名称。学员届亦数按广州黄埔军校顺称。广州黄埔的军事学校停办后,南京的这所军事学校就成了广州黄埔军事学校的延续。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自南京迁往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改组,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关麟徵任校长。1947年孙立人奉蒋介石命令到台湾高雄凤山组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军官训练班,隶属成都军校本部。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将在校的台湾籍学生和国民党高官政要子弟200余人空运台湾高雄凤山就读,在成都军事学校停办。1950年,作为黄埔军校的延续,“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在台湾高雄凤山重建。此军事学校自广州黄埔开始,在大陆共办23期,到台湾续办第24期,至2004年办至73期。

二、关于洛阳军校

洛阳军校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创办于1932年。

1932年1月28日,日军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威逼南京。1月2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作出自南京迁都洛阳的决定,将洛阳作为战时“行都”。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国民党政府于1932年12月又从洛阳迁回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洛阳期间,蒋介石决定筹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洛阳分校建立之前,蒋介石已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调训中央军部队尉级军官1000人。1933年9月,洛阳分校建成,蒋介石兼任校长,祝绍周具体主持校务。校址在洛阳西关外原袁世凯时营建的工兵营。学校在洛阳共办4期,按序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期,南京的1000人为第一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学校迁往陕西汉中。

洛阳军校每期学员 1000 余人,全部采用德式教材,实行德式训练。学校还曾专设韩国人班,为韩国培养抗日军事骨干。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自 1924 年 6 月在广州黄埔创办至 1949 年底迁台湾,在大陆所办的 23 期与各分校及短期训练班在内共毕业 23 万余人。

三、关于高桥所毕业的学校

高桥的亲密战友、三区队副政委郑紫明和三区队党总支书记郝福鸿在世时都曾介绍高桥毕业于国民党军官学校洛阳分校。1982 年本人参加宁城与河北承德、宽城、平泉四县联合组织的承宽平宁抗日斗争史征集编写工作时,曾与平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委主任李世瑞到河南郑州采访当年三区队党总支书记、时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郝福鸿。期间曾有去洛阳查找洛阳军校档案的计划。后因准备采访的当年三区队特派员、时任广东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的赵练要公出,便忙于赶往广州,故没去洛阳。临离开郑州时,拜托郝福鸿利用他工作方面的便利,帮助查清此事。

郝福鸿曾几次去洛阳,但一直没能查到洛阳军校的档案。直到 1985 年 4 月,河南省的公安部门才按郝福鸿嘱托,查到了部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的同学录。记载有高桥情况的同学录为 1935 年印制,记载高桥当时的名字高明海,字镜天,辽宁辽阳人,22 岁,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四期学员。此同学录证明,高桥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第四期无疑。

总览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历史,从 1924 年在广州黄埔创办,到 1949 年迁往台湾,校址虽曾几次迁移,名称也曾几次改

变,但是届次一直延续,是一以贯之的。因其初创时校址位于广州黄埔,当时就有黄埔军校之别称,中间有一段时间还曾被正式命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由于“黄埔军校”这一称谓简练上口,故这一别称在长时间里一直胜于它的本称。例如提到某某人毕业于该学校,一般都说是黄埔几期,而不说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几期。有些人甚至只知有“黄埔军校”而不知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关于高桥所毕业的洛阳军校,其完整的称谓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是广州黄埔“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延续。洛阳军事学校是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分校,并由蒋介石亲任校长,是“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认定高桥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按流行称谓,也可以表述为毕业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

找回高桥头颅的人

李文

1943年5月,为开辟承(承德)平(平泉)宁(宁城)地区游击根据地,中共第十三地委决定正式成立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县办事处。同时,以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一团四连和特务连为基础,组建了第三区队,共300多人,为承平宁地区主力武装,队长高桥,政委黄云(杨雨民)。

由于高桥等人率领三区队转战于承平宁各地,痛击日伪军,严重扰乱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部署,打击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惹得日本侵略者非常恼怒,于是,他们除了在承平宁地区大搞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共产党八路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外,并与1944年3月调集了关东军骑兵旅、装甲兵旅及警察讨伐队等重兵向承平宁地区进行全面扫荡围剿。游击区军民处于非常困难时期,战争环境急剧恶化。为了保存实力,三区队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被迫奉命陆续撤回关内。高桥及部分战士留了下来,坚持在承平宁北部地区活动。

可就在1944年3月29日,高桥及22名战士却在八素台(今布日嘎苏台)老西沟遭遇刘其讨伐队(队长刘其昌)包围,战斗中高桥及17名战士壮烈牺牲。承平宁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三区队队长高桥牺牲时年仅31岁。

高桥牺牲后,尸体被讨伐队运到八里罕,残暴的日本鬼子将他

的头颅铡下挂在八里罕街里示众。日寇还开来了不少部队在八里罕开庆功大会。在庆功会上,日本鬼子奖励了打死高桥的人。庆功会开过后,日寇边将高桥的头颅装入盛着药水的广口瓶,先送往平泉,随后又送去了承德“示众”邀功请赏,在报纸上登“号外”大肆宣传。

高桥的尸体被当地的群众弄个棺材装殓起来草草埋到当时三区宣传部长刘振文的菜园子(街里东头)里了。

高桥的头颅被拿去了承德之事许多人都知道。可是,是什么人将高桥的头颅又从承德找回来了呢?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高桥的头颅是刘英武找回来的。

刘英武,三座店喇嘛沟人。伪满时期他当三座店村甲长。高桥、杨雨民等人领导三区队在宁城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时,他成为两面甲长,与高桥、杨雨民私人关系很好,他家里也藏过八路军,他也暗中帮助过八路军。八路军方面并任命刘英武为三座店村行政委员会主任,任命汤兴舟(也是三座店人)为副主任。1943年8月,高桥、杨雨民指挥三区队一举打下三座店鸦片组合,缴获大烟膏子1500多公斤,派连长秦宝仓率全连人将缴获的鸦片送到冀东根据地。当时就有刘英武的功劳。二区区长贺仲一把二区区部设在大金沟西沟,西沟村地主梁殿英当时是日伪三座店村(是个大村,管辖着几个村)村长、伪满协和会会长兼三座店鸦片组合主任。贺仲一通过宣传教育和让敌伪地方人员写《保证书》、内线人员牵线动员等办法,争取了梁殿英和当时三座店警察分驻所所长吴景显,事前动员并说服了吴景显,这个工作就是刘英武做的,为高桥率队袭击三座店鸦片组合创造了条件。当天,吴景显把所里的所有警察都分派下去收烟干,警察所里人空了,梁殿英也借故回大金沟西沟了。晚上高桥带领三区队战士来袭击鸦片组合,没费劲就把鸦

片组合打下了。

高桥牺牲了,杨雨民、周治国等人及三区队主力此前已转移进关了,宁城地区便由联合县办事处民政科长张立文和张野溪等人坚持开展工作,刘英武跟张立文他们不熟,刘英武以前与高桥联系和活动情况张立文不了解,张立文还听说刘英武当甲长时还曾领着日伪军打死过八路军,于是,张立文疏远了刘英武。

后来刘英武想起了杨雨民,现在知道他底细的人只有杨雨民,就想去找杨雨民。而且他知道高桥的头颅被日本鬼子拿去了承德,日本投降了,他还想去把高桥的头颅找回来,于是主动请求要去承德。1945年冬天,刘英武走到平泉,坐火车去了承德。

当时,热河省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在承德召开,杨雨民时任热河省政府副主席。杨雨民在宁城地区工作时,刘英武给他们办过好事儿,杨雨民知道刘英武。刘英武到承德见到杨雨民后就把来意说明了,杨雨民信得过刘英武,于是千方百计帮助找到了战友高桥的头颅,为了安全起见,杨雨民还给了刘英武一头驴、一支二号盒子枪和一件棉大衣,嘱咐他路上小心。

刘英武在承德盘桓了些时日,一切准备停当,正要往回赶,忽然听说平泉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占了。走平泉不安全,刘英武只好放弃奔平泉,改从北路黑里河从山区往回来,道路难走了,日程也慢了。他是用一只木箱把高桥的头颅装起来,他骑驴把木箱背在自己背上背回来的。由于天寒地冻,路上旅途劳累过度,他走到黑里河就病倒了,一直病了好几天。

农历年前,刘英武终于将高桥的头颅背回来交给县委(这时宁城地区还属平泉县,但也已有了宁城县委和宁城县政府机构,县政府安在八里罕孔家大院,县委安在八里罕金家大院,即现在八里罕中学)。县委把高桥的头颅放在了四合院的西厢房,盘算着过了年,

1946年春与尸体归葬。这次要移葬到北梁,这期间还要做些准备工作。

刘英武又去河东台采石场向石匠订了一块石碑,讲好价钱两石小米把碑做好立上。

1946年“四·八烈士事件”震惊全国,王若飞等人从重庆回延安,因飞机失事遭遇空难。党中央号召全国都要开追悼会。宁城县委商量就把安葬高桥和召开追悼会搁在一块儿举行,两会一起开了。

当年是杨苏纵队驻军在这里,由杨苏纵队牵头操办,县里、区里跟着张罗。那个时候还不太平,国共拉锯,八里罕北梁山顶上的树都放倒了,把砍断了的树再立起来,区小队有人站岗,当一看见北边大道上有国民党兵开过来了,站岗的人就把树放倒发出信号,那时共产党的政府都是“背兜政府”,一得到消息就都转移撤走或藏起来了。国民党军队走大路,他们不去农村,走一段路就支上大炮放几炮以壮声势。等国民党军队过了八里罕河,过了河南杨树林子,县委县政府的人员和区小队就出来或回来。当时叫“跑情况”,一有情况,县里和区里机关说跑就跑。

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在八里罕完小操场举行。把高桥的尸骨扒出来,重新买具棺材,把骨头按人体骨架对好放入棺材里,连头颅也一起放入棺材,在学校操场搭的灵棚。雇了两帮“十王会”,灵棚上的对联,上联是:继承你们遗志彻底解放祖国领土,下联是:踏着你们鲜血坚决消灭蒋家王朝。

石碑是由河东台石匠在山上采石场就凿好磨平,用大车拉到八里罕,直接拉到北梁墓地,在墓地再刻字。石碑正面“高桥同志之墓”六个大字是由当时八里罕完小校长李树范所书,背面碑文内容是由县委农委会主任王东旭撰稿,由三区教育助理张松鹏所书,那

时是趴到石碑上拿毛笔硬写上的,石匠再照字刻出来。当年正闹内战,经常有人打黑枪,很危险,写字的人心里都害怕。

与高桥一起安葬的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二区区长贺仲一。贺仲一是1944年4月18日牺牲的,与高桥牺牲时间仅相差20天,他们俩的牺牲情况相仿。这天,韩全讨伐队(队长韩全福)向西部山区搜索扫荡,在三座店小塘土沟与贺仲一和几名工作人员相遇,因寡不敌众,贺仲一在战斗中牺牲。敌人把贺仲一的头颅割下挂在三座店街西卡子门外一棵大杨树上“示众”。事后,任富昌等群众将贺仲一的尸体掩埋在了大金沟西沟。这次,县委也将贺仲一的尸骨起出来装棺提前用大车拉来,先放在墓地了。

1946年4月11日,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和隆重的安葬仪式。

葬礼开始,把高桥的棺材放在大车上,杨苏纵队的一位领导亲自驾辕拉车,棺材上系两联白大线布,在两边拉着,两帮“十王会”跟着吹奏,农民、学生、干部、地方部队区小队和杨苏纵队的战士都参加了,送葬的队伍一共有几千人。各战线都送了挽联,纸幡挽联飘飘摇摇,送葬队伍浩浩荡荡,从学校操场一直延伸到北梁墓地,场面极其肃穆壮观。把高桥和贺仲一两人都下葬以后,高桥墓前的石碑也同时立了起来。

那刻碑钱两石小米刘英武也没自己掏。有一天,一个大烟鸦片贩子从梁西带着大烟过来,在大金沟让土匪截住抢去了,他来找刘英武,让刘英武想法通融通融把大烟给要回来,刘英武脑子一转,说:“让我去给你把货闹回来倒行,但我有个条件,我要刻一块石碑,连工带料到完成,讲好的,工钱是两石小米,你替我掏了吧”。大烟贩子点头哈腰一口应承。刘英武这个人私官两厢、黑白两道都走得通,没费事就将大烟给他要回来了,给高桥

墓立的石碑也刻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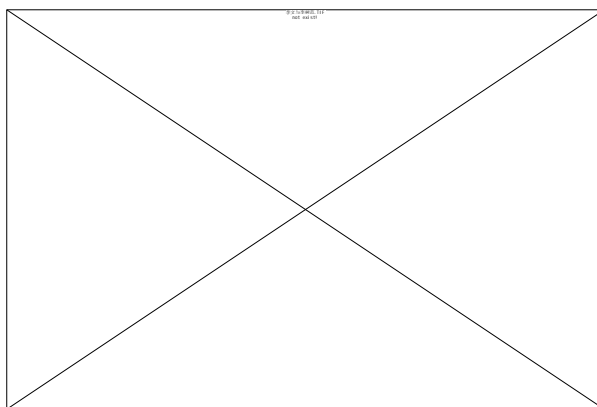
.....

因为某种原因,1946年9月刘英武和汤兴舟一起叛变了,投靠了国民党宁城县警察大队梁殿英,这时梁殿英手下的地方武装被国民党九十三军收编为警察大队了。

1947年3月14日,宁城县支队在大金沟塘土沟围剿国民党宁城县警察大队时,刘英武被打死。

(据采访原教育局长,93岁的李树藩老人记录整理)

2010年1月31日



作者在采访李树藩老人(右)

光荣的历史 伟大的贡献

耿志民 蹇国安

宁城县是革命老区。革命老区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建的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宁城县地方是热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有中共承平宁和宁赤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党的县级领导机构，建有承平宁和宁赤联合县办事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区级政权，有八路军主力部队三区队深入到这一地区，建有多支抗日游击队，在地处伪满洲国境内的宁城及周边地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消灭了日伪军大量有生力量，牵制了日伪军的大量兵力不能用于其它战场，有高桥、陈革、裴文和、李春阳、舒殿友、徐建堂等数百名抗日志士与宁城儿女把最后一滴鲜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宁城县就被中央人民政府认定为革命老区，并曾派老根据地访问团到宁城访问，将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送到宁城人民心中。宁城老区的历史是光荣的，贡献是伟大的。

一、宁城老区历史概述

宁城地区抗日斗争的历史大体可分作自发抗击、找到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取得抗日战争最

后胜利五个阶段。

(一)自发抗击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操控下,“伪满洲国”在长春建立。1933年2月22日,日军向热河发起进攻。3月2日,宁城地区沦陷。

日军入侵宁城及热河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有效抵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热河就全被日军占领,热河地区并入“伪满洲国”版图。日军占领热河和宁城地区之后,便立即着手网罗汉奸蒙奸,收买旧官吏,旧武装,建立反动统治体系,实施残酷的殖民式统治。同时,还在各地修建据点,驻扎日军或伪军,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对日寇和伪满统治的反抗。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宁城人民十分愤怒,民间武装组织红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白枪会的领头人,曾带领会众愤起反抗。

1933年7月,宁城五化宋三家人张占河、班佐亭等,带领宋三家、乌石台沟、山头等地的白枪会、黄枪会会众2000余人,攻打了驻凌源西北地的日军,杀敌10余人,30余名会众战死。

1933年12月,宁城地区的红枪会、黄枪会等群众性武装组织迅速发展,相邻的建平小塘伪警察署日籍指导官嘉荷谷带领日伪军200余人到宁城地区清剿,住到建平小新地。宁城一肯中三爷地人陈国钧、田宗岐,驿马吐人李庄等,组织宁城地区的红枪会、黄枪会等会众主动进攻,参加会众2000余人,50余人阵亡,李庄父子等5人遭俘被杀,日伪军被赶走。

日寇入侵热河地区之后,将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期的税局子改头换面,直接变成日伪统治者残酷盘剥热河人民的工具。在汤玉麟

统治热河的几年里,其残暴地搜刮民脂民膏就十分著名,曾有文人送他“天高三尺”的牌匾,暗喻他已将地皮刮去三尺。日伪实行殖民统治,苛捐杂税更加繁重,原税局子变成日伪的走狗,更加肆无忌惮,集市上收税,老百姓卖一担柴的钱,经常不够落地税钱。挨家挨户收税,常让老百姓没有度日之粮。道路上设卡收税,到亲戚家借几升度荒的米,如被堵住也要被迫交税。各地的抗税事件时有发生,八里罕街里的商铺曾应平泉街里商铺之约罢市,大双庙柳条沟的黄枪会曾砸掉一肯中税局子在路上设的税卡子。

1933 末,宁城头道营子大宝贝台人王清宇、杨志等人在村中组建黑枪会,带领民众习练刀枪棍棒,以武力抗税。头道营子税局子的洪局长为镇压这里的群众,勾结驻在平泉南五十家子的伪国兵第六分队到村中扫荡。伪国兵六分队进村前向村里打了一炮,进村后又纵火烧了村民杨老六的房(黑枪会“设坛”集会处)。日伪统治者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该村群众。王清宇、杨志等人经与附近大黑石、小黑石、平泉南坡、北五十家子等地的黑枪会、黄枪会联系,于 1934 年 3 月下旬,集聚 300 余名会众,袭击了头道营子税局子,杀死税局子内的伪职员 16 人。此次事件给了日伪统治者很大震动。日军驻承德宪兵队、伪满洲国驻热河第五军管区派出 1000 余人到宁城地区镇压,大宝贝台村王清宇、杨开德、尹长好、大百岁、王锅腰等 9 人遭俘被敌人用铡刀铡死,黑里河、平泉南坡等地近百人被抓走,部分人被判刑死于监狱,部分人被送到外地当劳工,没有几人生还。

几次红枪会、黄枪会、黑枪会抗击日伪军事件后,日伪统治者开始对这类群众性武装组织实施残酷镇压,宁城地区的红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群众性武装组织多数被迫解散,少数转入地下。

(二)找到中国共产党

日伪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并没有让英雄的宁城人民屈服。为了躲避日伪统治者的搜捕,曾参加攻打头道营子日伪税局子的头道营子大宝贝台黑枪会“法师”杨志、喇嘛洞黄枪会“法师”李文彪,西泉范杖子红枪会“法师”裴文和等几个人以唱皮影、挑货郎挑作掩护,躲往外地,游走于长城内外。中国共产党在冀东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消息传遍长城内外,使他们知道了中国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领导人民抗日,让他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抗日的希望。他们几个人开始有目的地寻找共产党。1940年夏季,他们在长城脚下青龙县境内与冀东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青山建立了联系,于1940年7月带李青山到宁城地区侦察敌情,了解情况。

李青山在宁城及相邻的平泉、承德地区活动一个余月,于1940年9月回冀东汇报情况。李青山认为,宁城及相邻的平泉、承德地区,日伪统治残酷,人民生活困难,反满抗日情绪高,并有红枪会、黄枪会等群众性武装组织抗击日寇的基础,且山高林密,很适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冀东迁(西)青(龙)地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周治国也曾到平泉地区侦察过敌情,他很赞同李青山的见解。且开辟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努力向热河与东北挺进,是党中央在洛川会议时就作出的决定,是冀东区党分委和军分区一直在努力做的工作。经请示上级同意,周治国立即在游击队中抽调李怀义、李庆轩、李海洲、李长江、陈立民5名共产党员,组建路北(锦承铁路)工作组,任命李青山为组长,带队到宁城地区开展抗日工作。

1940年10月,李青山带领路北工作组到宁城黑里河地区,在李文彪、裴文和、杨志等人配合下,以红枪会、黄枪会组织为纽带,很快发展宁城西泉范杖子林茂庄、李学会,承德三家纪福东,平泉蒙和乌苏姚喜贵等抗日积极分子20余名。

为了开阔抗日积极分子们的眼界，让他们掌握抗日政策和学到武装斗争经验，李青山从积极分子中挑选裴文和、李文彪、姚喜贵、纪福东、林茂庄等 10 人，带他们到冀东参观学习。这些人在冀东学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还跟随周治国带领的游击队参加了攻打宽城峪耳崖金矿日伪军警护队等战斗。在冀东的学习战斗使积极分子们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尤其是攻打峪耳崖金矿，一次杀死守矿日军 21 人，俘虏伪矿警 2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7 支，让他们亲身体会到了日本鬼子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极大地增强了他们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游击队建立。1940 年 12 月，李青山奉命带领抗日积极分子返回宁城黑里河地区，立即组建起了承平宁地区第一支抗日游击队，当时称路北游击队。最初参加这支游击队的有宁城黑里河地区的裴文和、李文彪、李学会、林茂庄、邓云、李学德、胡凤贵、刘占英、刘建材、何僧、贾凤贵、齐青林、齐树林、宋占清、李树林，平泉蒙和乌苏地区的姚喜贵、陈永会、魏国珍、高志福、于义、徐振贵、贾树千、熊占林、张树林、薛金山、张国凤，承德三沟地区的纪福东等计 30 余人。裴文和被任命为队长，李青山任副队长兼指导员。

路北游击队建立之初，没有枪支弹药，仍然使用红枪会、黄枪会时的大刀、扎枪等武器，所作工作主要是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政策，发动群众抗日，壮大游击队，军事行动不多。1941 年 2 月，游击队发展到 40 多人。李青山、裴文和为了培训锻炼队伍，带领游击队到冀东，在迁西渔户寨找到周治国率领的游击队。周治国率领的游击队为两个中队 100 余人，路北游击队随同周治国带领的游击队一起学习，一起战斗，并曾到主力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参观学习。十二团首长十分重视这支诞生于伪满洲国境内的抗日

游击队,带领全团干部战士列队欢迎并发表了讲话,称赞游击队战士们不畏艰险,勇于斗争的精神,鼓励大家与日寇血战到底。十二团还为游击队举行了队列演练与刺杀表演,演出了文艺节目,使游击队员们大开眼界,很受鼓舞和启发教育。

游击队发展。1941年4月,根据长城以外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冀东区党分委组建青(龙)平(泉)工作团,周治国任主任,葛春生、刘汉民任副主任。周治国所率游击队一部分编入主力部队,一部分与裴文和、李青山所率路北游击队被编为青平游击大队,归青平工作团领导。周治国所率部分为一中队,苏百熙任队长。路北游击队为二中队,裴文和任队长,李青山任副队长兼指导员。游击大队长由周万余担任,副大队长刘元存,指导员刘增孝。

青平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开辟长城以外伪满洲国境内热河地区的青龙、平泉一带。自1940年1月1日起,日伪统治者在一些地方撤掉县治,并入旗治,平泉、宁城二县并入喀喇沁中旗,旗治所先设宁城(小城子),年末迁到平泉。青平工作团所开辟地区包括宁城地区。至1942年5月,青平工作团在青龙和平泉南部地区建立了抗日区政权,开辟出抗日游击根据地。青平游击大队,特别是二中队,数次深入到宁城及宁城以北的喀喇沁旗、围场等地,经历宁城热水千层洼、八里罕北场子、西泉哈拉薄荷沟等战斗数次,给了日伪统治者以有力打击,为创建承(德)平(泉)宁(城)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承平宁武工队。1942年5月,按着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分局的指示,晋察冀中央分局十三地委(由原冀东区党分委改组)决定组建三支远征武装工作队,分别出冷口、喜峰口、古北口,深入到伪满洲国境内的热河地区,开辟抗日工作。其中出喜峰口的武装工作队称中路武装工作队,亦称路北(锦承铁路)武装工作队和承(德)

平(泉)宁(城)武装工作队。此路武工队成员最初为 28 人,周治国任队长,李保华任副队长。裴文和、李青山所率青平游击大队二中队被编为承平宁游击队,归承平宁武装工作队领导,后发展为两个中队。

1942 年 6 至 8 月,承平宁武装工作队在承平宁三县交界山区建立起 4 个抗日区政权。宁城黑里河地区属第三区。1943 年 4 月,承平宁武装工作队又在宁城、平泉、凌源三县交界地区建立第五和第六两个抗日区政权,宁城山头石佛等地属第六区。

承平宁武装工作队进入承平宁地区之后,十三地委陆续派遣大批干部到承平宁地区工作,承平宁游击大队不断发展壮大,黑里河西泉朝阳沟人王汉升、魏文龙、李凤祥、张富林、赵占春,热水人纪洪恩等大批宁城优秀儿女参加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员几次补充到冀东主力部队。游击队一中队队长由冀东派来的十三团排长包文胜担任,一区区长姜建舟任指导员。二中队队长由纪洪恩担任,冀东所派红军老战士王茂松任指导员。裴文和因腿曾受伤有残,李青山因不识字等原因被派到区里工作。1943 年 4 月 21 日,周治国、纪洪恩、王茂松带领承平宁游击大队二中队长途奔袭,成功打下宁城中部地区的榆树林子伪警察分驻所和伪粮棉组合,缴获大批棉布,解决了武工队和游击队全体人员的夏季服装。

主力部队。1942 年 11 月,十三地委、十三军分区发动热河南部地区战役,派主力部队十一团和十二团从冀东到热河地区作战。十二团参谋长周嘉美和二营营长杨思路、十一团参谋长苏然(高桥)和三营副营长刘永福率主力部队 1000 余人,深入到长城之外的热河地区作战。11 月 13 日至 17 日,先后有承德上谷、永合火车站,平泉黄土梁子、宁城八里罕伪警察署,承德六沟、平泉洼子店、七沟等 11 处伪警察分驻所被攻克。此次战役行动,有效地推动了

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苏然率十一团三营攻克八里罕伪警察署与黑里河伪警察分驻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首次深入到宁城地区作战。

(四) 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承平宁联合县与三区队。1943年5月，根据承平宁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形势，十三地委决定撤销承平宁武装工作队，建立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政府)，组建由军分区直属并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三区队，进一步开辟和巩固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赤峰人、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杨维华(杨雨民，化名黄云)被晋察冀中央分局从冀中军区调来任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书记兼三区队政委，周治国任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兼承平宁联合县办事处主任，主力部队十一团参谋长苏然(化名高桥)任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兼三区队队长，陈革任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办事处武装科科长，其他负责人有办事处民政科科长张立文，秘书科科长兼财粮科科长宋兴邦等。三区队编制两个连，另有侦察排、副官处、电台队等计300余人。郑紫明任副政委，后增郝福鸿任党总支书记。

地方游击队。承平宁联合县建立之后，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向北发展，又在宁城北部地区和建平西部地区建立起第七区和第八区。地方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先后有李新年、赵洪武、郝瑞廷、李春阳和五、六区基干队建立。

党的建设。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十分重视党员发展和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任命王永为组织干事，具体做党员发展工作。工委书记黄云亲自编写辅导材料用于培养入党积极分子，所有党员干部都注意培养党员发展对象，期间有六区宁城石佛温杖子、石洞子沟，八区三座店丰水山，大双庙烟筒沟，小城子水泉等地周

恩、周德明、翟凤廷、张树举、孟庆元、贾文奎、潘春祥、杨秀章、任中山、金宝善等十几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温杖子等地建立了党小组，丰水山建立了党支部，杨秀章任党支部书记。风水山党支部是宁城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

主要战斗。三区队和各游击队、基干队互相配合，曾发动伏击战、袭击战、攻击战数十次，给了日伪军以有力打击。三区队在宁城地区的主要战斗有：袭击宁城三座店鸦片组合，缴获鸦片 1000 多公斤；与七区队联合在宁城石佛卧龙泉子伏击伪国兵，歼敌一个连，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 30 余支；在平泉大沟诱歼驻宁城石佛谢杖子日军山本守备队，击毙守备队队长山本、副队长东山岛以下日军 30 余人，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 19 支，手枪 2 支，掷弹筒 2 具；在宁城山头下坡子夜袭黄土梁子伪警察队，俘虏伪警察队人员近百人，缴获长枪 87 支，手枪 3 支，马 2 匹；袭击宁城县原县城小城子警察署与粮棉组合，俘虏伪警察 6 名，汽车司机 1 名，缴获棉布 238 匹，伪币 10 万余元。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苏中报曾报道战况。游击队在宁城地区的主要战斗有：袭击凌源宋杖子火车站击毙日本关东军高级特务马场；伏击伪喀喇沁中旗协和队；击毙伪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与宪兵分队长夏谷；袭击喀喇沁新开坝、八里罕三岔口、黑里河大营子警察分驻所等。

党的地下工作。1942 年 5 月，八路军太行军区敌工部派一二九师敌工干部金荣九到他的家乡锦州开展地下工作，了解伪满洲国境内日伪统治者的政治军事情况。金荣九发展曾在辽吉黑民众抗日救亡后援会工作过的中学同学张一字、爱国教师赵品泉等人组成敌工小组，在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地发展十几位关系人，搞到大量情报。张一字有一堂兄张占一早年到宁城一肯中经

商,后在一肯中置地安家,张一宇曾在其堂兄家小住一年,在宁城结交了爱国民主人士韩祐庵等很多朋友,对宁城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们也曾到宁城地区了解情况,知道了宁城地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有八路军主力部队三区队。锦州距离太行地区远,情报传递十分不便,金荣九、张一宇就在宁城地区发展关系人,寻找三区队,希望能就近与党组织建立联系,传递情报。在韩祐庵等人的协助下,金荣九、张一宇于1945年8月5日在宁城存金沟小梁子找到了三区队二连,见到了二连连长张永胜(舒殿友)。经舒殿友向区队政委黄云、队长高桥汇报,金荣九、张一宇于一周后在承德小建厂沟见到了黄云和高桥。黄云、高桥用电台与上级联系,确定了金荣九的组织关系,金荣九、张一宇开始在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和三区队领导下工作,大量情报通过三区队的电台快捷地传递到了冀东和太行军区。

(五)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各方面战场捷报频传。1945年8月8日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日宣战,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步伐。8月17日苏联邦第十七集团军第八旅进抵宁城。8月18日八路军冀东主力部队在平泉小寺沟与苏军会师,宁城地区彻底解放。8月24日活动在宁城地区的承平宁联合县民政科长李惠友,宁赤联合县办事处主任张立文等负责人带领武装工作队人员开始在宁城马占城子等地接收日伪政权。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9月3日中共平泉县委、县政府成立,辖原日伪喀喇沁中旗地域,即平泉、宁城两县地方。全县建12个行政区,现宁城县地方4个区,分别为第三区(八里罕)、第四

区(小城子)、第五区(天义)、第六区(山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胜利。

二、宁城老区的牺牲与贡献

日军占领热河与宁城地区之后,即把这一地区并入伪满洲国版图,建立殖民统治体系。初期,日军将一些有一定中国背景的人员派入各有关部门,充任参事官、指导官,掌控各个有关部门的实权。如米泽四郎进入宁城县政府,仁科信夫进入喀喇沁中旗王府,稻田秋佐进入巴爷府,其他各部门也有大批日本人进入。就连为数不多的几所学校,也都是由日本人控制。如当时的喀喇沁中旗蒙古族小学,就是由一位名为朝水武男的日本人担任了校长。各地的伪警察署,更是有大批日本人进入。所有部门的实权实际都是由日本人把持。

1939年之前,日伪统治者沿用旗县分治体制。1940年1月1日,日伪统治者为了标榜“日满一家”、“满蒙一家”,在有旗治撤掉县治,并入旗治,平泉、宁城二县地方县治撤掉,统一并入伪喀喇沁中旗。旗公署先设宁城小城子,1940年11月迁到平泉。现宁城县区域范围设21村228甲,6处伪警察局和28处伪警察分驻所,建立了庞大的伪警察机构与纪东阁、韩全福两支伪警察讨伐队,并派驻日军守备队和整营建制的伪国兵,以保证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实施。后期,还调曾在东北围剿过抗日联军的刘其(昌)、王熙(祉)、曲焕(文)等讨伐队到宁城地区。最多时,日伪在宁城地区的总军(警)兵力曾达万人之多。

为了割断抗日军民之间的联系,日伪统治者自1942年起开始在宁城地区实施集家并村,集家地域涉及现在行政区划13个乡镇

的 10 个乡镇，集家面积占县域面积的 60% 左右，共建集家部落 153 处，并掉自然村 630 多个，进部落 7200 多户 30000 余人。集家并村给宁城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与损失。1951 年中央访问团到宁城访问时所调查的资料记载：八里罕三岔口一处集家部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死掉 100 余人，其中有 6 户死绝，最多一户 7 口人。第四区（黑里河）拐棒沟、打鹿沟等 4 个村，就有 1127 间房屋被烧毁或扒掉，271 条牛，17 匹骡马，41 头驴，764 只羊，6 麻袋鸡被掠走，郎福才、任福有 2 人被活活打死。第十二区（八素台，现布日嘎苏台）张麻子沟二道沟自然村，集家前有 12 户 63 口人，房屋 40 间，牛 37 条，驴 7 头，216 亩耕地。集家时房屋全被烧掉，土地全部荒芜，牛驴全被掠光，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只剩 8 户 42 口人。据建国初期统计，宁城县范围内在日伪集家并村时，有 1 万余间房屋被拆被烧，1 万多头牲畜被抢掠，4 万多亩耕地荒芜。

几年中，在宁城地区牺牲的抗日军政人员有：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三区队队长高桥；中共承平宁联合县工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办事处武装科长陈革；承平宁联合县二区区长贺仲一；三区队二连连长舒殿有，区队直属队副官刘相廷，排长徐建堂；青平游击队大队长刘元存；三区队战士王汉三、张振海，游击队战士巩书安、熊占林、张振远、高志福等 200 人之多。有赵洪武、郝瑞廷、李春阳三支游击队全部战死在宁城地区；有裴文和、纪洪恩、宋占清、邓云、张振海、崔连生、刘斌、王殿清、王清宇、杨开德、陈国钧、田宗岐、李庄等 20 余名宁城优秀儿女为抗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以雾灵山为中心，深入到敌后之敌后的伪满洲国境内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重要决定之一。宁城及周边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建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伪满洲国境内与日本侵略者及其伪满洲国的

反动统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意义十分重大。1951年9月5日至9日,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代表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曾到宁城县的第四区(黑里河)、第十一区(陶家营子)、第十二区(八素台)进行了访问,向50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颁发了纪念章,向96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颁发了毛泽东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亲笔题词,这是宁城县历史上的一大殊荣,宁城人民会永远为此而骄傲!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始终不忘老区和老区人民,在政治上关怀,政策上倾斜,经济上扶持,使老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有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有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有老区人民的不懈努力,宁城老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三区队部分战士跳崖 事迹发现经过追述

蹇国安

内蒙古宁城县南部朝宝沟川有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村名叫李营子。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有部分八路军战士跳崖牺牲。因事情是发生在夜里,当地群众只知道是八路军,但不知道是什么队伍,也不知道战斗的具体情况,事情一直尘封了 40 年。

1982 年我在共青团宁城县委工作,受县委委派到河北平泉参加承德、宽城、平泉、宁城两省区四县联合组织的承宽平宁抗日斗争史资料征集编写工作,历时接近三年。三年的时间里,曾三次邀请当时还健在的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承平宁地区工作和战斗过的老同志到平泉参加座谈会与审稿会。这些老同志中有时任辽宁省丹东军分区司令员、当年三区队二连二排八班班长兼文化教员董国政。董国政每次参加完会议之后,都到宁城寻找他所在部队当年跳崖的地方。因当时三区队是第一次到那个地方,而且是队伍刚进村时间不长就发生了战事,董国政没有记住具体地名,只是对周围环境有深刻印象。他在时任宁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德林同志的陪同下,虽然走遍了宁城很多悬崖峭壁处,也没有找到具体地址。最后一次是 1984 年 9 月,再次寻找无果,董国政准备放弃了。张德林是宁城人,对宁城的地理情况十分熟悉,他说榆树林子范杖子前

山南坡也很陡,是不是再去那里看看,董国政同意了。第二天张德林有事,他让我陪着董国政前去。

当时宁城县委用的车还是北京吉普“212”,开车的师傅是霍占英同志。我们一早出发,去范杖子前山南坡。范杖子虽然在县城天义附近,但其前山南坡却在驿马吐川,要到几十公里的石佛卧龙泉水才能从那向北进沟。当时的路十分难走,到范杖子前山南坡山脚下已近晌午。山脚下的小村庄叫潘拐子沟,归当时的石佛乡管辖。到这里,董国政只简单地看了一下,便说地形不像,不是这里。

从潘拐子沟出来,董国政准备回平泉了。当时回平泉要从凌源走,路经山头。山头是当时山头乡政府所在地,因时到中午,我们去乡政府的食堂吃午饭。时任山头乡党委副书记的霍殿荣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说他们乡的马营子村李营子前山当年摔死过八路军,是不是那呢?董国政听了为之一振,吃过饭就邀请霍殿荣同志陪我们去马营子。

马营子在朝宝沟最深处,车到胡营子就不能向前开了。在胡营子问当地群众,几位上了年纪的人已能把事情说个大概。他们说当年的八路军是住在西南沟,夜间讨伐队去打,有人在李营子前山摔死了。车到不了李营子,我们就去了西南沟。西南沟在胡营子西南方向。到了西南沟,董国政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右手一拍大腿,指着村前山顶上的一棵树说:就是这里,那棵“独立树”还在。“独立树”是一军事术语,是对有地形标识作用孤树的称谓。

经与村里上些年纪的人交谈,他们的忆述与董国政的记忆完全吻合。村里人说,小日本垮台前一年春天的一天夜里掌灯以后,他们村里来了一帮八路军,想在村里住下。八路军刚做上饭,敌人就来了,八路军就顺着山顶往西边去了。有一个兵犯了“羊羔疯”(癫痫),另一个当兵的背着他走,落在后边,被敌人一枪都打死

了。还有一个兵掉到大沟里摔断了腿,被敌人抓住了,其余人去哪里就不知道了。听说他们到了李营子那边,有在李营子前山摔死的。村里人还说,第二天上午,敌人把全村的人都集中起来,给大家开会,当着全村人的面,把那位摔断腿的兵用刺刀刺死,把他的头和那两位被打死的兵的头割下带走了。又过一天,敌人又把附近马营子、胡营子、孙营子的人都赶到西南沟,当着众人的面,把西南沟人李文章的头用马刀砍下,说他“私通八路”。原因是那天敌人奔西南沟,在路上曾遇见李文章,问过他村里有没有八路军,李文章说没有,这样就把李文章杀了。关于那棵独立树,村里人说那是他们的“老山神”,在那长了好几辈子了,从来没有人动过它。

董国政的记忆是,1944年2月6日三区队打下宁城(小城子),敌人调重兵围剿三区队,兵力上万,到处都是敌人。三区队为了执行坚持承平宁地区的命令,完成打击和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划作小分队与敌人穿插作战。1944年3月11日日落之后,三区队二连连长舒殿友带领二排、三排50余人,到了宁城南部一个村庄,准备在那里吃晚饭休息一下。这个村的一个人说那里地处沟口,不安全,派人把他们送到了另一个在山沟里的小村子。进这个村子的时间已是晚上9时多。部队进村,即开始支锅做饭,董国政负责带班站岗。饭还没做熟,董国政发现有敌情,即向连首长报告。当时部队的子弹已经打光,舒殿友立即带领部队冲上西边山岗,敌人也尾随追来。当是虽是农历二月中旬,但是阴天,没有月光,双方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谁也看不见谁。舒殿友带领队伍向西突围,走到一处山顶,前面是悬崖,看不清悬崖多深,后面是敌人,能听见说话声。三区队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对这一带的地形不是很熟悉。在打无子弹,行无去路的情况下,舒殿友与指导员马九荣等几位负责人研究决定,跳崖突围,宁可摔死也不当俘虏。如果悬崖不是太深,可

成功突围。于是,50多人毅然跳下悬崖。在董国政的记忆里,悬崖不是太陡,约有50左右米深,干部战士们跳下后,有连队司务长刘相廷等8人当场牺牲,连长舒殿友头部受重伤,他本人右脚跟被挫露脚骨,其他人也程度不同受伤。指导员马九荣轻伤,他组织幸存的人清理一下战场,用步枪作了一副担架,抬上舒殿友,甩开敌人,进入对面的后山。走到后面山里的一个山口时,舒殿友牺牲,战友们捡石块把他葬在了那里的山坡上。第二天夜里,这支队伍进入黑里河地区。董国政说,那位犯“癫痫病”的战士姓聂,是冀东人。西南沟的人说让队伍到西南沟来的人是孙营子北沟当时的十家长朱兰廷,带路送来的人是他的侄子朱文才。

当时,西南沟的群众也不知道是什么队伍,只知道是八路军。直到亲历者董国政40年后来访,他们才知道是三区队。董国政很想到李营子前山看一看,但当时路况不好,车开不进去,步行路还很远,董国政的年事已高,在大家的劝说下,他很遗憾地离开了西南沟。遗憾之余,他又感到很欣慰,说40年的心愿总算了了,找到了这个地方,知道了那些战友的牺牲地,让当地人民知道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算是可以告慰那些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友了。他当时嘱咐我,一定要把一些具体情节搞清楚,写入抗日斗争的历史。

根据董国政和西南沟群众的忆述,经进一步调查了解,三区队二连连长舒殿友率队跳崖这一英雄事迹写入了《承宽宁平抗日斗争史》(初稿)。1985年11月,我又写了一篇《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跳崖小记》,刊载于1986年1月政协宁城县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宁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将这一尘封了40余年英雄史事昭示给了宁城人民。

《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跳崖小记》一文曾引起担任过中共宁城县委副书记,后任政协赤峰市委员会副主席的布和同志的注意。21

世纪之初，他曾带领赤峰市有关部门人员亲临李营子召开群众座谈会，进行详细考证。

2011年3月17日，笔者再次到李营子。时过66年，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艰苦岁月的人已经找不到，但是提起当年曾有八路军牺牲在他们家门前的事，几位中年人都能说得很详细。谷振东，1961年生；高文武，1960年生。他们说，老人们在世时经常念叨，满洲国时前山摔死过八路军，8个人，还有一个走到山后死了。8个人中有一个可能是管账的，身上背的兜子里有账本和满洲票子。这8个人当时被村里高万盛等人安葬于村西山脚下。1972年由当时的山头公社组织移到西南沟村后黄土坡，山后的那个人也移去了，与死在西南沟的八路军葬在一起，当地人都称呼那里为“八路军坟”。1980年那些坟又被移到地处朝宝沟村的山头乡烈士陵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五化镇委员会、五化镇政府在当年9壮士牺牲地李营子村前的山崖下修建纪念碑一座，镌刻碑文，详细地记述了当年发生在宁城县境内的这一悲壮的英雄事迹，让人民永远牢记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操和爱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永久振兴而奋斗。

受五化镇党委、政府英明举措之感染，特将当年八路军冀东军分区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英勇跳崖这一英雄事迹的整个发现过程作以上具体追述，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事迹的具体详情。

附：照片及碑文碑记

1944年2月6日，八路军冀东军区三区队在队长高桥、政委黄云指挥下，一举打下热北重镇、宁城县原县衙所在地宁城（现名小城子），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延安新华社、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苏中报曾报道战况。日伪统治者调重兵到宁城地区扫荡，三区队划作小分队与日伪军穿插作战。3月11日夜，二连连长舒殿

友率两个排在宁城山头朝宝沟沟里马营子西南沟与日伪军遭遇,子弹打光,撤退到李营子前山遇到悬崖,全体干部战士 50 余人誓死不作俘虏,毅然跳下,舒殿友等 9 人壮烈牺牲,其余人突出包围。现原山头乡已并入五化镇。五化镇党委、政府为了永久昭彰革命先烈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革命老区人民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奋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之际,于当年壮士们跳崖之处修建纪念碑一座,铭刻碑文,详细记述了这一革命历史事迹。

碑文:抗日九壮士纪念碑

碑记:1944 年 2 月 6 日,八路军冀东军区三区队攻破宁城(小城子),日伪调重兵扫荡,三区队为完成打击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划为小分队与日伪军穿插作战。3 月 11 日夜,三区队二连连长舒殿友率 50 余人在西南沟与强敌遭遇,突围至李营子前山,在子弹打光,周围地形不熟的情况下,全体干部战士誓死不作俘虏,毅然跳下悬崖,舒殿友等 9 人壮烈牺牲,其余人突出包围。

为缅怀先烈,昭示后人,特树碑立记。

中共五化镇委员会

五化镇人民政府

公元二〇一〇年七月

1946 年国民党 93 军在宁城的情况

蹇国安

1946 年 6 月国民党 93 军奉命自香港乘美国军舰北上。93 军系云南龙云、卢汉所部，军长卢濬泉为卢汉之幺叔。下辖暂编 18 师与暂编 22 师。暂编 18 师师长许义濬，副师长李长雄。率 3 个团。第一团团长宋德裕，第二团团长安永松，第三团团长保如光。暂编 22 师师长龙泽汇，所率第一团团长邹谷君，其他团待考。7 月下旬，93 军接替石觉所率国民党 13 军进驻叶柏寿、天义地区。暂编 18 师驻天义，暂编 22 师驻奎德素。9 月 12 日，暂编 18 师副师长李长雄奉命率第一团、第二团及炮兵连进驻乃林，保如光率领第三团进驻小城子。热辽军区部队攻打乃林的时间应该是 9 月 18 日至 21 日，由于暂编 22 师派邹谷君率第一团及坦克从奎德素区增援，热辽部队撤出战斗，暂编 18 师的第一团和第二团撤回天义。小城子战斗发生在 9 月 23 日至 25 日，主攻部队是热河省军区十三旅（旅长黄鹄显）的 37 团、39 团与热辽军区十七旅（旅长何能彬）的 49 团。热辽军区 16 旅（旅长张德发）的 47 团、48 团，17 旅的 50 团及骑兵团负责打援。国民党军队去小城子增援的是从乃林撤回天义的暂编 18 师的第一团、第二团及邹谷君所率的暂编 22 师第一团。以上是双方参战的具体部队与时间。

国民党 93 军原系云南地方部队，部队官兵反对打内战的情绪较浓。这些部队撤回云南后，多数在 1949 年 12 月随卢汉起义。

龙泽汇,彝族,云南昭通人,为龙云之侄,卢汉之内弟。1946年在宁城时为少将师长,1948年3月任第93军副军长。1949年10月任第93军中将军长。1949年12月9日率部随卢汉在昆明起义。曾是协助卢汉起义的左膀右臂之一,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副军长、云南军区副军长,云南省林业厅厅长、云南省体委副主任、云南省第三至五届政协副主席,云南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云南省委主任委员。是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1年3月3日病逝昆明。

后 记

政协副主席 赵秀春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文史资料具有补史之遗、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独特功能，其价值和作用的确是不可替代的。有些珍贵的文史资料，甚至可以填补某个时期史学研究中的空白。



重视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县历届政协的一个光荣传统，自政协成立以来，共出版《宁城文史资料》8辑，专辑3辑。各辑出版时间如下：

- 1985年出版第一辑，编辑沙万川 王维新 吴殿珍 周凤玉；
- 1986年出版第二辑，编辑沙万川 周凤玉；
- 1989年出版第三辑，编辑沙万川 周凤玉；
- 1995年出版第四辑，主编陶文仕 马启光；
- 2003年出版第五辑，主编李凤忠；
- 2005年出版第六辑，主编索平安；
- 2009年出版第七辑，主编赵宗源 编辑索平安；

2013年出版第八辑,主编索平安 副主编韩士宾;
2005年出版《宁城革命历史档案文献选编》,主编马昆;
2007年出版《宁城名人名景名胜古迹选编》主编张荣,编辑索平安;
2009年出版《喀喇沁中旗驸马府之兴衰》作者乌教菊,编辑索平安。

由于历史原因,如今在宁城已很难找到一套完整的《宁城文史资料》,因此,为满足社会各界的需求,县九届政协决定出版《宁城文史资料》合订本。

在编辑本合订本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1、编辑时恪守实事求是的方针,注重“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注重以史为鉴,注重文章质量;突出地方特色;力求精品流传,力求反映宁城重要人物、重大事件。

2、合订本收录了1-8辑和《宁城名人名景名胜古迹选编》部分内容,本着详古略今,详事略人的原则,对部分现代内容进行了删减。为了方便阅读和携带,按照目前统一规格,对书的尺寸和字体进行适当放大,订正了个别字词句。

3、便于查找和阅读,本合订本按历史沿革、人物春秋、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社会沧桑、史海钩沉六部分进行了重新分类,顺序排列,按1-8辑顺序排列,《宁城名人名景名胜古迹选编》放在后。

4、编辑时,尽量保持文章原貌,内容基本不动,以体现原书编辑人员的良苦用心和文稿风格。但对个别文章亦进行了适当删节或补充完善,对有些资料补充了图片。

在编辑中,为了保证《合订本》能够有助于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有助于巩固和扩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且又具有宁城特色,参与编选的人员尽力做到精选细审,对遇到的问题,反复斟酌研究,

认真考察文献资料,凝聚了编审工作者的心血。但是,由于受到能力和水平诸因素限制,加之时间短,本合订本还可能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敬请各界同仁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此书出版,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得到了县政协各委室的密切配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3年5月